

书史译丛

书史导论

〔英〕戴维·芬克尔斯坦

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 著

何朝晖 译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书史译丛

书史导论

(英) 戴维·芬克尔斯坦

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 著

何朝晖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David Finkelste in and Alistair McCleery
AN INTRODUCTION TO BOOK HISTORY
© 2005 David Finkelstein and Alistair McCleery
Routledge, 270 Madison Ave, New York, NY 10016
(根据美国罗德里奇出版公司2005年第一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史导论/(英)芬克尔斯坦,(英)麦克利里著;
何朝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书史译丛)

ISBN 978 - 7 - 100 - 08473 - 4

I. 书… II. ①芬… ②麦… ③何… III. ①图书史
—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139916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书史导论

[英]戴维·芬克尔斯坦
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著
何朝晖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8473 - 4

2012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²/₄

定价: 36.00元

目录

中文版序	1
译者前言	5
前言	13
第一章 书史理论	23
引言	23
书史的起源	24
麦肯锡与文本社会学	26
书史 (histoire du livre)	29
交流圈	30
生平 — 著述意义上的交流圈	32
新理论的介入	34
印刷文化与书史	36
建立西方文化史上书籍崛起的模型	38
作者意图	44
阅读与书史	47
书史与媒介	50
小结	51

第二章 从口头到书面 53

引言53

通过书写实现的社会交流54

口述传统59

技术变迁63

书写、权威与个人67

书写与权力70

小结76

第三章 印刷的诞生 77

引言77

印刷术发明前的书籍78

延续与变迁82

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86

德国的古腾堡89

宗教改革93

文艺复兴96

知识与力量99

启蒙运动102

工业革命104

漫长的 19 世纪109

知识产权111

平装书的发展112

20 世纪后期及其以后114

小结115

第四章 作者、作者身份与权威 117

引言117

手抄本文化与“作者”118

权威与作者的角色120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者122

保护人制度125

保护人、出版商与公众128

作者、版权与报酬130

工业时代的作者133

对作者功能的诠释137

小结142

第五章 印刷商、书商、出版商、代理 145

引言145

变迁中的商业模式146

输出印刷传播方式153

印刷与民族凝聚力157

审稿人与代理158

文学场域与网络163

小结166

第六章 读者与阅读 167

引言167

阅读的历史170

开端170

中世纪	174
印刷书	177
阅读的局限	181
畅销书的发展	183
工业化的阅读	186
阅读的性质	188
小结	190
第七章 书籍的未来	193
引言	193
技术决定论	194
媒体全球化	198
读者之死	204
国家的角色	208
小结	211
结 论	213
参考书目	217
术语表	237
索引	243

中文版序

戴维·芬克尔斯坦 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

本书是书籍史研究的入门之作。在书籍的发展史中，中国提供了许多关键性的技术革新。首先是纸的制造。纸的出现，使发达国家书籍生产和发行快速发展，因为它为印刷提供了一种廉价的介质，其植物原材料相对容易获得。现在进口纸张的价格如此昂贵，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土出版举步维艰，这提供了一个反例。

人文科学的成就喜欢使用个性化的叙述，而不是透过实验和知识传播来描述知识的缓慢增长。于是长久以来纸的发明就和一个叫蔡伦的汉朝宦官联系在一起，他在约公元105年将造纸流程的详细报告上交给皇帝。根据后来的记载，蔡伦的革新利用了诸如树皮、大麻、破布和鱼网等材料，最终取代丝帛成为了一种更廉价、经济的书写材料。于是，破布，无论是棉布还是麻布，成为了最主要的原材料，因为它有着稳定和相对丰富的来源，尤其是在城镇。到公元150年，纸张的使用和制造已经传到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后来又传到朝鲜、越南和日本。在以后数百年里，纸张的使用和制造技术通过主要的商路传到中亚。到1150年，西班牙的摩尔人工匠已

经开始造纸，并最终从那里将造纸技术传播到整个欧洲和西方世界。

来自中国的第二个重要创新是墨。说英语的国家称之为“印度墨”，但在欧洲其他国家则称之为“中国墨”，这个称呼显示了它传播的起点。它是一种固态墨，最初中国人用它来拓印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后加以完善而成。墨用燃烧松木的烟灰，加入胶料和其他辅料混合而成。关于墨的发明有各种传说，不管怎样，墨很早就在中国普遍使用，尤其是用于书法。固体墨锭的便携性使它们得以传到中国之外（包括印度），最后传到西欧。西欧对制墨方法加以改进和改造，用于印刷。

如果从追溯其影响和被采用（或改造）的过程来看的话，一个更具争议性的要素是中国发明了雕版印刷。这起源于其他两种实践：石碑拓印——为了恒久不易，文本被刻在石头上，通过把润湿的纸铺在石碑上，刷上墨，文字被转移到纸上；盖印——在金属或石料上刻上反向凸起的文字，沾上墨后盖到纸上。更复杂的形式是纸币的生产，曾令早期到访中国的欧洲人惊叹不已。在木板上结合以上两种实践，用以复制以往刻在石头上的文本，对大部分中国学者来说就代表了印刷的发明。自然，它使得文学作品和教科书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

然而，这项发明与后来古腾堡的发明不同。古腾堡的金属活字铸造法，只需造出相对很少的活字，30个罗马字母而已，而中文字数则有3万个以上。

虽然中国也发明了木活字并得到应用，但它们比起木版来，在时间和成本上都不太经济。这显示书籍史并没有表现出一种狭隘的技术决定论。它必须考察范围更广的书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不仅要包括生产，还要包括发行和接受。在这样做的时候，它就利用了第一章所要讨论的罗伯特·达恩顿“交流循环”中的所有要素。

这些要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难以分离。例如早期的匿名著作，一旦从口头变为书面形式，就要赋予它们一个作者——就像我们对待某项发明那样，认为肯定有一个确定的人写了它们。《西游记》是以玄奘到印度朝圣的传说为依据的，其最著名的版本是明代匿名出版的一个雕版印本，但是后来它被认为是学者吴承恩的著作。看起来似乎用这种书写形式固定下来的文本需要有一个创作者；它也优先承认最先成形的文本的完整性。对那个文本和那个作者的保护，其结果就成为一种写在许多版权法中的法定权力。进而这种权力成为一种可交易的商品，支撑了当代的出版业。因为这个产业在一个全球市场运作，它就要寻求国际版权的协调，以确保公平的贸易环境。中国通过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组成部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成员，成为加入这种协调的国家之一。

书史还要从这里继续走向数字出版、网络出版。这本书里所描述的书史与当下技术发展的相关性，可以从每一阶段支持和反对印刷和文本创新的

各种观点中看出。在从口头到书写、再到印刷形式的转变中所表现出来的瓦解，然后最终被吸收进社会之中的过程，今天又在从印刷到基于屏幕的网络媒体的技术变迁中重演。历史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在闲暇时有机会重新审视那些反映和关涉技术和社会变革的原则和价值。书籍仍然有价值，它们被吸收进新的媒体环境中，在读者与文本之间造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本书对此的探讨仅仅只是第一步。

译者前言

何朝晖

“书史”这一名称，对中国学术界来说并不陌生。早在1931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陈彬龢、查猛济著的《中国书史》。新中国成立后，刘国钧、郑如斯等学者又相继编有《中国书史简编》、《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等以“书史”为名的教材和参考资料。此外，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大量书籍编纂史、出版史、发行史、收藏史等方面的论著，都是中国书史研究领域的丰富成果。

这些著作关注的焦点是书籍本身的发展史，即书籍的形制演变、编纂、出版、流通、收藏等等，反映了中国书史研究的独特学术理路和传统。米盖拉 (Michale Bussotti)、贾晋珠 (Lucille Chia)、包筠雅 (Cynthia Brokaw) 等研治中国书史的海外学者曾评论说，这些研究比较重视书籍的物质形式和生产技术，对书籍的文化意义和书籍背后的社会史的研究则有所欠缺。^{*} 最近20年来，一批海外汉学家致力于用一种不同的视角和理念，开拓中国书

* Michale Bussotti, "General Survey of the Latest Studies in Western Languages on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in China," *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y*, n.s., vol. 16(1998), pp.53-68. Chia, Lucille. "Mashaben: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Jianyang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In Paul J.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p. 284-328; 446-5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Cynthia J. Brokaw.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n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3-5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史研究的新领域，写出一种别具新意的中国书史。^{*}他们更为关心的，是书籍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书籍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周遭环境的关系，以及书籍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

这些海外汉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坦言，其理论与方法借鉴和移植了几十年来西方书史研究的发展成果。

这里所说的书史 (book history)，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在突破传统文献研究樊篱的基础上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它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及其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统合关于书籍的各种研究——编辑史、印刷史、出版史、发行史、藏书史、阅读史——的全面的史。书史不仅是这些局部或侧面的集合，更因为把它们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富有更深广的内涵。它又不仅仅是关于书籍自身的历史。书籍不是孤立存在、凌虚蹈空的，它在每个阶段表现出来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都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与书籍有关

* 参见何朝晖，“另一种‘书史’”，《读书》2010年第5期。梅尔清，“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刘宗灵、鞠北平译，《史林》，2008年第4期。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史林》，2007年第5期。周绍明 (Joseph McDermott) 著、何朝晖译《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附录“本书所涉及相关书目的说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的各种思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都是书史研究的对象。因而它绝不仅仅是书籍本身形制和内容的演化史，更是一部社会史、文化史、传播史。这决定了它必然是融汇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由来自多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的研究领域。研究书籍的形式、内容、版本、整序、校勘、辨伪等，是目录学家、文献学家的领地；探讨阅读习惯、阅读心理、读者对书籍的接受机制、文本意义的主宰者，文学理论家驾轻就熟；考察书籍生产传播模式的演变及其与社会历史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是历史学家的拿手好戏；社会学家对于深刻地阐明书籍的社会属性、书籍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能够做出重要的贡献；传播学家则以其独特的视角洞悉书籍的本质，对书籍的前世今生以及未来做出解释和预见。书史是一门融合了多学科智慧的学科。这从本书所论及的璀璨群星中即可见一斑：目录学家和图书馆学家有麦克科洛、格雷格、鲍尔斯、亚当斯、巴克、马丁，文学理论家有麦肯锡、麦克盖恩、奥恩、麦克卢汉、巴特、伊瑟尔、菲什、热奈特，历史学家有费费尔、达恩顿、夏蒂埃、爱森斯坦、金兹伯格，社会学家有福柯、杜吉德等。^{*}

在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学者注意到书史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的

* 这里的学科划分主要依据这些学者所取得的学位和服务的系科，但并不是绝对的。不少目录学家出自英语文学专业，奥恩的学术成就则跨越文学、历史、哲学、传播学等几个领域。

兴起，以后又陆续有学者撰文介绍西方书史研究的动态。^{*}进入新世纪，出现了几篇深度评述西方书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论文，^{**}同时一批西方书史研究著作陆续在国内翻译出版。^{***}西方书史的研究成果正在全面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然而目前对西方书史研究成果的引介在广度和深度上仍有欠缺，一些重要的方面还存在遗漏。另一方面已翻译出版的西方书史研究论著多是实证性研究成果，理论性著作尚付阙如。全面系统地把西方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介绍给国内学术界仍是当务之急。这正是译者翻译本书的初衷所在。

本书从书史理论沿革，口述、书写、印刷、数字出版等各种传播模式的发展演变，作者观念、作者身份的形成与变化，书籍生产传播流程的各个

* 比较早的有安占华“法国书籍史研究简介”，《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期。此后如彭俊玲、陈峰、夏李南、张明辉、孙卫国、王余光、许欢、陈俊启等都曾撰文介绍。

** 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史林》，2007年第5期；于文，“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于文，“‘书籍史’的孕育与诞生”，《图书情报知识》，2009年第6期。

*** 如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吴昌杰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弗雷德里克·巴比耶，《书籍的历史》，刘阳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80）》，叶桐、顾杭译，三联书店，2005；费夫贺、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李鸿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新星出版社，2006；沃尔特·翁（奥恩），《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费希尔，《阅读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09；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参与者，阅读与读者等方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书史研究的学术史、各主要理论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和著作，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 and 认识西方书史研究的成就。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书史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本书有限的篇幅里所列举的仅仅是一些主要人物和著作，还远不是全部。同时自这本书问世以来的几年时间里，西方书史学界又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在此仅就译者见闻略举一二。理论和通论方面有莱斯利·豪萨姆 (Leslie Howsam) 的《旧书新史：书籍与印刷文化研究的方向》(*Old Books and New Histories: An Orientation to Studies in Book and Print Culture*)、西蒙·埃利奥特 (Simon Eliot)、乔纳森·罗斯 (Jonathan Rose) 编的读本《书史手册》(*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Book*)、亚历克西斯·威登 (Alexis Weedon) 主编的5卷本《西方书史：重要论文文库》(*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the West: a Library of Critical Essays*) 等等。^{*} 实证研究方面有达恩顿的《诗歌与警察：十八世纪巴黎的传播网络》(*Poetry and the police : communication networks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约翰斯的《盗版：从古腾堡到盖茨的知识产权战

^{*} Howsam, Leslie. *Old books and new histories : an orientation to studies in book and print culture*. Toronto ;Buffalo :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6. Eliot, Simon; Rose, Jonathan. ed..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 2007. Weedon, Alexis. ed..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the West: a library of critical essays*. Farnham ;Burlington, VT : Ashgate, 2010.

争》(*Piracy: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rs from Gutenberg to Gates*)、安·布莱尔(Ann Blair)的《要知道的太多:近代以前学术信息的管理》(*Too much to know: managing 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 modern age*),以及由安·霍金斯(Ann R. Hawkins)主编的《书史》(*The History of the Book*)丛书等。

此外,这本书还有些“名不副实”。它名为《书史导论》,实际上只是西方书史的导论。本书中所介绍的理论成果,几乎全部是以西方的经验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即使其中偶尔提到印度、新西兰毛利人和美洲印第安部落等地的案例,对这些案例的描述和分析也都是由西方学者完成的,缺乏来自东方国家本土的视角。它反映了一个尴尬的现实:在西方学者建立的书史研究框架里,几乎没有西方之外的各种书文化的位置。

一个真正完备的书史理论体系,应该能够反映世界上各种优秀的书文化成果。中国、印度、埃及、伊斯兰世界、印第安文明中的玛雅文化都有着

* Darnton, Robert. *Poetry and the polic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Johns, Adrian. *Piracy: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rs from Gutenberg to Gates*.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Blair, Ann. *Too much to know: managing 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Hawkins, Ann R. ed.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Serie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7. 该丛书目前已出版《中世纪晚期伦敦中产阶级的写作》(*Middle-Class Writing in Late Medieval London*)、《读者与文本载体论集》(*Readings on Audience and Textual Materiality*)、《历史中的阅读:来自英美传统的新方法论》(*Reading in History: New Methodologies from the Anglo-American Tradition*)等8部著作。

悠久灿烂的书文化，但在这本以《书史导论》为题的书中却鲜有论列，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本书的原作者专门为中译本撰写的序言表明，西方学者也在对东方的书文化投以关注。但要从根本上打破这种局面，除了西方学者的努力，更有赖于来自其他书文化背景的学者贡献出自己的理论成果。各种书文化研究之间首先必须有起码的了解和对话，否则遑论书史研究的整合。一部全人类的书史，应该由世界各国的学者共同书写。

中国的书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几千年来未曾中断，延绵不绝；中国又是印刷术诞生的国度，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手抄本文化交相辉映。中国书文化的连续性和丰富性是世界其他地区文明所难以比拟的。中国书史的若干重要特点，例如印刷术与传统社会的调适与融合，而不像欧洲那样导致剧烈的社会变革，雕版印刷术长期占据出版技术的主流地位等等，是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书史理论所无法涵盖和解释的。中国书史能够为书史学科理论、方法的构建提供许多新的资源，任何不能反映中国书史丰富而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实践的书史理论体系都是不完整的。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书史的书文化大国，中国在国际书史学界理应发出自己的声音，取得应有的话语权。在借鉴西方书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符合自身书文化特点的学说和理论体系，与国际书史学界展开积极对话，是一项兼具使命感和吸引力的工作。

希望本书的翻译出版能够为推动这种沟通和对话增添一点助力。

前言

1936年，英国出版商斯坦利·安温（Stanley Unwin）收到牛津大学一位研究英国文学的学者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一份用打字机辛辛苦苦打出来的书稿。这部书稿最初来源于作者给孩子所讲的睡前故事。安温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份来稿，他给了自己十岁的儿子雷纳（Rayner）一个先令，让他读一遍，并加以评论。雷纳很喜欢这部书，下结论道：“这本带有地图的书，不需要任何插图就挺不错[原文如此]*，对5—9岁的孩子应该很有吸引力。”（Gekoski, 2004: 13）。这里所说的书稿，当然就是指《霍比特人》（*The Hobbit*），其作者托尔金（Tolkien），即将因为这部书以及随后《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三部曲的热卖而成为极其富有的学者。尤其是到了1960年代后期，反主流文化拾起书中的神秘、幻想元素，使之风靡一时，更令托尔金日进斗金。如今，《霍比特人》及其后续作品已行销多年，成为众多读者喜爱的读物。2003年，它在英国的全国性调查“读者最喜爱的100部小说”中荣登榜首。此后的每一代人都对它加以诠释，重新评价，从中抽取不同的元素——或是远离都市生活的田园主题，或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或是在罪恶的城市生活中对美好自然的向往。它已经被改编

* 英文原文中即有“原文如此”字样。——译注

成电影三部曲，并获得巨大成功，成为视觉文化扩张的一个载体，全球媒体工业的一部分。书中充斥着激发人们奇思异想的地方和语言，为某些读者所钟情，而电影则去除了文本中的繁复内容，专注于叙述，成功地吸引了另一类型的受众。但是电影并没有使读者远离托尔金原书的想象世界，事实上它鼓励读者回去读原书——每集电影公映后，三部曲和《霍比特人》图书的销量都直线上升。

借助于斯堪的纳维亚神话和宗教象征，托尔金在书中探索和思考了当代文化。他的书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混合体，其中包含了视觉材料——向手抄本文化回归的精致地图和图画，这样就在绘满插图的书页上提供了一种“完整”的体验，这种体验对每个读者来说可能都是独特的。由于该书的成功，托尔金文化（Tolkieniana）已经成为一种产业。托尔金的书信、论文和“关联”物品都会在拍卖会上拍到高价。并且，任何东西都不会落下——甚至托尔金在牛津大学演讲或在学院餐厅里穿的长袍，都以极高的价格售出。^{*}关于《指环王》的书籍四处行销，电影角色的玩偶、玩具和塑像成了收藏品。托尔金成了一种遗产产业（heritage industry），朝圣者们来到牛津追寻他的足迹，在他曾经待过的小酒馆畅饮，在他住过的房子里探身俯瞰窗外的风

^{*} 负责销售的书商里克·吉科斯基（Rick Gekoski）提到，他放弃了几双托尔金的旧鞋子和软呢夹克，现在这些东西对托尔金的忠实粉丝来说会值很多钱。关于里克·吉科斯基与托尔金的短暂关系，见 Gekoski, 2004: 13-24。

景。所有这些，令那些原先用打字机打在如今已然褪色的纸上的文字，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重要资产，每一图书版本的上市都能确保出版商们的利润，并令托尔金的资产增值。每次电影发行和其他各种类型的版权出售之日，就是钞票滚滚而来之时。

在最初的文本中，托尔金所使用的语言来自口头文学和文化的叙述方式——正是他对过去口头流传的史诗，如《贝奥武夫》(Beowulf) 的了解，形成了他的文本结构。托尔金及其著作、电影和相关书籍的网站，把托尔金的影响从纸和书籍扩展到了超文本 / 赛博空间 (cyberspace)。如今，万维网 (World Wide Web) 使读者得以创造和分享他们自己关于《指环王》和《霍比特人》的读物、版本、故事结局和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读者变成了作者。

《霍比特人》和《指环王》三部曲并非孤立的案例——书籍出版改变或影响文化、社会群体和交流模式的例子，还有很多。书籍是常常挑战既有规范和权威观念的重要载体。《指环王》这样的个案研究数不胜数——许多人耗尽一生研究《圣经》，追踪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哈里特·比彻·斯托 (Harriet Beecher Stowe) 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所产生的影响。印刷品的种类之间也存在差异，不同的印刷媒体共存于书史这样一个领域之中，都同样值得去研究。

书史学家们要问的问题包括：

● 文本是什么？文本是供人阅读而写下的文献。但一部文本必须具备某种物质形式。这种形式可以是范围十分广泛的媒体——从印刷的书籍、杂志、报纸到网页。所有这些文本的作用，包括信息交流、叙述和娱乐。

● 书是什么？一个玩世不恭的人可能会认同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院前院长的观点，他宣称书是“死牛裹着的木片”（Mitchell, 1995）。更平淡无奇的说法是，书是物质对象，后面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会更详细地追溯书籍形式的发展。你现在读着的就是一本书，除非你正在读本书的网上盗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是传统上所定义的书。你也可能在读本书的非法复印件，
2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它是印刷本的复印件，但如果不把零散的书页装订在一起，也不能叫作书——它仍然只是一个文本，只不过以散页的物质形式存在。

● 媒体是什么？这里所说的媒体，是对文本物质形式的一般用语。一部书是一个媒体，一个网站是一个媒体，一部电影剧本也同样可以是一个媒体。“媒体”（medium）这个词包含了“媒介”的强烈含义，对这个关键术语，在本书中还会加以讨论。这个词的复数“media”，一般用来指包括图书出版商等在内生产各种物质形式的文本的机构。在传媒研究领域，这个词几乎被用来专指广播和新闻界，我们认为它不应仅仅被局限于这些领域——它还指书籍和书籍出版。

书史学家要问的还有其它问题，既有关于定义的，也有关于实体的，

我们将在下面探讨这些问题。

罗伯特·达恩顿 (Robert Darnton) 是最早以书史为背景提出这些问题的学者之一。1982年, 达恩顿回顾了书史领域, 宣称它在方法上如此支离破碎, 简直像是“跨学科的混战” (Darnton, 1982b: 10)。同时, 他预见这是一个“可能在学科体系中赢得一个与科学史和艺术史比肩的位置”的时代 (Darnton, 1982b: 9)。自那时起一波接一波的研究浪潮, 说明他可能是对的: 致力于研究印刷文化史和书史的国家的或学术性的中心, 如雨后春笋般在北美、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地区出现; 出版商通过发行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专著、手册、读本和杂志而获利; 茁壮成长的专业组织 (作者、阅读与出版史学会, SHARP) 努力推进该领域的研究, 学者们通过专门的国际会议、研讨会和座谈会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对话。同样, 涉及这一令人激动的新领域的学年课程也大量涌现。

为什么要研究书籍? 书史学家会说, 文本的传播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直来直去的过程。通过追踪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过程, 阐明生产和市场结构, 研究印刷品对文化的影响,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书籍对文化和个人的影响也并非轻易可以解释: 例如书籍和印刷品在人生命中的不同阶段对“读者”和消费者有不同的影响。对此, 如何开始我们的讨论呢? 正如唐·麦肯锡 (Don McKenzie) 曾指出的, 物质形式影响我们对文本的阅读。同样, 不同的物质形式会促使读者用不同的方式来阅读文本, 正如杰罗

3 姆·麦克盖恩 (Jerome McGann) 在号召对“文本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texts) 进行研究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两个问题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加以讨论。

本书是关于这样一个主题和领域的探讨。比如说,《指环王》的价值和它的性质可以从各种角度加以研究:观察它从手稿到成品的过程,找出它的读者的特性,弄清他们怎样阅读它;从媒体商品的角度,看它是如何被改编成各种形式,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要并走向国际市场的;将其与第一章所要讨论的罗伯特·达恩顿、亚当斯、巴克和其他人提出的传播模型相比较。我们的目标是要描绘出书史的轮廓,书史学家如何研究书籍、印刷品和文本,以及通过运用书史的方法你能学到什么。书史学家试图理解书籍和阅读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人们的生活和社会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像《大英百科全书》、《百科全书》(Encyclopedie)和《牛津英语词典》这样庞大的编撰工程都有着巨大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它们是准确性的捍卫者、标准的制定者、重要思想成果的集大成者。同样,有若干手稿和标志性文献成为了整个时代、文化和社会的象征——《大宪章》(Magna Carta)、《独立宣言》或新西兰的《怀唐依条约》(Treaty of Waitangi)便是证明。

《书史导论》就要着手考察这些问题了。它以《书史读本》(The Book History Reader)中选辑的原文摘编和论文为起点,对《书史读本》中评论和主题的范围做了扩展。我们的目的是提供一部书,来阐释当前印刷文化研究和书史研究的背景。我们考察过去人们是如何看待书史的,我们也预测它将

来的发展趋势。同时我们的目标也是为书史和印刷文化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罗盘”，使之成为在这一领域从事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们研究当前热点的一个起点和指南。虽然这本书常常会提到《书史读本》中的原始材料，但我们的主要目的还是要扩大讨论的范围和主题的覆盖面，仅仅阅读《书史导论》本身也能使读者获益。

处于本书核心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我们的下述观点：书史与时下所进行的印刷文化研究不同的是，它认为文本生产始终极具活力地向前发展，并成为人类社会交流结构的一部分。这样做需要一种跨学科的方法。《书史导论》的结构编排，强调了学生们在学习近代以来的书史时，可能会遇到的社会交流问题。它既是对西欧文化中文本历史的叙述，也是关于理解这段历史，并将其置于相关背景之中加以考察的最新思考的一个综合。

第一章回顾了过去一百年中书史研究的主要理论和重要论争。它讨论了新目录学（New Bibliograph）运动在目录学和书籍研究中开创的一些新方向，这些新方向主要体现在格雷格（W.W. Greg）和弗雷逊·鲍尔斯（Fredson Bowers）的著作中，并检视了随后对这些学者所提出的研究思路的反应。我们要问1960年代和1970年代新西兰学者唐·麦肯锡的著作在改变对于书籍的目录学研究方向方面，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并讨论他的“文本社会学”（sociology of text）概念如何与1950年代以来受法国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书籍的社会文化史（Histoire du Livre）相联系。这一部分还要概述罗伯特·达恩

4

顿的“交流圈”(communication circuit)模型作为一种研究文本在社会中的流通的方法的地位,以及作为回应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R. Adams)与尼科拉斯……巴克(Nicolas Barker)提出的一种以生平一著述(bio-bibliographical)为导向的方法,此外还有其他强调书籍的副文本(paratext)研究和呼吁研究“文本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texts)的理论模型。本章论及的还有研究口头、书写和印刷交流结构,把书史的研究兴趣引领至新方向的学者:比如沃尔特·奥恩(Walter Ong)、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阿德里安·约翰斯(Adrian Johns)等等。

第二章审视了书写的历史,以及这一领域如何与书史研究融为一体。它概述了书写发展的历史,及其在西欧文化中的传播过程。它还观察了口述传统如何体现在早期的书写和手抄本文化中,以及当印刷技术普及时,书写如何在结构和风格上发生改变。我们还讨论了因为有文化的阅读公众数量的发展,书写的性质所发生的变化:从一种由一人向多人朗读的文化工具,到书写的结果通常指向单个独立读者的一种过程。最后,本章简要地考察了学者们如何论述书写为国家和机构权力服务,利用书写对世界其他地方进行政治和文化殖民,以及如何在阶级结构的背景下研究书写活动。

第三章考察了手抄本文化与印刷术出现之间的连续性。它不仅使我们关注生产过程,也让我们关注当手抄本——一种可收藏的商品,被印刷

书——一种可交易的商品取代时，产业结构的发展。本章概述了印刷书与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并介绍了有关的争论。版权的发展将在第四章讨论。本章还概述20世纪图书出版发生的变化，并预告了最后一章关于书籍未来的讨论。

第四章聚焦于作者身份的各种概念，以及这些概念在过去一百年中如何变化和发展。它考察了中世纪作者身份的定义，讨论了1450年代以来印刷术的出现如何将作者身份重新定义为一种更具创造性的活动，一种可以为个人带来名声和财富的活动。讨论的其他主题包括，保护人的地位，版权的出现对作者作为一种职业的影响，以及出版过程中文学代理和出版商审稿人的角色。我们简短地回顾了20世纪关于作者身份的重要阐释，这些阐释对于书史研究来说十分重要。最后讨论了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作者身份将会被怎样重新定义。 5

第五章考察书史学家如何描述和探讨图书和印刷文化生产过程中涉及的许多代理角色。它回顾了西欧印刷生产不断变化的商业模式的历史，这些模式是在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发展起来的，是第三章和第四章所述内容的延续。它考察了印刷文化如何输出到欧洲的海外殖民地，从当地和地区报纸的出版起步，并简要描述了印刷文化在形成民族认同和地区认同中的作用。它还凸显了从文学代理和出版商审稿人，到无形而影响巨大的文学网络，文化代理在支持和塑造印刷文化生产中的作用。

第六章介绍了在书史研究方面不那么热络的领域——读者和阅读。它提出阅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以及作为一种个体经验，可以在书史中合而为一。这方面已有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和贾妮斯·拉德威（Janice Radway）等人的开拓之作。本章还回顾了从最早的刻划符号，到19世纪、20世纪建立公共图书馆系统之间的阅读史。最后探讨了阅读的属性，援引了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从个人行为的角度、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从社会属性的角度所做的精辟论断。

第七章探讨了书籍消亡的论调，考察了可能影响书籍未来的四个最主要的因素：新技术与印刷文字的关系；就书籍出版结构和书籍在不同文化中的影响而言媒体全球化的性质；阅读与读者的当代概况；最后，国家在为书籍、出版者和读者提供支持方面所担当的角色。

在本书最后，我们归纳了所讨论的重要问题，还有你看这本书时会碰到的各种术语的解释，以及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列表不完整是有意为之：既然《书史读本》已经提供了一个完备的书目，我们觉得没有必要重复劳动。其他作者常常在他们对书籍和阅读的讨论中使用类似探险的比喻：你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远未被穷尽的领域，你将有机会亲自对它进行探究。我们希望

6 本书能成为你进入书史领域的一本指南。

第一章 书史理论

引言

本章将概要介绍过去一个世纪的书史研究中所产生的主要理论和论题。它将简要勾勒像格雷格和弗雷逊·鲍尔斯这样的新一代目录学家，在 20 世纪上半叶规划目录学 (bibliography) 和书籍研究的发展方向所产生的影响，并讨论此后学者们所撰写的著作。我们将考察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唐·麦肯锡的著作及其“文本社会学”概念，他用这个概念扩展了传统目录学，将文化与社会背景囊括进来。本章还将简要论述麦肯锡的著作与 1950 年代以来在法国历史学家中兴起的“书史”运动之间是如何联系起来的，这些法国历史学家致力于研究书籍的社会和文化影响。这一部分还将论述罗伯特·达恩顿的“交流圈”模型，作为一种对文本在社会中的流通进行研究的方法的地位，以及托马斯·亚当斯与尼科拉斯·巴克对达恩顿的反驳，他们采用了一种更倾向于目录学本身的方法。此外还讨论了强调研究书籍副文本和提倡研究“文本的社会化”的其他理论模型。在对目前描述书史的通用术语进行简要概括后，本章将考察书史学家如何描绘西欧文化中书史的不同阶段的特征，聚焦于沃尔特·奥恩、马歇尔·麦克卢汉、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阿德里安·约翰斯及其他学者的著作。由此，本章考察了书史学家如何在这些背景下诠释作者和读者的作用，以及书籍如何因它们在社会中的“媒介”作用而成为研究对象。

书史的起源

7 书史（或对书籍与文本历史的研究）与目录学、文学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史等领域有着很强的学科渊源。无论从哪个方面研究书籍的诞生，把它作为物品、艺术品、独特生产方式的产物，或是作为独特的文化象征，几乎都要回到一个关节点上，那就是文本成为文化文明与商业文明的一部分。教堂、政府和富人们若干个世纪以来积聚起来的厚重奢华的手抄本藏书，其中有许多源自文艺复兴时期，这些书表明对于书籍拥有者来说，书既是美轮美奂的物品，也是人类知识的载体。这一点常常又滋长了人们对印刷文化的生成物进行分类、整理和研究的兴趣，以通过书籍本身了解那些创造书籍的人，了解书籍对于其创造者有着怎样的意义，以及创造者们的意图。

当然这是20世纪初的情况，当时关注早期印刷品的学者开始探究这些出版物生产中的细节问题。例如，莎士比亚著作早期版本的印行，就问题多多。文学学者们问道，一个人如何从莎氏戏剧众多“被污染”的版本中区分出“真实”的版本？在原稿佚失、手头只有不可靠的印刷版本的情况下，学者们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能够得到莎士比亚在16和17世纪最初构思的真实文本？答案在于由“新目录”（New Bibliography）学派所提出的方法论，该学派由麦克科洛（R. McKerrow）（1927）、格雷格（1950）和弗雷逊·鲍尔斯（1950）等学者引领。对他们来说，对权威文本的构建，变成了对当初文本生产的实体物质的检验，以及把文本和书籍作为物质对象来研究（区分字

体、纸张、墨色、印刷方式等)，以区分作品的“好”版本与“坏”版本。^{*}结果导致了对文学和文本生产原初状况的更为严格的审查——目录学，用格雷格的话说，将会变成“关于文学文献的物质传播的科学”（Greg, 1914: 39）。到了1950年代，经过格雷格、鲍尔斯、麦克科洛和其他人的努力，目录学普遍出现在英美大学的英语系中，成了攻读博士学位初期必修课的一部分。正如罗伯特·达恩顿所指出的，博士生们得到教导，对印刷品的物质形态进行非常严格的描述，包括“如何辨识格式，比较签名，查找删除页（包含错误或可能有违碍字句的书页），识别字体，寻找水印，辨析手工制作，以及识别装订形式”（Darnton, 2003: 43）。

重建文本（以及形成其印成品的印刷流程），是新目录学大旗下这些目录学家和文本考据家们所奉行的“描述”或“分析”目录学的决定性方面。学者们找寻文本的本来含义和作者的真实意图，对原稿的修订情况进行检视，以便尽可能地为文本建立一个最完整、最少受到“污染”的版本。在作品流传过程中作者之外的其他人的介入，被视为“污染”过程的一部分。8
比如，鲍尔斯告诫目录学同行，“现在看来，或者说本应如此，不加判别地使用作者在世时的最后一个版本，是完全不可靠的，尽管这种情况仍时有发生”；最权威的文本应该是“离作者手稿，亦即最初的权威版本时间最近的印刷文本”（Bowers, 1950a: 59）。印刷流程中的介入者，包括编辑和校对人员，其行为将受到追踪，以便找出他们干预的痕迹，建立最能准确反映作者最终意图的文本。作者的最终意图是如何被破译的，有时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远非那么严格。仍然存在这样的疑问，即作者的意图是否仅仅只是作为一种编辑上的概念而存在，这种概念掩盖了编辑自己的偏好和决定（Tanselle, 1979）。

^{*}波拉德（A. W. Pollard）对莎士比亚四开本书“好”、“坏”版本的划分（在 Pollard, 1909 中有清楚的阐述），以及他得到这些结论的方法，将影响随后麦克科洛、格雷格和鲍尔斯所提出的“新目录学”的基本指导原则。

新目录学研究的结果常常会激发新历史相对论和后殖民主义的灵感，但同样也会使之失望，尤其是在解构主义等理论思潮兴起的背景下。“在他们的想象中，博士们是那些把莎士比亚的文字首次变成书籍的工人的同伙”，一位研究者写道，“这是一种让人痴迷的想法，它持续不了多久”（Darnton, 2003: 43）。其他人直言目录学在学术界的地位：1980年代一位学界重量级人物警告研究生们，如果不在相关院系得到经费或学术上的支持，出版史研究不可能取得进展（Sutherland, 1988）。通常的建议是最好依附于通史，或通过高度理论化的方法来研究文本。

麦肯锡与文本社会学

事情开始发生变化，起初很缓慢，而后从1960年代末起逐渐加速，这部分归功于一个剑桥毕业的新西兰学者的开拓性工作。研究文本生产的“新目录学”方法（非常理想化地）假设文本是由排字和印刷工人通过理性、一致的模式和方法生产出来的：本质上，印刷和印刷品生产是“固定”的常数，对作品内容本身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除了印刷工人易于犯些这样那样的错误（弄掉或放错铅字、在印装过程中弄乱书页、遗漏文本的某些部分等等），这些错误“污染”了作者的原始意图。唐·麦肯锡写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

的著作，尤其是他引发争议的充满独创精神的论文——最初于1969年发表在《目录学研究》(*Studies in Bibliography*)上的《思想的印刷者》(*Printers of the Mind*)，对此提出质疑。彼得·麦克唐纳(Peter D. McDonald)和迈克尔·苏亚雷斯(Michael F. Suarez)在他们所编的麦肯锡关于目录学和书史的论著集《制造意义：〈思想的印刷者〉及其他论文》(*Making Meaning: "Printers of the Mind" and Other Essays*)中，对麦肯锡的思想做了重要的诠释和概括。正如他们所指出的，《思想的印刷者》通过揭示一部文本的物质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生产环境，挑战了在20世纪40、50和60年代统治版本目录学(textual bibliography)的分析目录学家们的正统观念。麦肯锡利用了从伦敦印刷商人威廉·鲍伊尔(William Bowyer)的通信、出版目录和商业账册中搜集到的原始资料，证明17和18世纪英格兰的印刷作坊并不是那么井井有条的，而是以他称之为“并发生产”(concurrent production)的方式为主：工作习惯差异相当大，通常是多部书同时印刷，排版和印刷并非只由一个印刷工人或编辑承担，而可能、并且经常是由同时工作的几个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以一种复杂而不确定的方式合作完成多个文本的生产。正如麦克唐纳和苏亚雷斯所指出的，这种情形可能不仅适用于纯文学文献：“并发生产的基本原则……事实上适用于所有的书籍生产。”(McDonald and Suarez, 2002: 13)

麦肯锡在后来的研究中又提出，对于文本的研究，需要把除文本意义之外的那些问题包括进来：“这样文本的意义就不是固有的”，他写道，“而是由那些写作、设计、印刷书籍的人，以及那些购买和阅读书籍的人的一连串解释行为所构建的”。麦肯锡还提出，印刷文化在其他文化中的作用，可能会因为它们的社会和交流背景不同而不同：“人们也认识到，一种关于书籍及其流通的特殊的欧洲中心观，并不能解释在有着不同的交流传统、识字能力标准差异甚大的其他社会中，文本所扮演的角色。”(McKenzie, 2002: 268) 麦肯锡在他自己的著作中贯穿着对这一问题的敏感，其中最著名的，

是他研究1840年英国殖民代表与毛利酋长之间达成的《怀唐依条约》的开拓性之作。在这部著作中，他研究了该条约的制定过程，这个条约的印刷版本确立了英国对毛利人土地的统治权，随后对于它的实施充满了争议，深刻影响了新西兰的历史发展进程，提供了一个因印刷文化与口头文化的差异而导致解读冲突的实体样本（McKenzie, 1984）。

麦肯锡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强调跨越相互竞争的各个学科领域人为设置的界限，拓展英美学术界对文本意义的研究。对文本的文学批评太多地忽略了“文本”边界之外的意义；目录学家们太多地忽略了文本所产生的社会学背景；历史学家们太多地忽略了印刷作坊的产品进入更广阔的公共领域的方式，以及被读者接受和消费的方式。麦肯锡发表于1981年的经典论文《印刷与意义：威廉·康格里夫的案例》（*Typography and Meaning: The Case of William Congreve*），将英美学者的注意力吸引到由法国年鉴学派引领的文本解读革命上来，年鉴学派自1950年代以来就已将社会史的量化方法应用于文本生产与接受的研究。然而与此同时，麦肯锡建议学者们不仅仅是把文本作为一个反映作者意图的产品来解释，甚或是通过对书籍出版和印刷趋势的量化的、宏观的历史考察来解释，而是将文本作为媒介产品来研究，从中人们可以发现经济、社会、美学和文学意义的痕迹。“当前的文本批评理论对于书史，对于它的研究样式和排版的视觉语言漠不关心，因而对处理这些问题无能为力”，他总结道，“只有一种新的全面的文本社会学能够统驭这些问题”。（McKenzie, 1981: 236）

书史 (histoire du livre)

在“文本社会学”中，麦肯锡确认文本的生产是一种协作过程，提倡注重对物质对象及其生产和接受进行分析的手段，而不是仅仅注重文本的内容。它成为了一种新趋向的一部分，这一新趋向由罗伯特·达恩顿和罗杰·夏蒂埃 (Roger Chartier) 等人领导，走向“1980年代和1990年代注重读者、物质实体和意义的书史 (histoire du livre) 研究新风尚” (McDonald and Suarez, 2002: 7)。正如罗杰·夏蒂埃后来所说的，麦肯锡“文本社会学”概念的价值在于我们从中得到的这样一些教益，以及它们在研究中的应用：

不同于文本的抽象性，它揭示出一部著作的状况和阐释取决于物质因素；不同于“作者之死”，除了图书销售商—印刷者之外，它强调作者在作品形式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于读者的缺位，它使我们想起一部文本的意义总是在历史情境中产生的，并依赖于赋予其意义的许多不同的阅读行为。(Chartier, 1997b: 85)

麦肯锡所强调的年鉴学派方法论的起源，可以在罗伯特·埃斯卡皮 (Robert Escarpit) 《文学社会学》 (*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1958年版) 中的量化社会史，以及吕西安·费弗尔 (Lucien Febvre) 和马丁 (Martin) 同年出版的《印刷书的诞生》 (*L'Apparition du Livre*) 中找到。埃斯卡皮的

著作以其试图从堆砌的数据中分离出书籍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模型而闻名，罗伯特·达恩顿（1982b）在他的重要论文《书史是什么？》（*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以及托马斯·亚当斯与尼科拉斯·巴克（1993）在对达恩顿的回应《书籍研究的新模式》（*A New Model for the Study of the Book*）中采用了这种方法。而且，年鉴学派的方法与像伊丽莎白·爱森斯坦那样把印刷书的发展与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运动联系起来的尝试不同。最近爱森斯坦的这种方法被批评为过度的决定论和简单化，从她的主要著作《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本章稍后将作讨论）的标题上就可见一斑（Johns, 1998）。费弗尔和马丁的章节标题“作为变革力量的书籍”（*The Book as a Force for Change*）可能更为准确。对于他们来说，在一出社会和政治的大戏中，印刷机只是众多演员其中的一个；费弗尔为他们的研究拟了另一个标题，《服务于历史的书籍》（*The Book in the Service of History*）。书籍推动变革的主要的积极意义，在于书籍所使用的语言：“欧洲统一的拉丁文化最终被各国语言的兴起所瓦解，这受惠于印刷机的力量，各国的方言因而勃兴。”（Febvre and Martin, 1976: 332）他们提出的这个观点后来在伊丽莎白·爱森斯坦那里得到进一步阐述。

交流圈

罗伯特·达恩顿（1982b）的开拓性论文《书史是什么？》，把人们的注

意力吸引到1980年代早期致力于书史研究的人们所面临的花样繁多的研究方法和路径。满怀激情的研究者面对着的是毫无标识的众多学科交错的十字路口，“与其说是一个领域，不如说是一片热带雨林……分析目录学指向这个方向，知识社会学指向另一个方向，而历史学、英语和比较文学各自占据着相互交叠的领地……他被相互竞争的各种方法论搞得晕头转向，这些方法论让他校对各种版本、编纂统计数据、破译版权法、埋头翻阅成堆的手稿、摆弄一台复原的印刷机、对读者的心理活动进行精神分析”（Darnton, 1982a: 10）。达恩顿的解决方案是提出一种对书籍生产的社会化过程进行分析的普遍模式，一个“从作者到出版者（假如图书销售商没有承担这一角色的话）、印刷者、贩运者、图书销售商和读者”的“交流圈”（Darnton, 1982a: 11）。这个交流圈在这些关键要素之间运行——这样就为诸如揭示读者得以影响文本生产的方式（研究19世纪连载小说的学者经常注意到这一点），或图书销售商们对出版决策的影响（例如达恩顿在一项关于18世纪法国印刷文化的案例研究中对此做了揭示，该研究追踪了法国图书贸易在图书销售商订单的影响下萎缩和扩张的轨迹）留下了空间。达恩顿的交流圈概念来自传播学研究中的类似模型，但他的目的是想为书史学者提供一种方法，把文本生产看成是一个包含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条件的多面体。“不管情况如何复杂，书籍都属于那些按固定模式运行的交流圈”，他总结道，“发现了这些交流圈，历史学家就能够揭示书籍不 12 仅仅是在讲述历史，它们也在创造着历史”。（Darnton, 1982a: 22）

达恩顿的模型绝非完美无缺，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作为一个开端，它植根于对文本生产的一种理解，尤其是对18世纪欧洲印刷和出版状况〔包括在充斥革命狂热、地下印刷网络和违禁书籍生产的年代里，像“贩卖书籍”（colportage）和书籍越境走私这样令人着迷的不寻常事件〕的理解。该模型的某些部分不适合于研究印刷发明前的手抄本文化，或对书写传统中口头文化的影响进行阐释。但是，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它发出了一个信号，尝试在各不相同和彼此竞争的书史研究方案中建立一个共同的基础，在

以后的时间里，它越来越被学者们加以吸收、发展和应用。

自从达恩顿对“交流圈”做了系统阐述，把它作为考察文本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种手段，书史就开始越来越聚焦于麦克盖恩 (McGann) 所描述的“文本的社会化”，即书籍作为人造物品从私人空间到达公共空间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一模式中，正如保罗·杜吉德 (Paul Duguid) 所指出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以下进程的一部分：“生产一种公共产品并将其植入一个特定的社会圈。” (Duguid, 1996: 81) 或者，正如最近的一项重要调研所揭示的，如今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是这样一种“书籍生产和消费活动”观念，它“把主要元素去中心化，并使它们相互作用和彼此依赖：换言之，出版史即超文本 (hypertext)” (Jordan and Patten, 1995: 11)。

生平—著述意义上的交流圈

并非所有人都对达恩顿 (及其追随者) 在其“交流圈”中对关键领域的定义表示满意。1993年，两位杰出的英国目录学家 (托马斯·亚当斯和尼科拉斯·巴克) 提出了一种模型来挑战和扩展达恩顿的模型。对于他们来说，关键是关注生平—著述 (bio-bibliographical) 这一维度。许多浸淫于目录学传统的学者认为这一维度是关于印刷文化和书史的后印刷 (post-print) (即

1500年以后)视角所缺乏的。要回答“在人们的想象中书籍是什么样的?它是做什么用的?”这些问题,就要承认古人与文本之间的联系比我们想象的要深。他们指出,“现在的趋势是假定当时的书籍像现在一样,是一种工具”,并继续道:

很难认识到大批量机械化复制这一观念有多么新,虽然它已有五百年历史,但仍然很新。从某种意义上——一真正的、实践的意义上说,它在15世纪并不新。文本通过各种方式大量复制,至少已经存在了两千年:新的只是范围和规模的突然变化。书籍作为知识和灵感的载体,更早地拥有了更大的力量,这些知识和灵感的影响超越了它们被构思或书写的时代。(Adams and Barker, 1993: 8)

虽然亚当斯和巴克承认从社会历史分析的角度看,达恩顿的“交流圈”是有用的,但他们批评其方法过于重视阐释交流的过程,这样就偏离了书籍作为物品的特性。他们的模型以各种过程为基础,其中交流圈由一部文本生命中的五个事件(出版、制作、发行、接受和流传)组成,被四个影响“区域”(思想影响;政治、法律和宗教影响;商业上的压力;社会行为与趣味)所围绕和影响。其结果是重点的翻转:“文本是书籍循环产生的原因:它的传递依赖于它发起新的循环的能力。”这是这样一个交流圈,它并不围绕人们怎样与文本互动运行,而是围绕“其(事件过程的)”次序构成了一个交流

* 译注:括号中内容为译者所加。原文为“but rather one that follows texts ‘whose sequence constitutes a system of communication’”。查 Thomas R. Adams and Nicolas Barker “A new model for the study of the book” 原文为:“we have five events in the life of a book – publishing, manufacturing, distribution, reception and survival——whose sequence constitutes a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David Finkelstein and Alistair McCleery ed. *Book History Reader*,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53)。可知亚当斯和巴克原文中“whose”所指为“five events”,而非“texts”。

系统”的那些文本运行。(Adams and Barker, 1993: 15)

新理论的介入

热拉尔·热奈特 (Gerard Genette) 在其有影响的著作《门槛》(*Seuils*) 中, 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该书 1987 年在法国出版, 于 1997 年被译为英文, 书名改为《副文本: 解释的门槛》(*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热奈特的著作通过聚焦于印刷书的“副文本”[用来控制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的阈限性 (liminal) 工具, 如封面和封底、印在封套上的广告词、索引、脚注、目录等]而与亚当斯和巴克的著作相契合。这些传统目录学家通常所关注的东西 (关于文本生产中的印刷技术和产生变异的线索), 对热奈特来说并无多大兴趣。他所关注的, 是这些副文本如何成为交流 (transaction) 的地带, “一个语用学*的专有领地, 一种影响公众的策略, 这种影响——无论是否得到理解、实际效果好与坏——都是为了使文本更好地被接受, 更恰当地被阅读” (Genette, 1997: 2)。换言之, 是洞悉文本生产策略, 这些策略被用来确保“文本的命运与作者的目的相一致” (Genette, 1997: 407)。学者

* Pragmatics, 语用学, 研究语言在不同语境中的理解和使用, 研究如何通过语境来理解和使用语言。——译注

们遵循这一路线，对诸如脚注和旁注这样的阈限性因素做了研究（Grafton, 1997; Jackson, 2001; Norton and Norton, 1996）。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尝试，以建立关于特定的诠释价值和过程的理论，这些诠释价值和过程是已完成的文本争取文化表现和接受的一种手段。

有些人认为热奈特的方法对书史学者来说价值有限，因为它在达致文本的“社会学”方面做得不够。正如朱丽叶·加迪纳（Juliet Gardiner）所指出的，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最大的瑕疵，是他“总是不能说明作者与出版者之间的区别，他倾向于把出版者视为作者意图的实现者，甚或延续者，把副文本视为其工具，显示了一种站不住脚的文本意义的实在论的固定性论调”（Gardiner, 2000: 258）。杰罗姆·麦克盖恩同样在《文本的条件》（*The Textual Condition*）中对热奈特提出质疑，同时指出，热奈特的方法是对过去对文本（“书籍”之内所包含的文字）的语言学属性感兴趣的文艺理论家们，将这些文本之外的部分边缘化（确实如此）的回应，其价值在于他坚持这些“副文本”对于研究文本意义具有重要价值。将文本与副文本对举本身就是一种有用的做法，这是作者的语言被出版流程过滤之后，一种复原作者意义和意图的手段。

但麦克盖恩关注的是热奈特过于专一、褊狭的方法，因为连热奈特自己也承认，他对副文本的兴趣在遇到文本生产的更物质的层面——墨、字体、纸张、物质生产过程本身——时终结了，因为这些东西不涉及语言学，所以不在热奈特受到文学影响的视域之内。“但显然正如其他所有人类事物一样，所有的文本”，麦克盖恩写道，“都是物化的现象，文本的实体也不仅仅是语言学的”（McGann, 1991: 13）。麦克盖恩随后提出了有影响观点，进而将矛头指向他认为文本研究中到1980年代一直流行的那种分析方法——把文学文本包裹在一张由解释学和文本诠释编织的密网中的语言学的方法。“文本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不切实际的解释学的魔咒之下”，他断言，“在这种观点看来，文本，特别是虚构的文本，并不被认为是某种社会

行为，而且如今这种观点发展到这种程度：文本的活动被过于主观（过于抽象）地放在语言条件中加以构想”。他的解决方法是建议将文本的研究建立在社会和物质的背景之下：“可以通过把文本研究的社会化推至极致，来打破不切实际的解释学的魔咒。”（McGann, 1991: 12）麦克盖恩的“文本的社会化”将被证明是书史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有影响的号召，和唐·麦肯锡的“文本社会学”一起，成为凸显书史学家的研究领域与那些严格从文学或历史学的基础上开展研究的学者之间的区别的一种途径。

印刷文化与书史

15 可以肯定地说，用来界定学者们现在在“书史”中所做工作的术语是存在争议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的叫法名目繁多，“印刷文化”、“文本社会学”、“出版史”、“版本目录学”（textual bibliography）等等。其中部分原因，既与“书史”这一标签的长处有关，也与它的缺陷有关——对于那些兴趣主要在于手抄本或中世纪、古代文献研究的学者，或通过从文化上对读者和读者反应进行分析来观照文本的学者，“书史”这一术语对于他们的目的来说，可能看起来过于具有排他性了。

*指古希腊、罗马时代。——译注

在吕西安·费弗尔、亨利-让·马丁 (Henri-Jean Martin)、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等人的著作产生重要影响之后，有人曾建议把“印刷文化”作为一个替换词。关于“印刷文化”作为一个术语的所指，哈罗德·拉弗 (Harold Love) 归纳为：

1. 一个通过印刷构建的“抽象世界”或意识。
2. 书籍生产与发行的产业关系。
3. 来自阅读与信息管理的社会关系的一套惯常做法。
4. 更广的交流学科当中的一个专业研究领域。(Love, 2003: 46)

拉弗的概括，涵盖了那些从达恩顿所阐释的“交流圈”中汲取灵感的学者们所寻求的那种认识。但是“印刷文化”这个概念，纵使有这样明确的定义，既没有使那些研究在这一类别之外的口述传统与手写文本的学者满意，也不令那些被亚当斯和巴克吸引过来的学者们满意，后者使“交流圈”转而更多地突出和反映文本在思想和社会领域中的物质生产和运动。

1998年，这个领域诞生了一本新的刊物。在创刊号中，编辑们为书史建立了模糊的参数，以便为所有这些看法提供足够的包容度。他们宣布，《书史》(*Book History*) 将是关于“书面交流的全面历史——手稿和印刷品以任何媒体形式，包括书籍、报纸、杂志、手稿和一次性印刷品 (ephemera) 进行的制作、传播和使用……关于作者、出版、印刷、装帧艺术、版权、审查制度、销售和发行、图书馆、读写能力、文学批评、阅读习惯和读者反应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史” (Greenspan and Rose, 1998: ix)。或者，正如另一位学者更简洁地指出的，书史“主要是关于我们自身的。它探寻过去的读者如何生成意义 (如此推展开来，其他人如何以与我们不同的方式阅读)；但它也质疑我们自身阅读的可能性的条件从何而来” (Price, 2002: 39)。如此宽松的定义应该是那些研究书史的人最为满意的，因为它涵盖了印刷活动的各个方面。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传播史的背景下，它是如何被看待的。

建立西方文化史上书籍崛起的模型

沃尔特·奥恩（1982）、杰克·古迪（Jack Goody, 1987）、马歇尔·麦克卢汉（1964）提出了西方文化史上书籍史（或用更宽泛的词——“人类传播史”）发展的一个简单化模型。他们提出，书史的发展可分为三个关键的“革命性阶段”：①从口头文化到书写文化（再细分为字母的发展，语言的出现，经济贸易结构的出现，书写工具——墨、纸、册页抄本——的获得，以及书写系统的成型）；②从书写到印刷（手抄本文化的发展，印刷的发展，它逐渐在文化和社会机构中得到应用，在越来越工业化的社会中提供大众消费材料）；③从印刷品到用计算机打出来的文字内容（我们正在经历的转变阶段）。

从口头到书写，再到印刷文化，沃尔特·奥恩和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见解，常常被人引用。麦克卢汉在其1960年代的畅销书《古腾堡星系：印刷人的形成》（*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与《认识媒体》（*Understanding Media*）中，关于印刷品性质的格言警句式的论述很吸引眼球，但后来不再被人关注（直到80年代以后他所预言的网络电子世界出现）。在这些著作中，麦克卢汉强调了书写与印刷对口头文化形式的破坏性影响，导致“耳朵的魔幻世界与眼睛的中立世界分道扬镳，这种分离使个人得以从部落组织中脱颖而出”（McLuhan, 1964: 32）。他提出，阅读文本和印刷书籍的私密性质，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人类互动的模式。对于麦克卢汉来说，这样的分化不是书写文化发展的结

果，而是古腾堡所发起的印刷革命的结果。他简明扼要地宣告：“直到出现使用完全一致和可重复使用的活字的大批量生产，官能的分裂才得以发生，视觉维度才与其他官能分离开来。”（McLuhan, 1964: 70）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在她的“印刷的固化作用”（typographical fixity）的概念中，以更谨慎的措辞对此做了重新阐明和解释（本节稍后讨论）。

沃尔特·奥恩在其经典著作《口头与书面》（*Orality and Literacy*）中，再次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书写与印刷的引入在社会交流中留下了一种新“意识”（consciousness）的烙印——书写“在视觉空间里重新建构了原先的口头语言”，而印刷“把语言更确定地植入这一空间”（Ong, 1982: 121）。其结果是在认知经验中植入了线性（linearity），一种能够很容易地对材料加以检索的空间构成感，并促使人产生一种终止感——“一种在已被完结、已达致完成状态的文本中找到的感觉——印刷品把思想封装进一部著作的成千上万本在视觉和物质上完全一致的拷贝中”（Ong, 1982: 129 - 130）。后来的研究者

17

在讨论印刷和文本文化在社会形式、阅读习惯和交流模式中的“媒介”作用时，吸取了麦克卢汉和奥恩的成果。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麦克卢汉和奥恩的深刻见解提供了一种文化的概念，它是“一种意识的形态，一种信仰和观念的结构，一种社会建构的主观性”（Love, 2003: 54）。

然而，在追溯了社会交流从口头到书写再到印刷的变迁之后，学者们得出结论，这些交流模式之间的区分是非常不固定的，常常出现交错的情况。每种模式的边界是不固定的——口头文化并未随着书写工具的发明而终结，手抄本文化也并未随着1450年以后约翰尼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及其继任者所开创的印刷技术的传播而立即消亡。正如哈罗德·拉弗、亨利·伍德豪森（Henry Woudhuysen）、玛格丽特·伊泽尔（Margaret Ezell）、大卫·麦克基德里克（David McKitterick）等人的著作所揭示的，直到19世纪末，手抄本传播在许多西欧社区中仍很活跃（Gomez, 2001; Love, 1998; Woudhuysen, 1996; Ezell, 1999; Justice and Tinker, 2002;

Fox, 2000; McKitterick, 2003)。这些研究结果，打乱了那些想要以泾渭分明的时代划分描述人类进程的尝试。正如大卫·麦克基德里克所指出的，“不管是从手抄的文本看，还是从插图、装饰看，手抄本和印本之间的界限都是模糊的，无论是在商业、物质和社会方面，还是在时代顺序方面” (McKitterick, 2003: 12)。

麦克基德里克的论点部分地是在回应书史研究中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自1970年代末一部著作印行以来风靡一时，它是关于近代早期的印刷文化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这就是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两卷本《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Early - Modern Europe*) (1979)。爱森斯坦援引了大量资料，对一系列异乎寻常的重要材料进行了利用和批驳，其中包括费弗尔和马丁、马歇尔·麦克卢汉和沃尔特·奥恩的成果，得出了有影响的论断，即印刷机的出现不可避免地转变了西欧的传播模式：15世纪末以来，在西欧的智识群体中，由于新技术的应用，资料搜集、储存、检索和交流的方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其结果就是爱森斯坦所说的“印刷的固化作用” (Eisenstein, 1979: 1,116 - 120)。这一术语说明了印刷文化的创新如何增强了社会生产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如另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通过创立“一系列技术和规范，使人类可以用一种令人生畏的新效率来利用世界上能够记录下来的知识储备” (Love, 2003: 46 - 47)。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印刷的固化作用”包括“印刷书能够给予印出来的文字和思想以牢固、经久的形式，能够通过大量发行在页面上文字组织形式一致的不同拷贝来传播这一客观化了的语言实体” (Kernan, 1987: 5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援引了爱森斯坦的“固化作用”概念，阐发他有影响的“想象的共同体” (imagined communities) 和民族认同的观点，提出“印刷资本主义”对于创造民族意识产生的条件尤为关键。对于安德森来说，对语言的机械复制，与口头语言相对的“印刷语言”，以三种方式形成

了现代民族意识和民族国家发展的基础：它“在拉丁文之下、口语方言之上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的领域……赋予了语言一种新的固定性，这种固定性在经过长时间后，为语言塑造出对‘主观的民族理念’而言极为关键的古老形象……（并且还）创造了和旧的行政方言不同的权力语言（language-of-power）”（Anderson, 1983: 44 - 45）。

安德森将固定性与人类活动相联系，提出文艺复兴的出现是运用印刷技术的结果，是由于“资本主义、科技和人类语言的多样性这三者间的爆炸性互动”（Anderson, 1983: 45）。然而，安德森小心地将他的立场与爱森斯坦的主要观点做了区分，他认为爱森斯坦的观点“近乎将‘印刷品’神化了，把它视为现代史上的神灵”。“在这里有一点值得记住”，他继续道，“虽然印刷首先在中国发明，其出现可能比在欧洲早500年，它并未产生重大影响，遑论革命性影响——正是因为在那里没有产生资本主义”（Anderson, 1983: 44）。

阿德里安·约翰斯同样提出，“固化作用”实际上是外在的而非内在的：它“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它为人们所认可并按它来行事，而不是相反”（Johns, 1998: 19）。而且，约翰斯认为在爱森斯坦所研究的那段时期，印刷文化的发展并不是那么直线前进的，而是以不确定、不可靠的整合过程为特征的。约翰斯研究文本生产的角度，受到了达恩顿、夏蒂埃和其他年鉴学派学者的影响，“一本书是一种共识的物质体现，至少是一种集体认可的物质体现”，他写道，“它是连接了各种各样的工作的一个枢纽”（Johns, 1998: 3）。更重要的是，他反对爱森斯坦关于“印刷的固化作用”是印刷文化的内在属性——不论它被传播到哪里它都是印刷的天生的一面——的立场。对于约翰斯来说，爱森斯坦著作的核心，是可以用印刷品所被赋予的特征来说明印刷文化环境的特点——当书籍被生产、传播和使用时，它们被认为体现了标准化、传播性和固定性的状况。书籍可以在任何地方，用标准的工具和技术被原样复制，这样，手抄本生产中那些导致文本污染的

19 内在因素就被去除了。其结果就是爱森斯坦的有影响的论断，“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通过其经典文本的永恒性而成为永恒，民族主义的发展要归功于法律和语言的稳定，科学本身成为可能是建立在现象和理论被可靠记录的基础之上的”（Johns, 1998: 11）。

这些论断在特定背景下是成立的。但学者们反驳道，这一景象并不完全是准确的，情况在书籍生产的头几个世纪中更为复杂。我们得到的书籍和印刷文化演进背后的定律，可以粗略地归纳如下：

1. 印刷出来的文本，基本上与其他同一版本的书籍完全一致（亦有分析目录学家们耗费时间寻找出来的细微差异），这样就能够使知识跨越时空进行有实效、有效率的传播；并且，

2. 这种对文本的固定赋予“作者”以“信任感”，书中文字被认为是作者的创造物。虽然“作者”作为一种职业是一个相对晚近的现象，但赋予这些人物以权威则是一个重要事件，要归因于印刷和书籍生产早期的发展。

约翰斯反驳道，从罗杰·夏蒂埃关于阅读习惯的著作来看，在书籍生产的头几个世纪里，在印刷文本的接受过程中，一部文本中的“信任”和“可靠性”并不如我们以前所认为的那么理所当然。当时的人们抱怨早期书籍生产过程不可靠，文本遭到“污染”，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花了好几个世纪。正如约翰斯所写的，“直到1760年，才出现第一部以印刷无误著称的书。在此之前，衍误变异是普遍现象，即便是在同一版本中。”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在西欧的印刷技术发展了一百多年后，印刷出来的首部对开本莎士比亚作品，版面上仍然可以找到超过六百种字体，其中还有错误和不一致的拼读、标点、分段和页面布局。“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约翰斯总结道，“对可信度的怀疑代替了固定性的假设”。亦即，读者需要在检视文本的来源、可信度、可靠性以及“参与书籍制作、发行和接受的人的评判”的基础上，对文本做出判断（Johns, 1998: 31 - 32）。

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上也出现了机构的、社会的“过滤装

置”（出版社、编辑、期刊、文学评论与评论家）来控制 and 评估印刷生产，因而我们已经习惯对机构标识（corporate identities）和“品牌”抱以信任。面对个人电脑在商业往来和社会交流中不断增强的支配地位，以及万维网（World Wide Web）上可获得与应用的信息和活动越来越多样化，我们对印刷文本的信任和依赖并未减少。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其中媒体资料在其内容和传输上交织着视觉、口头和书写交流材料，口头信息交流技能（如果涉及影视等视觉媒体还要包括在广播电视上表现自己的能力）仍然为人所珍视。

20

另一方面，罗杰·夏蒂埃等学者对上面提到的社会交流的三分模型（口头、书写、印刷）做出回应，提出这一模型并没有完全把一些可视之为重大社会变革的创新，比如书写工具和印刷机的发明包括进去。（或许可以认为其重要性还要更大一些。）他们提出，或许更为准确的说法是，从口头到书写、再到印刷文化的发展，还可以找到其他的“发明”作为标志，即：

……在公元后的头几个世纪里发明的册页抄本（codex），使阅读书籍的方式从打开卷轴变为翻页，这样就形成了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使用的书籍的形式、结构和组织方式；14和15世纪“作者”的出现，使某些作家[首先是彼特拉克（Petrarch）]享有了被以专名指称的权威，而这在传统上是只为古人和基督徒保留的；版权观念的创造，在自然法理论和一种新的对原创性的审美的基础上，使作者对作品的永久而不可侵犯的控制权在18世纪得以确立。（Chartier, 1997a: 11）

作者意图

将作者的活动等同于天才的创造这样一种倾向，是19世纪早期的一个遗产。这种倾向赋予这些个人以原创者的价值，把他们视为拥有创造精神的个人，能够生产出与当代和未来文化共鸣的恒久文本。这种倾向在文学批评方面的烙印尤为明显。有人认为在西方文化中，作者崇拜的兴起是浪漫主义时代的产物，在拜伦爵士（Lord Byron）的身上体现得最为典型，他的狂暴个性 [在与出版商约翰·默里（John Murray）的工作关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成为了那个时代创造气质的缩影。

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福柯（Foucault）两人关于作者身份问题和作者与文本的关系的观点中，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是如何进入书史领域的。1960年代，巴特被再三引用的“作者之死”，为颠覆以前关于作者在文本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的设想定下了基调。他的观点，以及福柯的回应“什么是作者？”，都把批判的重点从以作者为中心的考察，转向以读者为基础的分析。更多这方面的情况，在第四章讨论“作者、作者身份与权威”时可以看到。

将文本的作者去中心化并将二者分离，并非一个新概念，新的是把普通读者提升为文本意义的终端创造者。但是正如福柯所清楚地指出的，从文本生产方程式中把作者的角色完全移除出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作者身份”是与文学商品化不可分割的文化形式：文学声誉能够而且的确以某种方式塑造了对文本的文化反应，这种方式并未在巴特式的分析中得到说明。书史研究随后的进展扩大和发展了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尤其是关注围绕作者身份

这一概念的纷争，这一纷争可以追溯到18世纪英国的版权立法中著作权的诞生，它本身是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民族斗争的产物。

版权立法，使作者作为一个特定商品（在此指文本）的创造者和拥有者的法定权力得到承认，它构成了一个在18世纪呈指数级增长的新的职业和产业的基础。这一职业和产业使文化商品的制造与发行合而为一，同时确认了作者（而不是以前的印刷者/图书销售商）是这些材料的原始来源。其结果是文学生产的社会和文化网络发生了变化，为19世纪在西欧和北美受到工业化驱动和印刷普及的背景下，作者成为一种让人尊敬和收益颇丰的成熟职业奠定了基础。

另一位法国理论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福柯从商品化的角度重新定位作者身份的基础上，开展了进一步的研究。对于那些特别关注当代（19—21世纪）印刷文化和作者身份的学者来说，他所清晰表述的“文学场域”概念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布迪厄的“文学场域”强调文化、社会和物质生产的连接，被定义为连接生产者（出版商、编辑和作者）与产品（书籍、期刊、文学作品）的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公共竞技场。布迪厄特别论及文学精英们如何取得、丧失和重获“文化地位”。“文学场域”指的是独特的、相对自治的微观社会，文化生产者及其产品在其中和其间活动。布迪厄的论点中最关键的，是他认为这些场域基本上是自足的，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有其自身的运行法则、独特的力量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Bourdieu, 1993: 164）个体在这些场域中活动，努力获取可以转化为更具实体性的报酬——无论是对艺术成就的认可、金钱收益还是社会地位的提升——的文化资本。正如布迪厄所说：

这个领域是充满各种争斗的场所，它特别关注的是谁是该领域的一部分，谁是真正的作者而谁不是。对于作品的诠释来说，重要的事实是这一自治的社会领域有点像一个棱镜在起

作用，它折射出各种外部的决定因素：人口统计学的、经济或政治的事件总是按照场域的特殊逻辑被转译，正是通过这样的中介物它们作用于作品发展的逻辑。(Bourdieu, 1993: 164)

要注意布迪厄所关心的是一般的美学和文化生产——他的分析既包括文学文本，也包括美术和音乐，这很重要。较之于文本的物质生产，他的兴趣更多地在于这种文化生产如何得以在特定的社会、文学和艺术结构中被操纵和解释，使之在这些“文学场域”之间运动。

贾妮丝·拉德威 (Janice Radway) 在她关于美国“中等品味” (middlebrow) 文化的著作，尤其是在她研究1920年代以来美国月读俱乐部 (Book-of-the-Month Club) 的活动的著作中，利用并重新解释了布迪厄的“文学场域”概念 [她称之为文学平面 (literary planes)]。月读俱乐部试图创造一种独特的“营销”工具，以家庭读者为目标开展图书邮寄服务，把自己打造成文学生产的中介者、仲裁者和过滤者的独特身份和角色，为此它建立了一个内部的“专家”委员会来审读文本，以便向俱乐部成员推荐和销售图书。他们的流程在本质上复制了布迪厄“文学场域”的一个内部变种，在那里文本的文化资本受到评估，然后被归类和区分，向特定受众销售。“月读俱乐部鉴定程序中的关键步骤”，拉德威指出，“并非鉴定本身，毋宁说是对图书的分类，不如说是将图书按不同的层次进行分拣”。(Radway, 1996: 24) 月读俱乐部设计了一个蓝图，把文本放在“一系列不连续的、离散的、不一致的领域”中看待。这样，俱乐部在生产者（作者）和消费者（读者）之间建立了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传播者——在这里指俱乐部的组织机构——与其说是价值的仲裁者，不如说是文本生产中的管理者。俱乐部通过其鉴定者的过滤对图书进行分类，而非对图书进行美学判断 (Radway, 1996: 24)。在很多情况下，无论是指南手册、地图集、科学教科书、传记，还是小说，文本生产的不同领域或层次，都十分公开

地在不同的意义层面上运行，以具体的、技术上各不相同的编码、结构和形式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月读俱乐部，开始只是一个纯商业性机构，它为自己塑造了一种无所不包的角色，作为一个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做评判、却得到读者信任的高质量文本提供者，同时活动在不同的文本平面和舞台上。

阅读与书史

经过过去30年学者们对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的探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巴特的“作者之死”导致“读者的诞生”的立场，现在已经被视为过时了，它所反映的是1960年代后结构主义革命反对新批评主义(New Criticism)文学责难的观点。这一点在第六章将做更多的讨论，该章讨论的是阅读和读者的问题。

“读者”，正如罗杰·夏蒂埃、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等人的研究所揭示的，并不像巴特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无所不能和创造性地自治的(米歇尔·福柯在他对巴特的反驳“什么是作者？”中简洁提到了这一点)。相反，正如夏蒂埃提醒我们的，阅读是一种历史性的通过中介起作用的活动——文本的意义“依赖于形式，通过这些形式文本被读者(或听众)接受和占用”(Chartier, 1989b: 48)。正如夏蒂埃接下来所说的，我们必须承

认“形式产生意义，当借以呈现内容以供解释的物质形式发生变化时，即使一个固定的文本也会被赋予新的意义和本质 (being) [或者说身份 (statut)]” (Chartier, 1989b: 48)。结果，对于阅读习惯和读者反应的任何研究，都必须面对这些活动发生的背景：“一部关于阅读模式的历史，必须辨别出那些把读者群和阅读传统区分开来的特定倾向。” (Chartier, 1989b: 48) 夏蒂埃还提出，要合理地这样做，就要充分利用书史研究的机遇，书史研究的目的包括重构和解释“文本的世界与读者的世界相遇的情形，前者总是一个形式、材料和对象的世界，后者总是一个在社会中被与他人共同的能力、习俗、期望和阅读习惯所定义的读者” (Chartier, 1997a: 10)。

罗伯特·达恩顿在他 1986 年的综述文章“迈向阅读史的头几步” (First Steps 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 中重申这一号召：将阅读研究置于历史和背景之中，作为从书史中扩展出来的强调社会学因素的一部分 (Darnton, 1986)。达恩顿号召进一步研究读者反应的历史，将印刷品放在日常生活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我们需要检视更多的档案”，他提出，“将读者关于阅读经验的记述与他们所读的书上的阅读记录 (protocols of reading) 加以比较，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他们的行为进行比较” (Darnton, 1986: 157)。进而，书史学家必须对读者与文本生产者之间易变的、交互的联系，以及从文
24 本中产生的意义随时间而变化的方式保持敏感。在他看来，阅读史家需要“面对处于该问题核心的相关要素：变化中的读者如何解释变迁中的文本？” (Darnton, 1986: 187)。在研究了阅读这一社会现象之后，书史学家就“能够回答许多关于‘谁’、‘什么’、‘哪里’、‘何时’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探讨更困难的‘为什么’、‘怎么样’具有极大帮助” (Darnton, 1986: 157)。

用达恩顿的话说，我们现在正在探讨阅读史上的“为什么”和“怎么样”，投入的力量与探讨“谁”、“什么”、“哪里”、“何时”一样多。关于阅读史的材料仍然匮乏，问题成堆：包括图书销售商的书单、图书馆记录和政府登记册等在内的档案材料，提供了概略性的资料，可供探究有关模型和趋

势的问题，这些模型和趋势可以是全局的，也可以是局部的；个人材料，包括书信、日记和自传，提供了对阅读中的自我的描述，可以对个人阅读习惯和实践做出谨慎的判断。例如，理查德·阿尔提克（Richard Altick）对从15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阅读的研究（1957）《英国的普通读者：大众阅读的社会史，1800 - 1900》（*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ss Reading Public, 1800 - 1900*），显示了这类材料的丰富性和密集性，也提醒我们需要再造我们所研究的文化的精神世界——弄清“为什么”和“怎么样”，正如亨利·让·马丁、罗杰·夏蒂埃、罗伯特·埃斯卡皮等年鉴学派学者们所严格要求的。

达恩顿的“怎么样”既包括印刷文字的副文本元素（这个与杰罗姆·麦克盖恩与热拉尔·热奈特的研究有关的课题已被提及），也包括阅读行为的性质本身。后一课题来自读者反应批评学派（reader-response criticism），它于1970年代在德国兴起，其中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是领军人物。伊瑟尔重新把读者置于阅读行为的中心，而此前狭隘地聚焦于作者“意图”和文本结构的倾向曾把读者逐出这个位置。在伊瑟尔的阅读模型中，读者在文本意义的创造过程中是一个积极的创造性的参与者。这一模型似乎强调了历史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它认为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时期会从他们的阅读中得到不同的意义。事实证明这一观念很重要，它使阅读史家得以从单个人的材料出发得出关于受众的结论，意欲反驳达恩顿“读者大众的经验在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外”（Darnton, 1986: 177）的主张。

书史与媒介

25 由于书史研究的主题和涉及面较为宽泛，书史学家们越来越以“媒介”（mediation）这一概念来设定他们的研究工作（从达恩顿的“交流圈”等理论中得到启示）。“媒介”是一个关键性概念，强化了对书籍史和印刷文化的含义的当代解释。正如琼·谢莉·鲁宾（Joan Shelley Rubin）所阐释的，“该术语摒弃了印刷品仅仅是作者文字的体现的观点，表明了影响文本流传的诸多因素”（Rubin, 2003: 562）。迈克尔·温希普（Michael Winship）支持这一解释，指出：“书籍史的根本在于，将文献作为一种人类装置，作为孕育它的社会和文化力量母体的一部分，而非一种纯粹或抽象的、独立于历史之外的理念来理解”（Winship, 1993: 95 - 96）。其他学者在对这一母体的考察中，从文学作品转向诗文选集、宗教问答集与读本、儿童教科书等多样化的文本（Price, 2000; Howsam, 1991; Monaghan, 1989）。

书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既标志着一个终点，也标志着一个起点。很清楚，当我们迈进一个讨论“新”的电子革命的时代时，开始于15世纪的“旧”的印刷革命，呈现出了更清晰的焦点和自然的终结。正如手抄本传统曾与当时新的印刷技术融合，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类似的新旧媒体的融合与互补。20世纪以来视觉文化嵌入到文化的构成之中（电影、电视、万维网的发展），也同时意味着印刷文化的重塑，以适应这些传播媒介。目前，书籍成为西方当代文化产业中的一部分，其中创造力、资本主义与消费通过以文本为基础的大众传媒产品的生产（书籍改编为电影，以及电影的“小说化”）

联系在一起。它也表现在印刷文本（报刊杂志）如今仅仅是争夺大众注意力的众多媒体传播系统之一这种状态中。你只要综观如今人类借以交流的众多媒体，就可以看到印刷文化正在慢慢地从社会交流的中心被赶到边缘地带，在电子时代，印刷品仍是信息的必要形式，但已不再是唯一形式。

然而，如果书籍将来不再是人类交流的主要形式，也并不意味着就像有些学者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书籍将面临消亡，印刷对社会构成的影响也并未减弱。书史的重要性在于它对人类发展所做的阐发。如果没有轻便和伸手可得的印刷品和文本，社会、文化、法律、人文和宗教形式就不会形成、传播，并塑造全世界的信仰和制度。

小结

这一部分概述了书史研究的主要理论，简要回顾了过去一个世纪里塑造印刷文化和书史学科的一些主要理论家的成果。它显示书史如何从过去的目录学和文本研究的传统——旨在确定可靠的文本和精确的文本意图，转向目前在更广泛和更易变的文化的、社会学和目录学的背景下理解书籍和印刷品。本章也叙述了在书史研究中，把书籍和文本生产，与对作者和读者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兴趣是如何产生的。它描述了书史学家们如何逐渐以“媒

介”来构架他们的研究工作，把重点从恢复文本的确切意义，转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理解文本的定位。在新的媒体实践和万维网挑战印刷品的固化作用，以及在视觉、口头和文本交流形式之间建立新的联系的情况下，我们在看待文本（过去、现在和将来）时必须承认它们的存在具有更广泛的背景。正如本章所揭示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书史正在从文学研究到历史、媒体和交流研究等不同的学科吸取和借鉴各种分析工具和观点。书史不再仅仅是目录学家或文学批评家们的地盘，而可以被视为人类交流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章 从口头到书面

引言

社会是建立在由信息交流过程所导致的各种活动之上的。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是围绕着这个展开的，我们活动的能力也常常由信息和知识的准确性及其最佳运用所决定。处理、解码、传递和运用知识和信息的技巧和能力，从来都受到高度赞赏。在口头文化中，有“说故事者”（griots），还有萨满教巫师、巫医和圣人，他们保存和传递着文化传统，充当着社会和文化价值的载体，同时兼有判决是非、治疗疾苦、通告讯息和娱乐大众的功用。而在书写文化中，则是由抄写员和哲学家来保存和解释人类思想和行为。即使在今天，那些擅长于搜集、运用和处理口头和书写信息的人，也常常履行着同样的职能。这一点我们在从公共关系“政治化妆师”（spin doctor）、信息官员（各种各样信息的把关者），到畅销小说家、记者、编剧和文化评论员等许多职业活动和传统中，都可以看到。

书写活动已经成为书史研究的一部分，本章把它视为社会交流结构的历史。本章将概述在西欧文化中书写是如何发展和传播的，指出其与权威和制度之间的关联，后面这一点在第四章还要做深入探讨。我们将考察口头传统如何融入早期的书写和手抄本文化，在印刷技术盛行时，书写如何发生结构和风格上的改变。本章还要论述由于具备识字能力的阅读群体的发展，书写如何在性质上发生变化，它原本是一种文化工具，

文本由一人面向多个听众朗读，后来发展到通常以个体的、孤独的读者为写作对象。最后，本章简要介绍了学者们在书写为政府和机构权力服务，书写被用来对世界上其他地区进行政治和文化殖民，以及把书写放在阶级结构背景中加以探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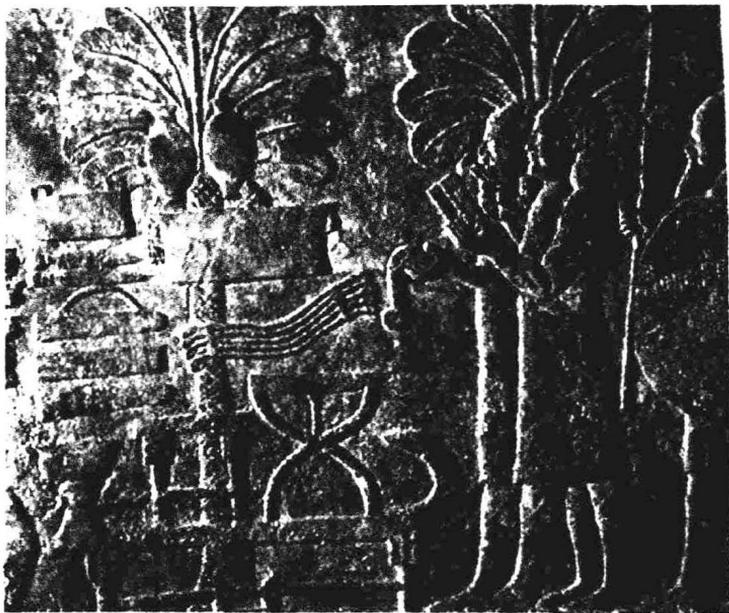
通过书写实现的社会交流

在西欧，通过书写实现的社会交流传统，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近东和美索不达米亚。据说，在公元前3500—3300年间，苏美尔人的农村公



楔形文字

社开始聚合成城邦。为了在干旱的土地上耕种，他们发明了新的灌溉技术，复杂的城市生活也开始产生对法律、规则和记录商品交易的符号的需求。人们认为书写从此诞生，它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为了记录语言，而是被作为一种辅助记忆的工具，在泥版等硬质表面上刻划，以记录经济往来和交易信息，记录对物品和财产的所有权和其他



古巴比伦的书记官

主张 (Assmann, 1994: 18; Schmandt-Besserat, 1982a, 1982b)。然而，在美索不达米亚三千多年的社会和政治发展中，象形文字、楔形文字 (cuneiform, 来自拉丁文 *cuneus*, 意为楔子, 反映了刻印在泥版上的符号的基本形状) 和公开诵读一起, 变得越来越重要, 并与宗教活动和仪式相联系, 成为“被挑选出来的少数人——身兼学者、巫师、医生和祭司——的技术特权, 这种特权受到严格保护” (Noegel, 2004: 134)。

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字是世界上许多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字之一。其他的, 有出现于公元前 3000 年左右的古埃及象形文字, 公元前 1650 - 1200 年前后的爱琴海文字 [所谓线性文字 A (Linear A) 和线性文字 B (Linear B)], 约公元前 3000 - 2400 年的印度河流域文字, 约公元前 1500 年的中国文字, 约公



古埃及石碑



古罗马日历

元前800 - 700年的希腊字母（西方字母的前身），约公元50年的玛雅文字，和公元1400年的阿兹特克文字（Martin, 1995: 1 - 42; Olivier, 2001: 197）。从最初的概念来看，埃及象形文字被证明是一种比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更为复杂的记录系统：它的目的是记录“政治信息而非经济信息，记录政治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活动”（Assmann, 1994: 18）。埃及人所使用的图形标记和符号，曾使有些人把象形文字视为一种图形艺术。其目的是把特定的社会、宗教和政治时刻和活动用图像呈现出来，镌刻在石头上，置于神圣场所，使之万古不灭。埃及象形文字分层很复杂，同时使用了语音、音节和语标等几种方法。它的特点是图形标记既指名称，也指动作。如同美索不达米亚文字一样，它也是社会精英集团——一群“掌握医学和巫术的僧侣”——的专有领

地 (Noegel, 2004: 135)。象形文字“如埃及语中所述, 专门用来‘记述神谕’, 将记录保存在永恒的神圣场所”(Assmann, 1994: 19)。

这种对文字神性的敬畏, 被带入到西奈和巴勒斯坦地区发展起来的文化中, 在希伯来《圣经》中的体现尤为显著。正如斯科特·诺格尔 (Scott B. Noegel) 所指出的, “既然以色列成为了接受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影响的文化通道和容器, 既然在迦南 (最终成为以色列的土地), 文字最初是以楔形文字形式出现的”, 这也就不足为奇了。(Noegel, 2004: 135) 西奈半岛发现的“原始西奈”铭文和受到象形文字启发的字母符号, 其出现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 1850 - 1500 年, 而且常常与埃及象形文字毗邻, 证明了这些文化上的关联和影响 (Lemaire, 2001: 203 - 204)。虽然在书写系统的使用和发展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和变异, 但把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西奈文化结合在一起的, 是它们都相信书面和口头文字的重要性, 是“一种把文字作为权力的载体、法令的载体、传达神谕的书面和口头载体的观念”(Noegel, 2004: 134)。在实践中, 这意味着慎重地对待文字的书写, 人们相信不准确的抄写是对神圣信条的亵渎, 会带来不可预知的恶果。在这种背景下, “准确的记忆意味着一切, 抄写是神圣的, 文本中所蕴涵的精微奥妙之处就是神的隐秘知识所在”(Noegel, 2004: 137; Livingstone, 1986)。

书面文字的准确性、权威性和神圣性, 也嵌入了罗马时期从西奈盆地崛起的最有影响的宗教运动中。基督教是在西奈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 该文化与罗马统治下的希腊语世界联系紧密, 并通过商业贸易与其他地中海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发生联系。起初基督教利用口述传统传播其教义, 使徒们承担了向大众宣讲福音的任务, 他们建立了基督教团体, 通过这些团体口头传播宗教故事和教义, 然后给这些团体留下布道词和主要教义的书面摘要和记录以备将来之用。

通过对主要教义的反复宣讲、不断扩充, 并进行书写记录, 基督教发展出一套统一的教义, 并利用书写技术的新发展 (册页抄本形式、使用羊皮

纸)使之更便于携带。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征服罗马帝国,是因为它能够提供一种对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具有吸引力的普适教义。阅读“异教”书籍和哲学家的著作,是为了从重要的文献中摘取思想观念加以借用,以有针对性地说服那些不信教的人皈依。与此同时,4世纪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传统观念,借助这些传统观念,“教会的神父不断宣称教会是使徒们传承下来的真理的独一无二的宝库,因为只有教堂才是圣灵(Holy Spirit)的居所”(Martin, 1995: 113)。(宗教权威因与作者观念的崛起相关,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加以讨论。)书面文字的神圣性被嵌入了教会议式,《圣经》,尤其是《新约》写本被放置在神圣场所的显著位置[类似于在犹太教堂中的圣洁位置敬畏地展示神圣的书卷——律法书(Torah)——的方式],并以其他的视觉媒体形式(绘画、教堂的彩色玻璃窗)再现,还制作了复本供教士们用来教育信徒。

在整个基督教历的第一个千年里,西欧的书写活动仍局限于教会的范围,主要在修道院里进行。历史中的某些机缘和个别国家的措施,会使书写活动外移到公共领域。公元8—9世纪,在莱茵河、默兹河流域,查理曼大帝及其继任者掀起的加洛林文化复兴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查理曼大帝招徕文人到宫廷任职,扩大了重要经典和文献的抄写规模,推动在外交和行政事务中复兴书写传统(查理曼大帝重新抄写了旧的法律和宗教规章,并要求写就新的政令和法律)。787年,意大利发布公告,宣布书面的法律高于口头传承的习俗,强化了书写的价值。

查理曼大帝及其继任者们还制定了教育政策,目的是使教士和神父的培训正规化,使他们胜任宗教职责。正如亨利·让·马丁所指出的,随着书写活动被包含在这样一种教育的内容中,它被纳入到教会背景之下,书写的目的在于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拉丁语——来熟悉和更好地理解《圣经》,并且,为了上帝的荣耀和西方的统一,将正确、统一的圣餐等仪式的程序永久地固定下来”(Martin, 1995: 126)。出于这种目的对手抄本进行复制,也

导致了书写风格和形式的改进——这一时期得到完善的加洛林字体，与新的标点系统结合起来。这一标点系统被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加以改进，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形式。（更多关于书写风格和形式变迁的情况见本章后面的内容。）

口述传统

然而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要注意到，从口述传统到书写传统的转变中，包含着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借用、吸收，同时重塑了旧的传统，以适应新的交流形式和语境。沃尔特·奥恩已经详尽而博学地论述了口头交流的传统，以及书写的出现对文字发明以前的社会的影响。他的著名论断是，“没有任何一项发明，比书写更能转变人类的意识”（Ong, 1982: 77）。在《口述文化与书面文化》（*Orality and Literacy*）中，奥恩比较了交流意识的变迁所导致的各次发展断裂，提出书写的出现包括了与口述文化交流不同的新的认知经验类型。口述文化，因其信息传递方面的特性，需要特别的技巧和话语形式。奥恩用了一个特别恰当的比喻来描述口述交流模式，他说：“即使在口述环境中，口述话语也通常被认为是编织或补缀而成的。”（Ong, 1982: 13）口述和口述话语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是它对记忆和重复的依赖（它以特定的可识别的模式将信息编织在一起），因为为了保存知识，信息必须以重复的方式口头传递，

31

直到听者内化、记住其意义。正如奥恩所解释的，“固定的、公式化的思维模式，对于智慧的演进和有效的行政管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Ong, 1982: 23）。

直至印刷产生，书写和手抄本文化还保留了很多口述话语的传统——不断重复；——在构思时想象一种参与对话的场景，在这样的对话中思考自己的观点时，用的也是口头用语。因而，在11世纪的英格兰，圣艾尔班斯的伊德默（Eadmer of St. Albans）这样写到，对他来说，写作构思类似于自己给自己听写。而撇开抄写员自己亲自写稿的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用“准口述形式”构思和组织自己的文章。阿奎那每每假想与一个对话者对话，他的文章的每一部分，都包括这个对话者对托马斯预设的立场可能提出的一系列反对意见，一份托马斯自身立场的提要，对每个问题的详细回应，以及想象中的反对者提出的质疑。

这种状况反映了在书写实践中对口述的雄辩风格所做的变通。手抄本文化“为一部书保留了一种说话的感觉，一种在对话中形成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物件”。（Ong, 1982: 123）从口述传统到书写传统之间的转换常常是渐进的，在这个过程中，那些精通前者的人会粗暴地质疑后者的合法性。这些质疑中最著名的例子是苏格拉底关于书写的哲学论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论述之所以为现代学者所知，是因为柏拉图用笔把它们记录下来），时间是在公元前4世纪。在门徒记录下来的许多对话中，苏格拉底把一部分注意力放在他所认为的书写对于当时希腊社会的有害影响上。当时，希腊正处于剧变之中，书写被吸收和融入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的各个方面。这种转变受到有影响的人物的拒斥，他们提出要保留以口述为基础的文化。这注定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因为正如奥恩所说：

到柏拉图时期（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一场变革已经发生：书写终于在希腊人中深入人心——在公元前720—公元前700年希腊字母发明后，这已经过去好几个世纪了……

新的保存知识的方法不是记忆，而是写下来。这解放了头脑，以便产生更加原创的、抽象的思想。(Ong, 1982: 23 - 24)

正如柏拉图在《第七封信》(*The Seventh Letter*)中所载的，苏格拉底对书写几无兴趣，更不相信其价值：苏格拉底关于这一问题的最著名的论断之一是，“写下来的东西，无论关乎何种主题，肯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臆造，其结果是，……在写下来的散文或韵文中，还没有出现什么值得认真注意的东西”。在探讨爱、智慧、社会的性质以及文学技艺的《斐德罗篇》(*Phaedrus*)中，苏格拉底重新讲述了埃及国王与埃及神祇透特(Thoth)(书写是他的发明之一)之间的争辩，以此作为对书写的告诫。透特给了国王几个发明，让他教给自己的臣民，在这个过程中透特和国王辩论了每项发明的优点和不足，然后他们说到书写。“这里”，透特说，“是一个学问的分支，能够改善记忆；我的发明是改善记忆和智慧的秘诀”。埃及国王不为所动。“如果人们学会了这个”，国王对神说道：

……它将在他们的灵魂中植入遗忘；他们不再练习记忆，因为他们会依赖写下来的东西；不再从他们自身找回记忆，而是借助于外部符号。你所发现的不是记忆的药方，而是提醒的药方。你给弟子们提供的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因为你告诉他们很多事情，却没有教给他们任何东西。你让他们看起来似乎知道得很多，但他们基本上一无所知。人们头脑里充满的不是智慧，而是智慧的幻象。他们将成为同侪的负担。

苏格拉底告诫斐德罗，“除了让人想起他已经知道的东西之外，如果相信写下来的语句还有什么别的用处，这个读者的头脑就太过简单了”

(Manguel, 1996: 58)。这里很显然，苏格拉底要采取和利用旧的查询习惯和框架（即记忆和口述文化传统）来应对新的现实。那些深陷于珍视记忆的传统的人们，自然不会喜欢一种改变这种规范和价值、需要掌握新的技能的社会形式——书写。

33 但是，变革的浪潮将苏格拉底这样的人席卷而去。随着识字的人越来越多，书写本身的特性需要有新的文化调适。“较高的识字率”，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促进了真正的书写创作，作者撰著了一个真正成为文本的文本，在纸上汇集他或她的文字。与以口述为基础的思想不同，这赋予了思想新的外形”（Ong, 1982: 94）。从手抄本文化到印本文化的进一步转变，引发了奥恩和其他学者所概括的一个新的“理性世界”（noetic world）的出现，它包括从口头到视觉空间的转变，在以印刷形式进行的交流中走向思维的理性、线性过程，“加于话语之上的一种终止感”，以及更正式、更机械、更非人格的文本叙述模式（Love, 2003: 54）。但是，正如在第一章里所提到的，这样的转变并非全盘推倒重来，而是调适性的，在新出现的交流形式中混合和容纳了旧的交流结构。

书写在民族语言的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在固定拼写、句法以及书面语和口语的正式规则和习惯的意义上，也在为语言在不同地区的正规教学和传播提供基本依据的意义上。语言（通过书写和印刷）的定型及其规范，得益于所有的人在运用语言时都使用同一体系的参考工具。

同时，杰克·古迪、马歇尔·麦克卢汉等人的研究显示，书写（以及后来的印刷）在整个人类历史改变前进方向和重塑历史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提出，人类有了写成和印成的书页，尤其是有了线性的表音的字母（与象形文字相对），正如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所说的那样，导致了“耳朵的魔幻世界与眼睛的中立世界”发生分离（McLuhan, 1962: 32）。沃尔特·奥恩花了大量时间叙述他在口头文化到书写文化的变迁中发现的许多变化。而麦克卢汉在他多部有影响的著作（《古腾堡星系》与《认识媒体》）

中，则聚焦于“古腾堡革命”，提出希腊字母、罗马文字，甚至中世纪的手抄本文化的影响，和印刷的发明所带来的人类意识的根本改变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从最近对构成经验的视觉部分的深刻认识来看”，他声称，

……希腊语的世界看起来是缺乏自信、游移不定的。在手抄本阶段，使用字母技术的语言还没有产生什么强烈的东西足以将视觉从感觉中完全分离出来。甚至罗马字母也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直到用整齐划一并可重复使用的活字进行大规模生产，感觉的分裂才发生了，视觉才从其他感觉维度中分离出来。（McLuhan, 1962: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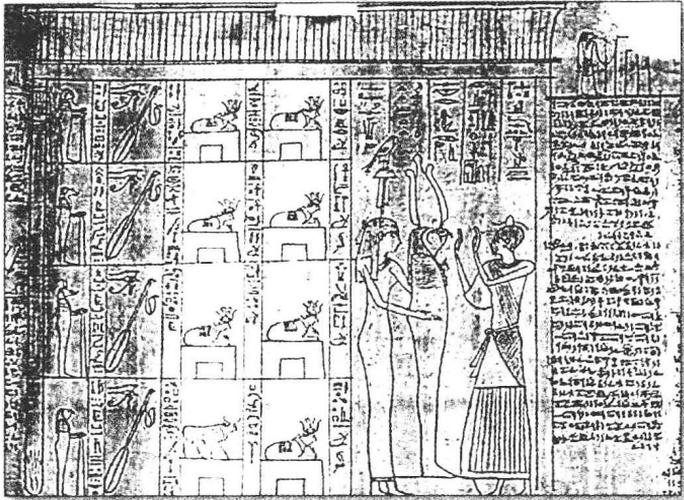
二十多年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虽然摒弃了麦克卢汉的散文文风（认为这对于学术研究是不可取的），但她利用了麦克卢汉的观点，清晰地表达了一个类似的观点，说明“印刷的固化作用”对西欧社会的影响。这一点已经

34

已经在第一章做了介绍（Eisenstein, 1983: 41 - 90）。

技术变迁

技术的进步和重要的书写材料的发展，使得从口头文化到书写文化的



4 世纪写在纸草上的埃及亡灵书

转变变得更为容易。起初，采用莎草纸作为书写材料，使当时的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有了表面光滑的书写介质。很多人还用苇管制成笔，蘸墨进行书写。莎草纸用沼泽中的苇茎晒干后制成，可卷成卷子，但过于脆硬，无法裁切装订成书页。据说罗马人发明了将莎草纸片黏在一起的技术，因而出现了长长的卷子。这些书卷 (volumen) 一般长 6 - 8 米，上面的文字“每行 15 到 30 字，每栏 25 到 45 行，栏与栏是并列平行的，每‘页’从 300 到 1350 个字符不等。比较起来，今天用打字机打出来的页面上约有 1500 多字，一个印刷页……有约 3000 字 [包括了用连续书写法 (scripta continua) 抄写的手抄本所没有的空白处]” (Martin, 1995: 58 - 59)。

罗马历史学家老普林尼 (Pliny the Elder) 声称，公元前 2 世纪，帕加马 (Pergamum) 的统治者攸美尼斯 (Eumenes) 完善了用动物皮制成的羊皮纸，这是由于埃及的托勒密王 (King Ptolemy) 禁止莎草纸出口，试图将莎草纸生产的秘密限制在埃及国境之内。但此前一个世纪的羊皮纸书卷已被发现，说明这个说法可能不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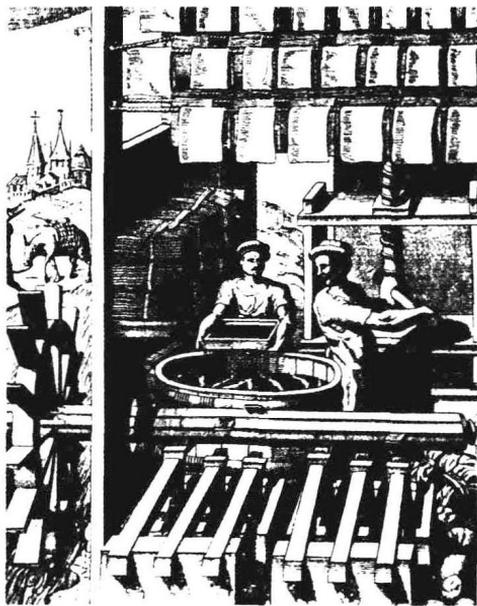
不管真相如何，羊皮纸比莎草纸更柔软，使册页抄本 (codex) (装连起来的两面书写的长方形书页) 得以在约公元 40 - 103 年间发展起来。虽然多

数罗马人倾向于保留传统的羊皮纸书卷形式，基督徒却开始以册页抄本形式保存他们的宗教和医学著作，并使用经过处理的皮革制作更为耐久的羊皮纸和牛皮纸。这不仅是因为羊皮纸更容易处理，也因为它尺寸灵活、经久不坏，使那些被罗马当局查禁的书籍更容易隐藏和运输。到公元400年，



6世纪早期的手抄本Vienna Dioscorides中的作者画像：希腊医学家、植物学家迪奥斯科里斯（Pedanius Dioscorides）

羊皮纸抄本，以及更为贵重的牛皮纸抄本，在整个欧洲成为手抄本的标准、主要的形式，“由许多装订起来的长方形书页制作而成”（Manguel, 1996: 127）。羊皮纸的替代品——用大麻或亚麻制成的纸张，几个世纪以后才出现。这种纸发明于中国，8世纪被阿拉伯人采用，在公元800至1000年间传遍了地中海沿岸的穆斯林国家（包括西班牙），最后传到意大利。意大利人利用整个13世纪完善了生产技术（例如引入化浆工艺、水印，用动物



一幅17世纪的插图中描绘的造纸作坊

凝胶使纸的表面更光滑），使其位于法布里亚诺（Fabriano）、博洛尼亚（Bologna）、帕多瓦（Padua）和阿马尔菲（Amalfi）的造纸厂闻名于欧洲。14世纪，法国和德国有了造纸厂，竞争更为激烈。15世纪下半叶，其他国

家也陆续跟进（斯特拉斯堡于1445年、英格兰于1490年、奥地利于1498年、荷兰和其他北方国家于1500年代建立了造纸厂）。

羊皮纸、纸张和抄本形式的使用影响了书面文字的保存方式。起初，书面材料被以连续书写法（*scripta continua*）抄写在书卷或羊皮纸抄本上保存，这对那些能够大声朗读文本、能辨别词的发音并解读其意义的人是适用的。但后来由于缺乏有效的标记来表示停止、暂停和中断，产生了对文献的错误解释，问题便出现了（Martin, 1995: 54 – 59）。

在早期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文献中，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标点符号，但在使用和风格上毫无规律。在西欧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演说稿中表示停顿的标点符号形式仍是随意而不可靠的。7世纪之后的某个时候，发明了在一行文中标示重点和停顿的方法——这里指的是在抄写中引入句点、破折号和逗号。到9世纪，僧侣——当时西欧书写传统的主要承载者，开始在抄写



中世纪修道院的抄写活动

时把演说稿中的一些部分单独提出来，加上更多的标点符号，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来表示一段文字的开头和结尾。15世纪初，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崛起的日益富有的商业资产阶级以他们的活力、进取心和赞助点燃的人文主义文化运动中，波基奥·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尼科拉·德·尼科利（Niccolo de Niccoli）等意大利革新家在为新的主顾——图书馆——抄写经典著作时，使用标准的斜体字、引号、逗号、句号、括号和其他标点符号来清楚地标示文本意义的分隔与转换，完善和改进了抄写方法。几十年后，印刷的出现使这些手段的运用越来越普遍，实现了印刷的标准化，形成了我们现在所习惯看到和解读的形式。

书写、权威与个人

直到1500年代（机器印刷出现的时代），甚至之后相当一段时期，书写活动和知识的书写仍局限于社会的精英群体——宫廷、司法界、世俗精英、修道士和牧师。基于正式政治体系的新兴地方势力，需要能够解读书写符号的人：解码者——抄写员。他们在官场中记录、解读和传播信息的角色逐渐发展起来，变成了统治者和政治精英们的耳朵、眼睛和声音。这种接近文字的机会赋予了他们权力，这与口述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的说故事者和巫师很相像。但是书写处于一个正在形成的过程中，书写文化中保留了口

头文化的形式，写作常常就是写下来的对话或谈话，其中充满着华丽的辞藻，并不断地重复，这些特点通常与演讲模式有关。

在这种背景下，西欧的手抄本和文本生产是在这样的假定之下进行的，即没有几个人能够读到书，大多数人最后只能用耳朵听。人们假设书写的文本会被大声朗读（这一点本书另一章将做详细论述）。通常有这样一种观点：把一个文本读出来是一种赋予它生命的方法，是一种不同于默读的、能够揭示其精神内涵的方法。文本不是为了读给自己听的，而是要共享。公元383年，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拜访米兰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看到了他认为不同寻常的事情——圣安布罗斯在默读：

他读书的时候，眼睛扫描着页面，心里寻思着意思，但他没有发出声音，舌头没有动。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接近他，客人来了也并不总是通告他。所以当我们拜访他时，常常看到他像这样默读，因为他从不大声朗读。（Manguel, 1996: 42）

如果大声朗读是常态，这种默读行为就是在打破常态，代表了对新的文化形式的顺应。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作品创作时都假设读者会朗读而不是阅读文本。在公共场合进行朗读的现象十分普遍，因为能够阅读的人少得可怜，而且，为大众消费提供的手写文本实在是少之又少。（这一问题将在第六章详细讨论。）

那些能读书的人掌握了一种权力，正如在所有主要宗教的仪式中所体现的那样。例如天主教会，像其他许多有组织的宗教一样，处于中心的是一些代表人物，他们是上帝的话的最终裁决者和解释者（礼拜日布道时，文本被大声诵读并加以评论，就是一个为了广大听众的需要，而对书写文本进行口头解读的公共讲坛的例子）。

书写是一种作用于感觉的具有永久性的行为，对上述权力的实施来说

这一观念也是很重要的。在理查德·德伯瑞 (Richard de Bury, 1287 - 1345) 关于真理及其在写作中的体现的著名著作《书之爱》(Philobiblon, 1345) 中, 他用一种与柏拉图关于书写文化的观点截然对立的方式, 发表了关于写作与文本的价值的观点。对德伯瑞来说, 写作是真理的物质呈现, 相比单纯的演讲对人类的感觉有着更强烈、更持久的影响。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 德伯瑞观点的核心是“在思想、演讲或文字中……呈现的真理, 放在书籍中更能体现其益处”。正如德伯瑞所说, 书写具有超越口头表达的永久性:

因为话语的意义 (virtus vocis) 会随着声音一起消逝, 潜藏在头脑 (mente latens) 里的真理是隐藏的智慧 and 看不见的宝藏; 但闪耀在书中的真理, 意欲向每个敏感的官能 (omni disciplinabili sensui) 呈现自己。当它被阅读时将自己呈现给视觉, 被听到时呈现给听觉, 进而在它被传抄、装订、修改和保管时, 以一种方式呈现给触觉。(Müller, 1994: 38)

写下来的文字是一个和蔼的老师, 一个没有人类缺点、随时听候召唤的伙伴, 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活着的, 只要你愿意, 它可以和你对话。它也是一种非常具体的存在: 尤其是在手抄本文化中, “书籍的实体”, 写作得以栖身的物质形式, 还可以作为“一种文字获得长久寿命的保证, 作者和意义存续的保证”(Müller, 1994: 44)。

手抄本和印刷文化中作者的地位和“权威”, 是本书后面的章节将要讨论的内容。但很清楚的是, 在整个西欧手抄本文化的演进过程中, 书写是通过其物质形式的存在施展权力的, 这是历史遗产的一部分,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时期, 它嵌入人类话语的那一刻起。书写把政治和宗教权威具体化, 其发展与民族国家的演进步调一致。15世纪以后, 随着西欧列强实力的增长, 开始在海外扩张领土和殖民地, 在这个过程中, 它们

把文化模式和政治现实强加给被殖民者，这些文化模式和政治现实被以书写（最后是印刷）形式复制的法律条文和协定所强化。

书写与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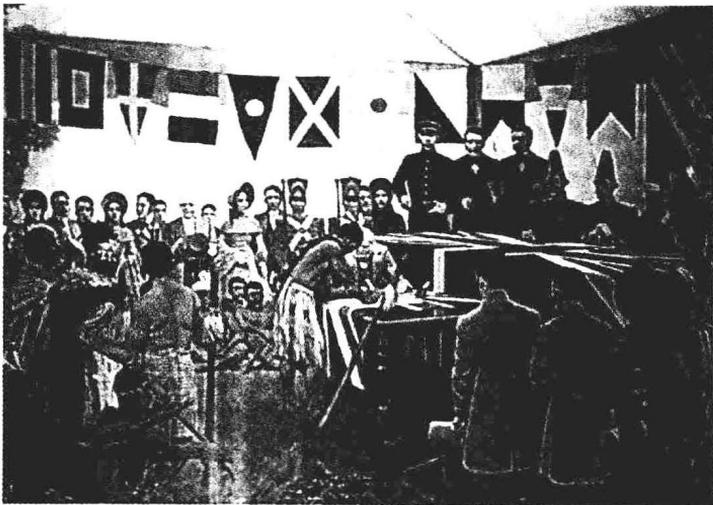


奇 普

已有很多著作研究了将书写文化强加于西欧列强的殖民地，对于塑造文化价值和为政治统治辩护所起的作用。不言自明，历史通常是那些在文化和历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人所写（和重写）的。15世纪和16世纪西班牙对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征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15世纪，西班牙征服者进入墨西哥（玛雅文化随后毁灭），紧随而来的是试图拯救异教

种族的基督教传教士。这些外部势力闯入的副作用之一，是玛雅文化及其器物被边缘化、被误读。玛雅人以“奇普”（quipu）形式所做的社会记录遭到破坏，它是用绳子以复杂的方式编结而成，由某些玛雅书记员专司解读。随后，玛雅习俗被同情或不同情当地文化的西班牙人用反映欧洲中心价值和理解力的方式记录下来。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玛雅遗址被发现和发掘出来，所出土的器物使人们对玛雅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之后，关于玛雅文化的看法才得以改观，这些新观点与西班牙人征服中美洲之后用来代替原始记录的那些文字记载的观点截然不同（Lavallée, 2001; Radicatide Primeglio, 1992; Ascher and Ascher, 1981）。

最近的文化史学家、书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著作，提供了丰富的个案研究材料，显示了殖民列强与被殖民族群之间产生的口头文化、书面文化和印刷文化冲突的结果。例如，克里斯·贝利（Chris Bayly）等人关于印度口述传统和书写传统的著作，很好地展示了印度的书面和印刷传播史的轨迹如何因外部入侵以及与外来文化和影响的互动而发生改变（Bayly, 1996; Finkelstein and Peers, 2000b; Darnton, 2001; Joshi, 2002; Ghosh, 2003）。蒙兀儿人（Mughals）把波斯的手抄本传统带到印度，用于



签订《怀唐依协定》

处理宫廷和官僚事务，16世纪末以后欧洲列强的入侵不断遇到抵抗，其手段来自对复杂交流工具的吸收和改造——例如，1857年起义中反抗英国统治的印度人，利用手写的情报和口传信息网络来组织抵抗，这种方式使试图掌握瞬息万变的局势的英国情报部门备感困惑。

唐·麦肯锡关于新西兰历史的经典论文，同样显示口头文化与印刷文化话语（沃尔特·奥恩所说的“理性世界”）是如何在人类历史上特别关键的时刻发生冲突的。该文关注的是1840年毛利酋长与英国官员之间达成的《怀唐依条约》（Treaty of Waitangi）[该条约将领土权让与英国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当局]。在这个案例中，来自英国君主和新西兰部落的两种权力，以及这些权力实施的不同方式（口头与印刷），导致在这个饱受质疑的事件之后所书写和印刷出来的文件极具争议，对它的解读大相径庭（McKenzie, 1984）。

39 一个类似的运用书写来实施政治和部落权力的例子，被法国社会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记录下来。1930年代末，列维-斯特劳斯花了几年时间在巴西的热带雨林里研究土著部落。他于1955年出版其拓荒之作《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在其中的一节“写字课”（*A Writing Lesson*）中，他描述了在一个印第安部落南比夸拉（Nambikwara）的经历，其中就谈到将书写用于政治目的的情形：

不消说，南比夸拉人没有书面语言，而他们除了在地上画几根带点的线条和之字形之外，也不知道该如何作画。但正如我在卡杜维奥（Caduveo）人那里所做的那样，我向他们分发了纸和铅笔。起初他们没用它们做什么，然后有一天我看到他们都在忙着画波浪线、直线。我很奇怪他们要干什么，然后我突然明白他们正在写，更准确地说，正在试图以我用铅笔的方式来使用这些东西，这是他们唯一所能想到的，因

为我还没有让他们欣赏我的绘画。大多数人仅止于此，但酋长有更大的抱负。无疑他是唯一理解了书写目的的人。所以他向我要了一个拍纸簿，当我们各自拿着一个本子一起工作时，如果我问他某件事，他并不用嘴直接回答我，而是在他的本子上画波浪线，然后给我看，仿佛我能读懂他的意思。他似乎有些沉醉于自己制造的假象；每次他画好一条线，就焦急地审视它，仿佛期待意思从纸面上跳出来。我们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我假装能看懂他那莫名其妙的涂鸦，他马上会加上口头说明，这样我就无需再费神请他解释了。（Munns, 1993: 107 - 108）

在这里，重要的是事情发生的方式，部落酋长抓住了书写的重要性，把它作为维护地位的手段，使它能够充当外界与土著人之间的主要中介。在这个例子中，列维-斯特劳斯描述了这样一个瞬间：书写被用作权力工具，被作为一种连接外部世界、控制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方式。但在这个例子中，重要的不是书写本身，不是出于交流目的对符号的理解，而是书写作为一种象征被借用于社会目的而非智力目的。列维-斯特劳斯利用这个事例来思考社会中书写活动和书写文化的最终角色，他得出结论说，将个人划分和安置在等级和阶级中，是书面语言被置入西方文明的主要目的之一。他说：“总是伴随书写活动出现的唯一现象是城市和帝国的创建，这就是要将大量的个人整合进一个政治系统。”他的结论颇具挑衅性，“我的假说，如果正确的话，将迫使我们承认这一事实，即书面交流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奴役”。（Munns, 1993: 110）

尽管列维-斯特劳斯的立场有些极端，却并不是孤立的——例如福柯，促使人们对书写的叛逆性质（“一种充满风险的姿态”）引起高度关注，这是一种被对文本的审查制度、政府控制和法定拥有权无情包围的话语（尤其是

在18、19世纪版权立法之后)。在这样的环境下,书写——“一种处于神圣和世俗、合法与不合法、宗教与渎神两极之间的行为”——成为被起诉的对象,它未能遵守同时代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约束和法规(Foucault, 1984: 108 - 109)。*对写作和文本生产的审查史在本章的论述范围之外,但它对于深入认识书面交流方式在支持、质疑或抗拒同时代的文化构成方面是有益的。

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也为深入认识15、16世纪对书写被政治利用进行社会控制所做的持续抗争提供了有趣的例证。例如,正如罗杰·夏蒂埃在“书写的实际影响”(The Practical Impact of Writing)一文中所指出的,莎士比亚1594年的历史剧《亨利六世》第二部,体现了当时口头文化与书写文化之间的冲突(Chartier, 1989b: 111 - 160)。在该剧所叙述的事件中,有1449年的杰克·凯德(Jack Cade)起义。杰克·凯德猛攻伦敦,目标是杀死“所有的律师”,袭击查塔姆(Chatham)的职员,破坏书写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场所(这里指法庭、档案馆和造纸厂)。凯德宣称这次起义的目的,是恢复传统的口头文化和规范,包括建立在口头公告基础上的法律,不通过书籍和纸张、而通过其他传统方式(如在木头上刻划记号)来记录债务和商业交易。虽然该事件发生了150年后莎士比亚才写了该剧,但正如夏蒂埃所说,莎翁是在用它来凸显两种文化之间的紧张:

……一种文化在公共和私人领域越来越依赖书面文字;另一种文化则建立在怀旧和乌托邦的基础之上,向往一个没有文字、由人人都能听懂的话和人人都认识的记号治理的社会。不管他以愚蠢和血腥形容一场受欢迎的起义,把造反者描写成被人操纵的盲从者的目的是什么,很清楚,起义背后的原因是对书写的仇视,书写被归咎为引发社会剧变的罪魁祸首。(Chartier, 1989b: 123)

41

* 罗杰·夏蒂埃对福柯关于作者功能的观点的分析很有用,见 Chartier, 1994: 25 - 60。

在这里，描写了底层民众对书写活动中所包含的权力，以及由书写文化所支持的官方构造（法律、国家和宗教）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威权感到焦躁不安。而识字阶层则担心印刷对手抄本文化的影响。15世纪末16世纪初印刷品的出现，影响了文化变迁的进程，对精英控制之下的特权和领域构成威胁。这种反应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6世纪一个威尼斯修道士在威尼斯议会上（在议员们的普遍赞同下）提议反对采用古腾堡的印刷技术革新。他宣称，为了捍卫书写，需要抵制印刷，因为它败坏文本（因唯利是图而制作、流通粗劣、讹误的版本），败坏思想（在未经教会同意的情况下使普通公众易于得到不道德或危险的文献），败坏知识（使之随便向愚人开放）（Chartier, 1989b: 123）。

古腾堡1450年的发明最终使人们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大规模地生产文献，并使之广为流通。此前，知识的流通局限于手抄本的私下流通。有关国际事件的消息，通常是通过发送手写的报告，在大国、民众、教会或其他民事部门之间流通，其后这些报告被复制、上达，或在一些相对封闭的圈子里传阅。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识字率提高了，阅读更为普及，但有关书写的知识仍局限于少数人。17、18世纪，在新教和路德教会的带动下，整个欧洲推行了精心制定的政策，以教会所有的人阅读上帝的文字，“通过他们自己的眼睛看看上帝通过他神圣的文字给了我们什么教导”（Chartier, 1989b: 118）。*（更多关于西欧历史上近代阅读的发展情况，将会在第六章提到）。

*在这篇文章里，关于近代早期西欧社会史上文化影响对识字率变化所起的作用，夏蒂埃尤为深刻和博学。

小结

人类交流的历史以文化实践的重要转换，以及拒斥、适应和内化的过程为特征。在本章，我们已经考察了在西欧历史上，口头文化如何面对来自书写或书面文化发展的挑战，后者采用和覆盖了前者的许多方法和过程，并应用到新的文化模板上。正如我们已经介绍的，像沃尔特·奥恩、马歇尔·麦克卢汉这样有影响的学者提出，从口头话语模式到书写话语模式，这些进程重塑了人类的话语和意识。这一章还考察了从书写到印刷文化的转变如何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接纳、改编和重塑过程。它介绍了对将口头文化整合进书写文化持批评态度的人，如何看待知识的传播等同于“亵渎”的观念，以及他们如何不得不面对他们所选择的信息处理方式的变化。当时有人抱怨，印刷文化通过征服书写文化，通过使得各种读写文化能够平等地（缺乏控制地）接触以前被视为隐秘的知识，使社会变得更糟了。当个人和机构都充分利用书写提供的机会来获得更广泛的受众之后，这些问题消失了。本章还讨论了机构如何利用书写为国家权力服务，以及学者们如何描述它在其他社会和政治环境中的应用。正如本书的其他章节将彰显的，书写、阅读和文本生产的历史始终以这种改变、演化和整合的过程为特征，这是人类交流圈的一部分，这个交流圈成为当今书史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

第三章 印刷的诞生

引言

本章详述了印刷时代书籍的发展，不仅论述了其发展过程，也论述了这一新兴制造业形成的产业结构。以快速、高效和便宜的方式大量生产书籍和小册子的能力，与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等广阔的社会和思想运动之间的关系，不能再以简单的因果关系——“印刷机是变革的动因”——来表述。这句话因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著作而广为流行。确实，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最近一直忙于反驳许多学者对她的那本影响巨大的著作的“轻率”解释，她还发现她的观点与后来阿德里安·约翰斯关于科学和印刷的观点之间，其共同之处比当初评论家和批评者所认为的要多（Eisenstein, 1979, 2002a and 2002b; Johns, 1998 and 2002）。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约略讲到爱森斯坦和约翰斯的观点似乎是对立的。然而，他们的某些观点，例如关于伟大的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就不一定那么对立。本章试图综述印刷出现的历史，不仅为第一章的争论提供背景，同时也强调对这些观点加以整合的可能性。

达恩顿对启蒙运动（在它的法国发源地）与印刷活动，尤其是与《百科全书》的出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他的研究显示，这种关系中包含了更复杂和多样的因素（Darnton, 1982a and 1982b）。事实上，通过把对书籍生产和发行的宏观研究，与对像纳沙泰尔印刷学会（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atel, 简称 STN) 这样的特定机构、特定图书以及特定读者或读者群的具体的微观史研究相结合, 这是书籍史能够对关于这些伟大的社会和思想运动的正统记述做出新阐发的领域之一。本章以相对简洁明了的编年方式展开论述, 从手抄本向印刷品的转型, 讲到书籍生产的工业化。尽管篇幅不短, 本章并不打算提供一部全面的历史, 而是为书史内部的争论及其对印刷文化的定义提供背景。

印刷术发明前的书籍

本章的标题与费弗尔和马丁的拓荒之作《印刷书的诞生》有些相似, 但也有区别。从文字产生和书籍的手工制作, 到引入一种技术使书籍生产达至初步工业化阶段(这一过程在19世纪完成——一方面是蒸汽动力的引



挑选羊皮纸



裁切羊皮纸



划对齐线

抄写前的准备工作



中世纪的抄写室

人，另一方面是机械排版的发展）(Febvre and Martin, 1976)，在这个过程中，本章所要强调的是一种连续性。从大约公元6世纪，直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印刷本取代手抄本，书籍都是由抄写员依据一系列常规来复制的(Cavallo, 2003)。这些抄写员通常身为修道士，在被称为抄写室 (scriptoria) 的修道院工场里工作。他们的一部分工作是抄写复制宗教仪式方面的著作，以满足教育新教徒和礼拜活动之需，但他们也曾复制同样用拉丁文写作的世俗书籍。抄写工作在羊皮纸或牛皮纸上进行，这些纸事先要折成页，标上记号，打上格线。其后，纸张会被切割成页，再摞成层叠状。如果需要复制很多本，母本就会被分给多个抄写员，每个抄写员就他自己的那部分制作多个复本。工作由一个主事 (armarius) 负责监管，他给抄写员提供羊皮纸、笔、墨和尺子。为了防范火灾，禁止使用人工光源，抄写只在白天进行。抄写员只负责用黑墨水抄写正文，留下书名、标题和首字母由文字装饰匠 (rubricator) 用红笔填上。这一场景在翁贝托·埃柯 (Umberto Eco) 的



中世纪手抄本《凯兰书卷》中的插图



中世纪的抄书员

小说《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 中被完美再现(1983)。

为了提高速度，一本书的抄写会分派给多个小组承担，因此不同风格的书写方式会在同一本书中出现。4世纪时，安色尔字体(Uncial)和半安色尔字体(half-Uncial)出现，并受到拜占庭艺术形式的影响；这些字体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来，各国字体略有差异，直到12世纪仍在使用。在使用这种字体的抄本中，最著名的是爱尔兰的《凯兰书卷》(Book of Kells)。公元8世纪，在查理曼大帝的推动下，书写标准得以改进，导致了加洛林(Carolingian)草体小字的发明，以之为基础形成了自那时以来欧洲的大多数字体。到14世纪，各国出现了新的字母形式，与当时风靡欧洲的哥特式艺术风格相协调。这些字体在风格和名称上各不相同，如英格兰的黑字母(black letter)、法国的斜圆字体(lettre batarde)、德

特别重要的手抄本，以及富裕的主顾委托制作的手抄本，其装饰常常极尽奢华（Febvre and Martin, 1976）。装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写字母、花边和小插图。小插图在尺寸上并不一定很小，它指的是装饰中的绘画部分。首写字母可以用花体字或缠绕的枝叶来装饰，但有时在环圈形的线条之间有小的插画，也成为小插图的一部分。花边可能会把页面中的文字整个包围起来，但有时只是被用来分隔文字和小插图。这些装饰中的绘画或是彩色的，或使用金叶或银叶。文字和装饰一起，构成了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作为收藏品的书籍。

延续与变迁

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成为可交换的商品。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书籍也需要一个生产、销售和发行的体系。中世纪晚期的书籍贸易以文具商（stationers）和商业性抄书室为中心，他们向大学或奢华手抄本的收藏家供应书籍，因此其服务的市场相当有限，局限于他们所在的地区。然而，在15、16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和识字率的普遍增长，提升了文学在欧洲文化中的重要性（Grafton, 1999）。与此相呼应，印刷技术把各种各样的大量书籍送到读者面前。从一个长时期来看，许多经久不衰的印刷商行一般坐落于商业和贸易中心，而不是围绕大学和修道院这样的思想中心设立。在摇

摇篮本 (incunabula) 时期, 印刷书生产的各个环节, 如活字的雕刻冲压、印刷机的操作和成品的售卖, 通常集于一家商行。早期的印刷书与手抄本非常相像, 尤其是版面式样, 需要装饰的首字母也仍然由手工完成。16 世纪, 欧洲大部分地区使用铜雕版来印插图, 字体从哥特式和黑字母向罗马字体和斜体字 (italic) 转变 (Müller, 1994)。

早期的印刷商身兼印刷者、出版者和销售者的角色, 但即使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市场, 这种模式也是无法长久维持的。经营一个印刷工场所需要的巨额前期资金投入, 很快就迫使印刷商分散投资风险, 并追求更大的市场。印刷作坊主 (master printers) 开始专注于主要的出版业务, 从贵族、富商或机构那里获得资金支持, 建立销售网络, 以确保在业内生存下去, 并获得足够的投资回报。随后, 成功的印刷商 (printers) 成长为出版商, 从而实现生产与销售职能分离。像马努提乌斯 (Manutius) (威尼斯)、柯贝尔格 (Koberger) (纽伦堡)、普朗坦 (Plantin) (安特卫普) 这样著名的出版商, 他们自己继续印刷书籍, 同时把一些活儿委托给小的印刷商 (Eisenstein, 1979)。

出版商们也创造了国际化的销售体系。传统上, 教师卖书给学生, 小贩在市场上兜售图书, 但通过这些渠道所达到的销售数额已远远不敷所需。像柯贝尔格



早期的摇篮本模仿了手抄本の様式

这样的成功出版商开始印刷库存目录，在大的城镇建立分支机构，参加国际书展，充当其他出版商的代理。欧洲主要的书展在安特卫普、里昂、莱比锡和法兰克福举行，商业上的优势使这些城镇成为各业商人关注的焦点。传统上，法兰克福是手抄本销售中心，同时很快成为规模最大的印刷书市。到1506年，柯贝尔格的生意如此之好，以至于他在法兰克福城里建立了一座仓库来存放库存书。像法兰克福这样的书市让印刷商、出版商和零售商汇集一处，接受订单、交易图书、购买设备、委托业务。书籍批发商也开始成为贸易结构中的一部分。原先在各大书市为大出版商做中间人的代理，发展为批发商，精力主要放在里昂和法兰克福等地举行的大型活动上，为巴黎等大城市的书籍销售商供货（Febvre and Martin，1976）。

从很早开始，印刷商们就意识到他们的生存取决于高效的发行。传统



普朗坦出版的多语种对照《圣经》

上，地方上的文具商为大学提供拉丁文学术书籍，他们通常依附于这些大学，普通读者则是流动摊贩的服务对象，所提供的书籍有用各国语言写的小册子、民间歌谣、年历和传奇故事。到18世纪，携带少量书籍的流动商贩仍然存在，但他们服务的市场非常有限。处于同一个书业体系之中的印刷商与出版商，都需要更加有效的发行效率。这样，中间人应运而生，他们作为宣传代理，为出版商推广库存目录，做

海报宣传，很快就变得十分有用。直到17世纪，出版商与销售商之间的区别还很小。

法兰克福等地的书市图书交易越来越频繁，在这些地方运货人随时准备为出版商运送商品。船只和四轮马车是运输书籍的唯一工具，都很笨重而且不可靠。托运的书籍用帆布包裹起来，装在大的板条箱里发运。大的出版商



书 贩

在法兰克福建立仓库，以便在书市举办间隙存储货物，欧洲主要城市的分支机构也成为发行网点。在法国，巴黎和里昂的图书发行得益于塞纳河与卢瓦尔河，而莱茵河和易北河则帮助书籍在德国境内流通（Febvre and Martin, 1976）。威尼斯之所以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出版中心，是因为它成熟的商业网络为图书发行提供了非常高效的服务（Lowry, 1979）。

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

威尼斯的阿尔都斯·马努提乌斯 (Aldus Manutius) 在出版上最为人所熟知的创新，是引入了斜体字 (italic type)，以及用八开本形式出版口袋开本希腊罗马经典著作 (Lowry, 1979)。这两个创新是相互联系的：除了美观上的考虑之外，斜体字字形窄小、紧凑，这一优势使印刷者能够经济地使用版面——对像八开本这样的小页面尤为重要。阿尔都斯以这种版式出版的著作秉持了当时最高的学术标准，但它们形式紧凑，便于携带——同时价格低廉。另一个创新是印数，达到了1000册，而当时的书通常只印100 - 250册 (最高也只有500册)。这些小尺寸的书专为个人购藏而推出，目的是为了普及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写的古典著作和意大利诗歌，这成为人文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些书流通广泛，尽享盛誉，结果其他出版商很快纷纷起效仿。主要的仿冒中心在里昂，然而法国印刷商除了从阿尔都斯的活字设计者弗朗西斯科·格里佛 (Francesco Griffo) 那里得到一些活字外，并没有在学术和印刷上遵循同样的高标准。阿尔都斯还印刷了他的出版物目录，将他的成绩公之于众。这些目录至少在1498、1503和1513年印刷了三次。其中不仅列出了可供书目，还标明了每种书的最低价格。它们是最早的出版目录。

但是，正如夏蒂埃在“书写的实际影响”中所指出的，这些进步伴随着一种拒斥，类似于前面一章所提到的对于文字本身的排斥 (Chartier, 1989b)。以前因为书写与特权和权力相联系，来自底层社会的人对书写行为心存疑虑，如今那些享有特权和权力的人，则对印刷似乎要带来的知识

(和权力)民主化满怀敌意。多明我会的一个修道士菲利普·迪·斯特拉塔(Filippo di Strata),开始劝说威尼斯议会对印刷加以限制,原因是它只求追逐利润,快速生产、大量复制讹误的文本;它在没有宗教权威适当监控的情况下,使普通公众接触到了不道德或危险的文本,因而败坏思想;它把知识随意向愚人开放,因而败坏了知识。夏蒂埃引用了威尼斯议会的裁决:“笔是个处女,而印刷机则是个婊子。”(Chartier, 1989b: 124)印刷(与书写)一定会取得胜利,也的确取得了胜利,这体现于两种理念:一方面它代表了更深层的控制手段;另一方面,知识从封闭的社会圈子走向开放,这本身就是对既存社会秩序的威胁。

印刷业在最初一百年间的蓬勃发展,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缺乏像其他行业那样组织起来的行业架构,这样的行业架构可能会妨碍该行业的发展。最早把印刷商和出版商包括进去的行业协会,是威尼斯行会和伦敦的书业公会。威尼斯行会直到1548年才成立。从1403年开始,伦敦书业公会就是英格兰抄写员、文字装饰匠和装订工利益的代表,但直到1556年,印刷商和图书销售商才被纳入该组织(Feather, 1988)。在早期,印刷是新生事物,从业人员的技能千差万别,这意味着它能够摆脱中世纪行会制度的束缚而发展起来。行会垄断了一个城镇或一个地区的某个行业,规定一个人怎样、何时、何地在这个行业雇用。由于缺乏行会组织,印刷业得以自由、快速地发展,企业主纷纷开设作坊。直到16世纪后半叶,印刷行会才开始出现,那时这个行业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印刷作坊主更多地承担起出版和销售的角色——某种程度上不再直接从事实际的印刷活动,同时,政府也开始试图控制出版业。行会一旦建立起来,就意味着雇主想利用它来控制那些容易制造麻烦的劳工(Feuvre and Martin, 1976)。

印刷业从业人员分为几个等级:学徒、熟练工(journeymen)和雇主(master printers)(Darnton, 1996)。像大多数行业一样,年轻的学徒要签二到五年合同为雇主服务,雇主为他提供培训、食宿、衣物和零花钱。学



17 世纪纽伦堡的印刷作坊

徒要打扫作坊、跑腿儿、准备油墨、搬运机器，最后还要从熟练工那里学技术。熟练工是专家——一个毕了业的学徒，充当排字工、校对员、活字设计师或印刷机操作工。他从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城镇，磨炼技艺，签订
49 工作合同。排字工通常是最有技术的工人，因为他的工作要求具备较高的识字能力。一个流动排字工希望能升至大型作坊排字工头的位置，然后自己当雇主。

到1500年，欧洲每个重要的大城市都至少有了一个印刷工场 (Eisenstein, 1979; Müller, 1994)。它们在规模上大小不一，小到只有雇主和一个学徒，大到雇用十二个人。纽伦堡的柯贝尔格 (Koberger) 和安特卫普的普朗坦 (Plantin) 经营的是罕见的大规模工场，各自拥有24台印刷机和一百多个工人。一般的印刷作坊有五六个工人，有的是长期的，有的是流动的。印刷作坊主/出版商，或大型工场里的排字工头，会监督印刷过程。一两个排字工从一个架子上挑选字母，把它们码在排字盘里，形成字行。排好的字行被放在方形活字盘里，行与行之间用铅条隔开。最后排好一整页，形成一个印版，放在一个金属版框中卡紧。为了把版排好，排字工需要识字，

还要懂得拉丁文。印刷工和油墨工两人负责操作印刷机，纸张由仓库管理员提供。有时，雇主可能还会雇用一名工人，用一种称为“T型杆”（peel）的长杆将湿润的印纸挂到装在天花板上的晾架上。印刷商们没有大量的活字储备，因此施印后印版几乎会被马上拆散，以使用这些字母来排下一版。这样，在整个工作周期中，排字、印刷、拆版保持着一定的工作节奏。如果雇主能够请得起的话，还会有一个校对员，可能由当地的文书或学生担任，负责将印样检查一遍。这样的作坊每天大约要生产3000页，工作辛苦，持续不断，需要大家通力协作。

运转一个印刷工场所需的协作精神，促成了工人们之间的团结，并很快在保护他们利益的团体和委员会中表现出来。雇主通过加入和建立行会，制定严格的行业准则，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工人和雇主之间的紧张关系集中于工资、伙食、工作时间过长、过度使用不熟练的学徒以降低成本等方面的纠纷。罢工并不少见（Darnton, 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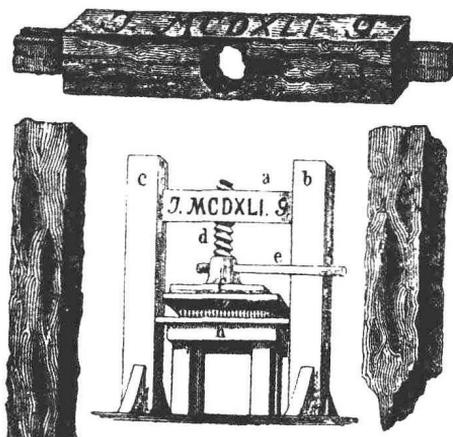
德国的古腾堡

从某种角度上说，古腾堡将金属活字用于印刷，只是对旧的材料和做法加以改进，并使之有了新的应用而已（Müller, 1994）。印刷工场里聚集



JOHANNES GUTTENBE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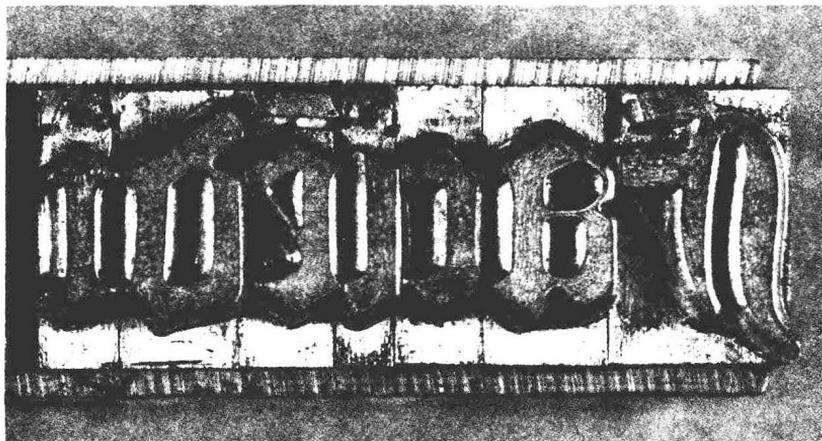
古腾堡



古腾堡的印刷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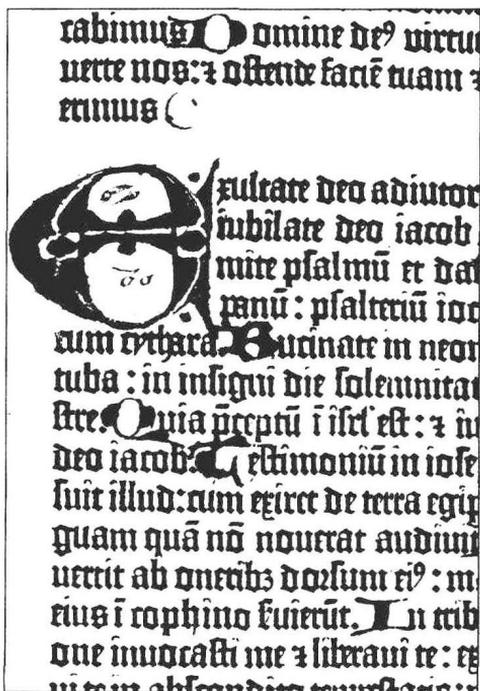
了各种各样的成熟技术。然而，尽管已有达恩顿早前的告诫，在社会的视角、书史的取向，与惯常只关注名人的通俗历史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丝紧张（Darnton, 1982b）。除了在葡萄和橄榄压制中已经使用的螺旋式挤压机（screw-press）之外，金匠、书法高手（writing master）和木刻工人的技艺共同创造了新的技术。然而，《危险》（Jeopardy）* 节目中的选手在面对“古腾堡”这个题目时，多半的回答是“印刷技术的发明者”。约翰尼斯·根斯

* 几十年来在美国十分流行的以知识问答为内容的一档电视节目。——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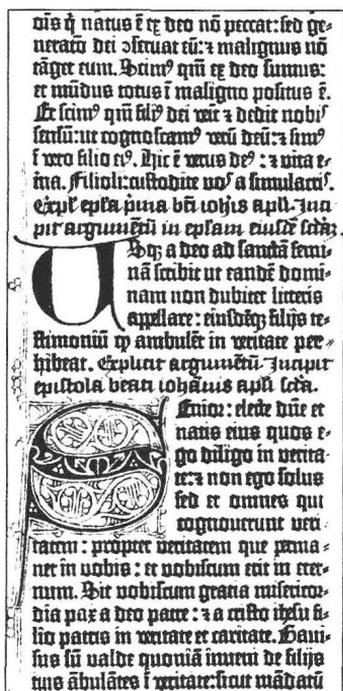


古腾堡活字的复制品

弗雷希·古腾堡 (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Gutenberg) 1390年代生于美因茨的一个中产之家，他的第一个职业是金匠。1428至1444年间，他住在斯特拉斯堡，明显是为了逃避美因茨的贵族与工匠行会之间的争斗。显然，在斯特拉斯堡时，他进行了一些制造活字的试验：他有一台印刷机，买了大量的铅，和伙伴们在搞一个“秘密项目”。到1448年，他回到美因茨，向一个律师约翰·福斯特 (Johann Fust) 借了钱，以便完成印刷机的发明工作。美因茨42行《圣经》通常被认为是古腾堡印制的，其出现不晚于1456年，但在古腾堡能用它获利之前，福斯特却取消了古腾堡对抵押品的赎回权，占有了古腾堡的印刷设备。然后福斯特与古腾堡的工头彼得·舍费尔 (Peter Schoffer) 成了合伙人。虽然不清楚后来古腾堡做了什么，但人们通常认为他继续干了一段时间的印刷，尽管现在并没有发现带有他的名字的印刷品。除了42行《圣经》之外，归到他名下的书还包括另一部《圣经》(“36



古腾堡42行《圣经》细节



古腾堡42行《圣经》

行”)、一些语法书、教皇的免罪符、至少一种大幅面占星历,可能还有乔安尼斯·巴尔布斯·德·詹努尔 (Joannes Balbus de Jannua) 的《万灵药》(Catholicon)。1460年后,他似乎停止了印刷,据说可能是因为眼睛失明。从1465年开始,他从美因茨大主教那里获得经济来源。古腾堡死于1468年2月3日 (Eisenstein, 1979; Müller, 1994)。

这种归功于古腾堡的复制文本的新方法,在它首次应用于美因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传遍了整个欧洲。在美因茨,福斯特和舍费尔得到了古腾堡的大量印刷物资,后来该企业由舍费尔之子约翰 (Johann) 继续经营。约翰·曼特林 (Johann Mentelin) 于1460 - 1461年间在斯特拉斯堡建立了一所印刷工场,印制了一部《圣经》,与古腾堡展开竞争。冈瑟·蔡纳 (Gunther Zainer) 可能在斯特拉斯堡接受了曼特林的培训,又被 SS 乌尔里克和阿弗拉的修道院 (Abbot of SS Ulric and Afra) 叫到奥格斯堡,那里早已因抄写室而闻名遐



15世纪德国的木刻雕版书《死亡的艺术》(Ars Moriendi)插图

迹。蔡纳的印刷机于1472年印出了第一部书。同年,乌尔姆的第一所印刷工场由约翰·蔡纳 (Johann Zainer) 建立起来,他可能是斯特拉斯堡的冈瑟·蔡纳的兄弟 (Febvre and Martin, 1976)。

印刷厂很快在德国的其他城镇建立起来。乌尔里希·泽尔 (Ulrich Zell) 于1464年在科隆建立了一个印刷工场;在若干年内,该城是德国西北部重要的印刷中心,卡克斯顿 (Caxton) 正

是在那里接受的培训。从1470年起，安敦·柯贝尔格（Anton Koberger）的印刷工场开始活跃于纽伦堡。1477年，约翰·阿默巴赫（Johann Amerbach）开始在巴塞尔从事印刷，然而从1521年起，苏黎世的印刷商在新教地区的印刷业中占尽优势。汉堡的斯蒂芬·阿恩德斯（Stephen Arndes）于1486年在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中的著名城市吕贝克（Lubeck）定居下来，从那里，印刷商们又把技术带到了波罗的海沿岸城市（Febvre and Martin, 1976）。德国拥有一个高效的出版系统，现在它需要的是出版的材料和出版的意愿，以使它的效能得以发挥。

51

宗教改革

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的新教改革运动（protestant reformation），意味着欧洲宗教思想的转变。这是一场围绕教义、《圣经》和礼拜方式等各方面进行的斗争，因印刷品的出现而导致的公共论辩，为这场斗争提供了舞台（Gilmont, 1999）。当人文主义的思想和方法从意大利进入北欧时，它们为约翰尼斯·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塞巴斯蒂安·勃兰特（Sebastian Brandt）、乌尔里希·冯·赫顿（Ulrich von Hutten）等新崛起的德国学者，提供了表达广泛存在的反教士情绪和民族主义情感的手段。这些人运用从人文主义的训练中获得的修辞武器，撰写了讽刺社会和评论政治的文章，抨击教

皇的权威。

当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 – 1546) 于1517年登上历史舞台时, 他宣扬以人文主义的观点重读《圣经》。其尚处于萌芽期的神学观, 在早已躁动不安的公众中又添了一把柴, 这种躁动不安表现在小册子、书籍、海报和木版画中。路德的个人反叛只是中世纪晚期改革冲动的一种表达, 它试图唤醒俗众的宗教热情, 复兴基督教的福音精神, 批判宗教等级制度和市侩腐败, 最终把矛头指向罗马天主教会的神学。路德成了中心人物, 在他周围掀起了一场宗教、社会和政治革命, 其中的部分原因正是印刷机的出现。

在这之前, 宗教上的革新或在教会内部被吸纳, 或像发生于今属捷克共和国的地区的胡斯运动 (Hussitism) 那样, 被定为异端遭到扑灭。书籍的大量生产使得新的改革思想, 能够以比以前快得多的速度向远为广大的受众



1520年在威登堡 (Wittenberg) 出版的路德的著作

传播, 并促使改革问题被拿到公众中辩论。1517年10月, 路德本该依照中世纪论辩的传统, 将他抨击教皇免罪符的檄文钉在威登堡 (Wittenberg) 教堂的门上, 然而, 他并没有这么做。自那以后, 争论转而进入公共领域。从1517年到1520年, 科隆、纽伦堡、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等印刷中心印成了超过30万份路德的小册子, 其中包括1520年印成的著名的《告德国贵族书》(Address

to the German Nobility)、《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 Captivity*)、《基督徒的自由》(*Freedom of a Christian*) (Febvre and Martin, 1976)。

这一时期在德国,许多从事印刷的人是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传教士或以前的神父,他们看到了新技术为福音传道提供的机会。通过他们的编辑活动,印刷品成为了饱学的改革者的学问与占主导地位的不同形式的大众口头和视觉文化之间的桥梁。这以某种方式,预示了后来印刷品对同时存在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的社会的影响,例如在印度次大陆的情形 (Bayly, 1996)。在《圣经》的序言里,在配以漫画的小册子和论说集中,复杂的教义思想以普通大众熟悉的语言、比喻、歌谣和口号传达给公众。游走的福音传道者们走下布道坛,手持统一的文本,将改革思想传到人们耳中,传到欧洲的客栈、市政厅、宅院和市场。同时,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的观点在大众的辩论中得到重塑和修正。

1520至1525年间,在德国,铺天盖地的小册子攻势令路德家喻户晓,表明他的思想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也鼓励了那些原本犹疑不决的僧侣们思考路德的激进神学思想,并开始编撰新的《圣经》德文译本。路德“所有信徒皆是神职”(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的观点,鼓励俗众绕开教士,自己解释经文 (Gilmont, 1999)。两个世纪后的1673年,理查德·巴克斯特 (Richard Baxter) 写道:“神学家的著作,不过是使人用眼睛看福音的宣讲,就如同让人用耳朵聆听福音宣讲一般。口头布道在以情动人方面无与伦比,还可根据参加教堂活动的会众的状态而随机应变。这种方式,如同直接从胸中流出的乳汁,最令人感到温暖。但是书籍在其他许多方面具有优势。也许你只能听一个拙劣的传教士布道,却可以阅读一个优秀传教士的布道文。传教士可能被禁止传道或遭到驱逐,而书籍却随时触手可及。相对于传教士来说,拥有书籍的费用要低一些。如果精心选择,书籍是一种服帖听话、触手可及、常伴左右、富有智慧、言辞中肯、恰到好处、铿锵有力的布道,对你灵魂的救赎总是大有益处。” (Chartier, 1989b: 124) 这种观点很自然地导致了用各国

语言印刷的《圣经》和宗教书籍，以及宗教、社会和政治讽刺作品数量的增长。1520年代，德国的书籍产量增加了十倍。如此，印刷不仅使改革者能够对教会的弊端进行广泛抨击，同时还提供了阅读材料以培育另一种形式的虔诚，并建立一个新教会（Eisenstein, 1979）。

在欧洲其他地方，书籍在改革思想的传播中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日内瓦和斯特拉斯堡成为通过出版宣扬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的思想的重要地点，而小册子和各教派的《圣经》则被走私进英格兰，以宣传变革思想（Febvre and Martin, 1976）。改革者们也很清楚要达到既定目标，印刷至关重要。路德描述印刷机是“上帝最大、最极致的仁慈，通过它，福音事业被推向前行”。宗教改革把欧洲的基督教分成天主教与新教两派，背后各自有不同的著述文化激励其宗教实践（Gilmont, 1999）。反宗教改革运动也53 同样受到了印刷机的推动，在特伦托会议（Council of Trent）重新定义正统之后，新的天主教信仰手册提供给了大众。

文艺复兴

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些致力于“人文研究”（study of humanity）的人，开始被称为人文主义者（*umanisti*）。很多早期的人文主义者或是教士，或是依附于教廷，但人文主义研究背后的精神信仰，超越了教士精英阶层。从整

体来看，人文主义者一般是些受过教育的俗世中人——大学讲师、教师、公证员、律师、文书和官员。他们的信仰是一种市民人文主义，其目标是复兴古代的思想，应用于当时的社会，以达到道德重建的目的。他们通过文学和修辞上的努力来追求这个目标：一方面翻译古典著作，为历史编纂学和文献学建立新的标准，以评估古代的著作；另一方面创作诗歌、伦理学论文、历史著作和书信——既用拉丁文写，也用意大利文写（Grafton, 1999）。

彼特拉克（Petrarch）（1304 - 1374）被视为推动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这场新的思想运动的关键人物。这场运动试图通过对智慧的研究来改善人类的境况，这些智慧来自西塞罗、塞内加（Seneca）、维吉尔、李维（Livy）等古典作家。就像西塞罗的研究曾促使希腊哲学转化为罗马文化，彼特拉克和他的追随者也把找回在中世纪被禁断、渗透到意大利文化中的古代学问视为己任。人文研究秉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知识是一种德性，使得人们凝聚于“社会”中，培养人们的同情心，通过教育使人文明。

起初，古典文化的重建包括对学者们耳熟能详的拉丁文著作进行校对、修订和重新诠释，后来，“丢失”文献的重新发现又强化了 this 进程。这些文献是尼科拉·尼科利（Niccolo Niccoli）（1364 - 1437）、波基奥·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 - 1459）等爱书人在大学和修道院图书馆里发现的。文艺复兴时期，由于阿尔都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等人的努力，古希腊文献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人文主义思想便具有了更鲜明的新柏拉图主义特征。在四处游历的荷兰人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手中，这种新的学问发展成基督教人文主义（Christian Humanism）。伊拉斯谟拿来了意大利人文主义的重要思想——相信理性的力量会带来道德改良，并把它与他对《圣经》的研究成果“基督哲学”（*philosophia Christi*）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单纯的基督

教信仰愿景，这种愿景有着广泛的吸引力。正如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试图复原古代的文献和智慧，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也试图重建早期基督教的文本和精神。在这一新的旗号下，人文主义更加公开地抨击教士的堕落，而且正是以这种方式，伊拉斯谟等人对教会的讥刺为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Grafton, 1999）。

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在学者圈子里传播，并渗透进了北欧大学的课程体系。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起而捍卫这种新的学问，把它视为一种“在德性中修炼灵魂”的途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他们与印刷机之间的亲密关系，而这是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所无缘达致的。在16世纪的头十年，伊拉斯谟与阿尔都斯·马努提乌斯合作，出版了他的《箴言集》（*Adages*）的修订本（1508），然后和巴塞尔的印刷商人约翰尼斯·弗洛本（Johannes Froben）合作，首次出版了他的希腊文《新约圣经》（1516）。作为这些出版商的文学顾问，伊拉斯谟能够对这一时期的书籍印刷的本质施加影响。修道院中“笔之使命”（“apostolate of the pen”）的观念，对伊拉斯谟来说十分重要，到了这一阶段，它已变成了“印刷机的使命”（apostolate of the press）（Lowry, 1979）。

16世纪稍后的一段时期，宗教改革促使教会分裂，统一在基督教思想之内的人文主义理想崩塌了，基督教人文主义解体。一些人坚定地加入了新教（Protestant）的阵营，一些人回归激进派别，其他人则被反宗教改革势力吸收。为应对新教，信奉福音主义的天主教改革变得更具组织性和纪律性，并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了印刷作为传播手段的重要性。一系列新的宗教著作出版，对经过重新解释的天主教教义和规条进行宣传，宗教社团和新涌现的修会利用这些书籍大造声势，宣扬传统教会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这些修会中最著名的一个——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在欧洲各处建立大学，这些大学通常都设有印刷厂。在16和17世纪，政治与宗教密不可分，印刷业的发展几乎只是为政治和宗教利益服务。西班牙统治下的安特卫

普 (Antwerp), 成为一个天主教出版中心 (普朗坦王朝, Plantin dynasty), 而在耶稣会士的保护下, 天主教在里昂和巴黎控制了印刷业 (Febvre and Martin, 1976)。

知识与力量

1470年代, 印刷技术在东欧各国传播, 1473年传到匈牙利的布达 (Buda), 此后两到三年间传到波兰的克拉科夫 (Cracow) 和波希米亚 (Bohemia) 的布拉格 (Pragne)。1473年, 在西班牙的瓦伦西亚 (Valencia), 第一批印刷书出现, 之后马德里 (1499) 和葡萄牙的里斯本 (1489) 出现了第一台印刷机。1483年, 斯堪的纳维亚的第一台印刷机出现于斯德哥尔摩。印刷术很快传到欧洲以外。1488年君士坦丁堡有了印刷机。1515年, 希腊城镇萨洛尼卡 (Salonika) 的也出现了。^{*}最早的希腊文活字, 由阿尔都斯·马努提乌斯于1490年代在威尼斯刻成。印刷很晚才到达斯拉夫语 (Cyrillic) 地区, 直到1550年代, 印刷书才在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出现 (Febvre and

55

^{*} 原文如此。——译注

年，英王玛丽 (Mary) 授予伦敦书业公会 (Stationer's Company) 出版专营权，让它控制首都的书籍生产，禁止其他地区的出版活动，除了牛津和剑桥的大学 (Feather, 1988)。

在17世纪英国内战和18世纪初詹姆斯二世党人 (Jacobite) 时期，政治上的偏执使书籍印刷和销售继续受到限制，但各地的地下印刷活动一直存在，一旦等到律法松动，就会伺机蓬勃发展。1695年的许可证法案 (Licensing Act) 废止就是一个机会，使此前只能接零散活计的外地印刷商得以建立工场，出版地方报纸。早期，外地的印刷商无力在书籍出版领域与伦敦商人展开竞争，但他们建立的地方发行和广告网络对伦敦图书销售商很有吸引力。18世纪，以伦敦和中北部地区中心之间的商业协议为基础，一个布局分散的书业体系在整个英格兰建立起来。18世纪初，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王室联盟建立，这对于相对落后的苏格兰书业是个新的促进因素。爱丁堡的詹姆斯·沃森 (James Watson) 等出版商与欧洲大陆建立了联系，但直到18世纪中叶弗里斯兄弟 (Foulis brothers) 才使格拉斯哥成为苏格兰的书业贸易中心。这对伦敦的统治地位构成了威胁，导致了进一步从法律上对版权进行保护的举措 (见第四章) (Feather, 1988; Rose, 1993)。

书籍和小册子并不是全部。近代早期，发现新大陆、新学问和新技术，使地图制作进入了新的时代 (Eisenstein, 1979)。15、16世纪，欧洲的沿海国家进行海外扩张，地图的制作和复制技术也在发展。在中世纪晚期，航海知识和地理发现秘不示人，这意味着如果想要复制这些资料，比如当时著名的葡萄牙人的坎提诺地图 (Cantino Map)，必须通过外交和商业间谍才能得手。这种偷窃手段只能是加剧了手抄本本来就不可避免的内容失真。

然而，随着新大陆的开发，殖民者越发需要新的可靠的地图。制图师想要更准确、一致地复制地图，于是把目光转向了正在兴起的印刷业。因为不再有保密的需要，印刷商与制图师建立了工作关系，使地图的复制更为准

* 指伦敦以外的英国其他地区。——译注

确可靠，地图的贸易更加开放。就像近代早期艺术家和学者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制图师们既学习以往的经典范例，也发展出了一种归纳法。托勒密（Ptolemy）世界地图成了15世纪的制图者们所依据的样板。由于与印刷联姻，地图被引入公共领域，出现一种更具归纳法特征的制图方法成为可能，以大陆环绕印度洋为布局特点的托勒密地图，逐渐根据探险家们的建议做了改进。

16世纪，荷兰的制图师在欧洲首屈一指（Febvre and Martin, 1976; Eisenstein, 1979）。杰勒德·墨卡托（Gerard Mercator）（1512 - 1594）引入印刷新技术，使地图更易于查阅。他又发明了墨卡托投影法，以便在平面上展现曲面的地球，使地图开始变得对读者更为友好。亚伯拉罕·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出版了世界地图《地球大观》（*Theatrum*），在持续的翻印中，该地图得到探险家和其他制图师们的改进和纠正。

制作地图的过程很复杂，因为需要标示如此多的数据。手工复制可以描绘出大量的细节，使用不同的字体和字号，但无法保证复制的精确性。另一方面，1470年代用木版雕印的第一批地图能够保证标准化复制，却不能标示出很精细的数据。雕刻金属版和滚筒印刷机的使用，使得印刷出的线条更为锐利、精细，可以区分出不同的色调，使用不同的字体。这样的细节呈现，不仅使地图能为旅行者、军事战术家和政府官员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且也更有助于贵族和学者开展研究和激发想象力。这一时期的地图用寓言故事中的人物、海怪、船只残骸、巨型舰队，以及描绘历史事件的绘画来装饰，使它们不仅仅是简单的参考工具。

启蒙运动

只有富人、富有的机构，以及那些热衷于学问的人，才能接触到地图和书籍。但印刷品是在一个公私交叠的领域出现的。如果像夏蒂埃所说，富人和精英们购买了书籍果真只是在家里私下消费，那么印刷品在这种“私人领域”中的角色，就开始适时地与它们在尤尔根·哈贝马斯 (Jurgen Habermas) 所称的著名的“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中的角色重叠起来 (Chartier, 1989b)。确切地说，这一观念来源于启蒙时期印刷文化 (图书、报纸、小册子) 对于公开辩论的影响，这是一个政治躁动特别强烈的时期 (Darnton, 1982a, 1996)。启蒙运动这一术语是指欧洲的一场思想运动，其影响在18世纪达到顶峰。启蒙思想家通常是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宗教的批判者，他们认为宗教代表了束缚人类精神的迷信枷锁。在他们看来，可以通过在人类事务中运用理性，通过科学知识的进步，实现社会的进步，而使人类精神得到解放。虽然和以往的思想运动相比较，理性被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但情绪和感情并没有被完全否定。启蒙思想家首先是批判性的，既不完全是理性的，也不全是感性的。他们全神贯注于寻求对社会组织和个人动机做出令人满意的理性而科学的解释，用亚历山大·蒲柏 (Alexander Pope) 的话来概括就是：“人类研究的正确对象是人。”

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常常在整体上被称作 *philosophes*，反映了他们当中有很多是法国人这一事实 (Darnton, 1982a, 1982b)。其中最杰出的包括：德尼·狄德罗 (Denis Diderot)，他是《百科全书》 (*L'Encyclopedie*) 背后

的灵魂人物；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写了《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出版于1748年；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写了阐发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观的《爱弥尔》（*Emile*）（1762），以及政论小册子《社会契约论》（*Du Contrat Sociale*）（1767），该书起首一句十分有名：“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以及伏尔泰（Voltaire），《老实人》（*Candide*）（1759年出版）的作者。同时期其他国家的作家，包括布里顿·杰里米·边沁（Britons Jeremy Bentham）、大卫·休谟（David Hume）、约翰·洛克（John Locke）、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德国人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戈特霍尔德·莱辛（Gotthold Lessing），意大利人切萨雷·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等。书籍是启蒙思想的载体，这个载体跨越了国界（Darnton, 1982b）。

许多启蒙思想家都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百科全书》（*L'Encyclope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ee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etiers*）撰过稿，该书最初由狄德罗和达朗贝尔（D'Alembert）编纂，后者在最初的七卷出版后退出。《百科全书》的出版克服了宗教势力的阻挠、作者之间的意见分歧、不菲的出版费用等重重困难，于1751年至1772年面世，包括附录在内共达35卷，其中12卷为图版，还有两卷索引。其目的是要汇集当时所有的知识，并显示理性是足以信赖的基本原则，以取代宗教（Darnton, 1982b）。

一些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关注政治问题，如不同形式的政府的合法性，以及立法管制日常生活的恰当性。启蒙思想确实影响了一些18世纪的君主，这些君主被称为“开明君主”（enlightened despots）。这个词尤指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12 - 1786）、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Joseph II）（1741 - 1790）和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1729 - 1796），也包括一些小国的君主。尽管他们仍然是拥有专制王权的至高无上的君主，但他们把自己视为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主宰。58

这使得他们致力于改善臣民的处境，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国家的现代化和“科

学”行政来实现的。这包括建立和扩充官僚机构，以理性地、高效地管理政府，有的还包括促进教育发展等社会事务，以及废除国内通行费等限制以促进贸易。一个有文化的公民群体的发展壮大，导致了对知识的渴求，刺激了新书的创作、出版和发行，这些书又反过来宣扬了国民识字的理念以及国民获取知识的权力。

天赋人权的观念源于启蒙思想家，启发了该世纪末法国和美国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们。一些人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过激归咎于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例如曾经资助过狄德罗的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取消了一些较为开明的政策。然而，相对于这些思想本身，卢梭和伏尔泰等作家所引发的批判精神影响更大。卢梭和伏尔泰的著作在整个欧洲，进而在各个殖民地和海外据点广为出版和传诵。

工业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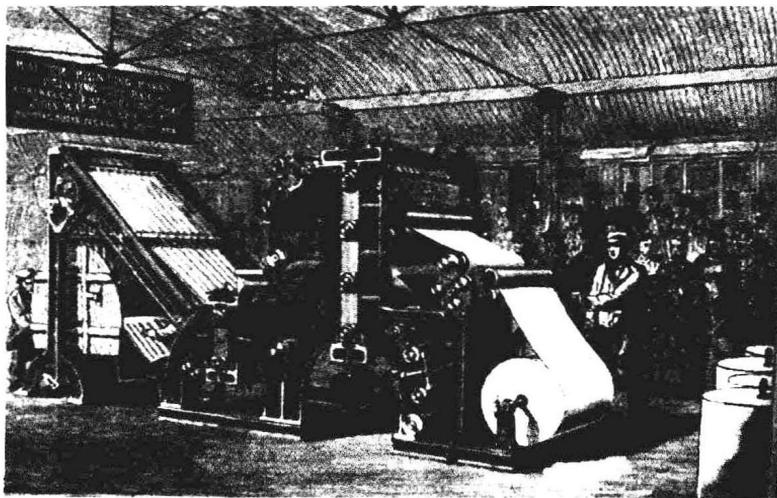
启蒙运动创造和反映了理性主义和科学探究的精神，这种精神的现实产物就是新技术的采用，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中以机器取代人力。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工业化时代，是物质和信息交流方式快速进步的时期。这也是一个城市化的时代，工人及其家庭迁移到了新的工业中心。这些变化，对印刷品的需求和供给都产生了影响。更先进的运河、道路、桥梁和铁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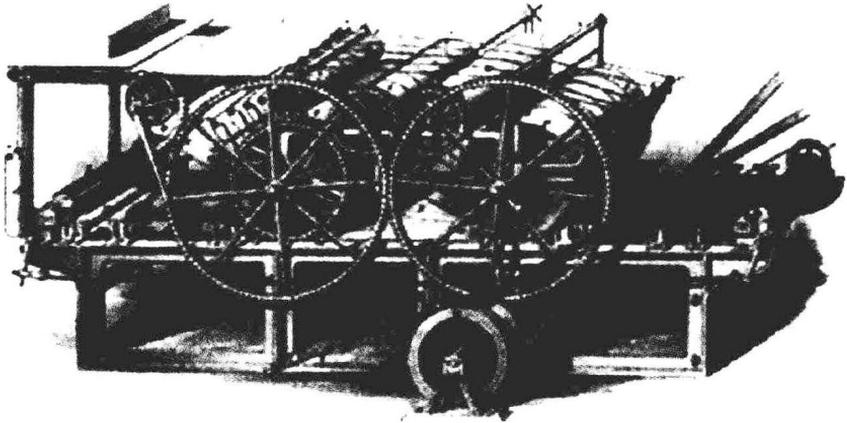
工业化时期的装订车间

强大的设备能够更快、更容易地操作，但并未使每小时所生产的印张数得到足够的增长。全面的机械化最初来自于报纸和杂志，尤其是伦敦的《泰晤士报》(Feather, 1988)。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泰晤士报》是唯一一份销量大到有必要追求更高的生产速度以满足产品需求的报纸。正是这家报纸，在

刷业利用蒸汽动力等方面的技术进步实现了机械化，实际上这是自古腾堡之后第一次实现了生产方式的重大改进。对于印刷来说，工业化意味着从手动印刷机到印刷机械的转变。这一进程中的第一步发生在19世纪的头20年，传统的木制螺旋压机，被完全用铁制造的机器所取代，如斯坦霍普印刷机 (Stanhope Press)，以及后来的哥伦比亚印刷机 (Columbian Press) 和埃尔比恩印刷机 (Albion Press)。这些功能更



19世纪的报纸印刷机



滚筒印刷机

1810年代赞助了库尼格（Koenig）蒸汽动力印刷机的发明，以及后来阿普加斯（Applegath）和考珀（Cowper）对机器的改进。

整个19世纪中许多工程师的不懈试验，使转轮印刷机、供墨系统和铅版逐渐成为标准的配置。正如在其他行业中一样，印刷的不断机械化引起了使用传统技术的劳工的反对。《泰晤士报》的首台蒸汽动力印刷机是秘密安装的，以免激怒印刷工人。铅版的使用，也对排字工人的工作构成威胁。从宗教改革开始，直到启蒙时期，印刷一直与激进思想的传播和政治觉醒度的提高密切相关。18世纪末，这种联系体现在印刷机在激进文化的崛起中所扮演的角色（Lee, 1976）。拥护改革的小册子、杂志和单张报纸，有助于公共舆论的形成。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Rights of Man*）于1792年出版，激进刊物《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到1817年发行量超过了4万份。正如宗教改革时期一样，激进的出版社的产品培育了一种口头交流文化，阅读社团、辩论社和讨论小组纷纷涌现出来。[从这里来看，较之前一章所讲的奥恩（1982）的一般性论述，和麦肯锡对《怀唐依条约》的具体研究（McKenzie, 1984），口头、书写、印刷三种类型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对立]。

60 由于印刷工人的职业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在这种口头文化中，印刷工人在向不读书的人传播激进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印刷工人中间总是存在很强的同志之谊，到了18世纪，早期印刷作坊中的兄弟情谊在英格兰发展成了被称为 Chapel 的印刷工人工会（Feather, 1988）。这些最初的工会是掌控工作流程的熟练工（journeyman）的组织，反映工人的疾苦，同时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激进主义使印刷工人工会组织性更强。1790年代，相关团体联合起来。排字工协会（Compositors' Association）于1792年成立，压印工友谊会（Friendly Society of Pressmen）也很快成立起来。由于印刷工人工会和劳工联合会（Trade Union）发挥了作用，印刷业成为成功进行了薪资谈判的行业之一。

在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恐惧*中，英国政府严厉压制煽动工人阶级中的行为。1799年的《结社法》（Combination Acts）规定行业组织为非法，许多煽动者被以政治阴谋罪投入监狱。理查德·卡莱尔（Richard Carlile）等激进的出版家为出版自由而战，常有人被捕入狱。针对出版的法律和经济控制——后来被称为“对知识征税”（taxes on knowledge）——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然而，拿破仑战争及其在北美和印度的余波平息之后，19世纪的欧洲进入了一个大体安定和满足的时期，加强控制的意愿减弱了，这些措施逐渐被取消（Lee, 1976）。随着传播网络日益复杂，管制变得更为困难。工业化不仅改变了工场里的生产流程和城镇文化，也意味着印刷业不再那么集中于伦敦，因为有更高效的物资和人员运输，各地的印刷厂得以建立起来。

* 指其他欧洲国家的统治者害怕发生类似的革命。——译注

漫长的 19 世纪

19 世纪见证了出版的革命。书籍生产流程中大部分环节的工业化，意味着成本的降低和产量的增加。诸如蒸汽动力印刷机、机械化铸字排字、铅版印刷等的发明，以及插图复制方面的革新，确保了书籍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速度大大加快。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社会，需要教育程度更高、有文化的劳动力在新的生产流程中工作，从事新的职业。英国的教育法案（The Education Acts）确保了识字率的增长，到 19 世纪末，大多数人都成了书籍的消费者（Feather, 1988）。出版业出现了大繁荣。既存印刷商与图书销售商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它们经过扩充和兼并，就成了主导书业的出版企业，这种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后半叶及其以后。



书籍贸易得益于交通

19 世纪的书店

和发行网络的改善，公路、电话和铁路的发展日新月异：这意味着外地的出版商可以在同一起点上与伦敦的出版商竞争。欧洲和美洲的人口增长（在整个19世纪欧洲人口翻了一番，美洲人口增长了15倍），为书刊杂志提供了一个嗷嗷待哺的市场（Fischer, 2003）。在行驶的列车上，在国家新建的校园里，在图书馆，人们需要书籍；为了搜集工业化过程中诞生的新行业的信息，人们也需要书籍（详见第六章）。

19世纪以前少数几个出版商所秉持的理想主义以及“对书籍的热爱”，部分地让位于更纯粹的商业主义和实用的商业目的。越来越多的书籍被印刷出来，出版商的细分市场主题（niche subjects）越来越多样化。在英国，直到1750年，每年出版的新书还只有约100种，到1825年增加到600种，到20世纪初增加到6000种（到该世纪末，新书种数突破10万大关）（Feather, 1988）。出版乃至整个书业的专业化，也表现在出版商协会、图书销售商协会、作家协会的诞生，以及新成立的出版商协会对图书净价协议（Net Book Agreement）的制定上（Feltes, 1986）。作者的作用因文学代理的崛起而得到加强。下一章对于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论述，但是，可能有一点在这里值得强调，即布迪厄关于“文化生产场域”的论述，放在19或20世纪的情境中似乎最为适用（Bourdieu, 1993）。

19世纪中期诞生了系列畅销书，大量书籍以低价格出版，目标瞄准大众消费者，这就是“百姓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Millions）。乔治·路特里奇（George Routledge）出版的“铁道书库”（Railway Library）包括了1300种小说，每本标价一先令，大多数人完全买得起。许多这类丛书是重印本，由于版权失效，不需支付版税，价格可以定得很低。通过出版企业的商业智慧，印刷文化达到了它的顶点（Sutherland, 1976）。

知识产权

然而，当这一切发生时，也开始出现从书籍的实体运输，到售让文本权力以供复制、翻译、（被剧院、电影或广播等新媒体）采用和商品化的转变，例如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的故事衍生了一系列产品。从以作为物质实体的书籍为中心，到以作为作品来源的文本为中心，这种转变乃是基于一套可靠而又可强制执行的国际化的法定权力。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到16世纪中叶，英国的印刷业牢牢地控制在书业公会（Stationer's Company）手里。印刷一部作品的永久性权力，及其附带的各种收益，被赋予了版权所有人，通常指的是印刷商。印刷商从作者或编者那里购买作品。尽管印刷商可以通过在书业公会登记，来保护自己印制一部作品的权力，但对于许多书来说，事实上谁第一个出版这本书，谁就获得了这本书的版权，即便这是一部盗版——在不向最初的版权所有人或版权购买者支付费用的情况下印制该书。印刷某些特别赚钱的书——例如《圣经》、62 礼仪书^{*}和一些通行教科书——的权力，被限定给少数印刷商，这被视为一种可以买卖和继承的贵重资产。

英国于1709年颁布的首部版权法规定，一部作品的版权属于作者所有。这一转变背后的原因，将在下一章做详细论述（Foucault, 1984; Rose, 1993）。这一更改的作用，是让一些作者在把作品卖给出版商时获取更大的收益——尽管一次性买断版权还要作为一种较为通行的做法持续一段时间，

^{*} 关于基督教礼仪的书。——译注

而不是实行利润分享或版税制。先预订后出版，这一1709年前为出版筹措资金所采取的普遍做法，仍然十分普遍。然而，当版权的强制力仅限于一国时，它在国际上毫无作用。拿英语出版界来说，这导致了美国对英国图书肆无忌惮的猖獗盗版，激怒了狄更斯（Dickens）等著名作家。狄更斯确曾以他的名义四处活动，以争取大西洋彼岸对版权的认可和规范，跟上欧洲的步伐。这种游说最终取得了成功，但已经是在狄更斯身后的1870年。国际性的版权保护通过1886年的《伯尔尼公约》（Berne Convention）、1952年的《世界版权公约》（Universal Copyright Convention）这样的条约得以确立，并延续下来。1911年，英国新的版权法承认了除印刷品之外作品发布于其他媒体的版权，将版权保护扩展到以其他形式对作品的演绎和生产。这反过来为这些媒体的发展，为一个作家的作品被众多媒体所采用，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依据。

平装书的发展

20世纪初，源于书籍的版权开始扩展到电影、广播等一系列大众媒体，出版商们从新媒体那里看到大众受众（mass audiences）的市场潜力，着手寻求吸引大众受众的手段。1935年，艾伦·莱恩（Allen Lane）推出了具有创新和开拓意义的企鹅（Penguin）平装书品牌。受到流行于欧洲大陆的信

天翁 (Albatross) 平装影印书的启发, 加上他自己常苦于在列车上缺乏读物打发漫漫旅途, 莱恩设计了企鹅丛书 (McCleery, 2002)。尽管被人认为是“便宜而悦目的”, 企鹅丛书还是以高水准的版面设计著称, 封面上的原始价格仅为6便士。实际上, 一些初版的企鹅丛书已成为收藏家的珍爱之物, 其精美的设计广受赞誉。业内专家对初版的推出抱怀疑态度。图书销售商们担心和精装书比起来利润减少, 而莱恩却在消费者的口味上孤注一掷, 初版印数巨大, 以求尽量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和零售价格。结果, 企鹅丛书体现了良好的“性价比”, 莱恩赌赢了, “企鹅”几乎变成了高质量平装书的代名词。企鹅公司代表了1930年代把书籍推向大众的冒险尝试, 如今它已成为隶属于皮尔逊 (Pearson) 集团的价值数百万英镑的企业。

平装书革命跨越了大西洋, 美国公司在图书设计和销售方面更大胆, 更有活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 企鹅在美国开设了分支机构。二战是阅读和书籍——不论是小说还是非小说——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军队意识到需要有文化的士兵, 以理解他们为之而战的思想信仰, 并能够在战争结束后成为积极参与社会的公民。美国的《士兵福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 以及战后英国大学的扩张, 是对个人的教育权利和社会对教育的需求的进一步承认。平装书为正规或非正规的教育提供了一种便宜的知识载体。许多其他出版商开始出版平装书, 到1950年代, 平装书在全世界的书架上、书店里已是司空见惯之物。它涵盖了所有能想到的主题, 所有的人都想拥有平装书, 都买得起平装书。实际上, 据说平装书的增长把那些只从图书馆借书的人变成了买书人, 创造了出版业和信息业的繁荣。这一新的阅读群体为新的作品创造了市场, 也使与书籍购买相关的行业焕发了生机: 零售业、营销业和设计业均从中获益。平装书进入到了生活的每个角落, 出现在了一些新场所, 例如药店 (美国)、超市、机场和街头摊贩 (West, 1985)。

从前, 平装书是已经在市场上取得了成功的精装书的翻版, 这些书容易找到新的读者。然而, 如今一些出版商, 尤其是小说出版商, 初版即用平

装形式印刷，这样做可以降低成本，使作品赢得更多的受众。在学术出版领域，一部著作同时以精装和平装两种形式面世是普遍流行的做法：精装版被公共或大学图书馆收藏，平装版供学生个人使用。读者正在看的这部书就采取了这种做法。

20 世纪后期及其以后

20 世纪后半叶，出版社通过合并和收购形成大型的、通常是跨国的集团 (Greco, 1995, 1996)。在这个趋势背后有三个因素：意识到出版业的国际化性质以及跨国营销的商机；在电影、电视等媒体上对产品进行深入开发的需求；以及小型的独立出版企业资金普遍短缺的状况。两种类型的集团出现了：一种以印刷为主业，在若干个国家经营，例如以德国为基地的贝塔斯曼 (Bertelsmann)；另一种同时经营多种媒体，书籍出版只是其中之一，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例如新闻集团 (News Corporation) 名下的哈珀柯林斯 (HarperCollins)。这些集团的形成并不总是被看成好事。通常这种合并仅包括出版商标、作者、重版目录和员工方面的资产剥离。一些作者对失去了与编辑的紧密联系感到不快，另一些作者则对更有效地挖掘自己作品的潜力表示欢迎。在出版的创新性与达到中央管理层所要求的各部门相同的盈利目标之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紧张 (Schiffirin, 2001)。无法达到后者要求的结果，

就是一些经久不衰的出版物和在地区或全国范围内的重要出版商消失了。然而，通过小型独立企业的不断创立，出版中创新的一面得以继续活跃，这常常要归功于那些从大的集团公司出来的雇员。这一时期在书籍销售领域，跨国销售链也发展起来，其中一些成为大的媒体或出版集团的一部分。印刷品统治地位的丧失，在多媒体集团公司中出版部门早已不再独领风骚，信息与文化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是基于对受到保护的知识产权的开发：所有这些因素已经导致对书籍未来的质疑，这一话题将要在最后一章展开。

小结

这是很长的一章。然而其主旨——印刷书的生产和发行，一直处于书史研究的核心，处于阐明关于生产与发行的关系及其社会背景的争论的核心。单纯从内部来看，这个背景既包括手抄本中已经存在的结构的改造和发展，也包括为适应印刷的快速传播所创造的新结构；从外部来看，该背景一方面包括印刷与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等重大的社会、文化、政治思想运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包括印刷结构与权力机构——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虽然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些关系的性质仍是激烈争议的话题，但我们将要在第七章看到，它们对于书史，对于书史是否能够对最近的发展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仍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章 作者、作者身份与权威

引言

本章考察过去一千年中作者身份 (authorship) 的概念如何变化和发展。首先考察了中世纪对作者身份的定义。当时, 手抄本生产大都具有宗教或教会背景, “作者”通常主要被看作复制者、编纂者、注解者和评论者。我们将考察 1450 年代以来印刷的出现如何将作者身份重新定义为一种更具创造力的活动主体, 这种活动能够给人带来名声和财富。我们还要讨论保护人制度在支持和塑造文本生产中的作用。然后本章转而考察版权问题, 以及 1700 年以来版权法的引入如何改变作者获得报酬的方式和作者的行为。我们还将简要考察 19 世纪的工业化对作者的影响, 以及新的角色 (如文学代理) 和技术创新如何改变作者活动的环境。本章还简要考察了 20 世纪关于作者身份的各种重要诠释, 这些诠释在书史研究中十分重要。最后, 讨论了由于数字时代的到来作者身份所面临的重新定义。

手抄本文化与“作者”

在以往的学术思维中，西欧手抄本文化（及其“作者”概念）的发展分为两个不同时期——“僧侣时代”（Monastic Age）和“世俗时代”（Secular Age），前者从大约公元400年到公元1100年代末，后者从12世纪末到15世纪末（及以后）（Thomas, 1976: 15）。从5世纪罗马帝国衰落直到12世纪，修道院和宗教中心几乎垄断了西欧文献的生产（12世纪大学和学术中心建
66 立起来，开始挑战这些权力中心）。正如前面几章提到的，智力活动集中于



手抄本中描绘的作者

宗教中心，手抄本的生产要符合宗教利益，维护教会及其教义的权威。修道院的日常程序里为脑力劳动规定了固定的时间，用来抄写和装饰宗教典籍。修道院的抄写室（monastic scriptorium）通常被认为是这类工作进行的场所，它成为中世纪文化的象征，“在那里，抄写员、文字装饰匠和装饰画家一起进行虔诚的劳动，一丝不苟地抄写着上帝的文字”。

（Taylor, 1999: 353）

这些中心组织严密，从抄写、书法到装饰，手抄本生产的各道工序都有其固定的位置，不同的工作分配给不同的修士承担。但正如安德鲁·泰勒（Andrew Taylor）和其他学者所指出的，这种笼统的观点可能是误导，因为事实上一个 monastic scriptorium 常常是指一群抄写员，而非他们工作的空间：一些修道院并没有为这类工作设立专门的场所，生产手抄本的僧侣们常常要在修道院里四处寻觅自己的工作场所（Taylor, 1999: 354; Knowles, 1950, vol. 2: 520 - 522; Ker, 1960: 3 - 11; Eisenstein, 1979, vol. 1: 14 - 15）。

有证据表明，11世纪以后，修道院把这些工作外包给职业“抄写员”。例如德国本笃会的圣埃默里克（Emeric）、特根希（Tegernsee）和沙耶尔（Scheyern），常常雇用职业抄写员抄录宗教和世俗文献，包括布道文、神学著作、礼拜书籍和百科全书。随着博洛尼亚、巴黎、鲁汶、巴塞尔、剑桥和牛津等地新建立的大学对教材需求的增长，这种单篇著作的外包越来越多。很快需求超出了修道院的供应能力，催生了一种独立的商业化的书籍产业，即图书销售商（在其他服务之外）向学生和感兴趣的人提供著作原本的片段（peciae），供他们租用和抄录。

12世纪末、13世纪初以来大学的建立，加速了新的阅读群体的发展，此前所生产的文献已不能满足这些读者的阅读兴趣。起初许多读者是教士，隶属于他们所选择的大学或学院，他们和他们的教授都需要古典作家的作品、参考书、评论和注解。大学建立图书馆以满足学生的需求，与此同时还在大学里设立了工场，以满足对基本文献进行复制的需求。

同时，13世纪因资产阶级——主要是律师、政府官员、成功的商人和医生——的崛起而新出现的阅读公众，创造了对法律、政治、科学、医学等领域的文献，娱乐、休闲和陶冶性情方面的书籍（文学作品、传奇故事、翻译作品、诗歌等）的需求。其结果是导致世俗的“人文主义”著作大量出现，与“僧侣时代”所复制的绝大多数文献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主要是宗教性质的，但也包括某些古代拉丁作家的著作，比如奥维德、维吉尔、波爱修斯

(Boethius) 和普里西安 (Priscian)，他们被中世纪的学者赋予了特殊的著作权 (auctoritas)，他们的著作也在这样的宗教背景下得到复制。

权威与作者的角色

就13世纪的文本生产，圣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圣波拿文德 (Franciscan St. Bonaventure) 提出，书籍 (这里指手抄本文献) 的写作行为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一个人抄写其他人撰著的材料，不增加和改变任何东西，这个人仅仅是抄写员 (scriptor)。另一个人写的也是其他人撰著的东西，把它们汇集到一起，但不加入任何自己的东西，这个人被称为编纂者 (compiler)。又有一个人所写的材料既有别人撰著的，也有他自己的，但他人撰著的部分最为重要，他自己添加的内容是为了使之更为明晰，这个人被称作评注者 (commentator)。还有一个人所写的内容既有自己撰著的，也有他人撰著的，他自己的部分最重要，把其他人的材料包括进来是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观点，这个人一定要称作作者 (auctor)。(Wogan-Browne et al., 1999: 3) *

* 译文源自 Alistair Minnis p.94. Elizabeth Eisenstein (1979), vol.1, p.122用了同一段略有差异的译文，源自 John Burrow (1976), p.615.

波拿文德的观点出自一个非常具体的、学术的背景，他所说的手抄本作者，处理的主要是一些特定的文本，这些文本都与他人有关。这种工作通常是很困难的（把稀见的手抄本搜集起来，创造出对人类活动的新解释），只有极少数精英能够承担。波拿文德的分类所关注的是思想和观点的机械复制。这种分类并不认为如今我们的社会对于写作所看重的东西——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文学、丰富的信息和理性的解释——是重要的。它是精英观点的一种反映，这种观点把文本生产视为在天主教堂和宗教场所里从事的一项任务（Minnis, 1988; Brown, 1995: 197 – 206; Kuskin, 1999; Taylor, 1999: 352 – 365）。

对于中世纪的书写和文本生产所代表的意义，有人持不同观点。试看乔叟（Chaucer）为他的“抄写员”亚当（Adam Scriveyn）所作的诗，关于英国中世纪抄写员的角色和文本生产，这是被引用得最多的材料。在诗中他悲叹抄写员总是图快，因而令他难以掌控，无法实现对文本的准确复制：

68

抄写员亚当，怎么老是这样
不管是波伊提乌（Boethius）还是特洛伊罗斯（Troilus）
都要返工重写
你的长发之下必是朽木一块
我每天都要把你的工作重来一遍
改呀，擦呀，刮呀
都是因为你粗心图快

在这里，乔叟（而非教会）是“权威”，负责给他的抄写员分派任务，原原本本地抄写他的文字，要求具有很高的准确性。另一方面，乔叟的诗凸显、体现了中世纪的人们所认同的作者身份模式，其中作者是延续下来的思想传统的参与者，这种传统与过去的权威（波伊提乌）密切相关。乔叟时代

的作者身份，正如最近一部关于中世纪英国文学理论的文选的编者所指出的，“更倾向于被理解为一种思想和道德的权威传统的参与者，在这个传统之中……一个作者可能承担抄写、修改、翻译或撰写等几种角色当中的一种”（Wogan-Browne et al., 1999: 4 - 5）。作者（或 auctors）被理解为了他们的目的而对材料进行重新塑造的人，他们所作的创作是对同一思想领域中的其他材料进行注解，并与这些材料紧密关联。他们不是后浪漫主义（post-Romantic）时代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天才概念之下的“作者”，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对所处理和重塑的文本没有最终的所有权。

同时，“权威”（authority）是一种能够栖身于文本之中、独立于“作者”之外的东西。例如，中世纪提到奥维德、圣奥古斯丁等人的作品，并未将作品的准确性或真实性关联或归结于某个具创造性的天才作者，而是将“权威”赋予文本本身的真实性。正如一些学者敏锐地指出的，“直到近代早期，是年代、真实性以及符合真理，而不是某个天才，被认为将权威性赋予了文本和作者”（Wogan-Browne et al., 1999: 6）。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者

文艺复兴时期，在西欧，对于“作者”的职能及其所代表的意义的解

释改变了。这主要是由于15世纪末以来印刷的文本复制能力，实现了从手抄本的小规模流通到印刷书的大量复制的转变。写作成为一种个人活动，一种获得认可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潜在工具。正如费弗尔和马丁所指出的，“中世纪的作者对于把名字加于一部作品之上几无兴趣，而印刷者则需要找出，或已经找到他们所印作品的真实作者——亦即作品并不是印刷者的创作”。把名字加于文本之上的结果是获得评价、认可，有时还会带来名气的增长。它使得一些人利用著作来追求名声——如果不是财富的话——的兴趣和愿望愈来愈强烈。费弗尔和马丁得出结论：“这种新的刺激也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艺术家们开始在作品上签名，作者身份有了一种全新的重要性。”(Febvre and Martin 1976: 261) 这就是几年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所反复申论的观点，“‘追逐名誉’这件事本身”，她赞同地说，“可能受到了印刷能使人不朽的影响”(Eisenstein, 1979, vol. 1: 121)。

以一种与以前的手抄活动不同的方式，印刷者与文本生产者结合，破坏了长期以来形成的集体著作的观念。这种个人创作的原则也同样被应用于其他媒体作品的作者。例如1500年代，随着伦敦剧坛的职业化，英国剧作家们得益于繁荣的剧本印刷市场：其结果，正如道格拉斯·布鲁克斯(Douglas Brooks)所云，是剧作的商品化，它又反过来鼓励和强化了“对个人创作行为的强烈关注”(Brooks, 2000: xiv)。印刷商觉察到剧本印刷在商业上的潜力，这些剧本体现了一个“作者”的“存在”，若文本被证实是出自作者的“权威文本”，就能够提升它们的市场价值。这些活动凸显了近代早期印刷如何改变环境，使得作者被视为一种个人行为，正如马克·罗斯(Mark Rose)所评论的，完成了“从中世纪的作者(auctor)到文艺复兴的作者(author)的转型”(Rose, 1993: 18)。

这种转型改变了作者的兴趣和行为。众所周知，作为一种作者拥有知识产权的体现，版权的观念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才普及开来，当时它在英、法、德等国得到了有力实施。然而，学者们已经指出自1500年代早期

以来形成的处于萌芽阶段的文艺作品所有权概念，与法律上对个人发明专利权的认可有关（Eisenstein, 1979, vol. 1: 120; Brown, 1995: 1 – 8; Rose, 1993: 16 – 18）。在法国，有两个有据可查的早期案例发生在1504年。第一个案例是巴黎的一个叫纪尧姆·库普（Guillaume Cop）的著名医生，他编纂了一部年鉴，在1504年三月，他成功地使政府颁布禁令，禁止一个图书销售商在未经库普授权和认证的情况下发行该年鉴。这一法令的意义在于，承认了将库普的署名和名字与这一文字产品相连接的价值。“那么，在某种意义上”，马克·罗斯指出，“库普所赢得的不仅仅是对于文本的权力，也是使用其姓名的权力”（Rose, 1993: 18 – 20）。两个月后，当一个印刷商企图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翻印诗人安德烈·德拉维涅（Andre de la Vigne）和其他作者撰著的诗歌作品集时，德拉维涅起而保护了印刷和销售该书的权力。正如辛西娅·布朗（Cynthia J. Brown）所指出的，这样的案例显示在商业环境下对文本创造者角色的认识上的转变。“在富裕的赞助人的高雅圈子之外，‘作者’变成了可出售的商品”，布朗写道，“书籍生产新的参与者——印刷商、出版商，最后是一个全新的更广大的读者群体——在作者参与决定其书籍的物质和文学面貌的过程中，是关键性的决定因素”。她得出结论，上述法律行动，以及中世纪晚期作者们的其他类似法律行动，显示了文本生产模式的重要转变，“的确，作为手抄本文化特征的等级分明的赞助人、诗人、抄写员三者组合，在印刷文化中演变为赞助人、诗人和出版者在合作中更均衡地分享权力”（Brown, 1995: 2）。

这些案例也凸显了以下事实，即随着支持对商品（和文本）进行商业开发的法律结构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教会“知识”垄断的削弱，许多西欧国家首都的出版商和图书销售商得以利用文本生产牟利，并常常谋求维护其开发和出售畅销印刷品的法律权利。然而，一旦作者把作品提交给生产流程，他们总是会失去对它的控制。但正如马克·罗斯所指出的，在某一方面文学市场仍然大体处于作者的掌控之中：“作者可能不能拥有他们的文本，

但他们肯定拥有自己的手稿——他们亲自手写或让人抄写的物质实体，而图书销售商和剧院为这些物品提供了市场。然而，作者的权利在把手稿交出去的那一刻终止了。”（Rose, 1993: 17 - 18）

保护人制度

在18世纪晚期作者对版权的运用导致市场变化之前，作者进行交易的普遍模式是建立在保护人制度之上的。保护人制度存在于整个中世纪，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制度，它是手抄本文化的衍生物之一。“作者”在富有的赞助人的高雅圈子里活动，“通过一套复杂的象征性交易和物质交易，主顾通过被赞助者的服务获得荣耀和地位，反过来向被赞助者提供物质和非物质的酬劳”（Rose, 1993: 16; 又见 Brown, 1995: 2）。

当然，给作家和诗人提供赞助的制度并不是中世纪才有的。有证据表明，在公元前250年至公元200年及其以后的罗马时期，在握有强权的贵族和政治人物的卵翼之下，存在着精英文学圈子。亨利·马丁所说的文学“小环境”（micro-milieus），可以在诸如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 235 - 183 BC）、普里西亚（Precia）和莱斯比亚（Lesbia）（公元前1世纪）、贺瑞斯（Horace）的保护人罗马武士梅塞纳斯（Maecenas）等人物的周围形成（Martin, 1995: 99）。

71

保护人委托、保护、鼓励，并在很多情况下控制文学创作。缺乏独立收入来源的作者会寻求与一位保护人建立联系，延长其职业生涯，改善其资金状况。特别是在整个14和15世纪，保护人制度普遍存在，形成一种“赠品交换经济”。作者将作品送给或献给潜在的宫廷或精英赞助人（国王、骑士、王子、贵族或贵妇）；作者希冀获得资金上的馈赠作为回报，或者在保护人家中或其社会政治圈子里得到一个闲职。（Mauss, 1954; Macherel, 1983）

这个制度与一种“市场经济”共存：得到向一位重要的保护人敬献作品的机会，将保证作者的作品得到公众的欢迎，尤其是在16世纪以后，西欧的作者们为了书籍的印刷与销售与出版商和书商打交道时，越来越多地需要对作品的经济价值及其潜力加以评估，这方面的考虑就更重要了（Febvre and Martin, 1976: 25; Brown, 1995: 106 – 107; Macherel, 1983: 151; Davis, 1983）。但迟至1740年代，文本生产市场已经发生了变化，作者们仍然寻求并得益于强有力的保护人。例如，英国诗人詹姆斯·汤姆逊（James Thomson）为英格兰和苏格兰几个默默无闻的贵族做了几年儿童家庭教师，然后在1738年从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Frederick）那里获得了一份养老金，1744年从利特尔顿勋爵（Lord Lyttelton）那里获得背风群岛（Leeward Islands）总勘察员的闲职（该职位年薪300英镑，而且事实上无事可做）。还有一个罗伯特·达恩顿提供的例子，此人名叫让-巴普提斯特-安托万·苏阿尔（Jean-Baptiste-Antoine Suard）。1750年代，他二十多岁时到达巴黎，意欲以文为生。在以后的40年里，苏阿尔极力结交瑞纳神甫（Abbe Raynal）、贵族、大臣等上层人士，得到了重要的闲职 [比如皇家审查官和拜罗伊特伯爵（Margrave of Bayreuth）的通讯特派员（literary correspondent）]。他又适时地被选入法国科学院（Academie Francaise）（这不仅是荣誉，还带有一份丰厚的年薪）。正如达恩顿所总结的，苏阿尔虽然没写过什么诗歌散文，但他通过法国的文化圈子爬了上来，靠闲职和薪金过活，而不是靠出售作品。“实际上，他几乎没写过什么东西，也没什么好

写的——不消说，他不会写任何冒犯当局的文字。他按文人们的风向行事，然后收获酬劳。”(Darnton, 1982a: 7)

这些例子揭示了保护人制度的一个方面，它适合于不那么野心勃勃的作者，但却对创作力旺盛的作者构成困扰。对保护人的依赖会导致“作者”的屈从，丧失思想上的独立性：保护人常常要求诗人及其他作家创作反映和增进自己利益的作品，或指定他们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进行创作。例如尼高勒·奥雷斯姆(Nicole Oresme)是法王查理五世供养的众多翻译家之一，1369年，他被指派翻译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经济学和伦理学著作，并于1372年完成。其目的是给查理五世提供阅读资料，用以指导其顾问和大臣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模式来进行某些政治改革。这种状况到18世纪并没有什么改变：许多著名英国作家，比如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 Steele)、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通过当时迅速发展的伦敦杂志社等渠道谋求独立的文学旨趣，但常常发现其独立性在他们所担任的政府职位和享有的皇室薪金面前被迫妥协，正如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所指出的，“许多受到皇室资助的作家需要在政治论辩中支持国王的大臣们”(Brewer, 1997: 163)。

结果，作者的旨趣与现实的、物质的考虑之间形成了紧张：文本不得不以一种能够吸引和维持保护人兴趣和政治认可的方式来进行写作。正如辛西娅·布朗(Cynthia Brown)所指出的，作者们为了生计，常常不得不在道义和独创性上做出妥协。“这样，在保护人制度下，作者的写作体现了他对保护人意愿、需要或形象的演绎，它或是出于某种形式的委托，或是由于想要获得委托。”(Brown, 1995: 106)但并非所有学者都用如此含有贬义的观点来看待保护人制度。例如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与一个依赖于飘忽不定的“流行口味”的无情的“文学市场”不同，保护人制度常常提供了一种良性的、正面的环境，使创作(暗指那些从中受益的作

家)得以繁荣。“在受到保护的状态下”,他评论道,“作者至少是与一个切近的读者圈子保持着直接的联系,不管是出于谨慎还是自愿,出于真正的尊敬还是表面上的应付,作者已习惯于接受这些读者的批评,有时甚至是根据他们的批评来行事。也许可以说,这个制度比起后来的制度给了作者更恰当的自由”(Williams, 1966: 50)。

保护人、出版商与公众

16、17世纪,机械印刷的兴起推动了有利可图的印刷书的发展,保护人的角色转变了。图书销售商和印刷商与贵族和宫廷人物一起,成为潜在的“保护人”,显示保护人制度从委托和控制,转向推广、消费和发行。18世纪末,在欧洲主要城市发展起来的能够自由表达意见的杂志社,为文本生产提供了新的途径。这些杂志社有的办得成功,有的不成功,受到审查的程度亦各不相同。建立了“出版公司”的出版商经常扮演文学赞助人的角色,资助作者创作特定的作品;他们建立文学沙龙和社团,作者们可以在其中获得或扩大职业声誉和社会影响;他们创办报刊,刊载用匿名、笔名或真名发表的文章和作品。作者们争相引起印刷和出版圈子里重要人物的注意,以从作品中获得收益,并挤进这些“文学场域”。宫廷保护人制度,慢慢地被更受经济利益驱动、更以市场为导向的保护人制度所取代。

进而，在整个18世纪以及19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护人的角色由教育和思想社团，以及非正式的文学圈子和沙龙来承担。这是保护人制度社会和文化转型的一部分，保护人制度逐渐演变为“一个人或机构对一个作者的支持和保护，但反过来期望他能够满足文化上的需要”（Escarpit, 1971: 38）。甚至今天我们还能从诸如国家桂冠诗人（Poet Laureates）等政府设立的头衔中，看到这种保护人制度遗留的痕迹。虽然这种由社会和市场驱动的保护人制度，成为了作者行为“职业化”进程的一部分，当时的人们在以写作维持生计时，还是常常抱怨那种被异化的感觉，以及他们所被迫从事的支离破碎的工作。在英国和其他一些地方，所谓“格拉布街”（Grub Street）雇佣文人（得名于许多“受雇”文人的办公室和住宅所在的伦敦街道）成为一种持续的隐喻和形象，概括了18和19世纪的文字匠们没有灵魂的工作，他们靠每天生产的字数按件取酬。正如约翰·布鲁尔和伊恩·麦克卡尔曼（Iain McCalman）所说，“一文不名，受人摆布”，其结果是：

作家们成了文学工厂里零部件的生产者。这种支离破碎的状态损害了作家们的信誉，他们与他们参与生产的作品之间仅仅具有一种边缘化的关系。他们所写的并不真正是他们自己的东西，而是由他人设计的东西，而且其价值只在于作为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他们对所完成的作品没有兴趣，因为这不是他们能够或希望承认是他们自己的东西。作家（writers）不是作者（authors），而是能够扮演多种角色的演员，其价值在于他们扮演多种作者角色的能力（Brewer and McCalman, 1999: 106）。

作者、版权与报酬

18世纪末阅读公众的崛起（他们对印刷书有兴趣，也有能力购买），也是这一制度变化的一个因素。它创造了条件，使作者从寄希望于赞助人给予经费和支持，转而通过订购和事先付款的方式来寻求作品的出版。按照这种做法，作者或印刷商/出版商请对作品感兴趣的读者预先付款，以支付出版和生产成本。之后，这种做法又被与当下通行的版权协商制度〔例如，根据售出数量来分配版税（royalty payment）〕相关的各种商业出版规则所取代。

订购出版作为（保护人制度之后）确保散文和诗歌出版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实行了很多年。在英国，书籍订购从1600年代末到1730年代迅速崛起，在整个18世纪中期保持稳定，然后在18世纪的最后20年再次上升。以这种形式订购的书籍，涵盖了从诗歌、道德说教、历史著作、医学书籍和指导手册，到传记、数学、音乐和其他非文学作品的广泛著作。

作者获得回报的其他方式，包括利润对半制度（half-profits system），即作者同意分担出版的风险，从图书销售所得（减去成本后）中获得50%的收益。这种方式在18和19世纪被普遍使用，但有时会被出版商滥用。出版商通过在会计上做手脚，夸大发行和生产成本，损害作者的利益，增加自己的利润。第二种方式从印刷出现之时起就产生了，即出版商或图书销售商以一个固定价格买断版权。在这种制度下，如果日后作品被证明很成功，作者也无法获得再版收益。第三种方式在19世纪作者的版权利益得到贯彻和

保护后经常使用，即出版商通过协议购买若干年或若干版的版权，之后版权重归作者。最后，还有版税制度（royalty system）的实施，它是19世纪在各利益方的强大法律行动和共同压力之下建立的。

版权，或印刷一部文本的专有权力的产生，主要是18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图书销售商之间法律斗争的结果。“作者”能够控制其作品以获得经济收益，这种观念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逐渐盛行起来，这与艺术创作的版权有着法律上的联系。但是从垄断书籍印刷的收益和过程的意义上说，版权是自15世纪以来印刷发展进程的一部分。费弗尔和马丁注意到在15世纪末的意大利，对版权产生需求的一些早期事例：早在1481年[安德烈·德·波西斯（Andrea de Bosisi）谋求取得让·西蒙内塔（Jean Simoneta）《斯福尔扎颂》（*Sforziade*）的出版权]和1483年[米兰大公给予托伦蒂诺（Tolentino）的皮特鲁斯·尤斯蒂努斯（Petrus Justinus）出版弗朗西斯科·菲莱尔福（Francesco Filelfo）的《宴会》（*Convivium*）为期五年的特权]，就有司法记录表明米兰的出版者和印刷者寻求获得专有的版权特权并获得批准。法国的记录显示，在16世纪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国王、议会和地方法庭经常收到授予特权的请求，这些请求也常获批准。同样，16世纪德国的印刷商从皇帝和地方政权那里获得出版特权。在德国和法国，这种特权常常被用作控制出版生产和所出版文献种类的一种手段（Febvre and Martin, 1976: 241; Darnton, 1982a, 1996）。

对于那些有利可图的书，延长这些权力和特权时（有些特许期限可长达30年）会造成很大争议，常常引起激烈争夺。正如费弗尔和马丁所指出的，“原则上特权会给予旧书的重印和新书的印刷，这样那些受到皇室眷顾的出版商就会力求无限期地延长他们的垄断，同时政府倾向于把特权授予那些最正统、最听话的出版商”（Febvre and Martin, 1976: 241）。这常常导致强有力的垄断，使新来者很难进入并建立印刷、出版或销售方面的信誉。

在英国，由类似的出版与印刷特权和垄断所导致的法律争端，催生了1709年的“安妮法案”（Statute of Anne），该法案赋予作者及其代理人一定

期限内（14年、21年，如若作者还活着就变成28年）对印刷作品的所有权。1774年，苏格兰与英格兰图书销售商之间爆发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斗争，其结果是作者个人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该案的辩护得到了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传记作者、苏格兰律师詹姆斯·博斯威尔（James Boswell）在从事文学创作之余所提供的法律帮助，案件在伦敦的大法官法庭审理。它在法律上建立了文本个人所有权的先例和观念，后来被国际上对版权的解释所采用。

唐纳逊（Donaldson）与贝克特（Becket）之间的诉讼，是围绕爱丁堡图书销售商亚历山大·唐纳逊（Alexander Donaldson）（以较便宜的价格）对原版于伦敦的某些书籍是否具有翻印权进行的。在这一案件中，伦敦图书销售商声称他们拥有永久性的独占翻印权（以此排除潜在的竞争）。这一案件威胁了英格兰（主要集中于伦敦）图书销售商/出版商的垄断，他们想保持对76 对所购买著作的唯一翻印权。这一垄断起源于1500年代中期伦敦图书销售商们高度组织化的行会组织，即书业公会。1557年的一份王室特许状赋予书业公会印刷垄断权：只有书业公会的成员，或持有特许印刷执照的人，才有权印刷、翻印书籍。

虽然最初王室特许状的目的是为了使政府更有效地控制英国的出版业，但随后对它进行解释时把范围扩大了，包括了全国性的独占翻印权——成为催生适于销售的书籍的“永久版权”的一个步骤。这一变化包含了一种文本价值诠释的转变——从把文本视为功能，其价值体现在它们所呈现的东西，体现在其暴露社会不公或取悦于“作者”的能力；到把文本视为物品，视为具备有形市场价值的资产。正如马克·罗斯所说，“把文本视为功能，以它们能做什么来估价它们，与审查制度和图书销售商特权合而为一的法规制度是相匹配的，正如后来把文本视为具有美学价值的物品，与以所有权为基础的文化生产和规章体系是相匹配的。”（Rose, 1993: 13）

唐纳逊是1700年代末许多有进取心的图书销售商中的一个，他们开始

积极地挑战伦敦企业的版权垄断。当人们意识到仔细地操作和运用拥有版权的材料，对经营这种有利可图的生意具有如此大的助益时，来自“外省”书籍销售和出版中心的挑战越来越大。结果，越来越多的图书销售和出版企业开始在伦敦以外出现：例如在1740和1790年间，这些外省企业从分布于200个城镇的400家，发展到分布于300个地方的1000家。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唐纳逊发起了法律上的挑战。在这个案例中，他反对书业公会的成员自动获得从作者那里买来的文本的永久性版权，因为这种独占性禁止竞争，而且这对那些最先把文本创作出来的人本来就不公平。法庭表示赞同，随后关于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拥有版权的基本准则被写入法律。起初作者，或购买版权的人，被赋予14年，然后是28年的独占性复制权。紧接着法国在1778年实施了它自己的版权保护法（1793年进一步用法律条文加以强化）。奥地利在1832年、德国在1835年如法炮制。在以后的60年时间里，其他国家慢慢地制定了类似的版权法（版权保护期限越来越长——初版最初是50年，后来是75年），而国际版权规章经过反复争执之后，随着1886年《伯尔尼公约》的批准才得以实现。

77

工业时代的作者

随着法定权力方面的变化，技术和市场的重大创新与变革也接踵而至。

由于造纸和印刷生产新技术的应用和交通、通信系统的进步（这些进展和问题在第五章有更全面的论述），改变了19世纪印刷文化的面貌。例如，1801年福德林尼尔（Fourdrinier）机械造纸机发明，取代了手工造纸，增加了产量，降低了造纸成本；快速排版机和蒸汽动力轮转印刷机的使用节约了生产时间；越来越快速的交通（蒸汽动力火车和轮船）使得国内和国际书籍运输更加快捷；通信网络的进步（邮政服务、电报、跨大西洋国际水下通信电缆的铺设）使得作者、编辑、出版商之间的信息快速传播与流通成为可能，节约了出版时间。

印刷文化模式的工业化与整个西欧的工业化进程步调一致。正如罗杰·埃斯卡皮所指出的，机械化扩大了市场潜力，同时书业中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面对一个迅速发展的市场，书籍印刷和销售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生的资本主义工业将图书置于掌控之下。出版商作为承担主要责任的企业家出现，把印刷商和图书销售商降到次要位置。作为一种次效应，职业文人开始组织起来……”（Escarpit, 1966: 22 - 23）在实践中，这导致了业务的分离。大型出版社涌现出来，既有全能的也有专业的出版商——包括英国的约翰·默里（John Murray）、威廉·布莱克伍德（William Blackwood）、朗曼和麦克米兰，法国的阿歇特（Hachette），德国的塞缪尔·菲舍尔（Samuel Fischer）、伯纳德·陶赫尼茨（Bernard Tauchnitz），美国的乔治·普特南（George Putnam）、霍顿·米夫林（Houghton Mifflin）、哈珀斯（Harpers & Co.），丹麦的居伦达尔（Gyldendals），瑞典的诺斯特（Norstedts）、阿尔贝·博尼尔（Albert Bonnier）等重量级出版社。一些出版社把印刷业务交给企业内部的编辑出版部门，但总体来说，专注于巩固“出版社”声誉的企业把大量印刷业务转移到专业印刷企业身上，这些企业采用新技术，同时接受几个出版商的订单快速生产。

在1800至1850年间的工业生产变革中，英国是领头羊。法国在183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1830年的七月革命后，政府审查制度松弛了，出台了

自由贸易方面的法律；同时从1833年开始普及义务教育，这样识字率水平得到提高。到1848年类似的印刷生产工业化过程（给作者提供的机会也随之发生变化）影响了德国、美国、北欧国家及其他地方。与这些变化发生的同时，越来越活跃的资产阶级和渴求消费出版产品的阅读公众不断壮大（Gedin, 1982: 34 - 39; Hall, 1996: 44; Chartier, 1981）。

这些法律、技术、商业实践和社会构成方面的变化创造了条件，使得书籍以越来越低的成本被更快地印刷出来，出售给更广的受众，给出版商带来更大的利润，使作者能够从作品中获得重复性的收益（通过利润对半协议、一次性售出一定期限的版权等已经提到的方式，或通过重新获得书籍销售的版税），确保了在著作首次出版后获得某种形式的稳定、持续的收入。

一种职业诞生了。尤其是在19世纪下半叶，我们看到在整个西欧靠写作来获得足够的年收入的人数在爆炸性地增长。如果一个人能够似乎凭空创造出某种东西并将之付诸出版，并有一个协议使他/她能从这些作品中获得年收入，他/她就能够写出足够多的作品使这样的收入源源而来。明星作者开始为他/她们作品的版权索要高价：1881年英国前首相迪斯雷利（Disraeli）将他轰动一时的小说《恩迪米昂》（*Endymion*）的出版权全权授予朗曼，获得了1万英镑；1862年，伦敦出版商乔治·史密斯给了乔治·艾略特7千英镑取得《罗慕拉》（*Romola*）的版权，使她暂时抛弃了与之长期合作的出版商约翰·布莱克伍德（John Blackwood）；乔治·史密斯还劝说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放弃与查尔斯·狄更斯合作连载《阿玛代尔》（*Armadale*）的计划，改为放在史密斯的《康希尔杂志》（*Cornhill Magazine*）上，付给他5千英镑的高价连载权；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初版内容的三分之二在英吉利海峡两岸出版时，第一次获得了1万5千法郎的版税，第二次出售版权又得到1万5千法郎（Sutherland, 1976: 105; Laurenson and Swingewood, 1972: 120; Escarpit, 1971: 42 - 43）。这些金额是巨大的，

但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在这一行只是极端的例子，大多数人还是要为相对低廉的报酬而苦苦挣扎。

79 然而，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们才看到今天大多数图书出版所采用的版税制度得以施行，按照这种制度，在双方认可的基础上作者可以获得按比例浮动的作品销售提成。这一制度源自美国的出版实践，据认为自1880年代以来在英国得到普遍采用。这在美国出版商乔治·哈温·普特南（George Haven Putnam）的《作者与出版商：文学新人手册》（*Authors and Publishers: A Manual of Suggestions for Beginners in Literature*）（1883）与《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恩怨》（*The Grievances between Authors and Publishers*）（1887）出版后尤为显著。在书中，普特南概述了美国的版税制度，呼吁英国、并暗示西欧也采用这一制度（Hepburn, 1968: 13 - 14; Keating, 1991: 15 - 19, 459 footnote 24）。

同样，直到20世纪初，我们今天所司空见惯的营销和推广策略才出现。这些策略包括：文学代理负责费用谈判并把文稿卖给出价最高者；通过有组织的密集的书展、读物和标语来促销书籍；利用其他媒体（广播、电视和报纸）来激发读者对作者作品的兴趣（West, 1985; Marek, 1995; Bonham - Carter, 1978, 1982; McDonald, 1997; Finkelstein, 2002）。正如朱丽叶·加迪纳所指出的，其结果是作者的生平被“写成传记，目的是——在英国——是使她或她的书摆在靠前台前的位置，用美国图书销售商的话说则是：‘在排行榜上’排名第一”（Gardiner, 2000: 263）。

对作者功能的诠释

作者作为一种职业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文本批评方法也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后工业化背景下。在很长时间里，那些研究文学的学者，寻求通过对文本内部意义和结构的诠释学分析来解读文本，用来研究通常这些著作所产生的外部环境的手段少得可怜。在整个20世纪早期，对文本生产进行学术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种人文主义主导的倾向，把创造性权威都归于作者，作者被看作是自我表达的、有目的的、创造性的，作者能够驾驭文本中的所有意义。对于那些涉足文学诠释学的学者来说，正如安德鲁·米尔纳（Andrew Milner）所简洁地概括的：“相关的意义是文学文本的作者有目的而为之的，无论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Milner, 1996: 29）其最终的任务，尤其是在英语学术圈中，正如施莱尔马赫（F.D.E. Schleiermacher）著名的论断，是“在开始时，对文本的理解要达到作者对文本的理解程度，然后甚至要超过作者”（Schleiermacher, 1985: 83）。这种诠释的一个例子，可以在20世纪初期到中期英国学者里维斯（F.R. Leavis）有影响的著作中找到。众所周知，他站在某种角度上宣布，英国文学史上只有六个人值得研究——其中包括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劳伦斯（D.H. Lawrence）。里维斯的观点是基于这样的看法，即文本本身是“真实”的最终来源，“权威”（authority）被赋予富有创造性的天才站在人性之上创作出来的文字。作者，是那些源源不断地倾泻出包含无穷智慧的纯粹文本的个人。[之后在目录学领域，文本

被认为会在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污染。其结果是在现实中形成了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围绕制造出各种试图尽可能忠实地复制作者“原始文本”（ur-text）的版本而建立。]

对这一倾向的回应遵循着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的路线演进，包括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文化唯物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批判运动。这些批判运动的历史不是本章的讨论范围，但是有几部已出版的见解深刻的概要性著作，可以为读者提供这方面的详细信息（Milner, 1996）。

在1960年代反对以往权威的骚动与批判旨趣中，出现了一种在书史背景下研究作者身份的学者需要加以关注的重要的结构主义观点，它来自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发表于1967年的短文“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巴特的文章体现了当时的批判趋势，既是对关于作者的“创造性”和“权威”的观念的解释，同时也是对这些观念的破坏。他宣称，一旦作者将作品提交给公共领域，他（她）自己就不复存在。把作者去掉，你就为新的意义创造了空间，你就解放了文本。在试图把批判的重点从以作者为中心的探究，转向以读者为基础的分析时，巴特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提出，现在批判性反思的首要问题是读者如何解释文本。“疏远作者”，巴特宣称，“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事实或一种写作行为：它还彻底地改变现代文本（或者，这当然是一回事，文本今后在被构成和被阅读时都会使作者在每个层次上缺席）”（Barthes, 1977: 145）。换言之，不再有必要把文本视为从上帝/作者到读者的线性过程，这个过程所传递下来的是需要解读的不变的真理。相反，读者在创造他们自己的意义时，无需作者这一概念的帮助——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本身就是作者。读者每次读东西时，他们都会带着完全不同的意义离开。巴特继续道：

读者是构成写作的所有引证部分得以驻足的空间，无一例外；一个文本的整体性不存在于它的起因之中，而存

在于其目的性之中，但这种目的性却又不只是个人的：读者是无历史、无生平、无心理的一个人；他仅仅是在同一范围之内把构成作品的所有痕迹汇聚在一起的某个人。(Barthes, 1977: 148)

巴特所反对的立场，是将作者意图解释为意义的担保人，“我们已经学会不再把历史的具体的个人，视为她或他的文本的表达主体” (Gardiner, 2000: 256)。将作者的权威从文本中去中心化和加以剥离，并不是一个新的观念，新的是把普通读者提升为文本意义的最终创造者。但正如米歇尔·福柯在一年后发表的著名反驳 [“作者是什么？” (What is an Author?)] 中所指出的，这还不够好，尤其是在物质生产和资本主义活动的背景下。说作者死了，杀死他或她的“权威”，就是忽略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文化生产和市场力量驱动的世界的事实。作者和他们的书，是商品。作者的名字带有各种各样的意义。正如福柯所指出的：

81

作者的姓名不仅仅是话语中的一个元素（能够成为主体或客体，能够被一个代名词所取代，等等）；它扮演了与叙述话语相关的一种特定角色，确保了一种分类功能。这样一个名字使人能够把一定数量的文本汇集在一起，定义它们，把它们与其他文本相区别、相对照。另外，它在文本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Foucault, 1984: 107)

或者，正如他的简练概括，作者的名字“似乎总是在场，划分出文本的边界，揭示它存在的模式，或至少表现出这种模式的特征” (Foucault, 1984: 107)。

福柯认为，作者的作用，对于确立文本是什么，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

其关键性不亚于任何别的东西。作者等同于他的“代表作”(portfolio)，他的“全部作品”(oeuvre)。这一点也被带入其他媒体产品，例如电影中。在电影中，“导演”(auteur)的作用(把创造性权威和原创性归于导演)居于主导地位。在福柯看来，现代的作者与其说是一种“本质”，倒不如说是从各种技术和社会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功能”。既然如此，正如一位学者简明扼要地指出的，福柯的“作者”是“一个名字，其流通独立于个体之外，马上就可以用作标示所有权的签名，用作那个名字所获得的各种重要性和名声的载体”(Gardiner, 2000: 256; Wernick, 1993; Chartier, 1994: 29 - 59)。

巴特和福柯反人文主义姿态(即他们拒斥试图还原作者本意的文学人文主义研究)的一个结果，是进入了一个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文艺理论的狂热时期。正如一位学者冷冰冰的评论，“狂欢于由罗兰·巴特首先宣告、随后得到米歇尔·福柯支持的‘作者之死’的理论意涵”(Milner, 1996: 115)，这一趋势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英语学术界的批评理论论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下述观点成为激烈交锋的焦点之一：“在文学和文化理论中，在发掘文本意义时把揭示作者意图作为中心任务的做法，长期以来遭到否定。”(Gardiner, 2000: 274)

82 近年来，出现了把作者作为文本意义的主要因素的回归，然而这一次的回归，是视野更开阔的历史和文化分析的一部分。例如新历史主义的倡导者[如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表现出这样的兴趣：“把文学作品置于与(实用、法律、政治或宗教性质的)‘普通’文本的关系中，这些文本构成了写作的原材料，并使之成为可理解的东西”(Chartier, 1994: 27)。其他学者援引皮埃尔·布迪厄关于文化生产社会学的著作，来考察“文学场域”中结构化的关系，以及艺术家、作家和其他文化生产者赖以活动的文化、政治与商业价值的等级体系(McDonald, 1997; Radway, 1997)。同样，“作者功能”是当前印刷文化和书籍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书史学者做得特别好的方面，是揭示了自中世纪以来作者角色(以及

作者行为所依据的所有权制度)的概念变化有多大。手抄本文化所建构的“作者”，与今天文化和批评意义上的作者概念相去甚远，后者日益被视为一个复杂的、商业化的、高度数字化的公共领域的一部分。通过跨国多媒体集团，印刷品与文本越来越成为媒体商品“垂直整合”的一部分，常常一起捆绑出售给电影、电视和其他媒体产品（见第七章）。在公共媒体领域，作者们参与其中并相互争夺空间（参加电视和广播节目以推广著作，频频在图书节亮相，为粉丝们签名售书，答复电子邮件、来信和各种请求）。这是朱丽叶·加迪纳所准确地指出的作者名字的流通的一部分，其中“充溢着对作者身份的浪漫主义的解读，把它视为孤立的、个人的、自白的，使作者意图的概念得以以这样的方式被重新定位，即通过在他/她的书籍的意义生产过程中一系列特定的表演行为，在文本写作之外把作者作为其文本的意义来呈现”（Gardiner, 2000: 263）。

“作者”同样可以通过迅速成长的数字媒体发现自己被重新定位：通过互联网被在线数字化、复制、粘贴、重新组合和发行（或署名或否）。目前试图控制对拥有“版权”的资料进行数字化盗版的努力，显示在一个流动的、全球化的、多变的媒体中，维持稳定的、印刷文化所定义的作者身份概念所面临的内在困境。正如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所指出的，数字化商品（无论是电影、音乐还是印刷品）“有一种在很基本的层次上混淆资本主义原则的逻辑”，使得原本直截了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回报过程变得复杂起来（Poster, 2001: 43）。我们可能会真的见证从波斯特所说的“模拟作者”（analogue authors）（即那些与印刷技术的概念和物质活动共存的作者）到“数字化作者”（digital authors）（那些与“或许是后现代的，或许是未来的，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甚至是基于网络的写作形式”相结合的作者）的转变。波斯特提出，虽然不像某些数字技术专家认为的那样，数字化文化会导致印刷文化的末日，但它正在对文化生产产生影响，正在转变作者形象（author figure）赖以存在的基础。“数字化写作”，他宣称，“既为作者打上了一种技

术上的烙印，也是指出作者身份新的历史格局的一个术语。它是新兴的，但似乎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Poster, 2001: 69）。

小结

我们已经考察了在过去一千年里，在西欧传统中作者身份作为一个概念和一种行为演变的方式。在中世纪，作者的活动主要局限于精英聚集的宗教中心，尽管当乔叟等人出来挑战既有秩序时情况有所改变。一般来说作者被视为为了当时的目的而重塑过去材料的个人。自15世纪中期印刷出现以来，作者身份作为一种功能发生了变化，支撑作者活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已经看到直到18世纪及其以后，印刷商、出版商和保护人如何在作者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也看到版权法的变化和19世纪工业化的出现，如何进一步改变了作者身份和书籍生产的要素。我们考察了20世纪对作者功能的诠释，以获得对今天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的深入认识。我们也注意到随着21世纪数字技术登上舞台，人们如何预言作者活动的新范式和对“作者身份”构成的重新定义。数字时代的作者身份可能也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是否需要作者在社会中的角色进行重新阐释，或者如我们在过去的手抄本和印刷“革命”中所看到的那样，将

仅仅涉及作者身份的传统方式和新方式之间的相互适应、重叠，仍然有待观察。这样，以这种发展的观点来评估当代和未来作者功能的角色，就是未来研究印刷文化和书史的学者将需要面对和承担的挑战。

84

第五章 印刷商、书商、出版商、代理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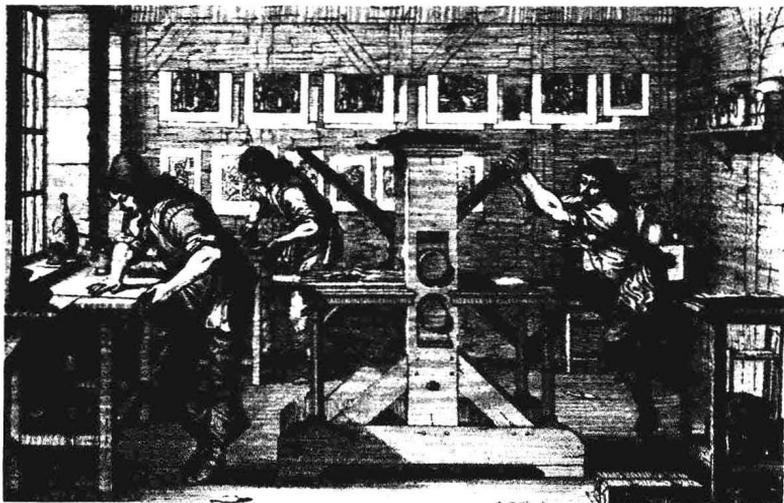
在最近的书史研究中，研究得最全面的领域，是参与书籍和其他文本生产、发行和接受的印刷、印刷商和各种代理的世界史。本书的第三章考察了印刷出现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占据了最多的篇幅。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对于书籍作为物质对象的迷恋——对珍稀罕见、令人着迷、不同寻常的图书制作过程背后的历史和人物的了解，常常与评估书籍的物质价值密不可分；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书籍和印刷在文化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正如前面的章节所指出的，罗伯特·达恩顿的“交流圈”有助于建立一个简略的模型，来说明支持和影响印刷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精细网络。达恩顿的文章强调了书史领域的持续扩张，从过去目录学聚焦于文本的物质实体，到目前将印刷文化生产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法律背景的兴趣包括进来。托马斯·亚当斯和尼科拉斯·巴克对达恩顿的回应中，提出了一个以书籍生产流程而不是以文本的外部力量为中心的“交流圈”，然而它仍然把我们对书籍的理解置于物质因素的背景之中，把决定书籍和文本生产的经济规则考虑进来。

本章考察书史学家们如何描述和讨论书籍和印刷文化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诸多代理的角色。它提供了一部西欧印刷生产商业模式变化的简史，这些模式在19世纪工业革命后发展起来，在第三章、第四章所述内容的基础上继续演进。它考察了印刷文化如何输出到欧洲的殖民地，起

85 初印刷主要用于当地和地区性报纸的出版；并简要地描述了印刷文化在塑造民族和地区认同中的作用。从出版商的审稿人和文学代理，到难以捉摸却颇具影响的文学网络，它还强调了各种文化代理在支持和塑造印刷文化生产中的作用。

变迁中的商业模式

正如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所提到的，从古腾堡的时代到19世纪，印刷业的商业模式相当简单。早期的印刷者同时扮演印刷、出版和销售的角色，他们搜寻有潜力的文本，购买印刷权，然后试图通过不同的途径从推广和销售



17世纪的印刷作坊



18 世纪的印刷工场

这些文本中获利。当贸易增长、国际间的联系发展起来之后，这些角色开始分化：到19世纪初，许多西欧城市有了专司出版的商人，他们与印刷商、插图画家和其他有关专业生产人员订立分包合同，完成书籍和其他印刷品的物质生产，然后向专业图书零售商销售成品。英国抓住了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是率先实现书业结构转变的国家之一。1780年后，“从一系列独立而相互合作的图书销售公司，到一群大型的公司企业”的转变开始了（Hall, 1996: 44）。创立于19世纪初的麦克米兰（Macmillans）、布莱克伍德父子公司（Blackwood & Sons）、约翰·默里（John Murray）、钱伯斯（Chambers）、史密斯-埃尔德公司（Smith, Elder & Co.）等家族企业，到1860年代就成为本领域的领头羊，主宰了英国的书业，并向英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出口图书获利。到19世纪末，西欧书籍市场的经济结构已牢固确立，包括印刷商、出版商（publishers）、出版社（publishing houses）、图书销售商、报刊出版者、图书馆、文学代理、独立作家和正在成长的阅读公众等因素，他们彼此独立而又联系紧密。

同样，我们开始看到在新技术的驱动下，印刷品作为可盈利的商品进入公共领域。比如1814年库尼格蒸汽印刷机开始应用于英国，适逢拜伦爵士渐露锋芒，直至日后享有偶像级的文学地位。库尼格蒸汽印刷机给拜伦这样的作家进军文学市场，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我相信，”詹姆斯·布鲁斯特（James Brewster）对拜伦说，“你必须利用蒸汽写作。”这件事说明诗人如何能够成为新工业技术的应用所释放的文化权力的受益者（Mole, 2003: 128）。文本工业化生产的革命，使得拜伦这样的作家能够迅速地将他们的作品从手稿变为印刷品，同时越来越快的交通网络，使他们的文字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远更快地跨越地理边界。

86 蒸汽动力（和蒸汽机）即将成为1790年代及1800年代初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西欧社会和经济重构的主要象征。蒸汽作为工业发展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的一个缩影，成为公众热议的核心话题。借助于看得见摸得着的新技术和大规模生产系统的应用，例如全国性和国际间的邮政系统、电报线路、快捷的装备金属壳体和蒸汽动力的轮船和铁路，以及生产日报等大众传媒的蒸汽动力印刷机，信息处理和通讯的速度更快了。卡尔·马克思在1840年代评论蒸汽机的发明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变化，宣称自然本身受到了人类发明的挑战：“自然造不出机器、火车头、铁路、电报……这些是人类工业的产物：自然材料被按照人的意愿变为工具。”（Briggs and Burke, 2002: 111）

库尼格印刷机是一种蒸汽动力的滚筒印刷机，英国日报《泰晤士报》老板秘密安装了这种机器。它一小时能印出1000页，于1814年11月29日首次投入使用。库尼格印刷机的出现把蒸汽与印刷结合到一起。该报夸张地宣传这一时刻是“自从发明该技术以来，这一最伟大的进步与印刷相结合的实践结晶”（Briggs and Burke, 2002: 111）。他们所说并不太离谱。事实证明蒸汽动力印刷和造纸技术的进步一起，对于印刷品交流成为文化互动与解释的核心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詹姆斯·斯科德（James Secord）所说，这段时

期已经为阅读成为大众文化至关重要
的一个方面打好了基础：“蒸汽动
力印刷机、机器造纸、公共图书馆、
廉价的版画、铅版印刷、宗教小册
子、世俗教育、邮政系统、电报和
通过铁路发行，在向不断增加的阅
读公众打开书籍闸门的过程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Secord, 2000: 30）
它使得印刷文化能够更快速地起到
媒介作用，同时在社会越来越知识
化、识字率越来越高的背景下，造
就和推动了信息的快速传播。在公

众的意识里，由政治革命和抗争所引发的思想躁动与重要的经济和工业革命
结合在一起，这要归因于书籍和其他印刷品的报道和呈现：“这是一个见证
了配图报纸、现代新闻记者、抓人眼球的街头广告、国际展览和平装书的时
代。”（Secord, 2000: 24）其结果是“印刷文化通过对其自身的报道，在大
众感知认识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占据了核心位置”（Secord, 2000: 30）。

这种成功鼓励了印刷业在境外进行技术扩张。自1830年代以来，英国
经验在大西洋彼岸和其他欧洲国家被复制，正如大卫·里德（David Reed）
指出的，“19世纪后半叶见证了印刷业翻天覆地的变化”（Reed, 1997: 44）。
例如在美国，印刷成为殖民地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18世纪有像本
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这样的重要人物参与印刷业，他漫长
而多产的著述生涯，是通过在新英格兰殖民地建立印刷和出版帝国开始的
（Isaacson, 2003; Brands, 2000; Morgan, 2002）。但正如大卫·霍尔（David
D. Hall）指出的，美国出版和印刷活动的“黄金时代”，在1830年后随着提
高产量和交流效率的新技术的出现而到来，像纽约的哈珀（Harpers）、费城

M. T. CICERO'S
CATO MAJOR,
OR HIS
DISCOURSE
OF
OLD-AGE:

With Explanatory NOTES.



PHILADELPHIA:
Printed and Sold by B. FRANKLIN,
MDCCLXIV.

富兰克林出版的西塞罗著作



19 世纪哈珀公司推出的大众畅销书——插图版《圣经》

利益），才通过彻斯法案（Chace Act）不情愿地接受了国际版权法的某些条款。

但是这种保护主义行为，也是美国印刷生产者为他们产品建立自我维系的大众市场的一种举措。正是在美国，我们看到了出版平装书的早期试验，最初是 1840 年代由报童兜售和通过邮寄订购方式推销的平装本“报纸副刊”，然后是 1860 年代至 1890 年代，波士顿的比德爾（Beadle）兄弟公司率先从事面向大众市场的平装书的出版。他们的第一本平装书《玛丽斯卡——白人狩猎者的印第安妻子》（*Malaeska, the Indian Wife of the White Hunter*）于 1860 年夏出版，盈利超过 1300 万美元。仅仅在 1860 年至 1865 年间，该公司的系列平装书销量就超过 400 万，卖的最好的书销量达 8 万册（Schneirov, 1994: 63; Milner, 1996: 69）。

法国在印刷品消费方面，经历了类似的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剧变。教育改革扩大了基本识字率，法律的变革松弛了出版物出版和发行方面的规

的卡利 - 里（Carey, Lea）等公司，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知名的公司（Hall, 1996: 44）。它们控制当地市场的能力同样源于它们的规模和生产速度——美国版图书一般比英国版数量多三到四倍（平均每版印数 750 - 1000 册），价格低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印刷品之所以便宜，部分原因是广泛存在“盗版”，英国的出版物成为被“借用”的对象。侵犯版权的问题一直延续到 1890 年代，美国对于国外出版物的保护主义法规实施（理由是需要保护本国印刷业利

定。面对法国不断增长的城市识字人群，大众出版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836年艾米尔·德·吉拉丹(Emile de Girardin)创办的商业日报《新闻界》(*La Presse*)及其竞争对手《时代》(*Le Siècle*)。一年内，整个巴黎日报的销售量从每天7万份跃升到23.5万份；到1870年达到100万份；到1880年超过200万份(Escarpit, 1996: 28; Motte and Przyblyski, 1999: 2)。文本形式上的创新包括连载小说(roman feuilleton)，其实它源自英国。在19世纪的法国文学圈中，最先以这种形式出版作品的大作家有巴尔扎克、大仲马、左拉和福楼拜。

19世纪法国的发行同样从英国模式中吸取了灵感。首先是马迪(C. E. Mudie)1842年在英国创立的巡回文库(circulating library system)[垄断和控制图书——尤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的生产和发行方式达50年以上]，其次是由史密斯(W. H. Smith)创建的报纸发行网和铁路报刊亭网络。对于史密斯的起步，吉内维尔·格里斯特(Guinevere Griest)这样评论：“19世纪初，史密斯的公司是在英国处于领先地位的报纸代理，1848年公司开始扩展铁路报刊亭业务时，这一地位并未动摇。”(Griest, 1970: 31)到1862年，史密斯公司在几乎所有英国铁路的报刊亭经营中取得了垄断地位[另一个零售业竞争对手约翰·孟西斯(John Menzies)控制了苏格兰市场]，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20世纪末。该公司也进入了出版市场，1854年起它与查普曼与霍尔(Chapman and Hall)公司联合出版了价格低廉的两先令平装再版本通俗小说，这些书在火车站销售尤多[因其黄色封面以“黄皮本”(yellowbacks)著称]。

法国人模仿了这些发行方面的创新。法国出版商路易·阿谢特(Louis Hachette)1826年在巴黎创建了企业，到1860年代，他通过精明地与法国政府建立关系，成为学校课本的主要供应商，使他的公司成为法国最大的出版企业。1864年阿谢特去世时，他的公司雇用了165名员工，年毛营业额达100万法郎。1851年阿谢特访问英国时，看到了史密斯铁路报刊亭的成

功。回国后，他通过游说，成功地获得了在法国火车站建立类似报刊亭的权利。随着铁路网的扩展（1850年至1870年间增长了600%），阿谢特的铁路书店帝国也迅速膨胀，在全国发展到几千个报刊亭和书店。1850年代，阿谢特还复制了史密斯的再版书系列，称为“铁路书库”（railway library）版，第一年出版了107种，次年出版了60种。这一系列总共出版了500种。畅销书中包括狄更斯、萨克雷、乔治·桑、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和塞居尔夫人（Comtesse de Ségur）的《苏菲的烦恼》（*Malheurs de Sophie*）。其中狄更斯的书共有28本（其中《大卫·科波菲尔》最畅销，达10万册，《奥利弗·忒斯特》仅次于前者，达8.3万册），《苏菲的烦恼》在整个1860年代每年稳定销售4万册，最后共售出170万册（Gedin, 1982: 39 - 40）。阿谢特公司在此后数十年间越来越强大，在阿尔及利亚和土耳其等海外市场开设了图书销售分支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其年营业额超过6000万法郎。然而战后，阿谢特不再是一个家族企业，它在20世纪末进行了一系列重组，成为一个跨国多媒体集团帝国，覆盖了多种娱乐业。

19世纪在出版领域除了上述这些成功，还有日报、周刊、月刊和季刊等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大众媒体带来的出版商机。征稿期刊数量的增长，使得许多作家能够以写作为生。知识产权越来越成为有价值的商品，尤其是在19世纪出台了若干重要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的裁决与贸易协定，使个人越来越多地取得对作品的法定权力。出版商意识到休闲内容能够刺激报刊的销售，并能够用作他们所出版的小说和非小说图书“品牌”的广告。从1840年代开始直到1880年代以后，连载作品在文学报刊中日益普遍，一个相应的市场发展起来，文本（无论是盗版还是合法购买的）以连载方式出版并在国际上流通：“19世纪中期，纽约的小说、法国的时尚、澳大利亚的信息充斥着杂志的大众化版面。”（Johnson-Woods, 2000: 355）

期刊为文学生产提供的新出路，也促使文学和印刷生产从业者形成更系统化的组织。在英国，到20世纪初，所有重要的出版和文学职业群体都

建立了代表他们的特殊利益的组织（在第四章曾简要提及），包括作家协会（1884年建立）、出版者协会（1896年成立）和大不列颠与爱尔兰图书销售商协会（1895年建立）。随着英国小说初版三卷本形式^{*}在1894年的终结，以及随后零售商所试行的易变而苛刻的定价体系使得利润越来越薄，图书销售商和出版商逐渐对新的作品实行基于双方意愿的固定价格协议。经过长期谈判，1899年诞生了纯账面协议（Net Book Agreement）（持续到1995年）。在美国，新建立的全美出版者协会试图在1901年引入类似的固定价格协议。经过长年累月的法律程序，13年后，最高法院根据反托拉斯法判定这种固定价格协议违法。

输出印刷传播方式

19世纪蓬勃发展的技术革新所重塑的印刷传播方式，被成功地输出到其他国家，这些国家接受了欧洲的投资、技术和技术工人。根据这些国家的当权者的具体需要和支持力度的不同，印刷活动或繁荣发展，或步履蹒跚。最初，印刷设施通常是传教定居点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官方出于获取信息

90

^{*} 19世纪英国小说出版的标准形式，初次印刷时分为三卷出版，使读者不断保持阅读的欲望。——译注

的目的，也需要建立印刷设施。例如，新西兰的印刷文化与传播史，是一个碰撞、冲突、调适、殖民地化与成熟的过程。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从1770年后欧洲人和毛利人最初的零星冲突，1814年后传教定居点的建立，到1840年以后的白人移民潮，都显示了两种彼此冲突的文化表达之间的碰撞：一方是植根于口述传统的毛利文化，另一方是崇信文字的力量，拥有建立于印刷文化传播方式之上、受到印刷文化传播方式支持的法律、政治传统和体制的欧洲文化（McKenzie, 1984; Cave and Coleridge, 1985; Traue, 2001; Belich, 1996: 116）。1840年2月6日，毛利人和白人（Pakeha）首领签订了《怀唐依条约》，英国官员将该条约视为以文件形式正式确认毛利将主权让与英国王室，但它仅仅体现了口头与印刷文化之间的碰撞、诠释和重新组合，其导致的结果至今仍有争议。

新西兰的印刷史是从传统的传教书籍开始的，这些书用当地的土著语言印刷——1815年至1845年作为传教活动的一部分，印刷了一批以土著语言编写的材料，供传教对象阅读。第二波印刷浪潮，即新西兰的英语印刷，始于1840年出版的报纸《新西兰报与不列颠观察》（*The New Zealand Gazette and Britannia Spectator*）。报纸出版成为新西兰殖民地发展过程中印刷活动的主要形式。正如特拉乌（J. E. Traue）所指出的，其发展十分迅速：1840年至1848年有5.9万人来自欧洲，有28家报纸创立；1860年至1879年间有181家报纸创立；1880年至1889年间创立了150家（Traue, 1997: 109）。

新西兰印刷文化传统植入的过程，及其以报纸出版为特征的最初表现方式，在西印度群岛、夏威夷、海地、塔希提、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和印度等其他殖民地也有类似体现（Traue, 2001; Cave, 1986; Anderson, 1982; Bayly, 1996; Chakava, 2001; Finkelstein and Peers, 2000a）。例如在印度，自1700年代中期以来印刷传播网络得到了发展。虽然至少在最初，大众传媒的技术与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从欧洲移植过来的，但其受众的划分则要细得多，按照语言、地区、宗教分为许多类型。饶有趣味的是，在印度

活动的诸个欧洲列强中，英国是最后将印刷机带到印度的国家之一。直到1761年，在印度的英国人才得到一部印刷机，即便如此它还是从法国人那里弄来的。其作用主要是印刷政府文件和书籍，针对大众消费的出版姗姗来迟。加尔各答的第一份报纸出现于1780年，随后马德拉斯于1785年、孟买于1789年出现报纸。到19世纪中叶，报纸杂志已经成了侨居印度的英国人（Anglo-Indian）生活中的司空见惯之物。正如一位人士1851年所说，“如同在伦敦一样，在加尔各答，报纸已经成为早餐桌上的必需品”。（Hobbes, 1851: 362）

澳大利亚的印刷业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曲线。整个19世纪，澳大利亚本土出版的书籍少得可怜；1850年代淘金热之后本土印刷生产发展起来，在承揽了一般业务的同时，主要集中于报刊出版市场。澳大利亚的图书批发商，如墨尔本的乔治·罗伯逊（George Robertson），主要在英国和北美售书，主要是和殖民地有关的读物。澳大利亚的作家发行作品有两个渠道：一是在不同地区的报纸和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和连载，这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但这些作品往往是短命的；二是找英国出版商出版（若最初在澳大利亚连载，则是再版），尤其是在1880年代“殖民地丛书”成功投放市场以后。该丛书由本特利（Bentley）、桑普逊和罗尔（Sampson and Low）、麦克米兰等公司竞相推出，面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市场，装帧使用廉价的纸张和布面。在这样的殖民地丛书中出版或重印的澳大利亚畅销书，有罗尔夫·博尔德沃德（Rolf Boldrewood）的《武装抢劫》（*Robbery Under Arms*）和迈尔斯·富兰克林（Miles Franklin）的《我的璀璨生涯》（*My Brilliant Career*）。前者1889年初版于麦克米兰的“殖民地书库”（*Colonial Library Series*），到1937年销量超过了100万（Eggert, 2003）；后者1901年由爱丁堡的威廉·布莱克伍德父子公司（William Blackwood & Sons）出版，又于1902年至1904年间通过一部以澳大利亚读者为对象的殖民地丛书发行。

19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澳大利亚图书销售商开始涉足出版业，通常

是与英国出版商合作出版。马库斯·克拉克 (Marcus Clarke) 的《终身监禁》(*His Natural Life*)，是一部关于囚徒生活的震撼人心的作品，最初在一本澳大利亚刊物上连载，1874年由乔治·罗伯逊在墨尔本出版，又由本特利公司于1875年重新出版，1882年以来则由罗伯逊公司和本特利公司在澳大利亚联合发行。同样帕特森 (A. B. Paterson) 的《来自雪河的人》(*The Man from Snowy River*) 于1895年由伦敦的麦克米兰、悉尼的安古斯 (Angus) 和罗伯逊公司联合出版，盈利颇丰 (Johanson, 2000: 148 - 149)。然而，从1890年代直至1960年代，英国出版商主宰了澳大利亚的图书市场，尤其是澳大利亚1912年的版权法实施以后，该法“确保海外出版商可以制定贸易条款，强制零售商从指定渠道进货，这样就将价格固定下来，并维持在高水平……” (Kirsop, 2001: 326)。直至1961年，出口占了英国当年出版图书的40%，其中对澳大利亚的出口就占到25% (Johanson, 2000: 254 - 282)。

加拿大印刷活动和印刷文化的发展要早得多，发展道路亦不同，但从承印零散印刷品和期刊印刷发展到本土文学出版的过程，同样缓慢。正如一项调查所揭示的：

加拿大的出版活动始于私下流传的手抄本，随后使用手工排版的印刷机生产出报纸和其他出版物，之后又被不断出现的各种新技术所取代。早期的图书发行，常常依靠私人进口，或从当地印刷所购买图书，直到人口规模大到足以开设专门的书店和发行代理机构。(McDonald, 2001: 92)

随着加拿大各地定居点的发展，印刷发展起来。1751年，印刷机首先出现于哈利法克斯 (Halifax)，随后1764年出现于魁北克，1793年出现于尼亚加拉，1798年出现于多伦多。早期主要是承接零活 (job printing) (招贴、信笺、账簿等)，其他主要业务有印刷政府和宗教出版物，以及报纸出版等。直到19世纪晚期，加拿大印刷生产和发行的经济结构还是实用性、个体性、

地区性活动的混合体，单个企业遵循着印刷、出版、发行合一的旧模式。正如一位研究者指出的，“直至20世纪初加拿大以外的大型企业的到来导致了兼并，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McDonald, 2001: 93）。

印刷与民族凝聚力

可以说，在整个后工业化时代的印刷史，尤其是受欧洲影响或控制的海外殖民地的印刷发展史上，印刷文化最初是通过报纸的出版而发展起来的，报纸在当地社区被用作一种发布信息和维系凝聚力的手段。报纸的大规模机器印刷，在萌芽阶段影响和促进了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语言的塑造和罗伯特·埃斯卡皮*所称的“独立的民族文学”（Escarpit, 1966: 24）的产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令人信服地指出，以这种形式对印刷的运用——他称之为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对于民族认同的持续塑造是关键性的，这种民族认同即“想象的共同体”，他在以此为题的书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论述。如果一部书能够在情感和思想上对人产生激励和吸引，那么在相同的时间段内被千万人消费的日报，同样可以让人感到被同一种语言连接在一起，“持续不断地保证想象的世界现实地植根于日常生活之中”（Anderson, 1982: 35 - 36）。

93

* 原文为 Roger Escarpit，应为 Robert Escarpit。——译注

审稿人与代理

上述各国的事例显示，从西欧引进印刷生产和出版后，其演进路线通常表现出相似性。同时，事实证明各国的印刷生产和传播体系将分化出层级和类别，这是一套“独特、明确，环环相扣，常常又是相互矛盾的惯常业态”的一部分（Feltes, 1993: 17）。著作权的不断增值，为诸如出版商审稿人和文学代理这样的新的中介组织和个人创造了空间，他们的作用是过滤和推广那些提供给大众消费的“原”材料。

出版商审稿人是印刷文化生产中的一种角色，它是在19世纪作为文学作品发表的一种途径而发展起来的，鼓动人们向数量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和杂志社供稿。出版商审稿人不是什么新现象：在需要决定是否录用某些稿件时，出版商的文学顾问或其前身（图书销售商）就常被召来咨询。阿瑟·沃（Arthur Waugh）着力刻画了19世纪中期的文学圈子里这类非正式的审稿人所表现出来的诡异形象，他写道：“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文学审稿人是……某种神秘的预言家，被关在某间密室里，被神秘地称作‘我们的审稿人’。”（Waugh, 1930: 139）19世纪晚期，出版社的审稿人来自当时的文学圈子，几无例外都是主流文人（men of letters），如约翰·福斯特（John Forster）、约翰·莫利（John Morley）、安德鲁·朗格（Andrew Lang）、爱德华·加内特（Edward Garnett）、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重要的女审稿人，有玛格丽特·欧丽梵（Margaret Oliphant）、伊丽莎白·里格比（Elizabeth Rigby）、杰拉拉丁·朱斯伯里（Geraldine Jewsbury）。

19世纪末，随着作家与出版商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更多地涉及出版物来源、版税、连载权方面的复杂谈判，审稿人的作用和地位发生了变化。审稿人签约承担特定的任务，有的积极挖掘有潜力的作品，协助、鼓励它们加入到出版“目录”中，有的仅仅对出版商和杂志编辑转给他们的稿件进行评定。为乔纳森·凯普（Jonathan Cape）公司审稿的爱德华·加内特是前一种类型的例子，正如玛丽·弗里茨那（Marie Fritschner）所指出的，他为凯普公司物色新人，并提供全面的审稿人服务：“他也修改稿件，但通常他的工作是在幕后，主要涉及小说的主题、动机和结构。”（Fritschner, 1980: 93）为本特利公司审稿的杰拉尔丁·朱斯伯里是后一类型的缩影，她不与作者打交道，而只处理稿件，根据商业或审美标准来接受或拒绝来稿，一旦做出评断就不再接受后续的修改完善。正如弗里茨那所说：

94

（朱斯伯里）主要代表出版商的利益，其次才是作者，文学放在最后。她秉持的文学标准，是把文学看作一种消遣解闷的东西。一般来说，她采用或拒绝一部稿件，取决于她对其商业价值的评估。（Fritschner, 1980: 94）

当越来越多的人想以文学为生时，就越来越需要“专业”评议人来做这样的工作。美国的一个例子显示，杂志编辑们收到的稿件数量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而是呈指数级增长：例如，19世纪美国头号月刊《世纪》（*Century*）（1897年发行量达到顶峰时的250000份）的编辑，发现来稿量从1873年的1700份，达到1874年的2000份，1875年的2400份，最后到1876年达到3200份（Schneirov, 1994: 11,66）。在“漫长的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直至20世纪，英国图书的年出版量反映了书籍市场类似的指数级增长，从1820年代的平均580部，到1850年代的2600部，1901年的6044部，1913年的12379部，和1958年的22143部（Williams, 1965: 185,187,191 - 192）。

正如弗里茨纳所指出的，审稿人在英国出版商重组后的业务流程——这一模式后来输出到国外——中的位置，是在手稿作者和最终印刷成品的出版者之间扮演强有力的中介角色。“虽然读者、作者、出版商之间的关系模式不同，但审稿人在出版企业政策的形成方面有重要的权力，因为他们对稿件的录用、拒绝和修改提供建议。”（Fritschner, 1980: 93 - 94）作为一个例证，这种转变体现了从“私人”关系——一种模糊不清、彬彬有礼、对作者谦恭诚恳的出版方式（同时掩盖了一种向出版商利益倾斜的出版模式），向一种更加商业化的、利益驱动的结构转变，以应对印刷品以多种媒体形式出版的局面。

正是在这个阶段，文学代理出现了。已有几部著作详细探讨了19世纪末以来职业文学代理的崛起，包括詹姆斯·赫本（James Hepburn）篇幅短小的开拓性著作《作者的钱包与文学代理的崛起》（*The Author's Empty Purse and the Rise of the Literary Agent*）。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存在着非正式地代表作者利益的人。例如，有学者把约翰·福斯特描绘为“18世纪的保护人与20世纪的文学代理之间的桥梁”。1830年代至1860年代，福斯特是为查尔斯·狄更斯、坦尼森（Tennyson）、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等人充当中介和顾问的人之一。萨克雷（Thackeray）赞赏福斯特的谈判技巧，他写道：“无论我们中间谁遇到困境，都会去投奔他——他无所不知，而且总能创造奇迹。”（Hepburn, 1968: 26）其他为作者提供类似服务的人，包括1850年代至1870年代为乔治·埃利奥特（George Eliot）服务的乔治·亨利·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1880年代至1890年代为阿尔杰农·斯温伯恩（Algernon Swinburne）服务的西奥多·瓦特斯-丹顿（Theodore Watts-Dunton）。托马斯·阿斯品沃尔（Thomas Aspinwall）1827年至1854年任美国驻伦敦领事，这期间为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和历史学家威廉·希基（William Hickley）[《费迪

南德与伊莎贝拉》(*Ferdinand and Isabella*)和《墨西哥与秘鲁冲突史》(*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 and Peru*)的作者] 充当在大西洋两岸的代理 (Barnes and Barnes, 1984)。

到19世纪末,文学代理已经职业化了。在英国,有几个人在这一行里脱颖而出。首先是伯格(A.M.Burghes,一个狡诈的代理人,从1882年开始为其服务做广告,最后因欺骗顾客被告上法庭),以及更为可靠的苏格兰人亚历山大·波洛克·瓦特(Alexander Pollock Watt)。后者于1875年在伦敦开设了一家代理机构,但直到1881年才以文学代理的身份做商业广告。今天文学代理的雏形的形成要归功于瓦特,他为成功的代理活动设定了标准的代理费(10%),并为出版商和作者充当“侦察员”的角色,寻觅使双方都能获益的稿源。他的技能在于,认识到了文学代理作为著作权仲裁者与评估者的中介角色,并将其完善,或更准确地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在于“参与版权估价,实际上成为版权估价者”(Gillies, 1993: 22)。他的主要对手是詹姆斯·布兰德·平克(James Brand Pinker),后者于1896年1月开始其代理活动。瓦特以为成名作家,如瑞德·哈格德(Rider Haggard)、卢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和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鼓吹宣传而名噪一时,平克则集中精力为新涌现出来的作家铺路搭桥,尤其是那些与现代主义运动有关的作家,如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福特·迈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劳伦斯(D. H. Lawrence)、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韦尔斯(H. G. Wells)等。直到平克于1922年去世,他都是一个杰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权谈判者,一个极具耐心的人。对此,康拉德写道:“他以最大的体谅,不仅抚慰了我的情绪,也激发了我的想象。”(Hepburn, 1968:58)大西洋两岸的其他杰出代理,包括取得巨大成功的美国代理柯尔蒂斯·布朗(Curtis Brown),他1899年在伦敦开始其事业;以及文学代理行(Literary Agency),1899年由凯兹诺(C. F. Cazenove)和乔治·赫

伯特·伯利斯 (George Herbert Perris) 创办和经营 (Gomme, 1998)。

96 这些代理很快开始在普通的印刷媒体之外、令人眼花缭乱的新领域里，谈判作品的复制权。例如到1925年，代理们为一部书谈判超过26种不同版权的事并不少见，包括用于纸牌和烟盒上的图画的版权 (Joseph, 1925:92 - 93)。但是起初文学代理是受到出版商排斥的，他们对文学代理的评论，流露出对这些人在“交流圈”中所代表的权力的转变的担忧。这一时期对文学代理最刻毒的批评者之一，威廉·海涅曼 (William Heinemann)，对文学代理价值的评判充满讥讽：

我的理论是，一旦作者陷入了一个典型的代理的魔爪，他就不再具有尊严。他基本上接受了代理迫不及待地移植给他的骗子的道德观。这种病毒的毒性如此之大，出版商最好退避三舍，以免感染。(Whyte, 1928: 124)

然而到1917年，这一职业铺天盖地之时，文学代理已是出版流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作者越来越想从版权谈判的纷繁事务中摆脱出来。1894年伦敦的邮局黄页上只登记了6个代理，到1914年则有超过30个代理及其联合体在商业杂志上做文学代理服务广告。

在美国，对文学代理的看法通常更为正面——美国出版商喜欢说，这些代理是英国人的一项有益的发明，认为它们带来了“这个国家的作者与出版商之间极其友善的关系和商业上的智慧” (Sheehan, 1952: 74)。1880年代，各种代理机构纷纷创立，聚集于纽约，包括雅典娜神庙文学代理处 (Athenaeum Bureau of Literature)、纽约文学修改社 (New York Bureau of Literature Revision)、作家文学事务所 (Writer's Literary Bureau) 等。然而美国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代理是保罗·里维尔·雷诺兹 (Paul Revere Reynolds)，他在1891年至1916年间是这一领域的主宰。其他代理，有成就

卓著的弗洛拉·梅·霍莉 (Flora May Holly), 189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 她在纽约第五大道的办公室里, 为西奥多·德莱塞 (Theodore Dreiser)、格特鲁德·阿瑟顿 (Gertrude Atherton)、埃德娜·费博 (Edna Ferber)、诺埃尔·考沃德 (Noel Coward) 等名作家做代理; 在整个1930年代, 伊丽莎白·诺维尔 (Elizabeth Nowell) 作为马克西姆·列勃 (Maxim Lieber) 文学代理处的一员, 不知疲倦地为托马斯·伍尔夫 (Thomas Wolfe) 等作家服务。

随着出版在范围上更加国际化, 尤其是在第四章提到过的20世纪末跨国媒体集团出现后, 文学代理的角色在规模和重要性上都向前发展了。如今代理常常是供商业出版的文本材料最初的主要“过滤者”, 取代出版商和审稿人成为文学价值的最初判定者。(审稿人通常在出版公司外部通过合同聘用, 仍然在学术著作、期刊出版等特殊领域起作用。) 代理成为出版文化的重要中介者, 在其他媒体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运动、电影、电视、广播和其他娱乐界明星谈判合同、评估价值。这一扩展, 显示了印刷文化活动在其他传播网络的延续。

97

文学场域与网络

书史学家已经开始关注在出版和发行阶段之后, 文学网络在议定文本

价值方面的中介作用。正如简·汤普金斯 (Jane Tompkins) 所指出的：“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名声，确切地说对于读者所理解的它的性质来说，主导其传播的社会经济进程，并不比作品被阅读时的（诗性的、道义的、人类灵魂的）文化观念更不重要。” (Tompkins, 2001: 201) 布迪厄、彼得·麦克唐纳和简·汤普金斯以及其他学者，已经对法国、英国和北美及其他地区这种由相互联系的个人所组成的无形网络，以及他们如何影响文本的生产和接受做了探讨。这种影响，或是通过把作品引导给有兴趣的出版者（比如代理），或是通过评论和研讨对公众的观念加以塑造，或是通过在适当的社会文化圈子里对作品进行鼓吹。比如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从1840年代起得到新英格兰地区一帮彼此联系紧密的文化名人 [以“新英格兰知识分子”刘易斯·辛普森 (Lewis Simpson) 为代表] 非同寻常的帮助。这些人对于文学事务的评断，在诸如《基督徒审查者》 (*Christian Examiner*)、《北美评论》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Monthly*) 等重量级的文化刊物上传播，对于19世纪美国文学经典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受益于惠普尔 (E.P. Whipple) 等当时有影响的评论家的帮助，威廉·蒂克纳 (William Ticknor) [蒂克纳和菲尔兹 (Ticknor and Fields) 出版公司的合伙人] 在出版上的支持，以及编辑威廉·爱默生 [William Emerson, 《每月文选》 (*Monthly Anthology*) 编辑、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之父] 的建议，霍桑的职业生涯走向了巅峰。相反，霍桑的同时代人，老理查德·亨利·达纳 (Richard Henry Dana Sr)，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波士顿的文化精英们对这一运动不予支持）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在其散文、小说和诗文集遭遇频繁退稿以及这些精英的苛评之后，只好放弃其文学生涯。简·汤普金斯将霍桑文学声誉的崛起，与纽约的索菲亚·华纳 (Sophie Warner) 在文化重要性上的衰退做了对比，十分清楚地显示了这些文化精英群体的文化把关作用是如何改变作者的声誉和对文本的阅读的。在文化视野和文学市场中，这两位作家无论

是崛起还是消失，都是他们被阅读和生产的特定社会、文学和经济环境所导致的结果。

发行过程中的无形的仲裁者，也通过类似的把关方式起作用。最近贾妮丝·拉德威的著作，研究了在美国由月读俱乐部首创的极其强大和有影响的图书传播模式，阐明了这个1920年代建立的以邮购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机构，是如何采用全新的营销技术，为自己确立文学生产中介、仲裁者和过滤者的独特身份和角色的。月读俱乐部设立一个内部的“专家”委员会来审读作品，然后向俱乐部成员推荐和销售，它创造了一种文本价值的“过滤程序”，为目标受众选定适合的读物。正如拉德威所指出的，“月读俱乐部鉴别程序中的关键步骤，绝不是对图书价值的评判，而毋宁说是对图书的分类，是将图书按不同的层次分拣”。把印刷品视为“一系列间断的、离散的、不一致的领域”，拉德威继续道，就在生产者（作者）和消费者（读者）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借此传播者——在此例中是起源于美国的月读俱乐部——通过其内置的鉴定者的过滤对图书进行分类，而非对图书提供美学判断，与其说它成为了价值的仲裁者，不如说是成为了文本生产中的文学管理者（Radway, 1996: 24）。月读俱乐部在创造和强化一个中产阶级的“解释共同体”和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读者群，并与之建立联系的过程中所充当的角色，后来在其他媒体中亦有体现，例如以电视名人的“品牌形象”为中心的文学书籍俱乐部开始发展起来 [美国谈话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利（Oprah Winfrey）的月度图书推荐是最近的一个重要例子]。

小结

本章考察了印刷文化的流通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种参与者和代理人。它简短地回顾了19世纪的工业和技术进步对印刷和文本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影响，阐述了西欧的创新成果如何向其他国家输出，被其他国家接受和改造。本章也探讨了促进印刷品流通与消费的交流圈是如何把各种文化代理包括进去的，它们在书籍和印刷品宣传推广中的角色，如今成为了当代书史研究旨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持续探讨和研究在过去500年中，印刷品在塑造社会话语和民族认同方面所扮演重要角色的一部分。

第六章 读者与阅读

引言

本章讨论书史当中“被忽略的环节”——读者。虽然有了像阿尔提克和金兹伯格的著作这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最近拉德威和罗斯的著作又使这方面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充实，但“读者和阅读”作为交流圈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过去却不被重视（Altick, 1957; Ginzburg, 1980; Radway, 1997; Rose, 2001）。部分原因是缺乏既完整、又不带偏向性的经验证据。我们在这里所采取的认识方法，是既把阅读看成一种社会现象，例如夏蒂埃对具有阅读和书写双重属性的读写能力传播的研究；也把它看作一种个人经验，正如我们在金兹伯格对磨坊主麦诺奇奥的刻画中所看到的（Chartier, 1989b; Ginzburg, 1980）。罗斯和拉德威的更新的研究，则试图把社会和个人的视角融合起来：前者对工人自传、刊物和书信做了详细考察，写出了一部读者的历史；后者对读者群体——无论是爱情小说读者还是月读俱乐部的读者——进行了详尽的研究（Rose, 2001; Radway, 1984, 1997）。拉德威对特定女性读者群的讨论，为斯坦利·菲什所称的“解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ies）提供了经验上的证据，也是对伊瑟尔关于阅读与解释的性质的观点的发展（Radway, 1997; Fish, 1976; Iser, 1980）。在伊瑟尔那里，书史再次与文学理论交叠，试图用来解释个人的阅读行为。

这种解释，部分地反映了如今所有的发达社会普遍给予阅读行为和

100 阅读能力以很高的价值（在第二章里说过并非总是如此）。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说《朗读者》（*The Reader*），不仅在小说写作地德国取得了成功，而且其在欧美各国的译本都获得了广泛成功（Schlink, 1997）。该书反思了德国人，尤其是战后那一代德国人的历史责任，但是正如小说书名所显示的，这也是一个关于阅读的故事。两个主角中较年轻的一个，迈克尔（Michael），读书给较年长的不识字的情人汉娜（Hanna）听。听人朗读给了汉娜一种重要的好处，否则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仅仅是迈克尔建立在蒙昧的初恋和身体的性交之上的。这种好处重复了汉娜早前的经历，当时她在一个劳动营当看守，保护了一些女囚犯，这样她们就可以读书给她听。然而，不识字具有如此强烈的社会耻辱，以至于当她作为战犯被审判时，她承认写了一份纳粹党卫军



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读者——意大利的伊索塔·诺家罗拉（Isotta Nogarola）

的报告，而没有透露她既不能读也不能写。同样强烈的是，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阅读带给我们的那种解放的力量，那种自强和自我实现的感觉，以致当汉娜在狱中学会读书写字时，已经年长的迈克尔由衷地为她高兴。“不识字是一种依赖。通过获得勇气学会读写，汉娜从依赖走向了独立，向自由迈出了一步”（Schlink, 1997: 186）。

你刚刚读到的是我们对这部小说的“阅读”，在这里，“阅读”很清楚意味着解释。由于本章的背景，我们的解释强调阅读的功能性与其解放的作用。在一个不同的——可能文学批评色彩更重——背景下，我们对《朗读者》的阅读可能会强调罪恶的性质或小说中具体的历史环境。阅读自身是创造性的，从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中生成意义。文本的物质形式影响或引导了意义的形成，同时我们的个性也在上面留下印记。但是其他人也会像我们一样对《朗读者》创造同样的意义。事实上，托马斯·多切蒂（Thomas Docherty）已经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做了（Docherty, 2003）。我们并没有彼此共谋或抄袭。这是两个因素的结果：意义的范围被文本的实际文字所限制；我们都属于斯坦利·菲什所说的“解释共同体”，较少强调我们的个性，较多地强调我们作为各种大的群体的成员的身份（Fish, 1976）。作为一种个体实践，阅读是一种解释的形式。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阅读是接受史的一部分。

对你们多数人来说，读这本书，阅读行为本身似乎是自然的、无意识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写作是作为一种技术从口头语言中发展起来的，阅读也是一种为了使用写作技术而需要学习的技巧（Manguel, 1996; Monaghan, 1989）。个人的阅读行为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生物学家宣称在人类进化中，个体的发育重演着动物种群进化史——换言之，个人的发展重复了更大的群体的发展。对于阅读来说也同样如此。在很小的时候，大人们向我们大声朗读，在我们自己能够阅读之前我们就已经经历过阅读了。当我们大一些，我们在学校或家中学习符号和声音之间

的关系，我们学习按照一个特定的方向来读这些符号，可能还要借助于指尖来引导正确的阅读方向。开始时，我们听老师读，然后看着我们自己的书跟读；我们一起齐声朗读；但是，当我们开始读单个的文本时，连续大声朗读所导致的不和谐噪音迫使我们安静地在心里读。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可能会动动嘴唇，发出低低的声音，但这是教学法所反对的，因此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学会了不这么做，除非遇到特别难或不熟悉的文本。我们已经从大声朗读变为默读。你大概在安静地、在心里读本书上的文字吧。

获得熟练阅读的能力仍然比能够熟练地写作要早很多，但两者实际上是同时教给我们的。我们学习标点和段落，把它们作为彼此约定的、使得我们所阅读的东西的意义更清晰的手段。我们学习书籍的结构，包括把书分为不同的章节，以及书的索引，以此作为更有效地引导我们浏览书中内容的手段。所有这些传授给我们的东西，以及我们在早年的教育中为了拥有读写能力，特别是能具备一定程度的熟练阅读能力所吸收的东西，是许多个世纪发展的结果。

阅读的历史

开端

从人们在泥版、石块或木头上刻划符号，用至少是另一个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记录信息的那一刻起，阅读的历史就开始了。只要书写仍是对诸如数量、商品或所有权等简单信息的编码，阅读就仅仅是一种原始和工具性的解

码方式 (Fischer, 2003)。所有编码都意味着某种形式的理解上的限制, 阅读仍局限于一小群人, 这些需要或希望从永久性的记录中找回信息的人, 掌握了这些记号的意义。起初, 这群人包括抄写员和官僚, 在某些文化中这些人来自僧侣阶层。收税是记录、保存和核实这些数据的一种重要动机。读者仅想确认应缴的什一税份额, 同时作为作者记下其交税额。

随着所传递的信息越来越复杂, 在与书写的物质形式的关系中, 读者的角色并不是被动的。例如, 正如第二章中提到的, 早期的基督教读者在卷子 (roll) 和方册抄本 (codex) 中选择了后者, 导致后者最终取得了统治地位。羊皮纸方册能够让读者前后浏览, 对内容进行检索、比较和概括, 而省去了同时打开几个卷子的不便 (Cavallo, 1999)。因而, 它更适合于对一种新宗教——基督教——的奥义的掌握, 基督教来自于旧的犹太教, 并希望与之相区别, 而犹太教的经典是卷子形式的。(此前纸莎草卷子优于泥版、蜡版和树皮的唯一形式, 它们可以承载比税收文件或商业文书更长的文献)。进而, 由于水平较低的读者的需求, 导致了在单词、段落间加入空格, 以及作为进一步辅助手段的标点符号的使用 (Cavallo, 2003)。在基督教圣经的例子中, 它还最后导致了将各种书分为带序号的章节。的确, 在征税之后, 宗教成为阅读和识字发展过程中最有力的推动力量。例如, 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和正统犹太社区,



阅读仍然是阅读宗教著作的同义词。由于宗教文献以其超越时间和变化的固定性获得了权威性，尤其是在一神教的文化中，具备阅读这些文献的能力也就被视为获得了权力和影响——既包括宗教的，也包括世俗的。

公共场合的碑铭，如装饰陵墓、廊柱和木乃伊棺木的埃及象形文字，或在伊朗西部比索通（Bisitun）发现的6世纪大流士一世用三种文字镌刻的纪念碑上的铭文，或许代表着从读者面受到严格限制的密码，到面向更广大读者的转变（虽然它们也是为了取悦于神——神被认为是识字的，同时震慑愚民——他们被认为应当礼敬文字）（Fischer, 2003）。阅读最早的文献的方式可能是内省的，但是当更复杂的叙述被记录下来时，文本就被大声朗读出来，部分是出于诗人或吟游诗人诵读的先例，部分是为了让更多的受众听到，包括那些不识字的人。由于这种阅读方式，书籍的稀缺和昂贵的价格，并不一定会导致其中所包含的信息在同一时间内只能被那一个人知晓。罗马的富人让识字的奴隶读书给他们听。小普林尼公元1世纪在一封信里写道：“晚餐时，若我妻子或几个朋友在场，我会让人大声朗读一本书。”（Fischer, 2003: 45）后来的修道院生活，包括工作或吃饭时由一名修士向其他修士朗读图书的固定程序。相应地，阅读中的表演成分给予了修辞风格的写作以优先地位。在向听众大声朗读的意义上，口头和书面并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默读确实同时存在（公元前5世纪末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中存在这样的证据），但在古典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是特例，而非常态（Nagy, 2003）。它在4世纪仍是如此不寻常，以至于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看到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默读，都表示惊讶（Parkes, 1999; Manguel, 1996）。

从公众的阅读到个人的阅读的转变，也可以在私人藏书和图书馆藏书量的增长上看出来。后者对于使那些无力拥有书籍的人能够看到书，起了很关键的作用。然而，藏书的最初作用是保存而不是供阅览，阅览的功能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似乎主要是古典时代拥有最多卷子的博

物馆，其次才是学者们校对、编辑、纂辑、删节文献的研究中心（Canfora, 1989）。它并未提供很久以后图书馆才引以为特色的阅览服务。然而，它的确为了学者们的方便而对馆藏进行分类和整序。在书籍（卷子以及后来的方册）稀缺、昂贵的时代，图书馆可以成为战利品的仓库和炫耀富贵的展厅。西塞罗使用过福斯图斯·苏拉（Faustus Sulla）的私人图书馆，后者的父亲曾于公元前86年在雅典抢掠书籍；西塞罗自己的著作由他的“出版者”阿提库斯（Atticus）的奴隶抄写，可以肯定卖给了一些私人收藏者（同时以摘录的方式被无数学习修辞学的“读者”使用）。西塞罗对福斯图斯·苏拉图书馆的使用，显示了利用彼此的住宅开展研究的高雅读者的人际网络。西塞罗自己在位于福米亚（Formia）和塔斯库勒姆（Tusculum）的庄园拥有藏书，罗马的家中也藏有书（Harris, 1989）。他按拉丁语和希腊语给藏书分类，这一做法在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的“帕比里庄园”（Villa of the Papyri）（Fischer, 2003）也被发现。

自己拥有书籍的这一精英读者层，尽管从现存材料看是最为突出的，但仅仅代表了范围更广的阅读群体的一部分。这一群体还包括像教师这样的“职业”读者，以及功能性识字人群，他们无需（或无暇）对古典或当代文学作品感兴趣。在维诺兰达（Vinolanda）发现的信件，和庞贝古城的墙上涂鸦，使我们得承认存在一个比西塞罗及其交往圈子，以及帝国取代共和国后他们的后代远为广泛的识字群体——哪里有作者，哪里就有读者。早在公元前39年，古罗马的第一座公共图书馆就开门服务了，为识字的古罗马人提供了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著作的机会，提供了对这些著作，以及关于历史、文学和品位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论的机会，提供了聆听来自他们中间的当代作家的作品的机会。到公元2世纪，罗马有了7个这样的公共图书馆，成为了私人藏书地的替代机构（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很多著作在私人藏书和公共图书馆中存有多多个副本，使这些书在罗马丧失了西方的霸权之后能够留存下来。帝国自身也推广阅读，不仅通过对行政

人员提出要求，也通过在各地创造了一个贵族群体，他们渴望通过获得拉丁文教育来与罗马人比肩——如果不为他们自己，至少也是为了他们的孩子。在帝国首都、高卢和不列颠省，都有售书的书商，满足读者对阅读材料的需求。小普林尼曾得意地写道：“拉格都纳姆（Lugdunum）有书商我还真不知道，从你的信里知道我的书在那里找到了买主，就更令我高兴了。”（Fischer, 2003: 72）

104 对于古罗马人及其臣服者来说，学习阅读从认识大写罗马字母开始。根据个人的条件，这种学习可以在家中进行，也可以聘请家庭教师，或在公立学校里进行。学习的模式与上面提到的类似：先是学习单个字母的形状和名称，然后是音节，最后是整个单词。根据昆体良（Quintilian）的记载，学生们学习流畅地大声朗读，对培养得体的声调和举止，与理解复杂的文本同样重视（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因此，在这种阅读的修辞化取向中，某些形式的写作会被赋予优先地位就并不奇怪了：居于首位的是史诗，然后是其他种类的韵文，再往后是演讲和历史。学习阅读也意味着拿着用连续书写法（*scripta continua*）书写的整篇文字，在没有系统标点的帮助下区分出短语和句子。后来方册装的采用也带来了版式和标点的使用，减少了学习者的困难。这种教育成功地创造了散布于罗马帝国境内的阅读公众，这个群体虽小，但已足以使书籍的制作生产具有多样性。

中世纪

中世纪可以被看作是从这种古希腊罗马成就上的倒退，但也可以被视为阅读从作为一种表演，到作为一种内省的追求的实质性转变。在西欧，直到13世纪，基督教会把教授读写作为培训神职人员的一部分，只把这些技能和书面交流语——拉丁语——的知识，传达给世俗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

在这一时期，教会几乎垄断了书籍的生产，仅有的图书馆只存在于教会的建筑——教堂和修道院中，而且只向特定的人开放。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完全信任读者，有所谓“铁链图书馆”，据称书是被拴在阅览桌上的（Saenger, 1999）。从13世纪初开始，在教会图书馆里必须默读，以使每个人能够读书静思；大声朗读仍在餐厅和某些工作场所延续。教会开始为虔诚的教徒出书，尤其是祈祷书（Book of Hours），提供有关教堂日程和礼仪方面的信息。然而，许多祈祷书做得如此华丽，以至于它们既被当作年历，也被当作艺术品。在其他需要读写能力的地方——政府和其他民政管理机构，如法庭，教士被请去提供秘书和抄写服务。因为有了罗杰·夏蒂埃对于抗拒读写能力现象的研究，这一点很值得注意（Chartier, 1989b）。在第二章，我们已经提到了苏格拉底对于文字的怀疑，以及书写所带来的明显的失落感（Ong, 1982）。夏蒂埃所强调的，是中世纪的农民对于文字的恐惧，因为文字与权威、法律和宗教相联系，权威常常是专断而傲慢的，法律常常与农民作对，宗教常常与神异、诅咒和巫术难以区分。

13世纪初，欧洲的第一批大学创立和发展起来。教学的形式是教师（lecturer）（其词根是拉丁文 *lectura*，意为“阅读”）大声朗读一部文献，要求学生抄写或拥有一个副本。于是每个学生就开始建立他自己微不足道但却属于个人的藏书，正如第三章所提到的，这通常是通过抄写，或购买书中的某些章节，即 *pecia* 制度实现的（Hamesse, 1999）。这些书，或书的一部分，会被学生们在宿舍里静静地阅读，正如手抄本在图书馆中被使用一样。图书馆目录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以便更快地找到所需文献。到14世纪末，根据夏蒂埃的研究，“默读已经成为标准形式，至少对于那些具备写作能力的读者，以及那些历来就识文断字的社会群体”（Chartier, 1989b: 125）。图书馆与“请安静”之间，有很长的血统纽带。

许多从早期大学毕业的学生会成为律师。与城镇中崛起的商人阶层一

*拉丁文，“单篇”的意思。——译注

起，他们是市民社会，而非农村社会中，阅读范围不断扩大和世俗化的最突出的代表。贵族，一旦从军事义务和比拼武艺的达尔文选择（Darwinian selection）^{*}中解脱出来，也开始培养藏书和阅读的兴趣。贵族的妻子和女儿们则不仅读祈祷书和其他宗教著作，也开始读带有更明显世俗意味的书籍，比如家政管理指南。但是，读者总数相对来说仍然很少，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小。读者人数从公元后的最初两个世纪的罗马帝国时期占总人口的0.1%，上升到15世纪中期法国时的不到5%，法国据称是当时西欧最先进的国家（Chartier, 1995）。书籍仍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常常是遗嘱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学生们甚至可以用它们来抵押债务。

106 与古典时代相比，阅读教育仍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尽管重点转向了基督教文献，并由教会而非家庭来指导阅读：先教字母，后学音节，再学单词；短语和句子要从文章里抽出，用正确的发音、重音和节奏大声朗读。由于拉丁语不再是母语（如果说曾经作为母语，那也只是书面形式的），语法书引入了系统分析或语法分析，作为一种通过语法关系来找出句法关系的方法。今天拉丁语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法关系的学习来进行教学的，比如把名字词尾变化和动词变化作为理解文字含义的预备知识。识字的母亲开始在家里教子女们认字。在祈祷书中常常可以见到圣女玛丽亚的母亲圣安娜教她读书的插图。当成长中的商人阶级开始宣示他们在城市里的独立地位时，15世纪的城镇里除了教堂之外，开始出现公共学校。教堂和公共学校的课程都采用相同的三学科制（trivium）（修辞、语法和逻辑），既有男学生，也有女学生。但一般只有男生可以升入大学学习四学科（quadrivium）（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小的学生只有14岁。书里包含了评注，新的读者往往在手抄本的页边上再加上他们自己的评论，创造了一种互动形式，不仅与文本（及其假定的作者和已知的评注者）互动，也和这个手抄本后来的读者互动。即使进入到印刷时代之后，连续书写仍然是书籍的标准形式。然而，用

^{*} 即达尔文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学说。——译注

红色标示出文字的起始，以及对首字母的装饰，手抄本对断句符号的逐渐引入，都清楚地显示了一种转变，即从为口头表演作标记，到使得对文本安静的内省的解释更为明晰（Saenger, 1999）。

印刷书

在第三章中讨论过的印刷的发明，引发并加速了阅读的传播。但这不是唯一的因素。加速的经济繁荣——部分原因是新大陆的发现所带来的资源开发和殖民浪潮；古典文献的重新发现和被称作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成长；由宗教改革运动和反改革运动所引起的教会分裂；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创造新的、独特的国家认同的愿望——如同对美洲、亚洲和非洲进行自然探险一样，开始对日常生活进行科学探索——这一切都促成了阅读的传播。开始，印刷更多地是使同样的东西更快、更便宜地生产出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使书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以便利读者。在原来的手写体之外，出现了新字体。威尼斯的阿尔都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推出了尺寸更小、更易携带的书籍，不再需要演讲台或阅读架的支撑，不再令读者握持书籍的双手酸痛（Lowry, 1979）。虽然宗教和法律方面的需求仍居于主导地位，但书籍的题材范围已开始迅速扩展。

读者在数量和性质上的相应扩展，加剧了对已有权威——政府和教会——的怀疑。如果书籍能印出多个副本，不同见解便更易盛行和传播。于是出台了规定，不仅为了控制那些正在印刷的东西，也是为了把那些能够买书、读书的人限定在社会的某些群体里，这些人从颠覆政府和教会中得到的好处最少。给印刷厂颁发执照是控制出版最直接的方式，同时对那些违犯法律的人给予严厉制裁。限制读者群的手段有，对用各国语言出版的读物颁布禁令，亦即出版物仅限使用有文化的人和教士们的语言，主要

是拉丁语；以及对纸、印刷和出版物征税，以确保只有富裕阶层能够买得起书。这种形式的间接审查在许多国家一直持续到20世纪。这些当权者的顾虑无疑是有道理的。世俗读者开始怀疑教条，重新发现基督教产生之前的文献，接受人文主义的观点，这样就把读者从权威中解放出来，使一种新的个性的感觉清晰起来。

第三章讨论过的人文主义的成长，不仅包括了哲学、宗教、法学和历史方面的新观点，也包括了古诗——奥维德和卡图卢斯——和当代诗歌——但丁和彼特拉克。读者们从中搜寻着对想象、情感和智力的启迪。这些书原先是硕大的对开本，现在缩小了尺寸，便于携带和借阅。然而，大开本印刷书的一个好处是能够更方便地加入页边注和行间注。在现存的这类例子中，批注常常出自不同的读者，这又一次说明了一种互动的阅读形式，读者以添加注解、问题和反驳的方式与作者（有时是其他读者）展开不断的对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阅读是一种允许存在不确定性和差异性的解释，而不是对权威的接受（和赞同）。意义可以是源于文本的读者的创造，而不仅仅是由文本自身所限定的。但是，伴随着这种观点的——可能这是自相矛盾的，是越来越坚持文本的准确性，以及需要对这种准确性给予某种形式的认可。印刷似乎能够保证这一点。随着文本，以及关于文本的增加，对记录所有已出版书籍的目录的需求也增加了。读者需要借助于这些早期的“搜索引擎”，为他们在眼花缭乱的出版物中引路。

拉丁语开始慢慢地让位于各国本国语，但丁和彼特拉克的例子体现了这一点。但丁提出本国语优于拉丁语，因为亚当在伊甸园里说的一定是本国语，理由是本国语是通过感官来学习的，而不像上面提到的那样学习拉丁语需要系统分析；也因为本国语的使用是普遍的，而使用拉丁语的人数是有限的。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1491年去世前，在他所出版的总共大约90部书中，有74部是用英语印的（Feather, 1988）。宗教改革期间，拥护本国语的运动加速发展，常常导致书籍之间的战争。宗教改革的原则之一，一方面是俗

众与上帝之间无障碍的联系，另一方面是俗众和上帝的文字——《圣经》之间无障碍的联系。宗教改革者通过提高识字率，使以本国语出版的《圣经》和其他宗教书籍更易于为读者所得，确保这种与上帝的直接联系。路德知道印刷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的重要性，这是此前像威克利夫（Wycliffe）和胡斯（Hus）这样的改革者所不了解的。日内瓦的加尔文和苏格兰的诺克斯（Knox），则建立了教授阅读宗教书籍所需阅读技巧的学校（Gilmont, 1999）。

一旦学得，这些技巧就不可能被仅仅局限于阅读宗教题材的书籍，而单个家庭拥有藏书，就成为发生宗教改革的那些北欧国家的显著特征。而且，所有的书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圣经》所获得的尊重；在一种近似柏拉图式的关系中，一般意义的读书获得了一种源自《圣经》阅读的较高地位。反宗教改革运动（Counter-Reformation）为了应对正在发生的宗教和社会变革，不得不在从书籍印刷中挖掘大众传播的潜力，与步改革者的后尘消弭教士阶层与俗众的鸿沟之间做出艰难选择。这样做的结果，是许多圣人传记（Lives of the Saints）、关于基督教本质的通俗解说、宗教问答集的出版，以强化自彼得以来传承有序的罗马天主教会的独特教条。这些书也用各国语言出版，阅读这些书同样需要掌握足够的技巧。书籍的战争可能已经爆发，但它更为平和的一面，则是读者数量的增长，可以得到的出版物、包括世俗读物数量上的增长，对用各国语言写作的书籍的读的增长，以及阅读地位的增长（Manguel, 1996）。

做出上述断言就要冒在某些方面有所夸大的风险：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在城市里发生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中上层阶级，即资产阶级和贵族。麦诺齐奥（Menocchio）是这一时期经常被引用的案例之一，他是一个1532年至1600年间生活在威尼斯北部山区，生活比较富裕的磨坊主（Ginzburg, 1980）。他的阅读记录之所以保存下来，是因为他在1583年和1599年作为异端成为审判的对象，并在第二次审判后被送上了火刑柱。审判记录显示，他有一颗活跃而好奇的心，导致了他与邻居之间的争执和辩

论，尤其是关于《圣经》。他自己拥有一部非法的本国语《圣经》译本，以及其他11部宗教和世俗著作，包括《十日谈》(Decameron)，虽然其中有些可能是借的。他对能够读书（以及了解这些书）感到非常自豪，并把这种能力归功于教士的传授。他把书中的知识和自己的乡村体验糅合起来，构建了他自己对于宗教及信仰的观点。阿维拉的圣特雷莎(St. Theresa of Avila)的例子也值得一提，虽然她来自资产阶级家庭，容易得到书籍，但她幼时所受教育有限，使她的阅读范围仅限于圣贤传记和骑士传奇，都是用卡斯提尔语(Castilian)写的。后来，她发现不掌握拉丁文是个缺陷，尤其是教会禁止将《圣经》译为卡斯提尔语后，《圣经》的大门对她关闭了。她所知道的《圣经》的片段，要么来自对他人布道词的记诵，要么是用心记住反宗教改革运动所允许的出版物的内容。其他比圣特雷莎更缺乏阅读能力的人，就要依赖配有解释性插图的浅显文字了(Manguel, 1996)。

有些人对阅读范围的扩大和阅读性质的扩展更为担心：从声称阅读本身——而不是照明条件——会导致失明，到相信读多了骑士传奇等小说会导致疯癫，就像堂吉诃德那样。关于阅读能力的证据，比关于书籍本身及其发行的信息更难核实(Chartier, 1989b)。在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第二部中，反叛的杰克·凯德(Jack Cade)代表了被排斥在阅读圈子之外的社会阶层试图逆转古腾堡所引发的潮流的落伍观点：“你们在王国建立语法学校，大逆不道地毒害年轻人。在这之前，我们的祖先只使用刻划符号，你们却让印刷大行其道。”另一方面，阿尔都斯·马努提乌斯通常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修昔底德的希腊文著作，维吉尔、贺瑞斯(Horace)和奥维德的拉丁文著作印上1000部(Lowry, 1979)。另外，他还出版了字典和语法书，以便为他的书培养新的读者。自1501年4月后的5年时间里，每隔两个月他都会发布便于携带的新版本。他的事业获利颇丰，显示他的书在整个西欧都能找到买主。这些买主把书看成宝贵的商品，不是因为其经济价值——由于印刷的出现书已经贬值了，而是作为通过知识来增长个人智慧和获得共同进步的源泉。

阅读的局限

显然书籍仍然是有经济价值的物品，尤其是对16世纪像杰克·凯德那样的人来说。一部没有装订的《哈姆雷特》要价6便士，而一个技工、皮匠、木匠或小店主平均每天可以赚到16便士，因此买一部这样的书会花掉他一天收入的约八分之三（Altick, 1957）。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他可以用同样的钱吃两顿晚餐，或者到全球剧院（the Globe Theatre）去买站票看6场戏。这样书籍的拥有者就局限于那些富裕人士或热衷学习的人。下面的表格来自阿尔提克的著作，显示17世纪末某些商品的比较价格：

110

表 6.1 17 世纪末价格与收入比较

书 籍	一般商品	1688 年的平均收入
对开本：7-10 先令	黄油：每磅 6 便士	牧师：每周约一镑
八开本：1-4 先令 (未装订)	咖啡：每磅 3 先令	农夫：每周 16 先令 4 便士
未装订的剧本： 1 先令	糖：每磅 6 便士	小店主：每周 17 先令 4 便士
布道小册子：6 便士	加那利葡萄酒 (Canary wine)： 每加仑 7 先令	工匠或手艺人：每周 14 先令 7 便士
戏院廉价票：12 或 18 便士		

资料来源：摘自 Altick (1957)

注：1 先令 = 12 便士



《禁书目录》

换言之，价格仍然是书籍广为流通的限制因素，因此也成为审查制度最有效的手段。法国在1563年颁布法令，书籍出版前需向国王申请出版特许，英格兰自1538年起需事先征得枢密院（Privy Council）的同意，这些都成为精明的印刷商和出版商需要逾越的障碍。罗马天主教廷在1559年出版了第一部《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起初该禁令在南欧的天主教国家收到了效果，但在北欧的新教国家却始料未及地起到了刺激这些书籍出版的作用，禁书从这些国家偷运至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书籍用本国语言出版，语言的限制作用正在消退。例如，1625年，伦敦的书业公会舍弃了拉丁文库存图书。只有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因为要与国际同行交流，继续用拉丁文写作（Feather, 1988）。另一方面，虽然盗版广泛存在，书籍的价格仍然对知识和思想的获取构成限制，直到19世纪，在印刷生产工业化和商业与公共图书馆集团采购发展的双重作用下，情况才得以改善。直到那时，阅读以及读什么，却反映了资产阶级地位和财富的增长。此外，出版商们很快意识到这个阶级的女性读者的消费能力和影响，并在出版物中反映了她们的趣味和喜好。

畅销书的发展

17世纪末和18世纪，读者数量进一步增长，不断出现新的出版物形式以适应读者的需求和口味。在法国的特鲁瓦（Troyes），连续几个朝代的印刷商和图书销售商推出的“蓝皮书库”（Bibliothèque bleue）促进了大众阅读（Chartier, 1987）。这套丛书得名于其蓝色封面，是专为大众读者设计的。它们用廉价纸印刷；短小精悍；通常是大部头作品的缩写；文字经过删减或改动，以使之简单易读或便于应付审查；内容包括骑士故事（曾经影响了堂吉诃德的那种）、爱情小说、神话故事、生活指南、礼仪手册、宗教著作和年历，由小贩兜售，通过无数网点发行；价格相对便宜。这套丛书获得了巨大成功，卖了数万册。这预示了18世纪小说的成功。

111

小说这类书籍的出现，据说要归功于资产阶级的崛起。从《堂吉诃德》到《鲁滨逊漂流记》（1719），小说风靡了整个欧洲和北美。其流行程度的一个指征，是此起彼伏的各种抱怨，或是责难如此之多的小说会使人堕落——即使今天我们仍能听到这种附和柏拉图的声音，或是担心因为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浪费时间。在一盏油灯所提供的更好照明条件下，在床上看书，如今变得更为普遍，但却遭到猛烈的抨击。阅读已经成为绝对个人化和内省的事情。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帕梅拉》（*Pamela*）（1740）主要吸引了女性读者，不仅是因为它细腻地描写了能引起她们共鸣的家庭生活，也似乎因为书中对女主人公帕梅拉有着深刻的洞察。它结合了当代肥皂剧的叙事悬念和礼拜日布道的道德说教。换言之，它既大胆，又安全。读

者为之迷醉。阅读小说的狂热持续下来：1803年德国出版了276部新小说（Wittmann, 1999）。这种类型的书籍直到今天仍占据主导地位。

如果说小说越来越占据人们的空余时间，通过净化情感为人们提供了自我完善的动力，那么日渐增多的百科全书和其他专业手册，则是通过提供知识来为人们提供自我完善的动力。1728年钱伯斯（Chambers）的《百科全书》（*Cyclopaedia*），直接导致了1751—1772年狄德罗更为著名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的出现（Darnton, 1982a）。人们阅读这些书籍，进行自我教育，了解周围的世界；阅读能够满足在正规的教育机构中无法得到满足的对知识的渴求。在追求知识的理性方法的传播中，暗含着对既有权威的挑战，这就是启蒙运动；再加上更直截了当的抨击批判，催生了一种质疑权威的风气，导致了美国和法国革命，正如第三章所论述的。然而，罗伯特·达恩顿对



兜售蓝皮书的小贩

瑞士纳沙泰尔印刷学会（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atel, 简称STN）档案的研究，凸显了另一种书籍——色情文学——的重要性。在一份样本中，图书销售商订购的457种书籍有21%是色情读物（Darnton, 1982b）。一方面这可以被视为对道德权威的挑战，可以和对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的挑战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可以理解

为 STN 随时准备满足读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这是存在书籍大众交易和地下交易的迹象。藏书家——主要成分是律师和医生——建立起规模庞大的私人图书馆，与此同时图书销售商数量激增，以满足这些藏书家以及其他远为庞大而稳定的资产阶级读者群的需要。达恩顿引起人们对法国商人让·兰森 (Jean Ranson) 的关注，他既从 STN，也从拉罗谢尔 (La Rochelle) 当地的书商那里买书。兰森 1775 年至 1785 年间从瑞士订购了 59 种书，他买了《百科全书》、卢梭的著作，以及宗教和教育书籍。他的同时代人因贝特·科洛姆 (Imbert-Colomés)，里昂的一名丝绸制造商，积累了 1 万部书。

在整个 18 世纪，阅读的性质从“精读”变为“泛读” (Engelsing, 1974)。这不是一场“阅读革命”，而是主导形式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的缓慢过渡 (Wittmann, 1999)。直到 17 世纪下半叶之前，读者典型的做法，是对《圣经》或约翰·班扬 (John Bunyan) 的《天路历程》 (*The Pilgrim's Progress*) (1678 - 1684) 等少量书籍读了又读，把书背下来或记住一部分内容，然后加以思考和讨论。在那之后，读者尽其所能广为涉猎，种类庞杂，如饥似渴，而出版商们，如特鲁瓦的乌铎 (Oudot) 家族，则出版了一大批相对便宜的读物来满足他们的胃口 (Chartier, 1987)。人们不仅读得更多，同时也有更多的人成为读者。从签名的能力来看，识字率在乡村和城镇都在上升 (Chartier, 1989b)。于是对教育材料、尤其是初级读物的需求增长了，这些书籍开始取代宗教著作成为出版商书单上的主角。瑞典路德教会 (Lutheran Church) 从 1686 年开始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来提高识字率：鼓励乡村妇女教她们的孩子读书写字；禁止不识字的人参加圣餐和婚礼。这个策略成功地把具备阅读能力的比例提高到 80%，但能写字的人数量要少得多。

工业化的阅读

19世纪的巨变，尤其是为了满足技术复杂的制造业的需要而带来的人口
的城市化，产生了对具有更高文化水平的劳动力的需求，而这只能通过
政府投资于针对底层阶级的公立义务教育才能得到满足。书籍生产的工业
化——更多、更便宜的书，在生产者和消费者——更多、更穷的人——之间
113 建立了一种良性循环。阅读可能是工业化社会里必要的生存技能，但它
的应用远远超出了阅读使用手册和订货单的需要。当时在很多国家，各种限
制——尤其是经济负担上的限制——从印刷品身上解除，随着价格的下降，
各种各样的读物纷纷涌现。如果买书还不太可能或有点困难，那么可以从会
员图书馆（subscription libraries）或俱乐部以较低的费用借阅。随着铁路网
的延伸，阅读成了一种更好的打发旅途时光的方式，出现了车站书店以迎合
这种新的需要。史密斯1848年在伦敦的尤斯顿（Euston）车站开设了第一家
办刊亭。（法国阿谢特的例子已经在第五章讨论过。）油气灯的发明改善了照
明。闲暇时间——开始时只有星期天的下午——虽然增长缓慢，但肯定是在
增长。大声朗读在家庭阅读和文学沙龙等场合复兴，作为如今占压倒地位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阅读的补充。狄更斯在英国和美国公开朗读自己的作品，吸
引了大量听众，因为他的书有大量读者。

到该世纪末，西欧和北欧国家的识字率已经达到总人口的大约90%
（Monaghan, 1989; Fischer, 2003）。城乡之间的差距在缩小，男女差别也
是如此。女性作为一个独特阅读市场的存在，可以在为女性口味和需求而

设计的出版物类型中更清楚地看到。各种类型的小说成为受欢迎的图书形式——从文学作品到一次性读物，从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到水牛比尔（Buffalo Bill）的探险。有些小说家，如斯科特和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其作品的众多译本为他们赢得了海外读者和国际声誉。书籍是一种大众传媒。然而，它们会和其他印刷品——报纸和杂志——竞争读者。当期刊连载作品以书籍的形式重印时，共谋取代了竞争，比如狄更斯和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但是报纸和杂志在信息量方面具有竞争力，并且从19世纪末开始娱乐性大为增强。报纸和杂志的多样性，使得它们能够用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瞄准特定的读者群，同时它们越来越娴熟地使用插图，在大众市场具有优势（West, 1985）。

19世纪的出版商注意到父母的可支配收入在增长，以及学校和主日学校的奖金所带来的购买力，开始把儿童视为一个独特的市场。从1870年开始，初等义务教育在西欧各国成为标准。对教育资料的需求增长了，为居家儿童设计的其他形式读物的商机也在增加。在这一市场，图书生产商能够竞争过杂志，因为家长们偏爱图书——更有价值、内容更充实，而认为杂志较轻佻、易变（Hunt, 2001）。儿童是否更喜爱书中普遍出现的更具说教性的内容，仍然不得而知，因为名流俊彦们重塑自己童年的回忆可能是靠不住的。只有凡尔纳等少数几个作家具有逃脱教育枷锁的想象的力量。

114

公共借阅图书馆尤其清楚，它们的儿童阅览区应该只为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保留。在英国，多数这类图书馆是1850年后建立的，当时征收了一种特别税（地方税）专门用于其建设。在我们写作本书的爱丁堡，这导致了一所规模巨大的中央图书馆的建立，该馆拥有丰富的参考书和非小说馆藏。在这个相对紧凑的城市里还有6个社区图书馆。公共财政投入得到了个人赞助的补充：在爱丁堡，纳尔逊出版公司（Nelsons）和钢铁大王卡内基（Carnegie）提供了赞助（他在英美两国都资助了图书馆的建立）。这些图书馆重点收藏非小说书籍，主要是希望不要将公共资金用于小说这样琐屑而可能有害的读

物上，同时也因为小说是会员图书馆或私人图书馆收藏的主要书籍（Rose, 2001）。它们并非没有行使权力不去购买一部可能引人犯错的书，事实上它们与在那些渴望取悦于重要的大宗买家的出版商的关系中，已经参与了出版事前审查。然而，在英国和德国的工人阶级中有很强的自学传统，使得他们的需求能够与公共图书馆想要提供的书籍相匹配。自传和日记等其他现存证据，显示了要学习、要获得知识和理解力的决心的力量。马克西姆·高尔基讽刺性地把他的自传命名为《我的大学》（1923），因为他在很长的时间里换了许多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试图完成自己制定的阅读计划。克罗宁（A. J. Cronin）《群星俯瞰》（*The Stars Look Down*）（1935）里的主角在矿井工作的时候如饥似渴地读书，直到他获得大学奖学金得以逃离矿坑。小说中他读书时的情景——疲惫不堪、光线昏暗、没有隐私，描写得格外真实。

阅读的性质

20世纪初，电影、广播、电视等新媒体出现，加入到印刷品的竞争者中来，不仅标志着竞争愈演愈烈，也标志着对书籍已经丧失大众传媒主导地位的确认，而阅读则一如既往地重要。即使是早期的无声电影，也依靠观众的阅读能力来填补叙事之间的空白，或解释其中的复杂情节。当代电视，至

少是在播新闻时，有时会在图像和声音之外辅以两三行静态或滚动的字幕。换言之，在整个20世纪，读写能力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所阅读的内容的性质。如果用参与其中的读者数量来衡量的话，雷克拉姆（Reclam）或企鹅等平装本丛书的增长和哈利·波特系列等某些畅销书的成功，并不能掩盖读书作为一种活动整体上的衰落（McCleery, 2002）。在发达国家，更少的人在读更多的书。可能我们应该问他们在怎样读。

若就文本权威的丧失来看，阅读行为可能会显得更为无政府主义。以读者为诠释者的极端观点会认为，读者可以从一个文本中没有边界或限制地创造出他或她喜欢的任何东西。一个更为温和的观点会说，阅读不是一种被动的行为，读者不会用单一的意义对文本进行解码。对于人类最初的记录符号可能只存在单一的解读，对于杰克·凯德的刻痕和符号在今天的对应物可能也是这样，但这并不是我们所读到的大多数东西的特征。过去，教会和政府（以及作者）可能曾试图将某种特定的意义强加于一个文本，但是文本和读者拒绝服从。沃尔夫冈·伊瑟尔认为，意义来自于文本与读者的互动（Iser, 1980）。为了创造意义，文本提供了文字，一套语言单元，而读者则带来了一套个体的经验，这些经验各自和联合影响了赋予那些单位的语义价值。这样，就没有特定的“正确的”意义，尽管可能的意义的范围被文本、被组成它的文字的确定的特性所局限。杰罗姆·麦克盖恩在这个当口会加上：读者解释的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个物质对象——书籍；文本的文字会使用一种特别的字体和字号，用一种特别的纸印刷，存在于一本特别的书中，在特别的封面和封底之间；实体书籍的这些特殊性也影响和限制了可能的意义的范围（McGann, 1991）。

那么在我们想象中的关于阅读的圆桌会议上，斯坦利·菲什可能会强调这个范围被读者个人的价值观、经验和文化背景所限制（Fish, 1976）。他会接着说，这些东西并没有我们有时所刻意认为的那么特别。一个文本有这样多的读者，并不一定会导致各不相同的意义，因为我们所共有的价

116 价值观、经验和文化背景限制了这个范围。正如本章开头施林克的小说的例子，相同的意义显示我们是“解释共同体”——我们与之分享价值观、经验和文化背景的、由其他人组成的广泛群体——的成员。不管是奥普拉的虚拟群体，还是在家中、书店、图书馆聚会的真实组织，成为书籍组织成员的积极要素之一，是一种团结一致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仅来自于一种共同的行为，读一本相同的书，也来自于成为“解释共同体”中的一员，在这个共同体中成员们对一本书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观点（Hartley, 2001）。从贾妮斯·拉德威对浪漫小说读者的访谈来看，很明显那里有一种类似的团结一致感（Radway, 1984）。这是阅读作为个人的诠释行为，与它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活动，交叉和融合的地方。

小结

你已经完成了本章的阅读。带着或多或少的熟练程度，你已经使用了一种技能，这种技能无论是从你作为个人的特性，还是你在社会中有效发挥作用的能力来看，都是很基本的。这是一种不可避免地与书写技术相联系的技能，但其发展速度一般要超过后者，所以“读写能力”（literacy）首先指的是阅读，然后才是书写。然而，由于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是书写或印刷的文本，

阅读史的重建面临可获得的证据在数量和性质方面的困难。书籍史试图整合对个人阅读行为的理解和社会接受史的理解，前者是指在这一刻你如何从这些我们写下来的，出版商选择用这种形式呈现的用墨印成的符号中创造意义；后者是指你为什么买或借这本书，你是谁，你在何时何地读它，这些情况常常和其他读者的情况汇集到一起，以创造出一幅阅读的社会剪影。书籍史既研究个体的阅读情况，也利用范围更广的统计资料，以及书籍，来创造阅读的历史，从最早的对贸易和行政信息的解读，到广泛的常常是折中性*的当代阅读。这样一种历史，对于过去许多书史研究中典型的对书籍生产的强调，提供了一种必要的纠正；它加强了这一领域的人性化，比如让我们反思我们自己作为读者的体验。

117

* 这里指受到评论家和媒体的影响而具有选择性。——译注

第七章 书籍的未来

引言

本章的论述至少源自两个因素：自 20 世纪初以来不断出现的关于书籍行将消亡的论调，以及同样顽固但可能过于天真的由过去昭示未来的历史观。对于前者，像韦尔斯（Wells）在《当沉睡者醒来》（*When The Sleeper Awakes*）（1899）一书中所描述的，科幻作家们设想了一个未来，书籍被其他视听信息存储和娱乐形式所取代。对于后者，过去传播技术的两次革命——在第二章、第三章所讨论的从口头到书写技术的转变和从手抄本到印本的转变，强化了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革命的感觉，即从印刷品转变为结合文本、图像和口语材料的数字媒体。但是书籍仍然是一种传播信息和影响大众的力量：每一场重大的政治选举都刺激了书籍的出版，以扩大候选人的影响，宣传候选人政纲背后的理念；少数民族群，如很多耽于阴谋论者，从相信失落的亚特兰蒂斯（Atlantis）的人，到执著于圣杯（Holy Grail）的人，出版了论证缜密的书籍来阐述他们的观点；那些怀着原教旨主义宗教信仰的人经常检查学校的课本，看看有无在道德或科学上违背他们的信仰之处。后面这种情况还应当提醒我们，书籍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仍然是教育的基本工具，或许还不止于此。证据显示，与书籍必然消亡的断言相反，无论是从种数上还是印数上，书籍都越来越多地被生产出来。但至少在发达国家，许多消费者正在选择其他的替代方式，无论是为了查找信息还是为了娱乐。在这些国家，

更少的读者在阅读和购买更多的书，这种大量阅读行为中的大部分，可能来自某些特定群体，如小孩和妇女。但是还有一种担心，这种阅读的性质可能会强化全球文化同质化的发展。我们可以在全球层面上分析书籍的出版与发行，并分析在特定文化中对这种全球性商品的接受情况。

118 在书史中对两者的考察都有很有价值的先例，同时，确实也有事例证明生产的一致性并不意味着接受的一致性。本章将考察近来和当下与书籍有关的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技术、产业结构、读者和国家的角色，以找到塑造书籍未来的那些催生变化的驱动力和发展的方向。

技术决定论

书籍是一种过时媒体的观点，源自于对技术更新速度的偏执，以及由此带来的急于引进新的、更新的信息储存、检索和传播形式。尤其是从激光影碟到 CD-Rom 到万维网 (World Wide Web)，印刷文字在一系列工具性功能、而非文化功能方面，受到了一系列数字媒体的挑战。它保留了一个优势，即它赖以成立的技术——读写能力——是无处不在的，在那些无力发展新媒体的发展中国家中分布广泛。而每一种新媒体，都要求人们能够使用那些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已经普及的技术，或者像那些激光影碟一样，正在过时或面临一个“会不会过时”的问题。在快速搜寻和检索各种信息的能力，

以及数字媒体整合静态或动态的文字、声音和图像的能力方面，印刷文字甘拜下风。印刷文字中包括了多种语言（和字母），而网络信息及其获取主要使用英语（和罗马字母），需要所有用户都能读懂英语，甚至越来越要求用户理解某个特定子集的英语，比如在发送短信息时。

保罗·杜吉德引进了与这个论题相关的两个概念：取代和解放（Duguid, 1996）。第一个概念体现了新技术取代和抹掉旧技术的观点。对于书籍来说，就是数字媒体使之消亡或正在慢慢使其窒息。书籍的历史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个问题。20世纪初，当时还是新生事物的模拟技术媒体——广播、电影和其后的电视，也曾挑战并最终颠覆了书籍和印刷品作为传播和信息事实上的垄断媒体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书籍并未消亡：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出版商开发出了平装书等新的流行形式；他们扩大了销售网点的分布范围；他们还从与模拟技术媒体生产者的共生关系中获益，既为广播、电影和电视提供了来源素材，也通过出版关于广播连续剧、电影或与电视节目的书籍利用了新媒体在大众中的普及。这种关系以及知识产权方面的交易，在第四章已有描述，从最好的方面说，它确实带来了新的繁荣，在最坏的情况下，至少也成为许多出版商的生存手段。

杜吉德强调，取代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本身把彻底摒弃过去作为一个原则，并作为突出和标榜新媒体的一种手段——“新”，就意味着创

119

新、激动人心、革命性和必然。换言之，书籍成了20世纪的模式或时尚，在一个消费主义的社会我们不得不为了“新”而舍弃它。相反的倾向也需要提到，例如斯温·伯克茨（Sven Birkerts）的书中所写的：通过对印刷文化、阅读和教育的田园诗式的呈现，把过去理想化（Birkerts, 1996）。对书籍的捍卫常常出于像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所关注的是保留某些图书和某些阅读形式，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似乎体现着一种过去的文化，其清晰的价值观与当代的混乱状态形成了对照（Bloom, 1996, 2001）。在这里，“文化”这一术语的使用很关键：它所关

注的并非百科全书、菜谱、实用指南，或那些只具有纯粹信息价值的东西，它来自一种给予文学、传记、学问——尤其是人文学科，以及任何具有潜在文化价值的东西的特权地位。这一方面是想要保存具有永恒重要性的东西，而不是只具有短暂实用性的东西；一方面是一种复古的怀旧的形式。正因为如此，很清楚那些“革命者”，即鼓吹新媒体全盘胜利的人，与这些书籍的捍卫者，从两方面都给出了极端主义和简单化的观点。而实际上，这只是同一个复杂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已。

关于新媒体的“革命”的观念，常常是从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解放了信息的意义上说的，即信息不再受到书籍的控制和局限。杜吉德的第二个概念——“解放”，是以这一观点为基础的，即数字技术，尤其是万维网，赋予了所有人以力量，使所有人都能够成为作者，所有人的作品都能得到广泛的阅读和欣赏。电脑不仅取代了打字机，也取代了出版商和图书销售商。解放并没有带来“作者之死”，而是把作者变成了他或她自己的出版者。解放还可以意味着知识产权法律束缚的松弛，意味着不仅可以获得材料，而且也获得了表面上的许可，以制作不同的版本。杰伊·大卫·博尔特 (Jay David Bolter) 主张书籍命定要边缘化，他写道：“电脑正在重组我们目前的写作经济。它正在改变写作的文化地位以及书籍生产的方式。它正在改变作者之于文本的关系，以及作者、文本之于读者的关系。” (Bolter, 1991: 3) 在持解放论的革命者们看来，数字技术就像是当代文化的罗宾汉，允许对富有信息和权力的人进行偷窃，以使平民大众受益。所有的信息都向所有的消费者开放。

120 这个观点的一个版本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传真机和复印机导致了冷战的终结，Internet 和 e-mail 则有力量改变像中国这样的社会 (Wirtén, 2003)。然而，这种观点看似有理，但它确实低估了对信息进行某种确认的必要，这在过去实际上是由出版许可制度来实现的。它可能也否认了书籍在塑造和支持社会共同体中的重要性，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到贾妮斯·拉德威的浪漫小说读者的“解释共同体” (Anderson,

1983; Radway, 1984)。从网络获取信息，可能反而加强了个人的孤立、分解，而不是形成“虚拟共同体”。这与麦克卢汉“地球村”的愿景相反，诚然那更多地是建立在1960年代中期电视——而非数字技术和 Internet——的影响的基础之上的 (McLuhan, 1962, 1964)。麦克卢汉提出文字，尤其是印刷文字，促进了线性的因果的思维和个体阅读，后印刷技术 (post-print technologies) 则重新创造了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把世界变为口头文化村 (the village of oral culture)，这显然对奥恩关于口述文化的描述产生了影响 (Ong, 1982)。曼纽尔·卡斯特尔斯 (Manuel Castells)，我们当代的麦克卢汉，进一步看到了数字媒体的融合，这种融合形成了网络社会，导致了文化体验的平民性 (Castells, 1996)。反全球化运动的成员，当然担心文化的同质化和统一塑造成一个美国化的地球村，这通常被简称为世界的“可口可乐化”。他们把美国的媒体，以及 Internet 的语言被英语主宰，看作是这一进程的火车头 (Tunstall, 1994)。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的论述中还要回过头来看。

然而，还有一个有价值的经验要从书史中汲取，那就是它对于出版作为一种社会化活动的强调。与达恩顿众所周知的模型相类似的交流圈，在数字技术中的确存在并正在发展 (Darnton, 1982b)。这些交流圈可能不仅仅使个人成为作者和出版者，不论是单独出现，还是像维基百科 (Wikipedia) 那样成为集体合作的一部分 (Wikipedia, 2004)，同时新的企业家和网站管理者也会出现，扮演类似于亚当斯和巴克版的达恩顿模型中的代理人的角色 (Adams and Barker, 1993)。然而，解放论者提出了一种分散化的愿景，它介于获得出版权力的个人和像科幻杂志那样的小型作坊之间。这种愿景低估了出版 (和出版许可) 的专业精神，以及现有产业的生存本能。目前新媒体的制度环境，从生产和发行方面看，通常仍然与跨国公司没什么两样，在其全部媒体运营中，会包括一个图书生产部门。

媒体全球化

121 这个标题里的全球化，具体指书籍史近来的发展中的三个领域，它们可能也会影响书籍的未来：媒体中图书出版部分的跨国所有制成为主流；不断增长的国际图书流——不是作为物品，而是作为可以译成其他语言和转换为其他媒体的文本来源；以及所谓跨国文化的普遍性。这三个领域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加强、被称为“全球化”的过程的几个方面。

正如第三章结尾所提到的，在20世纪后半叶，出版社通过合并、收购形成了大型的、通常是跨国的集团。从这一点看来，似乎书籍出版业成为了文化全球化的火车头之一，正如它被认为对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提供了动力一样。然而，人们还注意到出现了两种类型的集团：一种以印刷为主业，在许多国家开展经营（例如总部位于德国的贝塔斯曼），另一种经营多种媒体，图书出版只是其中之一，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例如拥有哈珀柯林斯公司的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这里的区分不像早前那样泾渭分明，因为横向整合的公司也开始从核心出版业务出发，通过纵向整合上下游业务来进行扩张。从只生产书籍的出版商，和只制作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工作室等类似机构，向两者（甚至更多）兼营的集团的转变正在发生，部分是受到了数字技术的驱动。自1990年代以来，这种转变使两种类型集团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跨越多种媒体利用数字材料——无论是文本、声音还是图像——的能力，令已被用滥了的“协同”(synergy)一词重又焕发光彩。最初的出版集团具有着其他当代媒体产业的特征：巨大的资金投入，为大众

市场进行大规模生产，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这些产品也同时形成了一种文化资产。

格列柯 (Greco) 描绘了1960年至1989年间美国并购活动的总体增长趋势，尽管1987年美国国会发起的财政改革使这一活动减慢下来 (Greco, 1995)。自1990年起，并购活动引人注目地重新活跃起来。在1996年发表的后续研究中，格列柯对此进行了跟踪：他统计了1990年至1995年间总共557起媒体收购，接近他先前所分析时段的并购总数 (Greco, 1996)。1990年代的第二个阶段创造了大的跨国媒体集团，涵盖了一系列产品和业务。2000年不仅标志着世纪的结束，也见证了美国在线 (AOL) 和时代华纳 (Time-Warner) 的合并，前者主要是网络服务提供商，后者是包括图书出版业务在内的媒体集团，两者的合并造就了世界上同类公司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同年，经营环境服务业和媒体业务——其中图书出版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国维旺迪 (Vivendi) 集团，收购了在音乐、电影和电视领域有着广泛业务的环球 (Universal) 公司。其他许多媒体集团在1990年代的“.com狂热”中收购了新的数字技术和产品业务，以补充和促进已有的模拟技术服务和产品业务，其中也包括图书出版。这些公司所寻求的各种媒体的相互协同，是以一种清晰的整合模式为基础的，这种模式依靠的是在媒体与媒体之间转化知识产权价值的的能力。这一模式的化身是迪斯尼公司，它对旗下米老鼠等形象品牌价值的敏锐意识，甚至引发了美国知识产权法的更改。对这些品牌的开发不仅包括电影、电视、主题公园、CD和相关商品，也包括基于这些形象的儿童图书的直接出版或授权使用，这些书不仅是新产品的衍生物，也是长久以来已经存在的老产品的继续发展。

122

通过这些接收、归并和整合过程实现的媒体集团内部出版业务的合并，导致了图书市场的集中 [同时图书市场通过横向整合得到扩大，例如英国的史密斯对霍德 - 海德兰 (Hodder Headline) 公司的收购，在此之前史密斯收购了约翰·孟西斯公司的零售部门]。梅尔和特拉普比较了

欧盟提供的统计数据，制作了表格以反映各国最大的5家出版企业的市场占有率（Meier and Trappel, 1998）。占有率百分比的变化范围，从荷兰和英国的95%，到芬兰的42%。贝戈蒂奇安设计了测算方法，评估自1983年以来美国模拟技术媒体的市场集中度（Bagdikian, 2000）。他对需要多少在图书出版、报刊、电视和电影业中占支配地位的公司，才能够占据50%的市场份额做了计算。在这个基础上，他得出了媒体每年市场集中度的数字：从1983年的50家下降到1987年的29家，1997年的10家，到2000年只有6家。这种集中度的重要性，在于学者们从中得出了用户选择、产品质量和“可口可乐化”方面的结论。据认为，这样的集中度导致了消费者选择面的缩小，和跨国文化同质性的增加（被集团内部一系列媒体产品的市场整合进一步放大）。这似乎与一些证据相悖，例如格列柯提出，仅仅在美国，新书的数量从1960年的15012种，上升至1989年的53446种（Greco, 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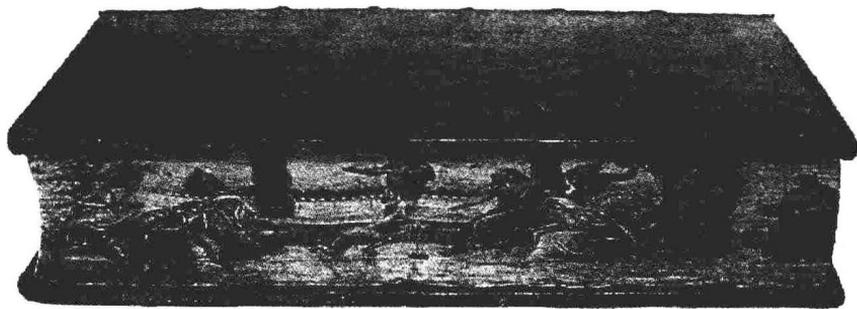
123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的一种解释，可能在于多样性的缺乏，以及伴随书籍种类增加的一种无可抗拒的同质性。集团内部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机制，产生并不断强化不肯冒险的倾向，这一点与独立的出版社不同。当一家公司被一个集团接管后，其重点从书籍间的相互补贴，变为每本书都要分担企业的日常开支和利润。当贝塔斯曼集团1998年接管兰登书屋（Random House）时，新主人期望兰登书屋贡献15%的利润，每年营业额增加10%。这将使利润从100万美元，一跃而升为1.5亿美元，年销售额约10亿美元；此外还将包括每年1亿美元的销量增长（Schiffirin, 2001）。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重点被放在那些能收到立竿见影效果的重点新书上，而不是逐渐积累出一个对增加利润具有重要意义的重版目录（backlist）。安德烈·希夫林（André Schiffirin）总结道：“以利润为中心的逻辑开始适得其反。[集团内]要求每种实体都要取得年销售额和利润的增长，迫使出版社的每个部门重复他人的劳动，争相出版最赚钱的图书。”（Schiffirin, 2001: 76）责任编辑们所编书籍的盈亏状况都记录在案，每个编辑都要达到每年规定的收入额

和利润额，这往往被作为他们业绩工资的基础。进而，由于需要找到“旱涝保收的东西”，就给各类名人支付大量的版税预付款，希望他们的名气能够带来所需要的销量和利润。（1998年哈珀柯林斯公司宣布取消2.7亿美元不挣钱的版税预付款。）或者将大量的版税预付款，付给由独立出版商出版、已经市场验证在销售上“安全”的作者。又或者，将图书作为以一部电影、甚至一个电脑游戏为中心的媒体打包产品的一部分出版，图书本身就是来自于电影或游戏。而且为了让事情十拿九稳，集团会花大量的广告费，动员庞大的销售力量，并动用强大的媒体关系（通常是一个姐妹公司）。即使集团的产品卖不动[有时公众过于任性，坚持自己的好恶，其不好的结果是“旱涝保收的东西”遭到公众拒绝，而另一方面《柯莱利上尉的曼陀林》(*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所获得的交口称赞，也是公众坚持自身品味的结果(Gardiner, 2000)]，也并非不需要推广和宣传。

文化悲观主义作为20世纪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大生产及其被融入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的描述——的遗产，不仅导致了对用户选择和多样性的担忧，也导致了对所提供的产品质量的担忧(Adorno and Horkheimer, 1944)。在这里，存在着一种与捍卫书籍生存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显著联系，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是建立在对文化重要性的有限定义的基础上的。对集团出版质量最具威力的攻击，来自1997年马克·克里斯宾·米勒(Mark Crispin Miller)的一项研究。像希夫林一样，米勒的眼光回到那个以文本为中心、而不是以利润为中心的出版时代。兰登书屋(被贝塔斯曼兼并前)是他所谴责的三家美国出版社之一，它们从伟大的小说和其他有文化意义的著作，转而出版以市场为导向的“垃圾”。他所说的“垃圾”，包括因名人而出版的书籍，即那些写名人的、由名人写的、与名人有关的书，休闲书或业余爱好方面的书，无论是关于装饰、烹饪，还是关于园艺的。他痛斥委托撰著方式(commissioning policy)，导致约克公爵夫人(Duchess of York)的传记“空洞和自说自话”(Miller,

1997: 116)。他也谴责低劣的编辑和校对，使得某些书“像夹生饭，干瘪无味，文笔粗糙，例如纽特·金里奇 (Newt Gingrich) 的《重塑美国》(*To Renew America*)” (Miller, 1997: 116)。虽然就某些书的优劣来说，我们作为个人会在很多地方同意这种带有这种强烈倾向性的鞭挞批判，但是它的选择标准和分析的严密性存在问题。它从结论出发，而所提供的论据并不令人满意。贾妮斯·拉德威关于月读俱乐部的研究，对出版商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分析要好得多 (Radway, 1997)。它所讨论的内容，要早于集团公司的时代，但它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客观、详尽的分析，可以很好地用来分析当代的委托和选择过程。

媒体集团的图书产品确实找到了国际市场，在过去的时代只有宗教书籍才能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基督教《圣经》。关于这一点，罗琳 (J.K.Rowling) 关于年轻巫师哈利·波特的系列图书颇具启发性。这些书在国际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起初是在讲英语的国家，后来随着该系列的不断推出，有了40多种译本。(因为《哈利·波特与凤凰社》(*Harry Potter and the Order of the Phoenix*) 英文版与法文版面世存在一个时间差，使得英文版在法文版推出前成了法国孩子手中畅销的书。) 这一出版上的成功，借助于小说改编的电影对小说的再次宣传而得到放大；借助于出版商所采取的儿童与成人市场交叉销售的策略而得到强化——例如，儿童版与成人版分别采用不同的护封和封面；借助于精心制定的精装书与平装书出版日程而得到优



《圣经》的书口彩绘

化——确保在便宜的版本发行前高价版本达到最大销量，发行平装本时又掀起一波新的宣传攻势，令读者热切期待。

哈利·波特故事所获得的国际影响，尤其是拍成电影以后，可以构成“可口可乐化”或国际文化同质性的证据——虽然在英国寄宿学校的冒险传统中，它其实有着很长的本土叙述谱系。（但除了关于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相关反应的报告外，极少有关于哈利·波特小说接受的研究。）这种对全球化以及跨国媒体集团的行为的批评，在赫尔曼和麦克切斯尼1997年的重要著作中可以看到，它重复了早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谴责（Herman and McChesney, 1997）。它主要是指通过输出价格低廉而制作水准较高的媒体产品（相对于那些当地制作的产品，如果存在的话），把发达世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强加于发展中世界的文化。本书作者之一想起1972年在加纳的阿克拉（Accra）时的情景，在盼望每周令人期待的时刻——在电视上观看美国系列剧《职业特工队》（*Mission Impossible*）时，那种不和谐感。这些节目[西方系列剧《富矿脉》（*Bonanza*）是另一部每周播放一集、很受欢迎的电视剧，与当地节目形成鲜明反差，后者是在摄影棚里录制的，充满了说教，只能在每晚有限的几小时播出时间里给《富矿脉》当陪衬]在语言和行为上提供了参考和榜样，看起来似乎比本土的行为准则和传统更具魅力。非洲的学生们在学校里读莎士比亚作品和其他英语文学经典，因为这些是他们所能得到的（进口）书籍，从好的方面说让学生接触到了不同的文化，强化了与过去殖民地母国的正面联系；从坏的方面说，它造成了与读者所处环境的不协调感，并挑战了本地认同的安全感。[本书另一位作者1976年曾在拉丁美洲看过经过重新配音的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剧《金碗》（*The Golden Bowl*），该剧源于生于美国后迁居英国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经典小说。这一事例也凸显了通过不同媒体和不同语言对文本所进行的持续开发。] 30年过去了，从这两个案例来看，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谴责似乎是软弱无力的，它既未能理解文化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性质，也未

125

能理解读者能够从文本中积极地创造意义，而不是被动地吸收，正如前面一章所讨论的。

然而，较之其他媒体产品，书籍毕竟在“可口可乐化”中较少串通一气：通过满足不同语言共同体的需要，语言差别继续受到尊重；正如哈雷克因（Harlequin）的例子所体现的，书籍常常为不同的文化量身定制，规模较小的、本地的或细分市场的出版者，能够以更高水平的创新、更低水平的资金投入（特别是与影视相比）继续繁荣（Wirtén, 1998）。集团企业密切关注这些较小的公司，常常因为这些小公司高度重视创新和革新而收购它们。格列柯在他对合并和收购活动的研究中提到，美国出版公司的数量从1960年的993家，上升到1987年的2298家（Greco, 1996: 234）。这些满足广大读者多种需求的小公司的存在，证明了米勒等人文化悲观主义的虚妄。作为独立的公司，或集团企业在当地影响的代表，这些规模较小的公司在细分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中，代表了一种发展的源泉，以及书籍未来的生命力。

读者之死

罗兰·巴特在写“作者之死”时，他是在承认读者是意义创造中的关键因素的意义，庆祝读者的胜利的（Barthes, 1977）。又正如在前面一章中所讨论的，像巴特和伊瑟尔这样的理论家在讨论与文本的互动时，将读者的

角色置于作者之上 (Iser, 1980)。但是, 读者在胜利的那一刻, 似乎也处于死亡或逐渐消失的危险之中——当“读者”指的是书籍的读者时。最近来自英国和美国的报告, 强调了这类读者数量上的下降。2004年美国全国艺术捐赠基金会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的最新报告, 给出了下降的数字, 美国成人闲暇时阅读小说的比例从1982年的56.9%, 下降到了2002年的46.7% (NEA, 2004)。影响这一下降的主要因素是来自其他休闲活动的竞争: 电视可能不再是主要的竞争者, 而且确实能够以很多方式促进书籍的阅读; 在所调查的时间段内, 上网作为休闲方式日益普遍, 玩游戏机和计算机游戏打发时间的也越来越多。抱着些许怀疑的态度, 该报告也注意到书籍的读者人数虽然下降了, 但包括以电视为纽带、取得巨大成功的“奥普拉的图书俱乐部”在内的图书俱乐部、书店、网上图书零售商以及畅销书的销售却十分景气。2000年, 英国图书馆与信息委员会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mmission) 主持撰写的报告《阅读当下》(*Reading the Situation*) 给出了解释: 更少的人在读更多的书。在英国, 15%的成年人声称, 每周至少有11个小时用于休闲阅读 (BML, 2000)。

另一方面, 阅读作为一种广义的行为正在繁荣: 一百年前西欧和美国因重视初等义务教育而获得的高识字率, 到21世纪初作为承认阅读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重要角色的结果, 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识字教育的主要载体仍然是书籍, 尤其在发展中国家, 书籍是最经济、有时也是唯一的媒体。在发达国家, 由于“信息社会”的成长, 也更加看重读懂屏幕上所显示的文字的能力。虽然在这些文化中, 相对于其他形式的信息, 印刷媒体的重要性下降了, 但通过其他交流渠道进入人们眼中的文本还在继续争夺着读者的眼球。今天在西欧任何一家咖啡馆里, 都会看到一个年轻人在移动电话上输入或读取文本信息。如果是网吧, 就会是在写或读 e-mail 信息。从这一点来看, 唐·麦肯锡将目录学或书史重新贴上“文本社会学”的标签, 以及其中所暗含的包容性, 体现了从书籍和印刷品中所获得的认识向所有的传播形式延伸

(McKenzie, 1986)。然而，对于书籍的未来来说，关键的问题不再是文盲的存在，而是不愿读书：能读书的人不读书。

127 今天，西欧和美国的一个典型读者，他或她的广泛的、实际上是折中主义的阅读，不仅会受到宣传和推广的影响，也会受到口头推荐的影响。[前面已经提到《柯莱利上尉的曼陀林》是口碑的受益者，《哈利·波特与哲人之石》(*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 起初只印了少量精装本时也是如此。] 报纸编辑知道书评栏目在读者中很受欢迎，读者把评论家们的评判作为买书和借书的指南。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中，阅读习惯会发生改变。大多数人在结束正规教育后就不再以阅读作为休闲方式，如果他们重拾书本，已经是中年时期，在运动和社交等活动不占用他们太多的空余时间时才进行阅读。妇女从学校教育开始，阅读更为持续，如果读书慢慢减少，那是因为她们有了小孩，当孩子们长大后她们又会重拾书本。女性比男性读的小说要多，实际上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市场，某些类型的小说除外。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成为读书团体的成员，更喜欢向同伴们推荐图书，而且实际上在选择书籍时更加大胆 (Hartley, 2001)。英国的报告显示，“那些从小就喜欢阅读的人往往不会放弃这个习惯，即使在人生的某些阶段可能为环境所迫导致阅读量减少，一旦有机会他们一般会重新成为‘重量级’(heavy)读者”(BML, 2000: 10)。“重量级”读者是在童年造就的：如果家庭鼓励孩子阅读，并至少有一名家长是热心的读者，那么孩子长大后往往会博览群书。

一些读者把书当作一次性用品，不仅真的随手丢弃，在阅读体验上也是如此。根据英国的调查反馈，以读书的方式休闲及其所带来的满足感，某种程度上可作如下分类：52%的人把它作为减轻和释放压力的方式，27%的人以此遁世，24%把它当作发挥想象力的机会 (BML, 2000: 12)。既能催人奋发，又能放松身心，这可能是书籍借以幸存下来的一种强有力的特征。阅读发生的环境千差万别：在床上，典型的是睡前阅读；在火车车厢或飞机座舱里；在繁忙而喧闹的车站或机场，在来来往往的旅客包围下阅读。阅读

方式不只一种：从浏览带有大量插图的“咖啡桌”（coffee-table）图书中的有限文字，到解码一个陌生领域里复杂的描述，到完全沉浸于类型小说的强烈叙事。

借助于“市场”的表象，读者获得了大胜，图书的出版和销售，尤其是在媒体大集团的支配下，都要匍匐于市场脚下。为适应读者的需求和特性，零售分为两种途径：从亚马逊等公司网上订购图书，可以通过数据库检索，通常还会辅以“智能代理”（intelligent agent），以以前的购买数据为基础预测读者的偏好，图书的库存也比任何现实中的零售商都要大，而且还有价格折扣；当今的书店提供友好舒适的环境，包括阅读区和咖啡屋，使买书重新成为一种休闲活动，选书更有可能是出于冲动而不是事先谋划。于是，读书或是成为学业或职业的一种需要，最主要的威胁来自网络信息检索；或是成为一种休闲生活方式，与其他形式的活动竞争，可能会成为某些独特的亚群体偏好的休闲方式。这些亚群体，成为那些急于在这些读者中为某些作者或丛书确立主导地位的出版商的目标。哈雷克因在国际上所取得的成功，它在爱情小说出版中的主导地位，来自于它对不同国家里所针对市场的了解和为其量身定做的能力，以及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开发利用其知识产权所取得的规模经济效益（Wirtén, 1998）。另一方面，数字技术通过提供技术支持以增加读者可选购书籍的数量，同时经济地减少每种书的印数，帮助出版商服务于这些亚群体或细分市场。比如眼前这部教科书的出版，就得以采用这些技术，以根据需求确定相对较少的再版印数。

国家的角色

然而，如果生产上的技术进步不足以制造出既满足这些小的读者群体的期望、又适合其经济状况的书籍的话，一个新的角色将登上舞台，干预市场主导的进程。国家，或国家授权的代理，能够保证继续向读者提供出于文化、教育、语言或民族上的原因而被视为积极、有益的东西——书籍，即使它们在经济上已不适于生产和销售。传统上，国家被视为出版的对立角色。正如在第三章和第六章中提到的，直到20世纪末，国家还常常出于道德和政治目的干预、压制，而不是支持出版。在1959年美国的丛树出版社



纳粹焚书

(Grove Press) 案件、1960年英国的企鹅图书 (Penguin Books) 案件审理之前, 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未删节版还不能广泛传播 (McCleery, 2002)。纳粹举行焚书仪式, 以表示对那些被认为在宗教、种族或思想上与他们作对的作者的著作的厌恶。然而, 对图书的道德审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西欧和北美国家所废止; 棍棒被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等院外游说集团捡起, 试图以各种方式查禁书籍, 目标从哈利·波特系列小说, 到萨尔曼·拉什迪 (Salman Rushdie) 的《撒旦诗篇》(*Satanic Verses*) (1989)。对于哈利·波特系列, 那些反对巫术和巫师的人, 在民主国家四处劝说图书馆和学校不要购藏这一小说; 对于《撒旦诗篇》, 则向作者和参与该书出版、翻译或销售的所有人宣判了死刑。尽管有阴谋理论家鼓噪, 但发达国家政府极少公开进行政治审查, 除非关涉国家安全。即便有这样的案例, 如英国对《抓间谍者》(*Spycatcher*) (1987) 的起诉, 其结果也最多是对该书的生动宣传。

相反, 目前在发达国家, 国家与出版之间的关系是积极的。通过把书籍定义为一种文化物品、一种教育必需品、一道抵挡民族语言或民族特性遭到侵蚀的屏障, 国家会主动和被动地支持图书的出版和阅读。对于阅读来说, 一个强大的图书馆系统似乎是一项国家必须给予支持的基础设施。然而, 国家对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支持力度, 多年来呈下降趋势——部分原因是读者数量的减少, 书店和书籍销售的转型, 以及读者期望图书馆所提供书籍范围的扩大。这形成了恶性循环, 随着读者拒绝劣质的馆藏和寒酸的环境, 国家的投入进一步减少。国家还可以用财政和法律手段来支持阅读 (和读者): 在英国, 图书实行零购置税 (VAT); 在法国, 1981年的《雅克·朗法案》(*la loi Lang*) 建立了零售价格控制 (Retail Price Maintenance) 制度。该制度的英国版——净价图书协议 (Net Book Agreement), 是自愿而非强制性的, 1995年图书出版商们同意废止。

那些想要在英语的渗透中保护本国语言的国家, 或那些想要在跨国出版业的市场控制中保护本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国家, 对出版采取了更主动的支

持模式。例如，加拿大政府出台了一揽子计划，支持整个加拿大出版业的成长和发展，强调英语和法语两种官方语言读物的均衡发展。其中一些计划是针对整个文化产业发展的，还有些计划则直接针对产业中的某些特定领域 (Lorimer, 1996, 2000)。支持的手段多种多样，从为书籍的写作和出版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到为小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贴现融资 (discount financing)。2001年位于渥太华的联邦政府拿出110万美元，紧急资助22家难以承受来自查普特斯 (Chapters) 连锁图书销售商的高退书率 (有时达50% - 70%) 的加拿大出版商。这些措施和一揽子营销和推广行动，使加拿大本土图书的销售量从1970年的占3到5个百分比，到2000年几乎占到30%。加拿大的图书销售额达近13.5亿美元，预计到2006年图书销售额的复合增长率将达到2.6%。

与此相反，爱尔兰出版业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国际出版巨头。大的海外出版集团，主要是那些有很强英国背景的公司，的确在爱尔兰争夺市场。通常它们的本部设在英国，但在爱尔兰当地有一支卖力的销售团队。进口占据了大约70%的市场，但不同种类的书籍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在教育领域，据估计90%的市场被爱尔兰出版商占据，但在一般性图书中外国出版商处于支配地位，拥有超过85%的市场份额。爱尔兰出版商提高了本土市场的占有率，如今占据了约14%的市场。爱尔兰语图书的出版是一个小的细分市场，每年大约出版一百种新书。大多数爱尔兰文学作品，都受到盖尔语图书委员会 (Gaelic Books Board) 或爱尔兰艺术委员会 (Irish Arts Council) 的资助。爱尔兰语出版商的总收入据估计不到200万美元，这项收入的大约三分之一是通过补贴得到的。由于爱尔兰语出版物的需求有限，这一领域很难取得经济上的自立，某种程度上继续依靠公共机构的资助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PWC, 1995)。

非英语国家在国际渗透面前似乎得到语言障碍的保护，虽然一部分市场，尤其是在学术和专业领域，面对英文书籍进口的冲击比其他领域更脆

弱。这些国家的问题，是如何既能维持一个本国语的小市场，又能以足够低的价格来鼓励消费。继续得到政府资助，对于确保少数民族语种出版的发展似乎是个关键因素，无论是像加拿大和爱尔兰那样的内部的少数民族，还是从国际意义上说的少数民族。总的来说，随着读者数量继续减少，以及许多书籍的印数下跌，许多国家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采取措施，以确保消费者的选择不只是倾向跨国集团的产品。

小结

本章不是讨论书籍的未来的，它考察的是塑造和影响书籍未来的因素。书籍将与新出现的技术并存，众所周知这些技术的性质和影响难以预测。手机的使用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书籍将继续满足读者的需要，虽然其功能将被更严格地限制在休闲方面。书籍的生产将主要处于跨国媒体集团的控制之下，这些集团仅仅把它们看作又一种产品，虽然这种产品一直在为其他媒体产品提供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小出版商将带来创造和革新，但它们仍然是那些与之竞争的大公司的猎物。书籍的读者在数量上减少了，但是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鼓励人们养成一种如饥似渴、博览群书的阅读习惯。国家可能需要越来越多地介入，以促进和保护书籍的阅读，就像它为被视为公民社会中的积极资产（positive assets）的其他活动所做的那样。

结 论

以上章节追溯了从公元前到工业革命再到当代，手抄本和书籍生产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考察的内容包括：

- 与作者身份有关的问题；
- 从宗教的背景到个人的背景，印刷品“权威”的转换；
- 印刷中心的建立，及与之伴随的全国和国际印书业的发展；
- 书籍在塑造阅读共同体和挑战权威中的角色；
- 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考察文本和印刷文化在文化传播中的地位的理论概念。

第一章概述了其中的一些理论概念。它综述了重要理论家的著作，这些理论家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塑造了印刷文化和书史研究这一学科。它揭示了书史如何从过去目录学和文本研究的传统，转变为目前集中关注文化和社会背景。它还讨论了现在书史的研究兴趣，如何越来越将对作者和读者的研究整合进对文本生产的研究之中，这一问题在后面的章节里又做了讨论。

第二章考察了在西欧文化中标志着从口头文化到书写文化的转变的那些挑战，在这一转变中新的文化模板采纳、覆盖了口头交流的方式和程序。本章还考察了从书写文化到印刷文化的转变过程中，一个类似的采纳、适应和重塑过程，以及对把口头文化整合进书写文化持批评态度的人，是如何看待知识的传播等同于“褻渎”的观点的，他们在选择处理信息的方式时如何不得不面对变革。最后，本章讨论了利用书写为政府、机构和政治的利益服

务的问题。

133

第三章继续讨论从以手抄本为基础的文化，向以印刷本为基础的文化转变。它把印刷机视为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期导致变革的一个动因，并概述了印刷书的选择、生产和发行所引发的产业结构的发展。本章论述了既有权力结构——国家和教会——通过许可证制度、法律限制和财政手段来控制印刷及其产品的传播的尝试。详细论述了书籍生产的工业化，以及随着来自其他媒体竞争的加强，该产业在20世纪末的萎缩。

第四章探讨了西欧文化传统中，作为一种概念和行为的作者身份。它讨论了中世纪作者身份的概念，阐述了随着15世纪印刷的出现作者功能的转变，并对现代作者行为背后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结构提出了深入的见解。本章还简要论述了20世纪对作者功能的解释，以深入认识当今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并阐述随着21世纪数字技术的兴起，学者们如何预言作者行为的新范式，以及对于“作者身份”的构成将要如何加以重新定义。

第五章考察了印刷文化的流通中所涉及的各种参与者和代理人，审视了西欧印刷品与文本生产、传播和消费中的产业和技术进步是如何输出到其他国家，并被接纳和适应的。它还提醒读者关注各种文化代理的历史，以及它们在当代社会中是如何介入书籍和印刷品的宣传推广事务的。

第六章既将阅读定义为一种读者从文本中创造意义的个人解释行为，也定义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行为。它追溯了阅读的历史，从最早对信息的解读，到18世纪精读到泛读的转变，再到以后的两百年时间里阅读在教育 and 自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阅读的性质，是根据伊瑟尔个人创造意义的模型和菲什所侧重的“解释共同体”来考察的。

第七章从四个角度探讨了书籍的未来，这些角度来自于书籍史：已经存在的新技术和未知的更新的技术对书籍的影响；书籍出版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新的产业结构的产生，以及这些结构对多样性、用户选择和文化的影响；读者数量的减少，同时数量减少了的读者的“密集”的阅读；最后，国家角

色的变化，从对书籍的管控到支持出版和阅读。

从我们的研究中得出的一个重要课题，是“中介”在书史研究中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当代的书籍和印刷文化史家，越来越关注于回答由印刷品的中介作用所引发的问题。他们所问的问题包括：

134

- 在书籍和文本所走的、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复杂路径中，是谁、是什么起了中介作用？

- 战略上的文化联盟和“文学场域”在塑造特定文本的推广和接受方面，所处的地位如何？

- 谁助推某些书籍和作者成为文化标准，而同时代的其他书籍和作者在文化和经济上却没有产生重要影响？

- 技术进步如何成为社会交流结构中“看不见”的一部分？

- 大众印刷媒体在塑造社会话语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当代印刷文化研究还必须（正如第七章所提到的）把跨国和比较问题考虑在内——书籍贸易全球化在经济、文化和社会上的影响；数字化和新的电子技术所提供的商机；改变产业面貌的跨国出版和图书销售联合体的同质化作用。

书籍史的未来必定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密切相关。同时，认识到我们所拥有的知识与印刷文化史的覆盖范围之间还存在差距是很重要的。对于那些具有欧洲和北美背景的学者来说，最显而易见的是，在非欧洲中心（non-Eurocentric）的印刷文化领域，还有很多值得讨论、值得研究的。例如，伊斯兰世界纸和印刷的发展史，及其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仍然需要加以深入的考察。同样，目前非文本材料作为印刷文化研究的潜在资源，还未得到充分利用；口述史和访谈资料，电影与视觉材料，以及那些随手丢弃的文件，很可能会为补充和增进我们对印刷文化以及书籍生产和接受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理解，提供强有力的材料支持。书史学家正在试图关注的其他问题，包括性别、阶级、种族、移民，以及印刷品在维持和构建社会、文化和民族

认同中的地位。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阅读和阅读习惯是一个新著迭出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有阅读革命、阅读在形成个人和集体认同中的地位等等。

135 这是书史研究中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乔纳森·罗斯 (Jonathan Rose) 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知性生活》(*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es*) (2001)、伊丽莎白·麦克亨利 (Elizabeth McHenry) 的《被遗忘的读者：找回非洲裔美国人识字社团丢失的历史》(*Forgotten Readers: Recovering the Lost History of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Societies*) (2002) 等获奖图书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其他学者紧随其后，贡献他们各自对于印刷文化的见解。我们所看到的，既有对书史的一般性记述，也有对其中某个具体方面的研究——从关于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爱尔兰、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等书籍国别史的研究项目，到已出版的对某些出版商、阅读群体和印刷文化现象的个案研究。最近在跨学科背景下出现的书史研究课程的数量，反映了对这个学科兴趣之浓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没有边界的知性世界——方兴未艾、仍处于定义的过程中，有着无限多的可能性。研究书史，就是研究我们的人性，研究支撑整个社会的知识搜集与传播的社会交流过程。

参考书目

Adams, Thomas and Nicolas Barker (1993) 'A New Model for the Study of the Book' , in N. Barker (ed.) *A Potencie of Life: Books in Society*. London: British Library: 5 – 43.

Adorno, Theodor and Max Horkheimer (1944; repr. 1977) 'The Culture Industry: 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 , in James Curran, Michael Gurevitch and Janet Wollacott (ed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349 – 83.

Altick, Richard (1957)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ss Reading Public, 1800 – 19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nderson, Benedict (1982)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Ascher M. and R. Ascher (1981) 'El quipu como lenguaje visible' , in Lechtman and Soldi (1981): 407 – 31.

Assmann, Jan (1994) 'Ancient Egypt and the Materiality of the Sign' , in Gumbrecht and Pfeiffer (1994): 15 – 30.

Bagdikian, Ben H. (2000) *The Media Monopoly* (sixth edi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Barnes, James J. and Patience B. Barnes (1984) 'Thomas Aspinwall: First Transatlantic Literary Agent' . *The Paper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 78.3:321 – 32.

Barthes, Roland (1977) *Image Music Text*. London: Fontana Press.

Bayly, C.A. (1996) *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 –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lich, James (1996) *Making Peoples: A History of the New Zealanders*. London: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Benson, Larry D. (ed.) (1988) *The Riverside Chauc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iriotti, Maurice and Nicola Miller (eds) (1993) *What is an Autho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Birkerts, Sven (1996) *The Gutenberg Elegies: The State of Reading in an Electronic Ag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Bloom, Harold (1996) *The Western Canon*. London: Macmillan.

——(2001) *How to Read and Why*. London: Fourth Estate.

BML (Book Marketing Ltd.) (2000) *Reading the Situation: Book reading, buying and borrowing habits in Britain*. London: BML.

Bolter, Jay David (1991) *Writing Space: The Computer, Hypertext, and the History of Writing*. Hillsdale: Erlbaum Associates.

Bonham-Carter, Victor (1978) *Authors by Profession*. Volume 1. London: Society of Authors.

— (1982) *Authors by Profession*. Volume 2. London: Society of Authors.

Bourdieu, Pierre (1993) 'Field of Power, Literary Field and Habitus' , in R. Johnson (ed.)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7 – 73.

Bowers, Fredson (1950a) 'Current Theories of Copy-Text, with an Illustration from Dryden' . *Modern Philology* LXVIII: 19 – 36; repr. in Brack and Barnes (1969): 59 – 72.

—(1950b) *Principles of Bibliographical Descrip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rack, O.M., Jr. and Warner Barnes (eds) (1969) *Bibliography and Textual Criticism: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1700 to the Present*. Chicago and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Brake, Laurel, B. Bell and D. Finkelstein (eds) (2000) *Nineteenth-Century Medi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ies*. Basingstoke: Palgrave.

Brands, H.W. (2000) *The First American: The Life and Times of Benjamin Franklin*. New York: Bantam Dell Publishing Group.

Brewer, John (1997) *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 English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HarperCollins.

Brewer, John and Iain McCalman (1999) 'Publishing' , in I. McCalman (ed.) *An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Romantic Age: British Culture 1776 – 183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 – 206.

Briggs, Asa and Peter Burke (2002)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edia, from Gutenberg to the Internet*. London: Polity Press.

Brooks, Douglas (2000) *From Playhouse to Printing House: Drama and Authorship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Studies in Renaissanc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3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wn, Cynthia J. (1995) *Poets, Patrons, and Printers: Crisis of Authority in Late Medieval Fr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Burrow, John (1976) 'The Medieval Compendium' ,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y 21:615.

Canfora, Luciano (1989) *The Vanished Library* (translated Martin Ryle). London: Hutchinson.

Castells, Manuel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Cavallo, Guglielmo (1999) 'Between *Volumen* and Codex: Reading in the Roman World' , in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64 – 89.

——(2003) 'Lire, écrire et mémoriser les Saintes Écritures', in Jacob (2003): 87 – 102.

Cavallo, Guglielmo and Roger Chartier (eds) (1999)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 (translated L.G. Cochran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Cave, Roderick (1986) *Printing and the Book Trade in the West Indies*. London: Pindar.

Cave, Roderick and Kathleen Coleridge (1985) 'For Gospel and Wool Trade: Early Printing in New Zealand' . *Printing History*, 7.1: 15 – 27.

Chakava, Henry (2001)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shing Systems in English-speaking Africa: In Search of an Independent Model' , in Michon and Mollier (2001):339 – 49.

Chartier, Roger (1981) 'L' ancien régime typographique: réflexions sur quelques travaux récents' . *Annales E.S.C.* 36: 191 – 209.

—— (1987)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ranslated L.G. Cochra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d.) (1989a) *The Culture of Print*. Oxford: Polity Press.

—— (1989b) ‘The Practical Impact of Writing’ , in R. Chartier (ed.) *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III Passions of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pr. in David Finkelstein and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1:118 – 42.

—— (1994)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translated L.G. Cochra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ed.) (1995) *Histoires de la Lecture: Un bilan des recherches*. Paris: IMEC.

—— (1997a)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the Book’ . *Substance* 82:9 – 11.

—— (1997b) *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History ,Language, and Practices* (translated L.G.Cochran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Charvat, William (1993) *Literary Publishing in America, 1790 – 1850*. New editio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Christin, Anne-Marie (ed.) (2001) *A History of Writing: From Hieroglyph to Multimedia*. Paris: Flammarion.

Copeland, Rita, David Lawton and Wendy Scase (eds) (1999) *New Medieval Literatures* 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arnton, Robert (1982a) *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b)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Daedalus*: 65 – 83; repr. in David Finkelstein and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1: 9 – 26.

——(1986) 'First Steps Towards a History of Reading' , *Australian Journal of French Studies* 23: 5 – 30; repr. in Robert Darnto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0:154 – 90.

——(1996)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York: Norton.

——(2001) 'Literary Surveillance in the British Raj:The Contradictions of Liberal Imperialism' . *Book History* 4:133 – 76.

——(2003) 'The Heresies of Bibliography'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0 (9): 43 – 5.

Davidson, Cathy (ed.) (1989)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avis, Natalie Zemon (1983) 'Beyond the Market: Books as Gift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33: 69 – 88.

Docherty, Thomas (2003) 'On Reading' . *Critical Quarterly* 45, 3: 6 – 19.

Duguid, Paul (1996) 'Material Matters: The Past and Futurology of the Book' , in G. Nunberg (ed.) *The Future of the Boo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3 – 101.

Eggert, Paul (2003) 'Robbery Under Arms: The Colonial Market, Imperial Publishers, and the Demise of the Three-Decker Novel' *Book History* 6: 127 – 47.

Eisenstein, Elizabeth (1979)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Vols I and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ngelsing, Rolf (1974) *Der Bürger als Leser: Lesergeschichte in Deutschland, 1500 – 1800*. Stuttgart: Metzler

Escarpit, Robert (1966) *The Book Revolution*. London and Paris: George G. Harrap & Co. Ltd. and UNESCO.

——(1971)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translated E. Pick). London: Cass.

Ezell, Margaret J.M. (1999) *Social Authorship and the Advent of Pri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eather, John (1988) *A History of British Publishing*. London: Croom Helm.

Febvre, Lucien and Henri-Jean Martin (1958) *L' Apparition du Livre*. Paris: Albin Michel.

——(1976) *The Coming of the 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 – 1800* (translated D. Gerard, from *L' Apparition du Livre*). London: NLB; repr. 1997, London: Verso.

Feltes, N.N. (1986) *Modes of Production of Victorian Nove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Literary Capital and the Late Victorian Novel*. Madison,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Finkelstein, David (2002) *The House of Blackwood: Author-Publisher Relations in the Victorian Era*.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Finkelstein, David and Douglas Peers (2000a) ‘“A Great System of Circulation” : Introducing India into the Nineteenth-Century Media’ , in Finkelstein and Peers (2000b): 1 – 23.

——(eds) (2000b) *Negotiating India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Media*. Basingstoke: Macmillan.

Fischer, Steven R. (2003) *A History of Reading*. London: Reaktion Books.

Fish, Stanley (1976)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 *Critical Enquiry* 2.

3: 465 – 86; repr. in David Finkelstein and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1: 350 – 8.

Flint, Kate (1993) *The Woman Reader, 1837 – 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ucault, Michel (1984) *The Foucault Read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ox, Adam (2000) *Oral and Literature Culture in England, 1500 – 17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ritschner, Linda Marie (1980) 'Publishers' Readers, Publishers, and their Authors' . *Publishing History* 7: 45 – 100.

Gardiner, Juliet (2000) 'Recuperating the Author: Consuming Fictions in the 1990s' . *Paper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 94 (2): 255 – 74.

Gedin, Per (1982) *Literature in the Marketplace* (translated G. Bisse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Gekoski, Rick (2004) *Tolkien's Gown and Other Stories of Great Authors and Rare Books*. London: Constable.

Genette, Gerard (1997) *Paratexts: Th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lated Jane E. Lew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hosh, Anindita (2003) 'An Uncertain "Coming of the Book" : Early Print Culture in Colonial India' . *Book History* 6: 23 – 56.

Giddens, 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illies, Mary Ann (1993) 'A.P. Watt, Literary Agen' . *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 9 (Spring): 20 – 34.

Gilmont, Jean- François (1999) 'Protestant Reformations and Reading' , in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213 – 37.

Ginzburg, Carlo (1980)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lated J. and A. Tedeschi).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Gómez, Antonio Castillo (ed.) (2001) *Historia de la cultura escrita*. Gijón: Ediciones Trea.

Gomme, Robert (1998) 'Edward Thomas and the Literary Agency of London'. *The Book Collector*. 47.1 (Spring): 67 – 78.

Goody, Jack (1987)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Oral and the Writt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afton, Anthony (1997) *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The Humanist as Reader', in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179 – 212.

Greco, Albert (1995)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US Book Industry, 1960 – 1989', in Philip G. Altbach and Edith S. Hoshino (eds) *International Book Publishing: An Encyclopedia*.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229 – 42.

——(1996) 'Shaping the Future: mergers, acquisitions, and the U.S.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s, and mass media industries, 1990 – 1995'. *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 12.3:5 – 16.

Greenspan, Ezra and Jonathan Rose (1998) "Introduction". *Book History* 1: ix – xi.

Greg, W.W. (1914) 'What is Bibliography?' *Transactions of the Bibliographic Society*, 12(1914): 39 – 53.

——(1950) 'The Rationale of Copy-Text' . *Studies in Bibliography* III: 19 – 36.

Griest, Guinevere (1970) *Mudie's Circulating Library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Gumbrecht, Hans Ulrich and K. Ludwig Pfeiffer (eds) (1994) *Materialities of Communic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all, David D. (1996) *Cultures of Pri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Hamesse, Jacqueline (1999) 'The Scholastic Model of Reading' , in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103 – 19.

Harris, William V. (1989) *Ancient Lite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tley, Jenny (2001) *The Reading Groups Boo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velock, Eric (1988) *The Muse Learns to Write: Reflections on Orality and Literac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epburn, James(1968) *The Author' s Empty Purse and the Rise of the Literary Agent*. London, New York and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rman, Edward S. and Robert W. McChesney (1997) *The Global Media*. London: Cassell.

Hobbes, Robert George (1851) 'Calcutta' . *Bentley' s Miscellany* 30:361 – 8.

Howsam, Leslie (1991) *Cheap Bibles: Nineteenth-century Publishing and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nt, Peter (2001) *Children' s Literature*. Oxford: Blackwell.

Isaacson, Walter (2003) *Benjamin Franklin: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Iser, Wolfgang (1980) 'Interaction Between Text and Reader' , in Susan K. Suleiman and Inge Crosman (eds) *The Reader in the Text: Essays on Audience and Interpret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06 – 19.

Jackson, H.J. (2001) *Marginalia: Readers Writing in Book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Jacob, Christian (ed.) (2003) *Des Alexandries II: Les métamorphoses du lecteur*.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Johanson, Graeme (2000) *Colonial Editions in Australia, 1842 – 1972*. Wellington, NZ: Elibank Press.

Johns, Adrian (1998) *The Nature of the Book: 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AHR Forum: An Unacknowledge Revolution Revisited'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1 (Feb): 106 – 25.

Johnson-Woods, Toni (2000) 'The Virtual Reading Communities of the *London Journal*, the *New York Ledger* and the *Australian Journal*' , in Brake, Bell and Finkelstein (2000): 350 – 62.

Jordan, John O. and Robert L. Patten (eds) (1995) *Literature in the Marketplace: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Publishing and Reading Practi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oseph, Michael (1925) *The Commercial Side of Literature*. London: Hutchinson & Co.

Joshi, Priya (2002) *In Another Country: Colonialism,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Novel in In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Justice, George L. and Nathan Tinker (eds) (2002) *Women' s Writing and*

the Circulation of Ideas: Manuscript Publication in England, 1550 –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ating, Peter (1991) *The Haunted Stud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Novel 1875 – 1914.* London: Fontana Press.

Ker, N.R. (1960) *English Manuscripts in the Century After the Norman Conques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Kernan, Alvin (1987) *Printing Technology, Letters and Samuel John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irsop, Wallace (2001) 'From Colonialism to the Multinationals: the Fragile Growth of Australian Publishing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Global Anglophone Reading Community' , in Michon and Mollier (2001): 324 – 9.

Knowles, David (1950) *The Religious Orders in England.* Two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uskin, William (1999) 'Reading Caxton: Transformations in Capital, Print, and Persona in the Late Fifteenth Century' , in Copeland, Lawton and Scase (1999): 149 – 83.

Laurenson, D.T. and A. Swingewood (1972)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London: MacGibbon and Kee.

Lavallée, Danièle (2001) 'The Peruvian Quipus' , in Christin (2001): 190 – 1.

Lechtman, H. and A.-M. Soldi (eds) (1981) *La Tecnología en el Mundo Andino.* Mexico: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Lee, Alan J. (1976) *The Origins of the Popular Press in England 1855 – 1914.* London: Croom Helm.

Lemaire, André (2001) 'The Origin of the Western Semitic Alphabet and Scripts' , in Christin (2001).

Livingstone, Alasdair (1986) *Mystical and Mythological Explanatory Works of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Schola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Lorimer, Rowland (1996) 'Book Publishing in Canada' , in Michael Dorland (ed.) *Canada's Cultural Industries: Problems, Prospects and Issues*. Toronto: James Lorimer.

Lorimer, Rowland with Mike Gasher (2000) *Mass Communications in Canada* (fourth edition).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ve, Harold (1998) *The Culture and Commerce of Texts: Scribal Public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3) 'Early Modern Print Culture: Assessing the Models' . *Parergon* 20 (1): 45 – 64.

Lowry, Martin (1979) *The World of Aldus Manutius*. Oxford: Blackwell.

Lyons, Martyn and John Arnold (eds) (2001) *A History of the Book in Australia, 1891 – 1945: a National Culture in a Colonised Market*. St. Lucia,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McCleery, Alistair (2002) 'The Return of the Individual to Book History: the case of Allen Lane' . *Book History* 5:85 – 114.

McDonald, Mary Lu (2001) 'The Modification of European Models: English Canada before 1890' , in Michon and Mollier (2001): 84 – 93.

McDonald, Peter (1997) *British Literary Culture and Publishing Practice 1880 – 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Donald, Peter and Michael F. Suarez, S.J. (eds) (2002) *Making Meaning: 'Printers of the Mind' and Other Essay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McGann, Jerome (1991) *The Textual Con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cHenry, Elizabeth (2002) *Forgotten Readers: Recovering the Lost History of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Societ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McKenzie, Donald E (1981) 'Typography and Meaning: The Case of William Congreve' ; repr. in McDonald and Suarez (2002): 198 – 236.

——(1984) 'The Sociology of a Text: Orality, literacy and print in early New Zealand' . *The Library* 6 (4): 333 – 65.

——(1986) *The Panizzi Lectures, 1985: 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London: British Library.

——(2002) 'What's Past is Prologue' ; repr. in McDonald and Suarez (2002): 259 – 75.

McKerrow, Ronald B. (1927)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for Literary Studen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cKitterick, David (2003) *Print, Manuscript and the Search for Order, 1450 – 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Luhan, Marshall (1962)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repr.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9.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McGraw-Hill; rep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4.

Macherel, Claude (1983) 'Don et reciprocité en Europe' .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24(1): 151 – 66.

Manguel, Albert (1996) *A History of Reading*. Bath: Flamingo.

Marek, Jane E. (1995) *Women Editing Modernism*.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Martin, Henri-Jean (1995) *The History and Power of Writing* (translated L.G. Cochra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uss, Marcel (1954) *The Gift: 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translated I. Cunnison). London: Cohen and West.

Meier, Werner A. and Josef Trappel (1998) 'Media Concentr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in Denis McQuail and Karen Siune (eds) *Media Policy*. London: Sage: 38 – 59.

Michon, Jacques and Jean-Yves Mollier (eds) (2001) *Les Mutations du Livre et de L'édition dans le Monde du XVIIIe Siècle à L'an 2000*. L' Harmattan: Les Presses de L' Université Laval.

Miller, Mark Crispin (1997)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n Patricia Aufderheide et al., *Conglomerates and the Media*.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07 – 34.

Milner, Andrew (1996) *Literature,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UCL Press.

Minelli, Laurencich (ed.) (1992) *I regni preincaici e il mondo inca*. Milan: Jaca Books.

Minnis, Alistair (1988) *Medieval Theory of Authorship: Scholastic Literary Attitude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Aldershot: The Scholar Press.

Mitchell, W. (1995) *City of Bits: Space, Place, and the Infobah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Modiano, Raimona, Leroy F. Searle and Peter Shillingsburg (eds) (2004) *Voice, Text, Hypertext: Emerging Practices in Textual Studies*.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Mole, Tom (2003) 'Byron' s "Ode to the Framers of the Frame Bill" : The Embarrassment of Industrial Culture' . *Keats-Shelley Journal* 52:111 – 29.

Monaghan, E. Jennifer (1989) 'Literacy instruction and gender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 in Davidson (1989): 53 – 80.

Morgan, Edmund S. (2002) *Benjamin Frankli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otte, Dean de la and Jeannene M. Przyblyski (eds) (1999) *Making the News: Modernity and the Mass Pr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Mueller-Vollmer, K. (ed.) (1985) *The Hermeneutics Reader: Texts of the German Tradition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Continuum.

Müller, Jan-Dirk (1994) 'The body of the book: The media transition from manuscript to print' , in Gumbrecht and Pfeiffer (1994); repr. in David Finkelstein and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1: 143 – 50.

Munns, Jessica (ed.) (1993)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Longman.

Nagy, Gregory (2003) 'Lire la poésie grecque à haute voix' , in Jacob (2003): 131 – 44.

NEA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2004) *Reading at Risk: A survey of literary reading 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NEA.

Nile, Richard and David Walker (2001) 'The "Paternoster Row Machine" and the Australian BookTrade, 1890 – 1945' , in Lyons and Arnold (2001): 3 – 18.

Noegel, Scott B. (2004) 'Text, Script and Media: New Observations on Scribal Activit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 in Modiano, Searle and Shillingsburg (2004): 133 – 143.

Norton, David F. and Mary J. Norton (1996) *David Hume Library*. Edinburgh: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Olivier, Jean-Pierre (2001) 'Aegean Scripts of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e' , in Christin (2001): 197 – 202.

Ong, Walter J. (1982; repr. 200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London: Methuen.

Parkes, M.B. (1999) 'Reading, Copying and Interpreting a Text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in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90 – 102.

Pollard, A.W. (1909) *Shakespeare's Folios and Quartos*. London: Methuen.

Poster, Mark (2001) *What's the Matter with the Internet?* London an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

Price, Leah (2000) *The Anthology and the Rise of the Novel: From Richardson to George Elio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The Tangible Pag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1 October: 36 – 9.

PWC (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1995) *The Strategic Future of the Irish Publishing Industry*. Dublin: Coopers and Lybrand.

Radicati de Primeglio, C. (1992) 'L' interpretazione del quipu', in Minelli (1992): 190 – 2.

Radway, Janice (1984)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Books and Reading in the Age of Mass Production', in *The Adams Helms Lecture 1996*. Stockholm: The Swedish Publishers' Association and the Stockholm University Library.

—— (1997) *A Feeling for Books: The Book-of-the-Month Club, Literary Taste, and Middle Class Desi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Reed, David (1997) *The Rise of the Popular Magazine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80 – 196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Rose, Jonathan (1992) 'Rereading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A preface to a history of audienc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3: 47 – 70; repr. in

David Finkelstein and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1: 324 – 39.

——(2001)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e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Rose, Mark (1993) *Authors and Owners: The Invention of Copyrigh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ss, Trevor (1992) ‘Copyright an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 *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 26: 1 – 27.

Rubin, Joan Shelley (2003) ‘What is 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Book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90 (2): 555 – 75.

Saenger, Paul (1999) ‘Reading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 in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120 – 48.

Schiffirin, André (2001) *The Business of Books: How the International Conglomerates Took Over Publishing and Changed the Way We Read*. London:Verso.

Schleiermacher, F.D.E. (1985) ‘General hermeneutics’ , in Mueller-Vollmer (1985): 72 – 97.

Schlink, Bernhard (1997) *The Reader* (translated Carol Brown Janeway). London: Phoenix House.

Schmandt-Besserat, D. (1982a) ‘The Emergence of Recording’ .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4: 871 – 8.

——(1982b) ‘How Writing Came About’ . *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 47:1 – 5.

Schneirov, Matthew (1994) *The Dream of a New Social Order: Popular Magazines in America, 1893 – 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ecord, James A. (2000) *Victorian Sensation: The Extraordinary Publication, Reception, and Secret Authorship of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eehan, Donald (1952) *This Was Publish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utherland, John (1976) *Victorian Novelists and Publishers*. London: Athlone Press.

——(1988) ‘Publishing History: A Hole at the Centre of Literary Sociology’ . *Critical Enquiry* 13 (3): 574 – 89.

Tanselle, G.T. (1979) *Selected Studies in Bibliography*.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1) ‘Textual Criticism and Literary Sociology’ . *Studies in Bibliography* 44: 83 – 143.

Taylor, Andrew (1999) ‘Authors, Scribes, Patrons and Books’ , in J. Wogan-Browne *et al.* (1999).

Thomas, Marcel (1976) ‘Manuscripts’ , in Febvre and Martin (1996).

Tompkins, Jane (2001) ‘Masterpiece Theater: The Politics of Hawthorne’s Literary Reputation’ , in David Finkelstein and Alistair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1: 250 – 8.

Traue, J.E. (1997) ‘But Why Mulgan, Marris and Schroder?: The Mutation of the Local Newspaper in New Zealand’s Colonial Print Culture’ .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ulletin*, 21.2:107 – 15.

——(2001) ‘The Two Histories of the Book in New Zealand’ .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ulletin*, 25.1: 8 – 16.

Tunstall, Jeremy (1994) *The Media are American* (second edition). London: Constable.

Wernick, Andrew (1993) 'Authorship and the Supplement of Promotion' ,
in Biriotti and Miller (1993): 85 – 103.

West, James L.W., III (1985) *American Authors and the Literary Marketplace since 1900*.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Whyte, Frederick (1928) *William Heinemann, a Memoir*. London: Jonathan Cape.

Wikipedia (2004)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in_Page (accessed 8 November 2004).

Williams, Raymond (1965)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6)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 – 1950*. first reprint. London: Pelican Books.

Winship, Michael (1993) 'Afterword' , in Charvat (1993): 91 – 102.

Wirtén, Eva Hemmungs (1998) *Global Infatuation: Explorations in Transnational Publishing and Texts*. Uppsala: Literature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Uppsala.

——(2003) *No Trespassing: Authorship,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Boundaries of Globalis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Wittmann, Reinhard (1999) 'Was there a Reading Revolution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in Cavallo and Chartier (1999): 284 – 312.

Wogan-Browne, Jocelyn, Nicholas Watson, Andrew Taylor and Ruth Evans (eds) (1999) *The Idea of the Vernacular: An Anthology of Middle English Literary Theory 1280 – 1520*.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Woudhuysen, Henry (1996) *Sir Philip Sydne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Manuscripts, 1558 – 16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术语表

Analog author 模拟作者

马克·波斯特在《因特网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the Internet?*)中使用的一个术语,用以定义传统的作者身份。即,那些仅限于通过印刷技术来出版作品的作者。

Annales School 年鉴学派

1950年代起源于法国的一个社会史运动,领军人物有罗伯特·埃斯卡皮、亨利·让·马丁、吕西安·费弗尔等人,强调在文本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研究中应用计量方法和社会史方法。

Backlist 重版目录

出版商在若干年时间里持续出版和销售的书目,与“新书目录”(frontlist)相对,后者指每年出版的新书。拥有一份能够带来稳定收入的厚重的重版目录是大多数出版商追求的目标。

Bibliography 目录学

该术语一般用来描述对文学作品和其他文献的物质传播所进行的研究。即,对创造和复制文本的物质手段的研究。传统上,这些研究又被按主题细分为以下领域:对印刷方式的研究(分析目录学(analytical or critical bibliography));对主要文献的描述和整理(描述目

录学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 ; 以及对文本传播的物质形式, 如纸、墨、书法和文本印刷形式的研究 (版本目录学 (textual bibliography)) 。

Bio-bibliography 生平 – 著述

托马斯·亚当斯和尼科拉斯·巴克在他们于1993年发表的有影响的论文“书籍研究的新模式”里使用的术语。主张一种关注以文本为中心的各种过程的书史研究模式, 而不是10年前由罗伯特·达恩顿提出的关注以交流圈为中心的各种过程的模式。

Book of Hours 祈祷书

一种非教会人士使用的用于祈祷的宗教书籍, 使用者通常是贵族妇女。流行于11世纪至16世纪间, 处于手抄本与印本书的过渡时期。

Codex 方册抄本

原指系在一起用来书写的木板或象牙板, 这些板子形成了书页。但后来用来指以类似形式装订在一起以羊皮纸制作的手抄本书册。

Communication Circuit 交流圈

1980年代初罗伯特·达恩顿提出的书史研究模型, 强调书籍和印刷品研究中的社会史方法, 其核心是在社会交流过程中考察书籍的位置。

Composing stick 排字盘

在机械排版发明之前, 排字工要用一只手托住与一行文字等长的木条, 另一只手以正确的顺序逐个挑选字母活字, 码放到木条上。然后排好的字行逐一被放到一个平底盘中。下一步是把盘中的字行分成页, 把每页——可能还有雕有插图的木板——在一个版框内固定好, 以备印刷。参见下面的 forme。

Cuneiform script 楔形文字

一种象形文字书写方法。使用带有尖端的书写工具，压印泥板形成楔形笔划。大约公元前3500年至100年盛行于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近东地区。该术语来源于“楔”的拉丁语 *cuneus*。

Digital author 数字化作者

马克·波斯特在《因特网怎么了？》中使用的一个术语，用以定义崛起中的数字技术背景下的作者身份。即，那些在更富流动性、更不稳定的数字环境中出版作品的作者，其中意义并不通过一个印刷的页面来加以固定和复制，而可以通过不同的数字形式进行复制、发挥、重写和转发。

Distribution 拆版

印刷中实际使用的活字对于印刷商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投资，而他们中的大多数资金有限。在每副印版（*forme*，见下）印完之后，学徒们负责将版拆掉，并将活字放回到字柜中原来的位置，以便排字工能够排下一版。

Exemplar 抄写样本

印刷术发明以前由大学当局提供的原始正式抄本，以此为蓝本抄出多个复制本或片段章节供学生们使用。

Forme 印版

排好的活字和雕有插图的木版被放入一个称为 *chase* 的版框中固定好，以待施印。固定在一起的版框和活字被称为印版。

Hieroglyphic script 象形文字

最早的一种书面交流形式，以象形图形或象形符号为基础创制。

自大约公元前3000年起为埃及人广泛使用。

Histoire du Livre 书史

从1980年代开始的一场社会史运动。它建立在年鉴学派书史研究的开创性著作的基础之上，强调将物质文本的研究与社会史以及对读者、读者身份和文本接受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其主要倡导者有罗杰·夏蒂埃和罗伯特·达恩顿。

Imprimatur 出版许可

由君主或教会颁发的印刷某部特定著作的许可证，以徽标的形式标记在书上。

Incunabula 摇篮本

最早的印刷书籍，尤指印于1501年前的书。

Literary field 文学场域

法国社会理论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一个广为人知的术语。用来指称连接生产者（出版商、编辑和作者）与产品（书籍、期刊、文学作品）的一般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竞技场。这些场域的存在使特定的文学等级秩序得以持续，强化了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群体，或形成网络以支持特定类型的文化生产。

New Bibliography 新目录学

20世纪初兴起的一个目录学学派。领军人物是格雷格·弗雷逊·鲍尔斯和麦克科洛等英美学者，提出把文本和书籍作为物质对象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系统研究。

Paratext 副文本

对读者如何理解文本进行控制的阈限性手段，如封面封底、护封广告、索引、脚注、目录、前言和跋语。

Parchment 羊皮纸

以动物皮（通常是绵羊或公羊）制作，以便在其表面进行书写、绘画或印刷。牛皮纸（vellum）也属于这一类型，但质量更高，是用小牛皮或其他一些未成年动物的皮制作的。

Paciae 片段

13世纪以后由抄写员根据手抄本样本复制，供在大学里使用的著作片段。用经过处理和修剪的绵羊皮抄写，每个片段可按对开尺寸叠成4页，或按4开尺寸叠成8页。

Print Capitalism 印刷资本主义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有影响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使用的一个术语。意指一种经济生产制度（资本主义）与一种交流技术（印刷）之间的互动，自1450年代印刷发明——“一个通向我们今天的大众消费和标准化社会的阶段”（Febvre and Martin 1976, 259 – 60）——之后两者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

Print culture 印刷文化

书史研究的另一种表述形式，强调印刷品的生产、发行、接受和与文化的社会关系。它尤其是基于社会交流结构和研究的背景建构的。

Punch 冲压机

以字母原模压制凹形字模的工具。将熔化的金属——一种锡、锑、铅合金——倒入凹形字模中，可铸造出活字。后者与凹形字模相反，文字是凸起的，可用于印刷所需的图文。

Scriptorium 抄写室

修道院里生产或复制手抄本的房间或空间。

Socialization of the text 文本的社会化

杰罗姆·麦克盖恩创造的用语，描述书籍和印刷品如何通过生产过程从私人空间进入公共空间。他强调研究书籍作为社会物品的重要性，这是其中一个方面。

Sociology of the text 文本社会学

1980年代初唐·麦肯锡创造的用语，是他拓展当时目录学研究范围的努力的一部分。他试图将文本分析与年鉴学派和书史（*histoire du livre*）研究的旨趣整合起来，以便兼容并蓄文本的经济、社会、美学和文学意义。

Stereotype 铅版

一种去除因拥有、储存和拆解大量活字而带来的成本的方法，出现于18世纪。从排好活字的印版上翻制膏模，以备需要时以之浇铸整块印版。这种技术受到出版商的欢迎，此前他们不得不付钱给印刷商以保存活字版，或在书需要重印时重新排版。

Typographic fixity 印刷的固化作用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创造的用语，用来指称15世纪在西欧发展起来的印刷技术，能够快速以相同的形式大批量复制同一文本，因而对书面文字接受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书面文字得以以一种印刷下来的、经久不灭的方式被固定下来并得到传播。

索引

李萍 编译

(数字系英文原版页码, 本书中为边码。数字后接“n”表示出现在注释中。)

Adages (Erasmus)《箴言集》(伊拉斯谟)	55
Adams 亚当斯	16
Adams, Thomas R. 托马斯·亚当斯	4,5,7,11,13-14,85, 121,137
Addison, Joseph 约瑟夫·艾迪生	73
Adorno, Theodor 西奥多·阿多诺	124*
Aegean scripts 爱琴海文字	29
Albion press 埃尔比恩印刷机	60
Alembert, Jean Le Rond d' 让·勒朗·达朗贝尔	58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图书馆)	103-104**
alphabet 字母	29
Altick, Richard 理查德·阿尔提克	25,100,110,111
Ambrose, St. 圣安布罗斯	37,113

* 原书为134, 误。

** 原书为113-114, 误。

Amerbach,Johann 约翰·阿默巴赫	51
American Publishers' Association 美国出版者协会	90
analog author 模拟作者	83,137
analytical bibliography 分析目录学	8-9
Anderson,Benedict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5, 7, 19, 91, 93-4, 121, 139
Angus and Robertson 安古斯和罗伯逊	92
annales school 年鉴学派	10-11,19,25,137,138,140
Antwerp 安特卫普	47,55
AOL 美国在线	122
Applegarth, Augustus 奥古斯塔斯·阿普加斯	60
apprentices 学徒	49
Aquinas ,St.Thomas 圣托马斯·阿奎那	32
Aristophanes 阿里斯托芬	103 *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73
Armadale(Collins)《阿玛代尔》(柯林斯)	79
Arndes,Stephen 斯蒂芬·阿恩德斯	51-2
Ascher,M. 阿施	39
Ascher,R. 阿施	39
Aspinwall, Thomas 托马斯·阿斯品沃尔	96
Assmann, Jan 简·阿斯曼	29
Associated Bookseller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大不列颠与爱尔兰图书销售商协会	90
Athenaeum Bureau of Literature 雅典娜神庙文学代理处	97
Atherton, Gertrude 格特鲁德·阿瑟顿	97
Atlantic Monthly,The《大西洋月刊》	98

*原书为13, 误。

Atticus 阿提库斯	104
Augsburg 奥格斯堡	51
Augustine, St. 圣奥古斯丁	37, 113
Australia 澳大利亚	92-93
Austria 奥地利	77
Authority 权威	36-38, 68-69, 80, 81-82, 105-116, 133
Authorship 作者身份	5-6, 20, 21, 62, 66, 84, 126-127, 133, 134
in an industrial age 工业时代的作者	78-80
and authority 与权威	68-69
and book history 与书史	21-24
copyright and payments 版权与报酬	63, 75-77
interpretation 诠释	80-84
manuscript culture 手抄本文化	66-68
patronage 保护人制度	71-73
patrons, publishers and the public 保护人、出版商与公众	73-74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69-71
Aztec script 阿兹特克文字	29
backlist 重版目录	134, 137
Bagdikian, Ben H. 本·巴格迪基安	123*
Balzac, Honore de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79
Barker, Nicolas 尼科拉斯·巴克	4, 5, 7, 11, 13-14, 16, 85, 121, 137
Barnes, James J. 詹姆斯·巴恩斯	96
Barnes, Patience B. 佩兴斯·巴恩斯	96
Barthes, Roland 罗兰·巴特	21-22, 24, 81, 82, 126-127
Basel 巴塞尔	51

* 原书为124, 误。

Baxter, Richard 理查德·巴克斯特	53
Bayly,Chris 克里斯·贝利	39, 53, 91
Bayreuth, Margrave of 拜罗伊特伯爵	72
Beadle Brothers 比德尔兄弟公司	88
Beccaria, Cesare 切萨雷·贝卡利亚	58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56
Belich,James 詹姆斯·贝利奇	91
Benson,Larry C. 拉里·本森	151n
Bentham, Jeremy 杰里米·边沁	58
Bentley's 本特利公司	92,94-95
Berne Convention 《伯尔尼公约》	63,77
Bertelsmann 贝塔斯曼	65,122,134
Bible 圣经	2,30,31,51,110,113
Bibliography 目录学	7,8-9,137
Bibliothèque bleue 《蓝皮书库》	112
bio-bibliography 生平—著述	5,13-14,137
Birkerts, Sven 斯温·伯克茨	120
Bisitun 比索通	103*
Blackwood, John 约翰·布莱克伍德	79
Bloom, Harold 哈罗德·布鲁姆	120
BML(Book Marketing Ltd) 图书销售有限公司	127,128
Boldrewood, Rolf 罗尔夫·博尔德沃德	92
Bolter, Jay David 杰伊·大卫·博尔特	120
Bombay 孟买	92
Bonanza 《富矿脉》	126

*原书为113, 误。

Bonaventure, St. 圣波拿文德	68
Bonham-Carter, Victor 维克托·博纳姆-卡特,	80
book clubs 读书俱乐部	23-24, 99, 116, 127, 128
book history 书史	5, 7, 26-27, 113, 135-136
authorial intention 作者意图	214
bio-bibliographical communication circuit 生平—著述交流圈	13-14
communication circuit 交流圈	12-13
<i>Histoire du Livre</i> 书史	11-12
and mediation 与媒体	25-26
origins 起源	7-9
and print culture 与印刷文化	15-16
reading 阅读	24-25
sociology of text 文本社会学	9-11
theoretical incursions 新理论的介入	14-15
in Western culture 西方文化中的书史	17-21
Book History 《书史》	16
Book of Kells 《凯兰书卷》	45
Book-of - the-Month Club 月读俱乐部	23-24, 99, 125
Books of Hours 祈祷书	105, 107, 137
booksellers 图书销售商	47, 65, 76-77, 86, 89, 90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图书销售商协会	62
Bord na Leabhar Gaeilge 盖尔语图书委员会	131
Bosiis, Andrea de 安德烈·德·波西斯	76
Boswell, James 詹姆斯·博斯威尔	76
Bourdieu, Pierre 皮埃尔·布迪厄	22-3, 62, 83, 98, 139
Bowers, Fredson 弗雷逊·鲍尔斯	5, 7, 89, 139, 151n

Bracciolini, Poggio 波基奥·布拉乔利尼	36, 54
Brands, H. W. 布兰兹	88
Brandt, Sebastian 塞巴斯蒂安·勃兰特	52
Brewer, John 约翰·布鲁尔	73, 74
Brewster, James 詹姆斯·布鲁斯特	86
Briggs, Asa 阿萨·布里格斯	87
Brooks, Douglas 道格拉斯·布鲁克斯	70
Brown, Curtis 柯尔蒂斯·布朗	96
Brown, Cynthia J. 辛西娅·布朗	68, 70, 71, 72, 73
Browning, Robert 罗伯特·勃朗宁	96
Buda 布达	55
Bunyan, John 约翰·班扬	113
Burghes, A.M. A.M. 伯格	96
Burke, Peter 彼得·伯克	87
Burrow, John 约翰·伯罗	141n*
Byron, Lord 拜伦爵士	21, 86
Calcutta 加尔各答	92
Calvin, John 约翰·加尔文	53, 109
Cambridge 剑桥	56
Canada 加拿大	93, 130
Candide (Voltaire) 《老实人》(伏尔泰)	58
Canfora, Luciano 卢西亚诺·坎弗拉	113-114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19, 139
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 (Bernières) 《柯莱利上尉的曼陀林》(贝尔尼埃)	134, 128

* 原书为151n, 误。

Carlile, Richard 理查德·卡莱尔	61
Carlyle, Thomas 托马斯·卡莱尔	96
Carolingian miniscule script 加洛林小写体	31, 45
Castells, Manuel 曼纽尔·卡斯特尔斯	121
Catherine the Great 叶卡捷琳娜二世	58, 59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会	30-31, 37, 53-54, 55, 109, 111
<i>Catholicon</i> 《万灵药》	51
Catullus 卡图卢斯	108
Cavallo, Guglielmo 古利埃尔莫·卡瓦略	45, 102, 103, 104, 105
Cave, Roderick 罗德里克·凯夫	91
Caxton, William 威廉·卡克斯顿	51, 56, 108
Cazenove, C.F. 凯兹诺	96
copyright 审查制度	107-118, 111, 129-130
<i>Century</i> 《世纪》	95
Certeau, Michel de 米歇尔·德·塞都	24
Chakava, Henry 亨利·查卡瓦	91
Chapels 印刷工人工会	60-61
Chapman and Hall 查普曼与霍尔公司	89
Charlemagne 查理曼大帝	31, 45
Charles V 查理五世	73
Chartier, Roger 罗杰·夏蒂埃	42, 53, 57, 79, 82, 83, 104, 105, 110, 151n
<i>Henry VI, pt.2</i> 《亨利六世》第二部	41
<i>Histoire du Livre</i> 书史	11, 19, 138
inventions 发明	21
printing 印刷	48, 49
reading 阅读	20, 24, 25, 100, 112, 113

Chaucer, Geoffrey 杰弗里·乔叟	68-69, 84, 151n
children 儿童	114-115
Chinese script 中国字	29
<i>Christian Examiner</i> 《基督徒审查者》	98
Christian Humanism 基督教人文主义	54-55
Christianity 基督教	30-31, 35, 102, 105
Cicero 西塞罗	54, 104
circulating libraries 巡回文库	89
Clarke, Marcus 马库斯·克拉克	92
<i>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i> 《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	60
Codex 方册抄本	21, 35, 36, 102, 105, 137
Coleridge, Kathleen 凯瑟琳·科尔里奇	91
Collins, Wilkie 威尔基·柯林斯	79, 96
Cologne 科隆	51
Columbian press 哥伦比亚印刷机	60
Combination Acts 1799 《结社法》	61
<i>Comedie Humaine</i> (Balzac) 《人间喜剧》(巴尔扎克)	79
communication 交流	27, 28
communication circuit 交流圈	5, 7, 12-13, 25, 43, 85, 99, 137, 138
bio-bibliographical dimension 生平—著述维度	13-14
digital technologies 数字技术	121
print culture 印刷文化	16
<i>Communist Manifesto, The</i> (Marx and Engels)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	2
composing stick 排字盘	50, 138
compositors 排字工	49-50

Compositors' Association 排字工协会	61
Congreve, William 威廉·康格里夫	73
Conrad, Joseph 约瑟夫·康拉德	96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55
<i>Convivium</i> (Filelfo)《宴会》(菲莱尔福)	76
Cooper, James Fenimore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	96
Cop, Guillaume 纪尧姆·库普	70-71
copyright 版权	5, 21, 22, 56, 62-63, 88, 139
and authorship 与作者身份	6, 66, 75-77, 83
Cornhill Magazine《康希尔杂志》	79
Counter-Reformation 反宗教改革运动	54, 107, 109
Coward, Noel 诺埃尔·考沃德	97
Cowper, Edward 爱德华·考珀	60
Cracow 克拉科夫	55
Crane, Stephen 斯蒂芬·克莱恩	96
critical theory 批评理论	83
Cronin, A.J. 克罗宁	115
cultural production 文化生产	22-23, 62
cuneiform script 楔形文字	29, 30, 138
<i>Cyclopedia</i> 《百科全书》	112
Dana, Richard Henry, Sr 老理查德·亨利·达纳	98
Dante 但丁	108
Darius I 大流士一世	103 *
Darnton, Robert 罗伯特·达恩顿	39, 49, 76
book history 书史	3, 8, 9, 24-25, 50-51

* 原文为 113, 误。

communication circuit 交流圈	4,5,7,12-13,14,16,85,121,137,138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44,57,58,112
<i>Histoire du Livre</i> 书史	11,19
Societe Typographique de Neuchatel 纳沙泰尔印刷学会	112-113
Suard 苏阿尔	72
<i>David Copperfield</i> (Dickens)《大卫·科波菲尔》(狄更斯)	89
Davis, Natalie Zemon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72
de Bury,Richard 理查德·德伯瑞	37-38
<i>De l'esprit des lois</i> (Montesquieu)《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	58
'Death of the Author,The'(Barthes)“作者之死”(巴特)	21-22, 24,81,82,126-127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独立宣言	4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 描述目录学	8-9
Dickens,Charles 查尔斯·狄更斯	63,79,89,96,114
Diderot,Denis 德尼·狄德罗	58,59,112
digital author 数字化作者	83-84,138
digital culture 数字化文化	83-84
digital media 数字媒体	118,119,120,122
Disney Corporation 迪斯尼公司	124
Disraeli,Benjamin 本杰明·迪斯雷利	79
distribution 拆版	50,138
Docherty,Thomas 托马斯·多切蒂	101
<i>Don Quixote</i> (Cervantes)《堂吉诃德》(塞万提斯)	110,112
Donaldson, Alexander 亚历山大·唐纳逊	76-77
Donaldson vs. Becket 唐纳逊诉贝克特	76-77
Doyle, Arthur Conan 阿瑟·柯南·道尔	96

Dreiser, Theodore 西奥多·德莱塞	97
<i>Du Contrat Sociale</i> (Rousseau) 《社会契约论》(卢梭)	58
Duguid, Paul 保罗·杜吉德	13, 119-120
Eadmer of St. Albans 圣艾尔班斯的伊德默	32
Eco, Umberto 翁贝托·埃柯	45
Edinburgh 爱丁堡	56,114
Education Acts 教育法案	61
Egyptian hieroglyphic script 埃及象形文字	29,113,138
Eisenstein, Elizabeth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	5,7,11-12,16,44,46,47,50,51,53,56,57,67,151n
authorship 作者身份	70
typographic fixity 印刷的固化作用	17,18-20,34-35,140
Eliot, George 乔治·埃利奥特	79, 96
Emerson, William 威廉·爱默森	98
<i>Emile</i> (Rousseau) 《爱弥尔》(卢梭)	58
<i>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 《大英百科全书》	4
encyclopedias 百科全书	112
<i>Encyclopedie, L'</i> 《百科全书》	4,44,58,112,113
<i>Endymion</i> (Disraeli) 《恩迪米昂》(迪斯雷利)	79
Engels,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2
Engelsing, Rolf 罗尔夫·恩格尔星	113
<i>English Common Reader, The</i> (Altick) 《英国的普通读者》 (阿尔提克)(1957)	25
English language 英语	108,119,130,131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44,57-59,60,112
Erasmus, Desiderius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	54

Escarpit, Robert 罗伯特·埃斯卡皮	11,25,78,79,88,93-94,137
Eumenes 攸美尼斯	35
Exemplar 抄写样本	46,138
Ezell, Margaret 玛格丽特·伊泽尔	18
Feather, John 约翰·费瑟	49,60, 61, 62, 108,111
Febvre, Lucien 吕西安·费弗尔	16,18,45,46, 47,48,49,51, 52, 55, 56, 57,72,139
<i>Annales</i> school 年鉴学派	11,12 , 137
authorship 作者身份	70
copyright privileges 版权特权	76
Feltes, N .N. 菲尔特斯	62, 94
Ferber, Edna 埃德娜·费博	97
Filelfo, Francesco 弗朗西斯科·菲莱尔福	76
Filippo di Strata 菲利普·迪·斯特拉塔	49
Finkelstein David 戴维·芬克尔斯坦	39, 80, 91
'First Steps 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Darnton)	
“迈向阅读史的头几步”(达恩顿)	24-25
Fischer, Steven R. 史蒂芬·菲舍尔	61,102,103,104,114
Fish,Stanley 斯坦利·菲什	6,100,101,116
fixity 固化作用	17,18-20,35,140
Flint, Kate 凯特·弗林特	111
Ford, Ford Madox 福特·迈多克斯·福特	96
<i>Forgotten Readers</i> (McHenry)《被遗忘的读者：找回非洲裔美国人 识字社团丢失的历史》(麦克亨利)	135
forme 印版	50,138
Forster, John 约翰·福斯特	94, 96

Foucault, Michel 米歇尔·福柯	21-22,24,41,63,81-82, 151n
Foulis brothers 叶弗里斯兄弟	56
Fourdrinier paper-making machine 福德林尼尔机械造纸机	78
Fox, Adam 亚当·福克斯	18
France 法国	76, 77, 88-90, 111,112,130
Frankfurt 法兰克福	47-48
Frankfurt School 法兰克福学派	134
Franklin, Benjamin 本杰明·富兰克林	88
Franklin, Miles 迈尔斯·富兰克林	92
Frederick, Prince of Wales 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	72
Frederick the Great 腓特烈大帝	58
French language 法语	131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59, 61
Friendly Society of Pressmen 压印工友谊会	61
Fritschner, Linda Marie 琳达·玛丽·弗里茨那	94
Froben, Johannes 约翰尼斯·弗洛本	55
Fust, Johann 约翰·福斯特	51
Gaelic Books Board 盖尔语图书委员会	131
Gardiner, Juliet 朱丽叶·加迪纳	15,80,81,82,83,134
Garnett, Edward 爱德华·加内特	94
Gedin, Per 佩·哥丁	79,89
Gekoski, Rick 里克·吉科斯基	1,151n
Genette, Gerard 热拉尔·热奈特	14-15,25
Geneva 日内瓦	53
Germany 德国	51-53,76,77,112
Ghosh, Anindita 阿宁蒂塔·戈什	39

GI Bill of Rights 《士兵福利法案》	64
Gibbon, Edward 爱德华·吉本	73
Giddens, Anthony 安东尼·吉登斯	122
Gillies, Mary Ann 玛丽·安·吉利斯	96
Gilmont, Jean-Francois 让·弗朗索瓦·吉尔蒙特	52,53,54,109
Gingrith, Newt 纽特·金里奇	125
Ginzburg, Carlo 卡罗·金兹伯格	100, 109
Girardin, Emile de 艾米尔·德·吉拉丹	88
Glasgow 格拉斯哥	56
global village 地球村	121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6,21,121-126,135
<i>Golden Bowl, The</i> (James) 《金碗》(詹姆斯)	126
Gomez, Antonion Castillo 安东尼奥·卡斯蒂略·戈麦斯	18
Gomme, Robert 罗伯特·戈姆	96
Goody, Jack 杰克·古迪	17,34
Gorky, Maxim 马克西姆·高尔基	115
Grafton, Anthony 安东尼·格拉夫顿	46,54,108
Greco, Albert 阿尔伯特·格列柯	64,122,124,126
Greece 希腊	32-33
Greek alphabet 希腊字母	29,34
Greenblatt, Stephen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83
Greenspan, Ezra 埃兹拉·格林斯潘	16
Greg, W.W. 格雷格	5,7,8,139,151n
Griest, Guinevere 吉内维尔·格里斯特	89
Griffo, Francesco 弗朗西斯科·格里佛	48
Grove Press 丛树出版社	129

Guild of Venice 威尼斯行会	49
guilds 行会	49, 50
Gutenberg, Johannes 约翰尼斯·古腾堡	18,42,50-51
<i>Gutenberg Galaxy, The</i> (McLuhan)《古腾堡星系： 印刷人的形成》（麦克卢汉）	17,34
Habermas, Jurgen 尤尔根·哈贝马斯	57
Hachette, Louis 路易·阿谢特	89-90
Haggard, Rider 瑞德·哈格德	96
half-profits system 利润对半制度	75
Halifax 哈利法克斯	93
Hall, David D. 大卫·霍尔	79,86,88
Hamesse, Jacqueline 杰奎琳·黑姆斯	46,106
Harlequin 哈雷克因	126,129
HarperCollins 哈珀柯林斯	65, 122, 134
Harris, William V. 威廉·哈里斯	104
<i>Harry Potter and the Order of the Phoenix</i> (Rowling)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罗琳）	125
<i>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i> (Rowling)	
《哈利·波特与哲人之石》（罗琳）	129
Hartley, Jenny 珍妮·哈特利	116, 128
Hawthorne, Nathaniel 纳撒尼尔·霍桑	98-99
Heinemann, William 威廉·海涅曼	97
<i>Henry VI, pt.2</i> (Shakespeare)《亨利六世》第二部（莎士比亚）	41-42,110
Hepburn, James 詹姆斯·赫本	79, 95, 96
Herculaneum 赫库兰尼姆	104
Herman, Edward S. 爱德华·赫尔曼	125-126

hermeneutics 解释学	15
Hickley, William 威廉·希基	96
hieroglyphic script 象形文字	29,113,138
<i>His Natural Life</i> (Clarke)《终身监禁》(克拉克)	92
<i>Histoire du Livre</i> 书史	5,7, 11-12,140, 138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2
Hobbes, Robert George 罗伯特·乔治·霍布斯	92
<i>Hobbit, The</i> (Tolkien)《霍比特人》(托尔金)	1-2
Hodder Headline 霍德-海德兰公司	124
Holly, Flora May 弗洛拉·梅·霍莉	97
Horace 贺瑞斯	72
Horkheimer, Max 马克斯·霍克海默	134
Howsam, Leslie 莱斯利·豪萨姆	26
Hugo, Victor 维克多·雨果	89, 114
Humanism 人文主义	31, 52,54-55 , 67-68, 107, 108
Hume, David 大卫·休谟	58
Hunt, Peter 彼得·亨特	114
Hutten, Ulrich von 乌尔里希·冯·赫顿	52
illuminations 装饰	46
imagined communities 想象的共同体	19,93-94,12
<i>Imagined Communities</i>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	139
Imbert-Colomes, M. 因贝特-科洛姆	113
imprimatur 出版许可	139
incunabula 摇篮本	139
<i>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i> 《禁书目录》	111
India 印度	39,91-92

Indus Valley script 印度河流域文字	29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59-61,66,78-79, 86-87
<i>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es</i> (Rose)	
《英国工人阶级的知性生活》(罗斯)	135
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产权	62-63,70-71,119,139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解释共同体	99,100,101,121
Ireland 爱尔兰	131
Irish Arts Council 爱尔兰艺术委员会	131
Irving, Washington 华盛顿·欧文	96
Isaacson, Walter 沃尔特·艾萨克森	88
Iser, Wolfgang 沃尔夫冈·伊瑟尔	6,25,100,116,127
Israel 以色列	30
Italic type 斜体字	48
Italy 意大利	76
James, Henry 亨利·詹姆斯	126
Jesuits 耶稣会士	55
Jewsbury, Geraldine 杰拉尔丁·朱斯伯里	94-95
Johanson, Graeme 格雷姆·约翰逊	92,93
John Menzies 约翰·孟西斯公司	89,124
Johns, Adrian 阿德里安·约翰斯	5,7,12,19-20,44
Johnson, Samuel 塞缪尔·约翰逊	73
Johnson-Woods, Toni 托尼·约翰逊-伍兹	90
Jonathan Cape 乔纳森·凯普公司	94
Jordan John O. 约翰·乔丹	13
Joseph II 约瑟夫二世	58
Joseph, Michael 迈克尔·约瑟夫	97

Joshi, Priya 普利亚·乔西	39
Journeymen 熟练工	49-50
Joyce, James 詹姆斯·乔伊斯	96
Justice, George L. 乔治·贾斯蒂斯	18
Justinus, Petrus 皮特鲁斯·尤斯蒂努斯	76
Kant, Immanuel 伊曼努尔·康德	58
Keating, Peter 彼得·基廷	79
Ker, N.R. 克尔	67
Kernan, Alvin 阿尔文·克南	19
Kipling, Rudyard 卢德亚德·吉卜林	96
Kirsop, Wallace 华莱士·柯索普	92
Knowles, David 戴维·诺尔斯	67
Knox, John 约翰·诺克斯	109
Koberger, Anton 安敦·柯贝尔格	47,50,51
Koenig press 库尼格印刷机	60,86,87
Kuskin, William 威廉·库斯金	68
La Vigne, Andre de 安德烈·德拉维涅	71
<i>Lady Chatterley's Lover</i> (Lawrence)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	129
Lane, Allen 艾伦·莱恩	63-64
Lang, Andrew 安德鲁·朗格	94
Language 语言	12,19,34,108-119,111,119, 130,131
Latin 拉丁语	12,104,105,108,111
Laurenson, D.T. 劳伦森	79
Lavallée, Danièle 丹尼尔·拉瓦利	39
Lawrence, D.H. 劳伦斯	96,129
Leavis, F.R. 里维斯	80

Lee, Alan J. 艾伦·李	60,61
Leipzig 莱比锡	47
Lemaire, André 安德烈·勒迈尔	30
Lesbia 莱斯比亚	72
Lessing, Gotthold 戈特霍尔德·莱辛	58
Levi-Strauss, Claude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39-41
Lewes, George Henry 乔治·亨利·刘易斯	96
liberation 解放	119,120
libraries 图书馆	113-114,105,114,130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mmission 图书馆与信息委员会	127
Lieber, Maxim 马克西姆·列勃	97
Linear A script 线性文字 A	29
Linear B script 线性文字 B	29
Lisbon 里斯本	55
Literacy 读写能力	60,61,105-116,113,117,119, 127
Literary Agency 文学代理行	96
Literary agents 文学代理	6,62,80,95-98
Literary fields 文学场域	22,23-24,83,98-99,135, 139
Livingstone, Alasdair 阿拉斯代尔·利文斯通	30
Locke, John 约翰·洛克	58
<i>Loi Lang</i> 《雅克·朗法案》	130
London 伦敦	56
Longmans 朗曼	78,79
<i>Lord of the Rings, The</i> (Tolkien) 《指环王》(托尔金)	1-2
Lorimer, Rowland 罗兰·洛里莫	30
Love, Harold 哈罗德·拉弗	16,18,34

Lowry, Martin 马丁·劳里	48,55,107,110
Lubeck 吕贝克	51-52
Luther, Martin 马丁·路德	52,53,109
Lyons 里昂	47,48,55,104
Lyttelton, Lord 利特尔顿勋爵	72
McCalman, Iain 伊恩·麦克卡尔曼	74
McChesney, Robert W.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	125-126
McCleery, Alistair 阿利斯泰尔·麦克克利里	63,116,129
MacDonald, Mary Lu 玛丽·卢·麦克唐纳	93
McDonald, Peter 彼得·麦克唐纳	9-10,11,80,83,98
McGann, Jerome 杰罗姆·麦克盖恩	3-4,13,15,25,116,140
McHenry, Elizabeth 伊丽莎白·麦克亨利	135
McKenzie, Don 唐·麦肯锡	3,5,7,9-11,15,39,60, 91,127,140
McKerrow, R. 麦克科洛	8,139,151n
McKitterick, David 大卫·麦克基德里克	18
McLuhan, Marshall 马歇尔·麦克卢汉	5,7,17,18,34-35,42, 121
Macherel 麦切洛	72
Macmillan 麦克米兰	92
Madras 马德拉斯	92
Madrid 马德里	55
Maecenas 梅塞纳斯	72
Magna Carta 《大宪章》	4
Mainz 美因茨	51
<i>Making Meaning</i> (McDonald and Suarez) 《制造意义： <思想的印刷者>及其他论文》(麦克唐纳与苏亚雷斯)	9-10
<i>Malaeska</i> 《玛丽斯卡》	88

<i>Malheurs de Sophie</i> (Comtesse de Segure)	
《苏菲的烦恼》(塞居尔夫人)	89
<i>Man from Sonwy River, The</i> (Paterson)《来自雪河的人》(帕特森)	92
Manguel, Albert 阿尔伯特·曼古埃尔	33,35,101,109,110
manuscript culture 手抄本文化	32,66-68
manuscripts 手抄本	5,18,45-46
Manutius, Aldus 阿尔都斯·马努提乌斯	47,48,54,55,107,110
Maoris 毛利人	10,39,91
map-making 地图绘制	56-57
Marek, Jane E. 简·马雷克	80
Martin, Henri-Jesn 亨利·让·马丁	16,18,29,45,46,47,48,49,51,52,55
	56,57,72,139
<i>Annales</i> school 年鉴学派	11,12,25,137
authorship 作者身份	70
copyright privileges 版权特权	76
ecclesiastical context 教会背景	30,31
scrolls 卷子	35, 36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2,87
Mauss, Marcel 马塞尔·莫斯	72
Mayans 玛雅人	29,39
meaning 意义	10-11,24-25,116
media 媒体	3
media globalization 媒体全球化	6,121-126,135
mediation 中介	3,7,11,24,25-26,27,134-135
medium 媒体	3
Meier, Werner A. 沃纳·迈耶	124

<i>Mein Kampf</i> (Hitler) 《我的奋斗》(希特勒)	2
memory 记忆	32,33
Menocchio 麦诺齐奥	109
Mentelin, Johann 约翰·曼特林	51
Menzies, John 约翰·孟西斯	89,124
Mercator, Gerard 杰勒德·墨卡托	57
Meredith, George 乔治·梅瑞狄斯	94
Mesopotamian writing 美索不达米亚文字	29
Milan, Duke of 米兰大公	76
Miller, Mark Crispin 马克·克里斯宾·米勒	134-135,126
Milner, Andrew 安德鲁·米尔纳	80,81,82,88
Minnis, Alistair 阿利斯泰尔·米尼斯	68,131n*
<i>Mission Impossible</i> 《职业特工队》	126
missionaries 传教士	91
Mitchell, W. 米切尔	2
Mole, Tom 汤姆·莫尔	86
Monaghan, E. Jennifer 珍妮弗·莫纳汉	26,101,114
Monks 僧侣	45,67,113
Montesquieu, Baron de 孟德斯鸠	58
More, Thomas 托马斯·莫尔	55
Morgan, Edmund S. 埃德蒙·摩根	88
Morley, John 约翰·莫利	94
Moscow 莫斯科	56
Motte, Dean de la 迪安·德拉莫特	88
Mudie, C.E. 米迪	89

*原书为131n, 误。

Muller, Jan-Dirk 简·德克·马勒	38,47,50,51
Munns, Jessica 杰西卡·芒斯	40,41
Murray, John 约翰·默里	21
<i>My Brilliant Career</i> (Franklin) 《我的璀璨生涯》(富兰克林)	92
<i>My Universities</i> (Gorky) 《我的大学》(高尔基)	115*
Nagy, Gregory 乔治·纳吉	113
Nambikwara 南比夸拉	40
<i>Name of the Rose, The</i> (Eco) 《玫瑰之名》(埃柯)	45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NEA) 全国艺术捐赠基金会	127
Net Book Agreement 净价图书协议	62,90,130
Networks 网络	98-99
New Bibliography 新目录学	5,7,8-9,139,151n
New Historicism 新历史主义	83
New York Bureau of Literary Revision 纽约文学修改社	97
New Zealand 新西兰	4,10,39,91
<i>New Zealand Gazette and Britannia Spectator, The</i> 《新西兰报与不列颠观察》	91
News Corporation 新闻集团	65,122
newspapers 报纸	60,87,88,91,92
Newton, Isaac 艾萨克·牛顿	111
Niagara 尼亚加拉	93
Niccoli, Niccolo de' 尼科拉·德·尼科利	36,54
Noegel, Scott B. 斯科特·诺格尔	29,30
<i>North American Review, The</i> 《北美评论》	98
novels 小说	112,114

* 原书为 Cronin, 误。

Nowell, Elizabeth 伊丽莎白·诺维尔	97
Nuremberg 纽伦堡	51
octavo format 八开本形式	48
Oliphant, Margaret 玛格丽特·欧丽梵	94
Oliver, Jean-Pierre 琼·皮埃尔·奥利弗	29
<i>Oliver Twist</i> (Dickens)《奥利弗·忒斯特》(狄更斯)	89
Ong, Walter 沃尔特·奥恩	5,7,17-18,31-33,34,39,42,60,105,121
oral culture 口述文化	2,17,18,28,31-35,133
and Printing 与印刷	60
and written cultures 与书写文化	40,41,42,43
Orality 口述	32,121
<i>Orality and Literacy</i> (Ong)《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奥恩)	17-18,32
Oresme, Nicole 尼高勒·奥雷斯姆	73
Ortelius, Abraham 亚伯拉罕·奥特里乌斯	57
Oudot family 乌铎家族	113
Ovid 奥维德	108
Oxford 牛津	56
<i>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The</i> 《牛津英语词典》	4
Paine, Tom 托马斯·潘恩	60
<i>Pamela</i> (Richardson)《帕梅拉》(理查森)	112
Paper 纸	35-36,78
Paperbacks 平装本	63-64,88
Papyrus 莎草纸	35
Paratext 副文本	14-15,25,139
Parchment 羊皮纸	35,139
Paris 巴黎	55

Parkes, M.B. 帕克斯	45,113
Paterson, A.B. 帕特森	92
Patronage 保护人制度	6,66,71-74
Patten, Robert L. 罗伯特·帕滕	13
<i>Peciae</i> 片段	48,67,106,138,139
Peers, Douglas 道格拉斯·皮尔	39,91
Penguin 企鹅	63-64,116,129
Perris, George Herbert 乔治·赫伯特·伯利斯	96
Petrarch 彼特拉克	54,108
<i>Phaedrus</i> (Plato)《斐德罗篇》(柏拉图)	33
<i>Philobiblion</i> (de Bury)《书之爱》(德伯瑞)	37-38
<i>Philosophes</i> 哲学家	58
<i>Pilgrim's Progress, The</i> (Bunyan)《天路历程》(班扬)	113
Pinker, James Brand 詹姆斯·布兰德·平克	96
Plantin, Christophe 克里斯托夫·普朗坦	47,50,55
Plato 柏拉图	32-33,37-38,112
Pliny the Elder 老普林尼	35
Pliny the Younger 小普林尼	113,104
Poets Laureate 桂冠诗人	74
Pollard, A.W. 波拉德	151n
Pompeii 庞贝	104
Pope, Alexander 亚历山大·蒲柏	58
Pornography 色情文学	112-113
Post-structuralism 后结构主义	83
Poster, Mark 马克·波斯特	83-84,137,138
Poststructuralism 后结构主义	24

Power 权力	28,38-42,43,48-49,56
Prague 布拉格	55
Precia 普里西亚	72
<i>Presse, La</i> 《新闻界》	88
Price, Leah 利厄·普赖斯	16,26
Print capitalism 印刷资本主义	19,139
Print culture 印刷文化	6,15-16,139
'printers of the Mind' (McKenzie) “思想的印刷者” (麦肯锡)	9-10
Printing 印刷	17-18,42,44-45,65,134
and authorship 与作者身份	5-6,66
changing business models 变化的商业模式	86-90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传播方式	90-93
continuity and changes 延续与变迁	46-48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57-59
Gutenberg and Germany 古腾堡与德国	50-52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59-61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知识产权	62-63
knowledge and power 知识与力量	55-57
and national cohesion 民族凝聚力	93-94
nineteenth century 十九世纪	61-62
paperbacks 平装书	63-64
and reading 与阅读	107-121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	52-54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54-55
pread in Europe 在欧洲的传播	48-50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二十世纪以后	64-65

typographic fixity 印刷的固化作用	18-20
<i>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The</i> (Eisenstein)	11-12, 18-20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爱森斯坦)	12
Protestant Reformation 新教改革运动	52-54, 55, 60, 107, 108-109
Przyblyski, Jeannene M. 珍妮恩·普瑞兹布利斯基	88
Ptolemy 托勒密	35, 57
Publishers 出版商	47, 61, 62, 64-65, 78, 89-90, 134
copyright and payments 版权与报酬	75-77
future of the book 书籍的未来	131-132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122-125
patronage 保护人制度	73-74
readers and agents 读者与代理	94-98
and state 与国家	130-131
Publishers' Association 出版者协会	62, 90
Publishers' readers 出版商审稿人	6, 94-95, 97-98
punch 冲压机	140
punctuation 标点	31, 36
Putnam, George Haven 乔治·哈温·普特南	79
PWC (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普华永道	131
Quebec 魁北克	93
Quintilian 昆体良	105
Radicati de Primeglio, C. 拉迪卡蒂·德·普里麦格里奥	39
Radway, Janice 贾妮斯·拉德威	6, 23-24, 83, 99, 100, 116, 121, 125
railway bookstalls 铁路报刊亭	89, 114
'Railway Library' “铁道书库”	62
Random House 兰登书屋	134-135

Ranson, Jean 让·兰森	113
Raynal, Abbe 瑞纳神甫	72
<i>Reader, The</i> (Schlink) 《朗读者》(施林克)	100-101, 116
reading 阅读	6, 37, 42, 100-102, 117, 118, 134
and book history 与书史	24-25
early history 早期历史	102-115
future of the book 书籍的未来	126-129, 132
and industrialization 与工业化	113-115
limits 局限	111
Middle Ages 中世纪	105-117
nature of 性质	115-117
popular 畅销书	111-113
and printing 与印刷	107-111
<i>Reading the Situation</i> (BML) 《阅读当下》(图书销售有限公司)	127, 128
Reclam 雷克拉姆	116
Reed, David 大卫·里德	87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	52-54, 55, 60, 107, 108-109
reliability 可靠性	20
religion 宗教	102-113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54-55, 69-71, 107
repetition 重复	32
Retail Price Maintenance 零售价格控制	130
Reuchlin, Johannes 约翰尼斯·罗伊希林	52
Reynolds, Paul Revere 保罗·里维尔·雷诺兹	97
Richardson, Samuel 塞缪尔·理查森	112
Rigby, Elizabeth 伊丽莎白·里格比	94

<i>Rights of Man</i> (Paine)《人权论》(潘恩)	60
<i>Robbery Under Arms</i> (Boldrewood)《武装抢劫》(博尔德沃德)	92
Robertson, George 乔治·罗伯逊	92
<i>Robinson Crusoe</i> (Defoe)《鲁滨逊漂流记》(笛福)	112
<i>roman feuilleton</i> 连载小说	88-89
Rome 罗马	35,104-115
<i>Romola</i> (Eliot)《罗慕拉》(艾略特)	79
Rose, Jonathan 乔纳森·罗斯	6,16,100,115,135
Rose, Mark 马克·罗斯	22,63,70-71,77
Ross, Trevor 特雷弗·罗斯	22
Rousseau, Jean-Jacques 让·雅克·卢梭	58,59,113
Routledge, George 乔治·路特里奇	62
Rowling, J.K. 罗琳	125,128,129-130
royalty system 版税制度	75,79
Rubin, Joan Shelley 琼·谢莉·鲁宾	26
Rushdie, Salman 萨尔曼·拉什迪	130
Saenger, Paul 保罗·桑格	105,107
Salonika 萨洛尼卡	55
Sand, George 乔治·桑德	89
<i>Satanic Verses</i> (Rushdie)《撒旦诗篇》(拉什迪)	130
Schiffirin, André 安德烈·希夫林	65,134
Schleiermacher, F. D. E. 施莱尔马赫	80
Schlink, Bernhard 本哈德·施林克	100-111,116
Schmandt-Besserat, D. 施曼德-贝赛拉特	29
Schneirov, Matthew 马修·施内罗夫	88,95
Schoffer, Johann 约翰·舍费尔	51

Schoffer, Peter 彼得·舍费尔	51
Scipio Africanus 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	72
Scotland 苏格兰	56
Scott, Walter 沃尔特·斯科特	114
scribes 抄写员	45,67
<i>scriptorium</i> 抄写室	45,46,51,67,140
scrolls 卷子	35,36
Secord, James 詹姆斯·斯科德	87
Ségur, Comtesse de 塞居尔夫人	89
<i>Seuils</i> (Genette) 《门槛》(热奈特)	14-15
<i>Sforziade</i> (Simoneta) 《斯福尔扎颂》(西蒙内塔)	76
Shakespeare, William 威廉·莎士比亚	8,20,41-42,110,151n
SHARP(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Authorship, Reading and Publishing)	
作者、阅读与出版史学会	3
Sheehan, Donald 唐纳德·希恩	97
<i>Siècle, Le</i> 《时代》	88
Simoneta, Jean 让·西蒙内塔	76
Simpson, Lewis 刘易斯·辛普森	98
Sinai Peninsula 西奈半岛	29-30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58
Smith, George 乔治·史密斯	79
Smith, W.H. 史密斯	89,114,124
social communication 社会交流	4,17-18,21,19-31
socialization of the text 文本的社会化	5,7,13,15,140
Societe Typographique de Neuchatel (STN) 纳沙泰尔印刷学会	112-113
Society of Authors 作家协会	62,90

Society of Jesus 耶稣会	55
sociology of the text 文本社会学	5,7,9-11,15,140
Socrates 苏格拉底	32-33,105
Spain 西班牙	38-39
<i>Spycatcher</i> 《抓间谍者》	130
Stanhope Press 斯坦霍普印刷机	60
<i>Stars Look Down, The</i> 《群星俯瞰》	115
state 国家	5,6,28,61,129-131
Stationers' Company 书业公会	49,62,77,111
Steele, Richard 理查德·斯梯尔	73
stereotyping 铅版	60,140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	55
Stowe, Harriet Beecher 哈里特·比彻·斯托	2
Strasbourg 斯特拉斯堡	51,53
Structuralism 结构主义	82-83
<i>Studia humanitatis</i> 人文研究	54
Suard, Jean-Baptiste-Antoine 让·巴普提斯特·安托万·苏阿尔	72
Suarez, Michael F. 米歇尔·苏亚雷斯	9-10,11
subscription publishing 订购出版	75
Sulla, Faustus 福斯图斯·苏拉	104
Sumerian cuneiform 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	29
supersession 取代	119-120
Sutherland, John 约翰·萨瑟兰	9,62,79
Sweden 瑞典	113
Swinburne, Algernon 阿尔杰农·斯温伯恩	96
Swingewood, A. 斯温吉伍德	79

Tanselle, G.T. 坦瑟勒	9
tax collecting 收税	102,103
Taylor, Andrew 安德鲁·泰勒	67,68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技术决定论	119-121
Tennyson, Alfred 艾尔弗雷德·坦尼森	96
Text 文本	2
and contexts 与背景	27
and copyright 与版权	77
socialization of 社会化	5,7,13,15,140
sociology of 社会学	5,7,9-11,15,140
textual studies 文本研究	15
Thackeray, William Makepeace 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	89,96
Theresa of Avila, St. 阿维拉的圣特雷莎	109-110
Thomas, Marcel 马塞尔·托马斯	66
Thomas Aquinas, St. 圣托马斯·阿奎那	32
Thomson, James 詹姆斯·汤姆逊	72
Thoth 透特	33
Ticknor, William 威廉·蒂克纳	98
Time-Warner 时代华纳	122
<i>Times, The</i> 《泰晤士报》	60,87
Tinker, Nathan 内森·廷克	18
<i>To Renew America (Gingrich)</i> 《重塑美国》(金里奇)	125
Tolkien, J. R. R. 托尔金	1-2,15ln
Tompkins, Jane 简·汤普金斯	98
Torah 律法书	31
Toronto 多伦多	93

Transaction 交流	14
Trappel, Josef 约瑟夫·特拉佩尔	124
Traue, J.E. 特拉乌	91
Treaty of Waitangi 《怀唐依条约》	4,10,39,60,91
<i>Tristes Tropiques</i> (Levi-Strauss)《忧郁的热带》(列维·斯特劳斯)	40
Troyes 特鲁瓦	112,113
trust 信任	20-21
truth 真理	37-38
Tunstall, Jeremy 杰里米·滕斯托尔	121
typographic fixity 印刷的固化作用	17,18-20,35,140
‘Typography and Meaning’ (McKenzie) “印刷与意义： 威廉·康格里夫的案例” (麦肯锡)	10-11
Ulm 乌尔姆	51
<i>Umanisti</i> 人文主义者	54
<i>Uncle Tom's Cabin</i> (Stowe)《汤姆叔叔的小屋》(斯托)	2
<i>Understanding Media</i> (McLuhan)《认识媒体》(麦克卢汉)	17,34
Universal 环球公司	123
Universal Copyright Convention《世界版权公约》	63
universities 大学	106
Unwin, Rayner 雷纳·安温	1
Unwin, Stanley 斯坦利·安温	1
US:Book-of-the-Month Club 美国：月读俱乐部	23-24,99
literary agents 文学代理	97
literary networks 文学网络	98-99
paperbacks 平装书	64

*原书为124，误。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出版与印刷	87-88
reading 阅读	61,127
Valencia 瓦伦西亚	55
Vellum 牛皮纸	35*,139
Venice 威尼斯	48,55
Verne, Jules 儒勒·凡尔纳	114,115
Vespasiano de Bisticci 维斯帕西亚诺·达比斯提奇	46
Vinolanda 维诺兰达	104
Vivendi 维旺迪	124
Voltaire 伏尔泰	58,59
volumen 书卷	35
W. H. Smith 史密斯	89,114,124
Waitangi, Treaty of 《怀唐依条约》	4,10,39,60,91
Warner, Sophie 索菲亚·华纳	98-99
Watson, James 詹姆斯·沃森	56
Watt, Alexander Pollock 亚历山大·波洛克·瓦特	96
Watts-Dunton, Theodore 西奥多·瓦特斯-丹顿	96
Waugh, Arthur 阿瑟·沃	94
<i>Wealth of Nations, The</i> (Smith) 《国富论》(斯密)	58
Wells, H.G. 韦尔斯	96,118
Wernick, Andrew 安德鲁·韦尼克	82
West, James L. W, III 詹姆斯·韦斯特三世	64,80,97,114
'What is an Author?' (Foucault) “作者是什么？”(福柯)	22, 24, 81-82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Darnton)	
“书史是什么？”(达恩顿)	12-13

* 此页码为译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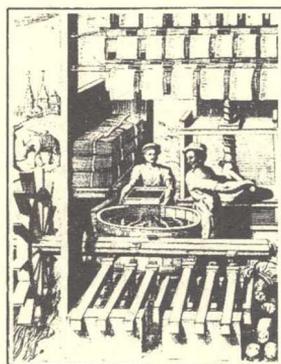
What's the Matter with the Internet?(Poster)

《因特网怎么了?》(波斯特)	83-84,137,138
<i>When the Sleeper Awakes</i> (Wells)《当沉睡者醒来》(韦尔斯)	118
Whipple, E. P. 惠普尔	98
Whyte, 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怀特	97
Wikipedia 维基百科	121
William Blackwood & Sons 威廉·布莱克伍德父子公司	92
Williams, Raymond 雷蒙德·威廉姆斯	73,95
Winfrey, Oprah 奥普拉·温弗利	99,116,127
Winship, Michael 迈克尔·温希普	26
Wirtén, Eva Hemmungs 伊娃·海芒斯·沃顿	120,126,129
Wittmann, Reinhard 莱因哈德·威特曼	112,113
Wogan-Browne, Jocelyn 乔斯林·沃根-布朗	68,69,141n
Wolfe, Thomas 托马斯·伍尔夫	97
women 妇女	128
World War Two 第二次世界大战	64
Woudhuysen, Henry 亨利·伍德豪森	18
Writer's Literary Bureau 作家文学事务所	97
writing 书写	5,17,28,42-43,133
authority and the individual 权威与个人	36-38
manuscripts 手抄本	45
and oral traditions 与口述传统	31-35
and power 与权力	38-42,48
and reading 与阅读	101
social communication 社会交流	29-31
technological shifts 技术变迁	35-36

Zainer, Gunther 冈瑟·蔡纳	51
Zainer, Johann 约翰·蔡纳	51
Zell, Ulrich 乌尔里希·泽尔	51
Zurich 苏黎世	51



本书全面介绍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变化趋势、学术流派和理论方法，是一本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全面回顾西方书史研究历程的精彩之作。在西方学术界、知识界，它既是初涉书史的入门读物，也是读者掌握书史理论发展脉络和趋势的案头必备。



<http://www.cp.com.cn>

ISBN 978-7-100-08473-4



9 787100 084734 >

上架建议：学术文化

定价：36.00 元